

经济开发与 环境变迁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的江汉平原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Academic Library

Wuhan University

杨果
陈曦 著

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的江汉平原

杨果 陈曦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 表 目 录

| | | |
|-------|-------------------------|------|
| 图 1-1 | 清乾隆年间枝江县上、下百里洲示意图 | 28 |
| 图 1-2 | 清光绪年间荆州万城大堤全图 | 34 |
| 图 2-1 | 荆江大堤形势图 | 50 后 |
| 图 2-2 | 清同治年间监利县古迹图 | 85 |
| 图 2-3 | 清同治年间上、下百里洲示意图 | 101 |
| 图 2-4 | 清同治年间石首县东乡示意图 | 122 |
| 图 3-1 | 清代荆江南岸四口分流示意图 | 135 |
| 图 3-2 | 民国初年江陵县堤防示意图 | 155 |
| 图 3-3 | 民国初年监利县堤防示意图 | 158 |
| 图 3-4 | 清乾隆年间石首县北乡示意图 | 164 |
| 图 3-5 | 民国初年石首县堤防示意图 | 168 |
| 图 3-6 | 民国初年枝江县堤防示意图 | 176 |
| 图 3-7 | 民国初年松滋县堤防示意图 | 178 |
| 图 3-8 | 民国初年公安县堤防示意图 | 184 |
| 图 3-9 | 清末华容河及两岸堤垸示意图 | 187 |
| 图 4-1 | 唐宋时期荆襄道示意图 | 217 |
| 图 5-1 | 宋元江汉平原聚落分布示意图 | 256 |

| | | |
|-------|------------------------------|-----|
| 图 5-2 | 宋代鄂州城平面布局示意图 | 268 |
| 图 5-3 | 清乾隆年间江陵县捕厅图 | 328 |
| 图 5-4 | 清乾隆年间石首县西乡图 | 336 |
| 图 5-5 | 清同治年间公安县全境图 | 343 |
| 表 1-1 | 宋代志书所记上荆江洲滩一览表 | 19 |
| 表 1-2 | 清乾隆时期江陵、公安县江心洲分布表 | 31 |
| 表 1-3 | 清光绪时期江陵县新增江心洲分布表 | 32 |
| 表 1-4 | 清代江陵县边滩一览表 | 33 |
| 表 1-5 | 清乾隆时期石首河段洲滩分布表 | 41 |
| 表 1-6 | 清同治至光绪时期石首河段新增洲滩表 | 42 |
| 表 1-7 | 清康熙、乾隆时期监利河段洲滩分布表 | 44 |
| 表 1-8 | 清同治至光绪时期监利河段新增洲滩表 | 45 |
| 表 2-1 | 清代江陵县江北岸月堤简表 | 79 |
| 表 2-2 | 清代监利县堤防决、塞简表 | 89 |
| 表 2-3 | 清康熙、同治年间监利县上、中、下乡江堤名称表 | 93 |
| 表 2-4 | 清康熙至乾隆前期监利县月堤修筑简表 | 94 |
| 表 3-1 | 清咸丰九年监利县各垸名称一览表 | 159 |
| 表 3-2 | 清乾隆时期石首县荆江北岸垸田简表 | 165 |
| 表 3-3 | 清代石首县垸田发展简表 | 169 |
| 表 3-4 | 清同治年间公安县垸田分布简表 | 180 |
| 表 3-5 | 清同治至民国初年公安县垸田简表 | 182 |
| 表 4-1 | 唐宋时期襄州、江陵府、鄂州户数一览表 | 216 |
| 表 4-2 | 宋元江汉平原茶、果木林、药材分布简表 | 230 |
| 表 4-3 | 梁子湖宋代瓷窑简表 | 243 |
| 表 4-4 | 斧头湖宋代瓷窑简表 | 244 |
| 表 5-1 | 宋元江汉平原洪涝灾害简表 | 284 |
| 表 5-2 | 宋元江汉平原旱灾一览表 | 288 |
| 表 5-3 | 宋元江汉平原地震、风灾一览表 | 290 |
| 表 5-4 | 南宋江汉平原饥荒情况简表 | 294 |
| 表 5-5 | 清光绪年间万城堤部分水神庙分布简表 | 348 |

内 容 简 介

本书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立足于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借鉴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心，上溯其源自唐、五代，下察其流至民国初年，着重从河道变迁、堤防修筑、农田垦殖、资源利用诸方面探讨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史，研究开发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重现其过程，揭示其发展道路及演变的机制、规律与特点。

全书正文五章，依次探讨：第一，荆江洲滩的演变与河道的变迁。重点分析边界条件、来水来沙、环流等自然因素及唐宋以来日益增强的堤防修筑、上游垦殖等人类活动对荆江洲滩演变及河道变迁的影响。第二，以长江干堤为中心的堤防修筑。分别考察长江干堤与其他江汉支流、主要河湖的堤防分布与兴衰，探讨堤防作为基本前提与保障对本区经济开发的作用，以及堤防扩展对本区人、地、水环境产生的日渐加大的干扰。第三，穴口演变与农田垦殖。细致研究荆江南岸分流四口（松滋口、虎渡口、藕池口、调弦口）的变迁历程及其原因，集中探讨穴口分塞与本区以垸田为主的农田垦殖的关系，兼及垸田之外传统垦殖方式的延续。第四，经济开发与自然资源利用。其中水、土资源是核心，水路交通的发展与林木

植被的利用则是重点；同时以今江夏地区考古所见当地陶瓷业的兴衰为个案，聚焦分析陶瓷业与植被资源的关系。第五，社会生活及其环境特色。探讨的主要内容是聚落的分布与变迁，自然灾害的种类、分布与影响，乡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以及水神信仰所反映的区域人地关系，贯穿诸问题的主线，仍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

在正文的基础上，本书以结语总括了历史时期江汉平原人地关系的演变大势，并集中提炼出宋元明清时期江汉平原人地关系的几个主要特点，如降水、降温等气候变化推动了本区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以堤防为核心的人类活动从根本上影响着本区地理面貌的变迁，水、土、植被等资源的状况制约着本区的开发进程，区域环境的特征造就了生活方式的特色；并强调江汉平原人地关系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与相当复杂的多样性。

目 录

| | |
|-------------------------|----|
| 绪 言 | 1 |
| 一、江汉平原自然环境及其演变趋势 | 1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7 |
| 三、本书结构 | 15 |
| 第一章 荆江洲滩的演变与河道的变迁 | 17 |
| 第一节 上荆江洲滩的演进 | 17 |
| 一、南北朝至南宋期间 | 18 |
| 二、明清时期 | 22 |
| 三、洲滩的发展与河道的演变 | 35 |
| 第二节 下荆江洲滩的变化 | 39 |
| 一、石首县 | 40 |
| 二、监利县 | 43 |
| 本章小结 | 47 |
| 第二章 堤防修筑：以长江干堤为中心 | 49 |
| 第一节 荆江北岸堤防的发展 | 52 |

| | |
|-----------------------------|-----|
| 一、江陵县 | 52 |
| 二、监利县 | 81 |
| 第二节 荆江南岸堤防的发展 | 97 |
| 一、枝江县 | 97 |
| 二、松滋县 | 105 |
| 三、江陵县 | 111 |
| 四、公安县 | 112 |
| 五、石首县 | 116 |
| 第三节 荆江以下江汉平原长江段堤防的发展 | 124 |
| 一、华容县与巴陵县 | 124 |
| 二、嘉鱼县 | 125 |
| 三、汉阳县、江夏县等 | 127 |
| 本章小结 | 131 |
| 第三章 穴口演变与农田垦殖 | 133 |
| 第一节 荆江分流穴口的演变 | 133 |
| 一、南岸分流四口开塞考 | 136 |
| 二、北岸穴口的湮塞：以郝穴为中心 | 143 |
| 第二节 江汉平原垸田的兴起与发展 | 145 |
| 一、垸田的兴起 | 146 |
| 二、垸田的发展 | 149 |
| 第三节 垸田之外：传统垦殖方式的延续 | 191 |
| 一、水利与屯田、营田的发展 | 191 |
| 二、农业生产方式与主要作物分布 | 200 |
| 本章小结 | 207 |
| 第四章 资源利用：河流、丘陵与植被 | |
| ——以宋代为例 | 209 |
| 第一节 水路交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209 |
| 一、艳曲的散去：荆襄道在宋代的衰落 | 210 |
| 二、水路交通网络的出现 | 218 |

| | |
|---|-----|
| 三、水路交通发展对经济开发的促进 | 222 |
| 第二节 林牧副业与丘陵山地开发 | 227 |
| 一、山田的开发与利用 | 227 |
| 二、经济林特产开发 | 230 |
| 第三节 手工业发展与植被资源利用 | 233 |
| 一、宋元江汉平原植被资源概况 | 233 |
| 二、造船业与矿冶业 | 235 |
| 三、宋代江夏地区制瓷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探析 ——以考古资料为中心 | 242 |
| 本章小结 | 252 |
| 第五章 宋元江汉平原社会生活 | 253 |
| 第一节 宋元江汉平原聚落的变迁及其环境因素 | 253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253 |
| 二、聚落变迁的主要特征 | 255 |
| 三、影响聚落变迁的环境因素 | 259 |
| 四、个案分析：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及其 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262 |
| 第二节 宋元江汉平原自然灾害探析：种类、 分布、影响 | 283 |
| 一、自然灾害的种类与时空分布特征 | 283 |
| 二、自然灾害对区域社会的影响 | 291 |
| 第三节 宋诗所见江汉平原农村日常生活 | 296 |
| 一、农耕品种及耕作技术 | 296 |
| 二、捕捞渔业及相应的生产方式 | 303 |
| 三、饭稻羹鱼 | 307 |
| 四、稳定或多变的民居 | 310 |
| 五、日常生活的环境特色 | 313 |
| 第四节 从水神信仰看荆江两岸人地关系的演变 ——以水神庙址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为例 | 314 |
| 一、自然神类 | 315 |

| | |
|-----------------------------|---------|
| 二、人格神类 | 326 |
| 三、余论 | 347 |
| 本章小结 | 350 |
| 结 语 | 352 |
| 一、历史时期江汉平原人地关系的演变大势 | 352 |
| 二、宋元明清时期江汉平原人地关系的主要特点 | 358 |
| 主要参考文献 | 362 |
| 后 记 | 388 |

绪 言

一、江汉平原自然环境及其演变趋势

江汉平原位于今湖北省中南部，由于其东部以长江为纽带与下游滨江平原联系在一起，边界难以确定，因此关于江汉平原地域范围的界定，分歧较大，迄今没有统一的标准。狭义的江汉平原，通常指西起枝江，东迄武汉市阳逻镇，北自荆门、钟祥南境和京山、应城（皆今湖北省同名县市）一带岗丘边缘，南抵长江干流的区域；广义的江汉平原，以平原外围 50 米等高线为界，西起枝江，东至武穴市田家镇，北沿汉水、沮水达钟祥和安陆，南至湘鄂边界。^① 本书的讨论以区域开发与环境变迁为核心，这一主题与自然环境的演变直接相关，因此在地理范围的界定上，本书主要依据地

^① 邓先瑞等：《关于江汉平原城市群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邓文”，载《经济地理》第 17 卷第 4 期，1997 年 12 月）对此有介绍，“邓文”所定江汉平原的地域范围为东起黄石，西抵宜昌，北沿汉水、沮水，抵达钟祥、安陆市，南与湖南接壤，包括今湖北 29 县市。“邓文”所指“江汉平原”主要按当代城市这种社会经济（同时也是地域的）实体来确定，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经济区域，与本书所注重的地貌单位不同，故不取此说。

貌类型,大致以平原外围 50 米等高线为界,西起枝江,东至武汉,北达钟祥、安陆,南接洞庭湖平原,介于北纬 $29^{\circ}26'$ — $31^{\circ}10'$,东经 $111^{\circ}45'$ — $114^{\circ}16'$ ①,包括今湖北省直辖的天门市、仙桃市、潜江市,孝感市的汉川,荆州市的荆州、沙市、江陵、公安、监利、石首、洪湖,荆门市的沙洋等 12 县市(区)的全部;武汉市,宜昌市的枝江,荆州市的松滋,孝感市的孝南、应城、安陆、云梦,荆门市的东宝、掇刀、钟祥、京山等县市(区)的平原部分,面积共约 3 万多平方公里。

(一) 地貌

江汉平原是长江与汉水共同冲积及附近湖泊淤积而成的湖积、冲积平原,由现代构造运动和河流冲积共同作用而成,在现代地貌上由三个河间洼地所组成,自北向南依次为天门河与汉水之间的刁汴湖洼地,汉水与东荆河之间的排湖洼地以及长江与东荆河之间的四湖洼地。其地貌组合特点是以长江、汉水为主导,河流呈带状分布,高起的天然或人工堤与条状的河间洼地平行,地表“太平小不平”,而以长江北面长湖—三湖—白露湖—洪湖四湖洼地为核心的地带地势最低,范围最广,俗称“水袋子”,是江汉平原的中心地区。②从平原中心的低地,渐次向外呈梯级上升为岗地、丘陵,这种地貌形势有利于河流梯级开发,但也易造成严重的内涝外洪,尤其是荆江河段③,河曲发育,水涨堤高,形成“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势。④

在江汉平原地貌中,人工地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已逐渐

① 参见本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参见蔡述明等著《江汉平原四湖地区区域开发与农业持续发展》,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 页;金伯欣主编《江汉湖群综合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 页。

③ 指长江从湖北枝城到湖南城陵矶的河段,全长约 340 公里。

④ 参见湖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地理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18~522 页;景才瑞、刘昌茂、郭柏林《荆江河曲地貌特征》,载《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 4 期。

演变成为一种控制区域环境演变的重要地貌类型。堤防即是本区最重要的人工地貌之一。早在唐宋以前,人们为防御洪水的威胁,已开始江边湖滨修筑堤坝;后来为了加固大堤,又兴起了护岸工程,如修建矶头、垒石护坡等。在今天的平原区内,江堤、河堤、湖堤、垸堤等数量众多,密如蛛网,人工地貌与自然地貌共同形成了一种自然—人工地貌体系。^①

(二) 气候与土壤、植被

从气候条件来看,江汉平原处于北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热量充足,为大陆性亚热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为 16°C — 17°C , 5—9月平均温度大于 22°C , 最热月均温为 28°C , 极端高温可达 40°C , 最冷月均温为 3°C , 极端低温为 -16°C 。平原区日照时数为 1800—2100 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40%—50%; 年均太阳辐射总量 417 000—489 000 J/cm^2 (每平方厘米焦耳), 有利于作物生长的 $\geq 10^{\circ}\text{C}$ 年均活动积温 4800°C — 5400°C , 无霜期 240—275 天。^② 平原年降水量丰富,为 1000—1500 毫米。降水年内分配不均匀,夏半年由于来自南方的温湿气候的影响,降水丰富,以 6—9 月最为集中,占全年的约 70%; 冬半年在北方干冷气流的控制下,降水较少。^③

作为典型的冲积、湖积平原,江汉平原分布着深厚、肥沃的土壤。耕作土壤以水稻土和潮土为主,水稻土又可进一步分为潴育型水稻土、潜育型水稻土和沼泽型水稻土等亚类。其中,沼泽型水稻土是一种受地表水和地下水浸润的土壤,潴育型水稻土和潜育型水

① 参见穆桂春、谭术魁《人工地貌初探》,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0年第4期; 阎国年《长江中游湖盆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及地貌的再现与模拟》,测绘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② 参见乔盛西等编著《湖北省气候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4页; 刘海燕、曹艳英《江汉平原湿地开发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载《地理学与国土研究》第14卷第2期,1998年5月。

③ 乔盛西、唐文雅:《中国亚热带气候》,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稻土则涉及土壤的形成过程。^① 在江汉平原区, 潜育型水稻土熟化程度高, 土体发育完整, 地下水位较低, 是水稻种植的理想土壤。潜育型水稻土和沼泽型水稻土通常称作“低湖田”, 地下水位高, 长期渍水, 宜于种植单季稻。潮土主要分布在高亢地带, 质地以壤质为主, 土体疏松, 地下水位低, 水、肥、气、热较协调, 自然肥力高, 耕性良好^②, 适于种植其他旱地作物。

湿润的气候条件, 使本区生长的地带性植被为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③ 但是, 由于长期以来人类活动的影响, 原生植被早已遭到严重的破坏, 仅在低丘或边缘垄岗平原和蚀余丘陵上有少量残存, 大部分地区已辟为农田, 作物以水稻、小麦、棉花为主。在湖区水域及其边缘地带有大量的水生和沼生植物, 如芦苇、苔草及藻类植物。在低丘及村落周围, 有一些次生林和人工栽培林。^④

① 潜育化过程指土壤形成中的氧化-还原过程, 主要发生在直接受到地下水浸润的土层中, 由于地下水在雨季升高, 在旱季下降, 使该土层干湿交替, 而引起铁、锰化合物发生移动或局部淀积, 形成一显有锈纹、锈斑以及含有铁锰结核的土层, 称为潜育层。潜育化过程指在土体中发生的氧化还原过程, 在整个土体或土体的下部, 因长期被水浸润, 空气缺乏, 几乎完全处于闭气状态,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势(简作“Eh”, 氧化剂与还原剂浓度比, 用来表示氧化还原状态, 计量单位用“伏”v或“毫伏”mv。Eh值越大则氧化势越高。Eh值在200—700毫伏之间为正常, 低于此值意味着土壤缺氧, 高于此值则表示土壤酸性增加)一般均低于250mv, 有的甚至为负值, 有机质在分解过程中产生较多的还原性物质, 高价铁锰转化为亚铁锰, 从而形成颜色呈蓝灰或者青灰的还原层次, 称为潜育层。参见李天杰等编《土壤地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第117页。

② 参见蔡述明等著《江汉平原四湖地区区域开发与农业持续发展》关于土地资源评价的内容, 第10页; 易朝路、蔡述明等《江汉平原(四湖地区)和洞庭湖区湿地的分类与分布特征》, 载《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第6卷第1期, 1998年3月。

③ 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植被编辑委员会《中国植被》, 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④ 参见李文滢等《湖北江汉平原及神农架山区晚第四纪植被与环境》, 载《中国北、中亚热带晚第四纪植被与环境研究》, 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

（三）水系

气候暖湿，水汽来源充足，降水丰沛，加上有众多的河流发源于平原四周的山地，使得江汉平原水文形成一个重要的特色：四周众水汇注，河港纵横，湖泊星罗棋布。

平原内水系发育大致以长江为界，分为北、南两大部分：北部江汉平原以长江、汉水为主干，组成复杂的水系，区内较大河流有14条，加上人工开挖的渠道，与众多的湖泊构成河湖交错的水网。受地形的影响，绝大多数河流都是向南、向南偏东或向东偏北（与长江流向平行）方向流去。^① 每年江汉平原地表径流总量约6338亿立方米，径流深度400—800毫米。长江是江汉平原南部最大的河流，它出三峡后，东流偏南，汇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来水，经武汉市往东，转东南出平原，入江西、安徽省境，东去入海。汉水是长江的最大支流，它从陕西入境，穿越鄂西北及鄂北岗丘后，南转，过钟祥南境，下游蜿蜒进入江汉平原，在境内由潜江转东（偏南）达仙桃市，然后大致向东（偏北），至武汉市汇入长江。其他支流还有沮漳河（南流，转东）、内荆河（自洪湖引水，东流偏北入江）、东荆河（自汉水南流，转东入长江）等，以及长江南侧的松滋河、虎渡河、藕池河等；入汉水的则有通顺河、天门河。

简言之，江汉平原区水系是以长江、汉水为主要脉络，形成纵横交错的河湖系统，具有舟楫、灌溉、养殖等多种功能，是本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四）江汉平原自然环境的演变

上述当前的地貌、气候、土壤、植被，尤其是水系方面的自然地理条件，既是古气候、水文、植被、湖泊的演变与新构造运动等自然因素长期影响的产物，也是长期以来人类活动不断作用于本区地理环境的结果。

江汉平原在构造上属于云梦沉降区，在全新世的早期至中期（距今12000—4000年），由于气候温暖湿润，雨量丰沛，使得本区

^① 白宪台、景才瑞：《论江汉平原以治水为主的国土综合整治对策》，载《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4年第2期。

原已宽广的水面更为扩大,但在河湖一片的水域之间仍分布有高于湖面的陆地。此时长江两岸植被繁盛。进入全新世晚期(距今4000年至今),气候在寒暖干湿之间波动。商周时期,气候略为偏凉偏干,湖泊面积有所缩小,淡水水生植物减少,长江两岸主要为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和针叶林混交林,森林十分茂密,长江的输沙量较小。春秋至秦汉时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长江两岸森林植被仍很茂盛。由于雨量充沛,长江输沙量有所增加,长江带来的泥沙使江汉地区入湖三角洲不断向湖泊伸展,使得湖沼缩小,江湖开始分离,荆江主槽确立,同时发育了多支汉流,这些汉流有的仍汇入长江,有的进入汉水再汇入长江,形成网状水系。东汉至六朝,气候转为寒冷,江汉地区的湖面进一步缩小,江汉三角洲平原上的汉流仍很发育,而森林植被在该阶段遭到破坏。隋唐至北宋期间,气温开始回升,长江水量有所增大,虽然云梦泽这时已消失,但长江右岸的湖泊不断扩大,江面则由于江心洲的扩大和靠岸而缩窄。这一时期荆江仍有“九穴十三口”,它们都是长江的汉流口。南宋至明清时期,气候再转寒冷,森林继续受到砍伐,穴口堵塞,荆江大堤初步形成,长江河道随之发生变化:汉流大部消失,江心洲由于上流来沙量增多常常出现新老并连,江面缩窄,洪水变幅增大。^①

总体上看,自全新世以来的12000年间,江汉平原的气候在寒暖干湿间波动,雨量亦随之增减,植被持续减少;长江河道逐渐南移,河道右侧的汉流逐渐发展,入江泥沙增多,江面日渐变窄;湖泊盈缩不定,但总体上呈缩小的趋势。

上述变化除了自然因素的作用外,人类活动亦起了重要作用。

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占主体的是“人迹所到的自然”和“经过人类劳动加工,面貌改观的自然”这两大不同层次,而由于人类活动加强,后者的比重不断增大,自然环境中所综合的社会因

^① 参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第三章“河道历史变迁”,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9页。

素越来越多。^① 考古发现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人类就驻足于江汉平原。^②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从防御自然到逐渐利用、改变自然。东汉末年以后,人类以筑堤、堰湖、修陂、开渠等方式开发江汉平原。中唐以后,开发的步伐日渐加快。宋代以降,江汉平原的自然环境较前代进一步变化,至明清时期,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筑堤围垦,平原的江面缩窄,汉流干涸,湖泊消涨多端,洪水变幅增大。不断扩展的筑堤围垦使江汉平原原先蓄泄兼具、调节水量的众多湖泊逐渐消失,从而影响了气候、水文等方面原有的生态平衡。如今,江汉平原既是全国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同时也是洪涝渍及病虫害多发的地区,生态环境的失衡影响、制约着本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相关研究述评

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近代以来,工业的发展在推动社会经济迅速进步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对立日益加剧。到20世纪中叶,人们在开始享受经济增长之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环境破坏后的报复,环境恶化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开始把环境问题作为一门科学,进行专门研究。继生物、化学、地理等自然科学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之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也开始对环境问题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等新兴学科应运而生;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今天的影响,并将其作为重要研究课题。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也相当重视,生物学、气象学、水文学、地理学、环境学、资源学、灾害

^① 参见胡兆量等《地理环境概述》第二章“地理环境是各要素紧密联系的有机体”,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

^② 刘德银:《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湖北江陵鸡公山发现旧石器时代居址》,载《中国文物报》1993年5月2日。

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均有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新成果不断问世。与本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在这一领域所作的研究。

在历史学方面，关于本课题讨论的江汉平原地区开发的研究成果，多属于经济史范围。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当欠缺，除了区域经济研究的开山之作和扛鼎之作——冀朝鼎先生所著、朱诗鳌先生所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①，对本区有所涉及之外，仅有一些经济史的通史或断代史论著对上述问题作过一些研究，如李剑农先生《宋元明经济史稿》。^②这一时期集中研究宋代南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论著是张家驹先生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③，荆湖地区是其讨论对象之一，但在该书中所占的分量相当有限。20 世纪 80 年代中，陆续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断代经济史研究著作，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④无疑是最优秀的代表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多处篇章都探讨了宋代荆湖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比较。稍后发表的李文澜先生《江汉平原开发的历史考察》（上篇）一文^⑤，则对江汉平原自新石器时代到六朝时期的开发历程作了专门探讨，有助于更全面、长时段地把握江汉平原地区的发展状况。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关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较受重视，论著较多，最具代表性的如郑学檬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⑥一书，继张家驹先生的《两宋经济重心南移》之后，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探讨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程民生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③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④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⑤ 载中国唐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 1988 年版。

⑥ 岳麓书社 1996 年版。

的《宋代地域经济》^①，在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的基础上，对宋代区域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论述。具体到江汉平原地区，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国内一批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研究者对本区经济作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就笔者所见，较重要的如牟发松先生的《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②，彭雨新、张建民先生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③等。以上有的学者以隋唐史或明清史研究为主，但论著中都涉及宋代，更重要的是其研究视角值得宋史研究者借鉴。

与此同时，宋史学者雷家宏等开展了对宋元时期江汉平原的经济发展及其与环境变迁的研究。雷家宏所撰《湖北通史·宋元卷》以及《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④、《宋代湖北农业政策与农业生产关系》、《宋代湖北手工业述要》^⑤、《宋诗所见湖北风物略述》^⑥ 等论文从多角度考察了宋元时期江汉平原经济诸方面之发展。笔者近年也着力于这一主题的探讨，发表了一些研究论著，本书的撰写是笔者对已有研究的系统总结与深化。

20 世纪 90 年代中，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湖北简史》，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从古至今湖北地区的开发历程；在此基础上，1999 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的《湖北通史》，对湖北省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历史作了长时段、较全面的研究。专著以外，还有为数可观的单篇论文集中研究了江汉平原的经济开发，如张国雄《江汉平原垸田的特征及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⑦，以及张家炎、宋平安等人有关清代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水旱灾害的探

①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④ 载《江汉论坛》1999 年第 9 期。

⑤ 均载陈本立主编《湖北历史文化论集》，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8 年版。

⑥ 载李锦章主编《湖北历史文化论集》（二），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⑦ 载《农业考古》1989 年第 1~2 期。

讨等^①，这方面的情况，张家炎在其《十年来两湖地区暨江汉平原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②一文中有较全面的概括与评价。不过，上述研究多限于明清经济史，而且主要侧重于农业史方面，较少涉及生态环境问题。

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多是分区域进行的，其中侯仁之先生有关西北风沙地区植被破坏与自然环境变化的研究和史念海、朱士光等先生有关黄土高原地区农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最高。另外，历史地理学近年来对气候、植被、野生动物、水文、灾害等环境要素历史变迁的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③，这些成果为本课题的展开提供了基础。

另有一些研究两湖的著作考察了江汉平原，如梅莉、张国雄、晏昌贵《两湖平原开发探源》^④，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⑤，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⑥等。不过，上述论著较少涉及生态环境问题。

在涉及历史时期江汉平原的开发与环境关系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一些成果。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⑦、张国雄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⑧讨论了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的人地关系。张建民、鲁西奇的《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考察了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变的形态与基本特征，强调

① 张家炎：《江汉平原清代中后期洪涝灾害研究中若干问题刍议》，载《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宋平安：《清代江汉平原水旱灾害与经济开发区探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② 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

③ 参见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

④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⑤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⑦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⑧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

人口变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演进、河湖与植被变化、自然灾害加剧在衡量人地关系演变中的重要作用。^① 张家炎在其新著《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中，将环境与生态分开考虑，探讨了由开发引起的环境变迁给江汉农村经济造成的影响以及农民如何面对变化的环境。^② 此外，周宏伟提出，3—14 世纪旱作物的推广破坏了长江流域丘陵低山的森林资源，人类活动在历史时期长江干流的清浊变化中起了主要作用。^③ 汪润元等的《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就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④ 张建民关于明清秦巴山区人口与经济开发的研究亦有系列成果^⑤，从中可见明清以来上游地区的开发活动对江汉平原的环境产生了直接影响。借鉴上述研究，可从更广的视野来审视明清时期江汉平原人地关系的演变。

另一方面，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历史上江汉平原的开发与资源、环境的问题也受到自然科学界的重视，不少学者从自然地理及资源、环境等学科对于江汉平原的开发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了较

① 载《光明日报》2004 年 9 月 21 日。

② 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周宏伟：《长江流域森林变迁的历史考察》，载《中国农史》1999 年第 4 期；《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第 4 期。

④ 载《学术季刊》1994 年第 4 期。

⑤ 如《明代秦巴山区的封禁与流民集聚》、《明代秦巴山区流民的附籍与分布》（分别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8 年第 2 期、1999 年第 2 期），《17～19 世纪秦巴山区的人口变动》（载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明代秦巴山区的流民与资源开发》（载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清代秦巴山区的经济林特产开发与经济发展》（载《武汉大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与郑哲雄等合撰，载《清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多研究,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是本区湿地资源^①的开发、利用及其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方面的成果相当多,代表性的论文如《江汉平原(四湖地区)和洞庭湖区湿地的分类与分布特征》^②、《论湿地及其保护和利用——以洪湖湿地为例》^③、《湿地资源开发模式兼论洪湖自然资源的创新利用》^④、《湖北省洪涝灾害与沿江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⑤、《长江流域生态形势、灾害趋势与湿地保护》^⑥、《论湿地研究与中国水利》^⑦,以及《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中国湿地保护研讨会论文集》^⑧、《中国湿地研究》^⑨等收录的一系列论文。研究者普遍认为,湿地的开发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湖泊水面萎缩、

① 两湖平原是我国湿地资源集中分布的典型区域之一。湿地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是当今国际上普遍关注的问题,1991年18个国家在伊朗朗姆萨尔签订了《湿地公约》,我国于1992年加入该公约组织,现全世界上百个国家成为缔约国,1997年起确立2月2日为“世界湿地日”,并以“湿地的价值与人类对湿地的利用”为第一个世界湿地日的主题。但是,有关“湿地”的定义,迄今没有统一,用来表达湿地的字、词在中国约有30个左右,在英语国家有15个左右。本书采用河海大学前校长左东启教授《论湿地研究与中国水利——迎1999年“世界湿地日”》(载《水利水电科技进展》第19卷第1期,1999年2月)一文中的表述:“湿地是介于陆地体系与水体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土地,覆有浅层地表水,或地下水位一般接近地面。”湿地是一种生产力极高的土地资源,是农业生产以及各种经济活动的重要场所(以上提到的多种水稻土即可统称为湿地),在维护生态平衡,特别是物种保护和环境净化等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参见姜文来《湿地资源开发可持续环境影响评价研究》,载《中国环境科学》第17卷第5期,1997年10月。

② 易朝路、蔡述明等著,载《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第6卷第1期,1998年3月。

③ 王飞、谢其明著,载《自然资源学报》1990年第5期。

④ 邓德源、李开伦等著,载《自然资源》1991年第5期。

⑤ 任晓华、何报寅著,载许厚泽、赵其国主编《长江流域洪涝灾害与科技对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⑥ 雷慰慈著,载《地球科学》第24卷第4期,1999年7月。

⑦ 左东启著,载《水利水电科技进展》第19卷第1期,1999年2月。

⑧ 林业部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1996年版。

⑨ 陈宜瑜主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

资源锐减,洪、涝、渍、旱等自然灾害频繁,环境污染日益加剧,不但严重地制约着湿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还破坏或改变了湿地生态系统,影响着湿地资源的永续利用”^①。上述研究所讨论的区域多包括本书所论及的地域范围,所关注的问题诸如人与地的关系,开发对环境的影响等也与本书有类似之处,因此尽管这些研究多属于对策性研究,注重于现实性、操作性的问题,但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仍多有启示。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98年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的发生,使长江防洪问题受到了高度重视,学术界对此问题也十分关注,发表了为数不少的研究论文。从研究主题来看,学者们的讨论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人文与自然条件的角度综合探讨长江洪灾的原因,注意到包括堤防修建在内的人类活动对于洪灾的影响,如赵本磊先生认为:“这次长江流域洪灾系天、地、生、人多种原因发生作用的结果,是人类与自然不协调的表现,是自然对人类的一次报复。”^②刘沛林先生指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之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③刘更另院士通过1998年长江大洪水的发生,对我国水利建设和森林破坏、水土流失等进行了思索,对洞庭湖区退耕还湖的方针进行了探讨。^④王克林、章春华和易爱军等研究洞庭湖区洪涝灾害形成的原因,认为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湖区发展过程中忽视了环境整治与生态建设,没有协调好人地、人湖关系”,“为抗御洪水,堤防越筑越高,出现了‘水涨——堤

① 前揭易朝路等《江汉平原(四湖地区)和洞庭湖区湿地的分类与分布特征》。

② 赵本磊:《九八长江洪涝灾害成因及防治方略的思考——兼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载《江西地质》第13卷第2期,1999年6月。

③ 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④ 刘更另:《洪水、思索、希望》,载《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1998年第6期。

高——水再涨——堤再高’的恶性循环现象，造成抬高洪水位、延长洪水过程、降低垸田内排涝能力等副作用”。^① 另一类讨论，也是为数更多的一类，从当代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于长江及江汉—洞庭湖区防洪减灾、堤防整治等问题进行了对策性研究，这方面的代表论文，除前面提到的刘更另、王克林诸先生的论著外，还有《长江洪涝灾害的可持续发展综合防御对策体系》^②、《适度退田还湖与长江中下游防洪》^③、《江汉平原湖区洪涝灾害形成机理与生态减灾的对策研究》^④，等等。诸研究通过分析 1998 年长江特大洪水发生的主要原因及其灾害，提出了强化环境意识、控制人口增长、适度退田还湖、增加蓄洪能力、发展耐渍农业等多种减灾对策。另有如《长江堤防防洪效果与效益》^⑤ 等文，则依据有关数据资料对长江中下游主要堤防工程的防洪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与估算，对于防洪工程在 1998 年抗洪斗争中获得的经济效益作出了科学的评价；《长江干堤病险堤坝的治理技术》^⑥ 等文则重点讨论了长江堤防工程治理的技术问题。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使笔者对于有关江湖堤防的人文与自然地理问题（包括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有所了解，从而有助于比较全面、客观地把握历史上堤防兴建的利弊得失，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多种视角，本书的一些论点便是从上述成果中得到启示的。

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应该用而且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手段进行综合考察、方可正确揭示其变化规律

① 王克林、章春华、易爱军：《洞庭湖区洪涝灾害形成机理与生态减灾和流域管理对策》，载《应用生态学报》第 9 卷第 6 期，1998 年 12 月。

② 张中生著，载《灾害学》第 14 卷第 3 期，1999 年第 9 期。

③ 陈文科著，载《中国农村经济》1998 年第 8 期。

④ 王学雷著，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 33 卷第 3 期，1999 年 9 月。

⑤ 沈华中、赵坤云、冯忠民、韩东平：《长江堤防防洪效果与效益》，载《人民长江》第 30 卷第 2 期，1999 年 2 月。

⑥ 刘毅平：《长江干堤病险堤坝的治理技术》，载《西部探矿工程·岩土钻掘矿业工程》第 11 卷第 3 期，1999 年 5 月。

的新课题。在这方面,黄土高原地区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的同类研究要深入、细致得多^①,相比之下,对历史时期江汉平原的研究多集中于明后期和清代,对于揭开本区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序幕的南宋直至明中叶的研究相当薄弱;至于将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学等自然科学相结合对本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则尚属起步阶段,这种状况使我们的研究面临诸多困难,但也为我们的研究留下了开拓的空间。

三、本书结构

本研究以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和必要的田野考察为基础,立足于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心,围绕河道变迁、堤防修筑、垸田开发、资源利用、社会生活等问题探讨该时期江汉平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二者间的互动关系,重现其过程,揭示其发展道路及演变的机制、规律与特点。

全书正文共五章,分别探讨:

(一) 荆江洲滩的演变与河道的变迁。本章上溯南北朝,集中对宋元明清时期上、下荆江段的洲滩演变进行讨论,并考察其与荆江河道以及人工堤防之间的关系。

(二) 以荆江干堤为中心的堤防修筑。拟分荆江北岸与南岸复原宋元明清时期的荆江堤防,一并考察荆江江汉平原长江段堤防的发展;重点关注堤防的空间分布、堤防兴废的历程及其与本区经济开发、环境(尤其是水系格局)变迁的关系。

(三) 穴口的演变与农田的垦殖。深入考察北宋至清后期荆江南岸分流四口(松滋口、虎渡口、藕池口、调弦口)和荆北郝穴的历史变迁,探究分流局面形成的原因、历程及其与本区垸田的开发、荆江水系格局的变迁、洞庭湖的演变的相关关系。垸田的兴起与发展,是宋元明清时期本区人类活动的重大成果,并对本区生态

^① 参见前揭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

环境的变迁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内容。垸田之外，传统垦殖方式仍在继续与发展，它们与垸田一起，共同推动着本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变迁。

（四）宋代江汉平原的自然资源利用。集中从河流、丘陵与林木植被等资源的开发利用角度，探讨宋代江汉平原水路交通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矿冶业的进步，并以江夏地区陶瓷业的发展为个案，探讨手工业与植被资源利用的关系。

（五）江汉平原社会生活。集中探讨宋元江汉平原聚落的分布与变迁，自然灾害的种类、分布与影响，乡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特别关注上述社会生活所蕴涵的环境特色；并从水神庙址的分布及其变迁入手，重点分析宋元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神信仰所反映的人地关系之演变。

正文之前是绪言，之后是结语，提炼出宋元明清时期江汉平原人地关系演变的总体趋势和主要特征，指出两宋至晚清的近千年间，本地区人地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基本和谐到相对紧张、逐渐失调的过程；筑堤、围垦等人类活动改变了本区的地理面貌，降水、降温等气候变化推动了本区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水、土、植被等资源的状况影响着本区的开发进程；并强调江汉平原人地关系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与相当复杂的多样性。

全书绘制图表数十种，多随文出现；征引文献数百种，除随文注释外，其主体部分另以“参考文献”形式附于书末。

第一章

荆江洲滩的演变与河道的变迁

荆江，流经江汉平原的长江干流主要河段，西起今湖北省枝城，东至湖南省城陵矶，全长约 340 公里；其间以今湖北省公安县境内的藕池口为界，分为上、下荆江，沿途流经今湖北省的枝江市、松滋市、荆州市区、公安县、江陵县、石首市、监利县及湖南省的华容县、岳阳市。

荆江河道的历史变迁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影响河道变迁的水沙条件也同时作用于河道中的洲滩。洲滩的发育与变化不仅是河道变迁、上游地质条件、降水与人类活动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又对河道的变迁产生作用。对荆江河道与洲滩关系已有一些研究，但基本集中于 20 世纪以来的演变，对历史时期洲滩变迁的研究则较为疏略，且未能涵盖上、下荆江进行整体性考察。本研究拟上溯南北朝，集中对宋元明清时期上、下荆江段的洲滩演变进行讨论，并考察其与荆江河道以及人工堤防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上荆江洲滩的演进

上荆江流经今湖北省枝江市、松滋市、荆州市区及江陵县、公

安县，为微弯分汊河段。^①

一、南北朝至南宋期间

历史上上荆江的洲滩众多，或为江心洲，或为心滩，或为边滩。江心洲不同于心滩和边滩，后两者时长时消，变动性大，其中边滩仅一边过水，而江心洲长期稳定，可以居住和耕种。^②《水经注》中明确记载了江陵县有枚回洲、故乡洲、龙洲、宠洲、郢里洲和燕尾洲，枝江县有百里洲、迤洲、富城洲。^③但更多的是无名之洲，仅枝江县附近就有数十洲。

宋代或宋代之前，上述诸洲发生了一些变化。下文据北宋初年《太平寰宇记》^④和南宋《舆地纪胜》^⑤相关记载整理为表1-1，以此分析南北朝及两宋时期荆江河道中洲滩的状况。

据表1-1，《水经注》中的枚回洲在两宋志书中都有较明确的记载；郢（景）里洲和宠洲只见于《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则无；龙洲，《太平寰宇记》称“在江陵县”，《舆地纪胜》中归为“景物”类，该条仅引盛弘之《荆州记》关于龙、宠二洲的传说及《太平寰宇记》相关文字，但没有提及龙洲、宠洲在南宋时的情形；故乡洲、迤洲和富城洲，两宋志书中皆无；燕尾洲，《太平寰宇记》无专条，其“蚌城”条记该城“在江内，燕尾洲上”^⑥，《舆地纪胜》同条作“蚌城在江陵，燕尾洲上”^⑦，二者仅有“江内”与“江陵”一字的差别。鉴于《太平寰宇记》“江内”的提法与众多方志中关于江心洲的习惯表述不相吻合^⑧，不能据此断定北宋时的燕尾洲仍为江心洲，

① 参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水文局编《长江中下游河道基本特征》之《长江中游枝城至城陵矶河道基本特征》，第一章“河道概况”，1983年内部刊印本，第36页。

② 参见张昌民《现代荆江江心洲沉积》，载《沉积学报》1992年第4期。

③ 《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武英殿聚珍本。

④ （宋）乐史撰，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刊本。

⑤ （宋）王象之撰，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1992年版。

⑥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山南东道五·荆州》“蚌城”条。

⑦ 《舆地纪胜》卷六四《荆湖北路·江陵府》“蚌城”条。

⑧ 关于江心洲在河道中的位置，就笔者所见，“江内”之说仅见于此，其余皆称“江中”。

《輿地纪胜》仅引《元和郡县志》称燕尾洲在江陵县,而不言其在北宋时的情形,故疑该洲至迟在南宋时已靠岸。

表 1-1 宋代志书所记上荆江洲滩一览表

| 书名 洲名 | 《太平寰宇记》 | 《輿地纪胜》 |
|----------|--|--|
| 百里洲 | 《荆州图》云：“其上宽广，土沃人丰，陂潭所产，足穰俭岁，又特宜五谷。洲首派别，南为外江，北为内江。”《荆南志》云：“县界内，洲大小凡三十七，其十九有人居，十八无人居。”盛弘之《荆州记》云：“县南自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满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故增一为百，以充百数。僭号旬时，身屠宗灭。及其倾覆，洲亦消毁。至宋文帝在藩，忽生一洲，果龙飞江表，斯有验矣。” | 在枝江县。《图经》云：“其上宽广。”盛宏之《荆州记》云：“县有九十九洲，洲不满百，故不出天子。乃宋文帝在藩，忽生一洲，果龙飞江表。” |
| 新洲 | 《渚宫故事》云：“梁王僧辩灭侯景，百僚劝进，湘东王即皇帝位，柵江陵城，周回七十里。时议迁都，御史中丞刘谷等进曰：‘臣等闻荆南之地有天子气，又闻渚宫洲已满百。’”《梁典》云：“太清末，枝江县阳阁浦忽生一洲，群公上疏称庆。明年，元帝即位。承圣末，其洲与大岸相连，唯九十九而已。” | |
| 岑头洲 | | 《元和郡县志》：“在枝江县。洲长百里，其西首曰岑头。昔岑彭讨公孙述，曾经憩于此，因名岑头洲。” |

续表

| 书名 洲名 | 《太平寰宇记》 | 《輿地纪胜》 |
|------------|--|---|
| 枚回洲 | 在县西南六十里。《荆州志》云：“自籍州次东，大洲有三，名城首曰‘枚回’，盛弘之《记》以为村名。旧云是梅、槐合生成树，故谓之‘梅槐’。中名‘景里’，下名‘燕尾’。”《荆南志》云：“此洲北，江呼为蔷薇江……” | 在江陵。晋冯枚迁桓元于枚回洲。旧云梅、槐合生成树，故谓之“梅槐”。 |
| 龙洲 宠洲 | 盛弘之《荆州记》云：“龙、宠二洲之间，旧云多鱼，而渔者投罟挥网辄绝。乃有水客泗而视之，见水下有石牛二头，尝为网碍，故渔者惩之，皆鼓枻而去。” | （“龙洲”条）《寰宇记》：“在江陵县。”盛宏之《荆州记》云：“龙、宠二洲之间，旧云多鱼，而渔者挥网辄。水下有二石牛头，尝为网碍。” |
| 邛（又作“景”）里洲 | 三国魏将夏侯尚围南郡，作浮桥，渡景里洲。今在郡西。 | |
| 燕尾洲 | （1）故奉城在燕尾洲上…… （2）蚌城在江内，燕尾洲上…… | （1）《元和郡县志》云：“在江陵县。” （2）蚌城在江陵，燕尾洲上…… |
| 百洲 | | 乾德初，李景威云：“旧传江陵诸处有九十九洲，若满百则有王者兴。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遂满百。”《长编》。 |
| 龙阳洲 | | 在江陵县界。旧《经》云：“后汉李衡于洲上作宅种橘。” |

资料来源：《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山南东道五·荆州》；《輿地纪胜》卷六四《荆湖北路·江陵府》。

百里洲较为稳定。与《水经注》相比,《太平寰宇记》与《舆地纪胜》除了均引桓玄和宋文帝与“满百之洲”的传说外,前者还引了《荆州图》^①和《荆南志》^②的记载。《荆州图》可见,至迟在南北朝时期,百里洲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荆南志》则称,枝江县共有大小洲三十七个,其中十九个有人居住,这是一个少见的确切数字。《太平寰宇记》同时征引此二书,折射出南北朝时期枝江县的江心洲渐次得到开发利用。

此外,《舆地纪胜》引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传说,继续创造“百洲”之说(详下);还增记了前此未出现的“岑头洲”与“龙阳洲”。

从《水经注》到《舆地纪胜》,记载的增减变动,反映了其间洲滩的变化。

首先,除百里洲这类变化不大的江心洲外,更多的江心洲如迤洲、龙洲、宠洲、邗(景)里洲与燕尾洲等,或靠岸转为边滩进而成为陆地^③,或解体、消逝于江中。其次,虽然上荆江河道中洲滩的数量多以“数十”、“九十九”或“满百”表述,但在这些看似长期不变的数字背后,是旧洲滩的不断销毁与新洲滩的不断形成。以《舆地纪胜》的“百洲”条为例,前此有《续资治通鉴长编》乾德元年(963年)的相关记载:

(李)景威又曰:“旧传江陵诸处有九十九洲,若满百则有王者兴。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遂满百

① 按:此处《荆州图》又名《荆州图副》、《荆州图副记》、《荆州图记》,约成书于晋宋时期,北宋《太平御览》所引《荆州图副》中关于百里洲的内容与《太平寰宇记》所记一致,参见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230页。

② 按:《荆南志》为南朝梁萧世诚撰,见前揭《汉唐方志辑佚》,第304~305页。

③ 从《水经注》卷三四对迤洲的记载“土台北岸有迤洲”看,当时的迤洲邻近江岸,北宋时当已靠岸。

数，昨此洲漂没不存，兹亦可忧也。”^①

“忽生一洲”是“满百”的主体内容。武信王指五代荆南国建立者高季兴，自其后梁开平元年（907年）任荆南节度使、同光三年（925年）封南平王^②，至李景威言事之乾德元年（963年），不过短短几十年光景，便“忽生一洲”且“漂没不存”，此洲显然属于变动性大的心滩。边滩的变动性同样较大，表1-1《太平寰宇记》中的“新洲”即属此类。

无论是《太平寰宇记》之“新洲”，还是《舆地纪胜》之“百洲”，都不过是南朝“百洲”传说的翻版。但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传说出现，这实际上反映了从南朝至宋代，上荆江一直保持着数量较多的江心洲，而且洲滩的新旧更替从未停止。

二、明清时期

明清以来，随着存世方志的逐渐增多，有关上荆江洲滩变化的记载更多。下文从古洲滩与新增洲滩两方面来考察这些变化。

（一）古洲滩的变化

上文已述，《水经注》中的百里洲、枚回洲在宋代尚存，迤洲、富城洲、故乡洲不见于宋代志书，龙、宠二洲与邗（景）里洲在两宋时或靠岸、或消逝，燕尾洲至迟在南宋时已靠岸。然而，明清方志与宋志所记多有歧异，有必要作出辨析。

迤洲，《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八《湖广四·荆州府·枝江县》云：

又有迤洲，长十余里，晋义熙初桓谦败死于此。《荆州记》：“迤洲在枝江东北十余里，亦曰延洲。”《水经注》：“江水径荆门、虎牙之间，荆门之下为延洲是也。”又县东南二十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乾德元年二月丙戌条，中华书局校点本2004年版。据该条记载，李景威为归州人，时为荆南兵马副使。

②《新五代史》卷六九《南平世家》。

里有富城洲。^①

引文中,迤洲在枝江县东北十余里,延洲在夷陵县荆门山与虎牙山之间,二洲相距较远,《荆州记》视迤、延二洲为一洲,当误,对此《水经注疏》已有论说。^② 此处所引《荆州记》未记撰著者,但就笔者所见多处辑录之《荆州记》来看^③,未见“迤洲亦曰延洲”之说,未详《读史方輿纪要》引自何处?迤洲还见于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四五《荆州府·山川》,但该书仅言迤洲“一名延洲”,而不及出处^④,同书同卷复称“富城洲在枝江县东北”,却与《水经注》、《读史方輿纪要》所记相异。

实际上,不仅宋代志书未记迤洲与富城洲,早于《读史方輿纪要》的嘉靖《湖广图经志书》^⑤、万历《湖广总志》^⑥、《荆州方輿书》^⑦等亦未提及。

龙、宠二洲,南宋以前常因江底石牛的传说而被并提^⑧,但自从《輿地纪胜》仅记“龙洲”、并增“龙阳洲”后(见表1-1),有关龙、宠二洲的记载有了变化:一是明代方志如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万历《湖广总志》未记宠洲,记“龙洲”时则皆云该洲

①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八《湖广四·荆州府·枝江县》“岑头洲”条,中华书局校点本2005年版,第3677页。

②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三四《江水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6页。

③ 参见宋本《水经注》,北京图书馆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水经注》,武英殿聚珍本、明崇祯二年严忍公等刻本;(清)陈运溶辑多种《荆州记》,麓山精舍丛书本;前揭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等。

④ 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1986年版。

⑤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嘉靖元年刻本。

⑥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福建省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

⑦ (明)雷思霈撰,载康熙《荆州府志》卷三六《艺文》,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⑧ 参见《水经注》卷三四,前揭《汉唐方志辑佚》所录盛弘之《荆州记》,《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等。

又名“龙阳洲”，且称之为晋李衡隐居种橘处；二是清代方志承袭了明代方志关于龙洲的记载，但复载了宠洲及江底石牛的传说。显然，当面对一个与古龙洲位置相近的新生江心洲时^①，明人将《舆地纪胜》中关于龙阳洲的传说与已经靠岸或消逝的古龙洲合二为一，创造出一个新龙洲。然而，宋人都无法指实的古龙洲，明人又如何能确指？而到清人那里，既有了一个新龙洲，当然可以指认龙洲以东新生成的江心洲为宠洲了。

枚回洲与邛里洲，据《水经注·江水篇》，分别位于龙、宠二洲的上、下游，这原本清楚的两个洲却在高沙湖的记载中被混淆。

《水经注·江水篇》称高沙湖在邛里洲上：

（江陵）县北有洲，号曰枚回洲，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北江也。北江有故乡洲……下有龙洲，洲东有宠洲……其下谓之邛里洲，洲有高沙湖，湖东北有小水通江，名曰曾口。江水又东径燕尾洲北……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高沙湖”条却称湖在枚回洲，又引《荆渚故事》云：“江陵城西二十里高沙湖。”据《太平寰宇记》同卷，景（邛）里洲在郡西，枚回洲在县西南六十里，这与“高沙湖”条自称湖在“江陵城西二十里”相矛盾。显然，该书混淆了枚回洲与景里洲的位置，误将高沙湖记于枚回洲上，遂使后世的记载趋于混乱。南宋《舆地纪胜》即称高沙湖在梅（枚）回洲上。清代，顺治《江陵志余》出现了相互矛盾的两条记载，一是“邛里洲”条记该洲上有高沙湖；“高沙湖”条则称：“《水经注》言在邛里洲，《荆南志》言在枚回洲。”^②顺治以后，方志言高沙湖，或引

① 乾隆《江陵县志》卷首《方舆·全图》清晰绘出了此“龙洲”，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② “枚回洲”说不见于《荆南志》，当源自《太平寰宇记》“高沙湖”条，顺治《江陵志余》（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顺治七年刻本）所记属“以讹传讹”。

《水经注》称在邳里洲,或引《太平寰宇记》称在枚回洲。

枚回洲与邳里洲之所以由明晰变为混乱,是因为邳里洲在明代以前已靠岸成为边滩,明代以后,沿江堤防又使原与荆江相通的曾口堵塞,后人难以辨识,因此,明代的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万历《湖广总志》、《荆州方輿书》均未提到该洲。清人试图指认高沙湖,光绪《续修江陵县志》指高沙湖即当时李家埠之北沙滩湖,而且“湖无堤之先,当与江通”^①,有意与《水经注》所言相合。

再看燕尾洲。由表 1-1 可知,故奉城在燕尾洲上。奉城,亦曰江津戍,与公安县马头岸相对。^② 马头岸,地当今公安县埠河镇,与荆江北岸的沙市相对^③,故古燕尾洲约在今荆州区与沙市区之间的河道中(即埠河镇与沙市相对的河道)。该洲不以江心洲的形式见于宋、明两朝志书,应是当时已靠岸成陆。不过,面对出现在相近地点的新洲,清人修志时不禁赋予新洲以古老的故事,令其长存不没。

上述可见,古洲滩较少见于明代志书,而清代方志不仅延续了明代以前古洲滩的传说,有的还出现讹误,给后人的认识造成了混乱。除上述“新洲”、“高沙湖”等记载外,窖金洲也是一例。此洲出现于清代,清人修志时试图追溯其源,但无法确定,于是或指为古枚回洲,或指为下百里洲,又或称其由南岸小滩增长而成。^④ 明清志书的这些差异,其实都反映了当时不断有新的洲滩形成。

岑头洲,据表 1-1,该洲至少在中唐已经出现,为百里洲西首。北宋时岑头洲是枝江县治;南宋咸淳六年(1270 年)县治徙于白

①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三《方輿三》,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光绪三年宾兴馆刻本。

② 《水经注》卷三四《江水》。

③ 参见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下篇《市镇篇》第一章“北宋时期”,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3~184 页。

④ (清)倪文蔚:《荆州万城堤志》卷首《谕旨》、卷九《艺文·杂著》之《窖金洲考》,光绪二十一年刻本。有关窖金洲起源的混乱认识,直至今日仍有影响,如杨怀仁、唐日长主编的《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第七章第五节“历史时期枝城——沙市段河道演变”即以窖金洲为古燕尾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3 页。

水镇，元明两朝因之；清顺治初年，为避兵乱曾短暂迁于百里洲^①，故《读史方輿纪要》“岑头洲”条记载：“在县东，百里洲之首也……今县依其上。”^② 乾隆以后，是洲不见记载。

百里洲，是枝江县河段中自古即有、“延袤百里”^③ 的大型江心洲。明代以前，相对于上述诸洲，百里洲长期稳定；明中叶以降，百里洲发生大变化。嘉靖年间（1522—1566 年），由于上游来水异常，百里洲被冲为上、下两段，间隔约二十里。^④ 万历《湖广总志》记录了嘉靖十一年（1532 年）与嘉靖三十九年（1560 年）的两次大水，尤以后者为重，两岸冲决数十处，百里洲堤即为其中之一。^⑤ 此后，百里洲的位置逐渐向下游移动，嘉靖时在枝江县东北六十里的江面上^⑥，乾隆五年（1740 年）以前，上百里洲已移至距县一百里（一说八十里）。^⑦

（二）新洲滩的涌现

明清时期，见于记载的上荆江洲滩较前明显增多。

枝江县境河段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记有洄洲（又称洄字洲）、渚洲、关洲、镡洲（一称縊洲）、灞洲、南渚洲（又称羊角洲）、苦草洲、芦洲、濞洲、澌洲、洋洲等。

根据记载，清代以后，诸洲在河道中的位置多有变化。^⑧ 清前

① 同治《枝江县志》卷一《地理志上·沿革表》，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同治五年刻本。

② 《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八《湖广四·荆州府》“岑头洲”条，第 3677 页。

③ 康熙《荆州府志》卷四《山川》“百里洲”条。

④ 乾隆《枝江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百里洲”、“上百里洲”、“下百里洲”条，乾隆五年刻本，海南出版社 2001 年影印故宫珍本丛刊。

⑤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荆州府堤考略》。

⑥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枝江》“百里洲”条。

⑦ 乾隆《枝江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之“百里洲”、“上百里洲”、“下百里洲”条。

⑧ 应该指出，方志对洲滩具体位置的记载并不精确，但可据此判断变化的趋势。本部分的讨论，嘉靖时期据《湖广图经志书》，康熙时期据康熙《荆州府志》，乾隆时期据乾隆《枝江县志》，同治时期据同治《枝江县志》。

期各洲的位置如图 1-1 《清乾隆年间枝江县上、下百里洲示意图》^①所示，涖洲、澧洲、关洲顺江而列，三洲在嘉靖以前皆已开发，均有民户耕作于内。^②其中，涖洲，嘉靖时在县东南二里^③，周围宽约十里，乾隆时下移至县东五里，宽则略增至十二里。澧洲，在涖洲之下，嘉靖时宽约十里，乾隆时缩至八里。同治五年（1866 年）前，涖、澧二洲发生巨大变化，成书于该年的同治《枝江县志》卷二称“涖、澧二洲今皆为水洗”，只是在冬季水涸时“犹有痕出”。澧洲之下是关洲，乾隆时约宽二十里，已较康熙《荆州府志》所记缩小十里，至咸丰十年（1860 年）亦“水洗殆尽”。^④

关洲之下有镡洲，嘉靖时在县东六十里，乾隆时移至县东三十里，同治时为县东四十里，清代镡洲的位置较明时靠近县治。与镡洲相邻为灞洲，嘉靖时在县东六十里，乾隆与同治时上移十里。与灞洲相对者南渚洲（即羊角洲），乾隆时在县东六十里，同治时上移十里。

可见，在涖、澧、关三洲下移的同时，镡、灞、羊角三洲则在向上游移动。

苦草洲、芦洲的位置在明清时变化不大。

澧洲，位置不详。乾隆《枝江县志》之《地輿图》显示澧洲在苦草洲和芦洲之上，而同书卷一《地理志·山川》记苦草洲在县东六十里，芦洲在县东南八十里，澧洲距县八十里，据此则澧洲不在苦草洲之上。其后的同治《枝江县志》卷二记，澧洲距县六十里，苦草洲距县六十五里，芦洲距县七十里，与乾隆县志《地輿图》所绘相近。

① 据乾隆《枝江县志》之《枝江县上下百里洲图》绘制。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枝江》“涖洲”、“澧洲”、“关洲”条。

③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枝江》“涖洲”条。又，万历《湖广总志》卷四《方輿三·荆州府》“涖洲”条记为“县东二十里”，结合清代方志对该洲位置及与其关联的澧洲、关洲的记载，此说当误。

④ 同治《枝江县志》卷二《地理志中·疆域》“关洲”条。



图1-1 清乾隆年间枝江县上、下百里洲示意图

澌洲与洋洲变化较大。洋洲在澌洲之南，两洲在嘉靖时均宽约五十里，至迟在康熙前期两洲合二为一，名澌洋洲。^① 两洲合一后，洲体较原先为长^②，并逐渐靠岸成滩。

清代以后，枝江县又有一些新的洲滩出现在志书中。康熙《荆州府志》卷四新见“偏洲”，在芦洲之下^③；乾隆《枝江县志》卷一新增“青夹洲”，在县北五里，“住民十八户”。

松滋县境河段 明代时江心洲主要有上莱洲和何家洲。上莱洲在县北三里的江中，实为两洲，将江水一分为三，明清两代基本如此。^④ 何家洲（见图 1-1《清乾隆年间枝江县上、下百里洲示意图》），又名河夹洲、河家洲，《明史》卷八八《河渠六·直省水利》称，永乐八年（1410 年）松滋县修筑了何家洲堤岸，则何家洲至迟在明初已经形成。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松滋县堤考略》中曾举何家洲之朝英口为松滋县要堤之一。清代方志对何家洲的记载较为详细，它是位于县东五十里的一个边滩，洲上沃土过百顷，规模较大。^⑤ 何家洲的发展颇受百里洲影响。由于百里洲逐渐东移并被冲为上、下两洲，逼迫水流南激，位于百里洲南的何家洲遭受其害，堤岸易崩。据康熙《松滋县志》^⑥ 卷六《水利》，河夹洲（即何家洲）三面临江，洲上筑有六段堤防共 242

① 康熙《荆州府志》卷四《山川》“澌洲”条。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言澌洲周围约宽五十里，洋洲周围与澌洲相似则亦周围约宽五十里。康熙《荆州府志》只言澌洋洲合并后约五十余里而未言此为周宽或长度，乾隆《枝江县志》则言其约长五十余里。

③ 雍正《湖广通志》卷九《山川志》称偏洲与灞洲俱在县东六十里，实将偏洲与锺洲混淆，雍正十一年刻本。

④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松滋》和同治《松滋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同治八年刻本）“上莱洲”条。

⑤ 同治《松滋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河夹洲”条。该条记洲在县北五十里，但以当时县治方位计，不当在县北。又据乾隆《枝江县志》之《舆地图》，下百里洲南有一何家洲，并称为松滋管，此洲当为河夹洲，位于松滋县治东。

⑥ 康熙三十五年刻本，海南出版社 2001 年影印故宫珍本丛刊。

丈，另有月堤一处 85 丈，均属险工。道光十三年（1833 年），洲南塌陷，洲民填筑塌陷地后，将长十余里之南堤与长二十余里之北堤连接为垸，“屡获丰登”，但终未能抵挡住水势的变化；咸丰十年（1860 年），受下游江陵溃堤淤塞的影响，水流不畅，“水归垸内者日积日深，无可疏消，致令合洲沈没，舍宇无一存者”^①。

另有芦花洲，清代新见，距县百里，与上莱洲、河夹洲同在百里洲以南的江段中，其十分之六为枝江所有，其余属松滋。黄家埠决口后，属枝江的部分逐渐淤平。^②

江陵与公安河段 江陵县河段的江心洲较多地见于乾隆时期，光绪初年又新增数洲，据记载制成表 1-2 和表 1-3。如表中所示，南、北两岸分布着数十个江心洲，有的还首尾相连。进一步结合并对照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的《荆州府志》和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的《江陵县志》，可以发现，即使是乾隆几十年间（1736—1795 年）本河段的洲滩也在发生变化：至乾隆后期，塌泊洲已“崩塌无几”；县南水师营对面新生出江干新淤洲，连白沙洲尾；距县九十里的江南岸新生石洲，新泥洲下新生白脚洲。光绪时天鹅洲已淤近御路口，白沙洲或石洲扩展而两洲相接，新泥洲与新淤洲相连，形成石洲、白沙洲、新淤洲、新泥洲、白脚洲五洲（今称“南五洲”）绵亘河道数十里的景观。^③

乾隆时期，公安河段也较前代新增了沅陵、平滩、申梓、二圣数洲。^④ 公安县另有彩石洲，雍正《湖广通志》称其在旧县东北十里，自江心涌出，长六七里。^⑤ 彩石洲与二圣洲在同治《公安县

① 同治《松滋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河夹洲”条。

②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九《堤防志三·顺江堤》“芦花洲”条，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光绪六年刻本。

③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九《堤防志三·顺江堤》“天鹅洲”、“白沙洲”、“新泥洲”条。

④ 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乾隆二十二年刻本）关于沅陵、平滩、申梓等洲的记载仅有方位而无洲名，但光绪《荆州府志》卷一九《堤防志三·顺江堤》在列举上述各洲后附言其出处为乾隆《荆州府志》。两志比照可知乾隆府志的阙名之洲即此三洲。

⑤ 雍正《湖广通志》卷九《山川志·荆州府》。

志》中列入古迹^①，但二洲实际上是靠岸成滩而已。

表 1-2 清乾隆时期江陵、公安县江心洲分布表

| 县名 | 洲 名 | 方 位 |
|---------|-----|---|
| 江陵 县 | 天鹅洲 | 距县十五里，江北岸。 |
| | 窖金洲 | 距县十里，大江中，相连又为新淤沙洲（南岸）。 |
| | 杨林洲 | 距县五里，御路口（北岸）。 |
| | 上姜洲 | 距县四十里，江南岸，相连又为下姜洲。 |
| | 下姜洲 | 与上姜洲相连。 |
| | 永安洲 | 距县五十里，江南岸。 |
| | 青安洲 | 距县八十五里，江北岸，相连又为塌泊洲。 |
| | 塌泊洲 | 距县九十里，江北岸，今崩塌无几。 |
| | 石 洲 | 距县九十里，江南岸。洲长六七里，上皆五色石子、木屑、瓦片，积久渐化为石，间有半存本质者，冬春之交足供游览。近淘金者众，石子排挤，中流渐益增长，扫塌北岸，自张家洲至吴秀湾被害为甚。 |
| | 白沙洲 | 距县一百十里，大江中，相连又为新淤洲。 |
| | 新淤洲 | 连白沙洲尾，在潭子湖对岸。 |
| | 新泥洲 | 距县一百二十里，郝穴。 |
| 公安 县 | 白脚洲 | 连新泥洲，在郝穴对岸。 |
| | 二圣洲 | 距公安县八十里（青安洲下）。 |
| | 沅陵洲 | 距县百里，江南岸。 |
| | 平滩洲 | 在县东九十里。 |
| | 申梓洲 | 距县东七十里。 |

资料来源：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乾隆《江陵县志》卷三《方輿》。

说 明：括号内的文字据《荆州万城堤续志》卷一《图说·万城大堤全图》定。

① 同治《公安县志》卷一，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同治十三年刻本。

表 1-3 清光绪时期江陵县新增江心洲分布表

| 洲 名 | 方 位 |
|--------------|--------------|
| 江干新淤洲 | 在水师营对岸（北岸）。 |
| 下马坊洲 | 在沙市北岸。 |
| 龙山官洲 | 在接官厅东，江南岸。 |
| 江心洲 | 在龙山官洲东，江南岸。 |
| 突起洲（又名“文村洲”） | 在城东南五十里（北岸）。 |

资料来源：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卷一九《堤防志三》；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三《方輿三》。

说 明：括号内的文字据《荆州万城堤续志》卷一《图说·万城大堤全图》定。

结合表 1-2 和表 1-3，并对照图 1-2《清光绪年间荆州万城大堤全图》^①，可以清楚地看到，龙洲、天鹅洲、江干新淤洲淤积在李家埠堤前的河道中；窖金洲、江心洲横亘江中，其东北方即为黄滩（潭）堤；突起洲生成于文村堤前的岳家嘴前；公安县二圣洲在青安洲下方，两洲与斗湖堤相对。在江南岸，不仅上姜洲与下姜洲相连，公安彩石洲还与江陵的南五洲相连，影响至今。此外，光绪年间（1875—1908 年），该河道中尚有一些新洲出现，如上柳林洲、下柳林洲、鄢家洲、六总洲、羊耳洲、军洲、王家洲等。^②

除了江心洲不断形成外，边滩也是光绪年间（1875—1908 年）的一个突出现象。表 1-4《清代江陵县边滩一览表》可见，边滩或心滩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江心洲演变的影响。如江北岸的马家寨滩，就是因为南岸的石洲逐渐堆积，逼流北趋，北趋水流挟带的泥沙落淤而成。该表还显示，虽然有些边滩因水流冲刷而逐渐变小，但只是少数。

清代，虽然古江心洲已不存在，但江陵县河段淤积的洲滩依然

① 据光绪《荆州府志·荆州万城大堤全图》绘制。

② （清）舒惠：《荆州万城堤续志》卷一《图说·万城大堤全图》，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较多。正如乾隆《江陵县志》卷三所言：“龙、宠以下，燕尾、邳里、高沙皆古名也。今则接龙洲者为天鹅，乾隆初年尚未过荆水师营，今已淤近玉路口。天鹅之外，则曰窖金洲。窖金以下，又有上姜、青安等洲。大抵洲渚，或倚南北江岸，或横亘江流，溃淤流徙不常，不独江陵为然，而江陵为尤甚。”

表 1-4 清代江陵县边滩一览表

| 滩 名 | 长 度 | 沙 石 状 况 | 对河道的影响 |
|------|------|-----------------------------------|--------|
| 鱼儿滩 | 二里 | 水涨，江面宽平；水消，江面窄狭，淤有沙洲。 | 险隘 |
| 簸箕滩 | 一里 | 水势湍急，多乱石。 | 险隘 |
| 太保滩 | 一里六分 | 多乱石，前有淤沙。 | 险隘 |
| 老龙滩 | 二里五分 | 江心窄狭，兼有淤沙。 | 险隘 |
| 白河套滩 | 二里 | 江面宽阔，淤沙无多。 | 平顺 |
| 马家寨滩 | 三里 | 昔年江面宽平，淤沙无多；近因南岸石洲渐长，逼流北趋，水势汹涌冲激。 | 平顺转险隘 |
| 炒米沟滩 | 一里八分 | 昔年淤沙甚大，江窄水急；近历届大汛，逐年冲刷，流沙渐去，江宽水缓。 | 险隘转平顺 |
| 晒谷坪滩 | 二里五分 | 江面窄狭，水势湍急，兼有淤沙。 | 险隘 |
| 吴秀湾滩 | 二里 | 昔年沙淤成洲，江面窄狭；近因沙洲冲消，江流畅泄。 | 险隘转平顺 |

资料来源：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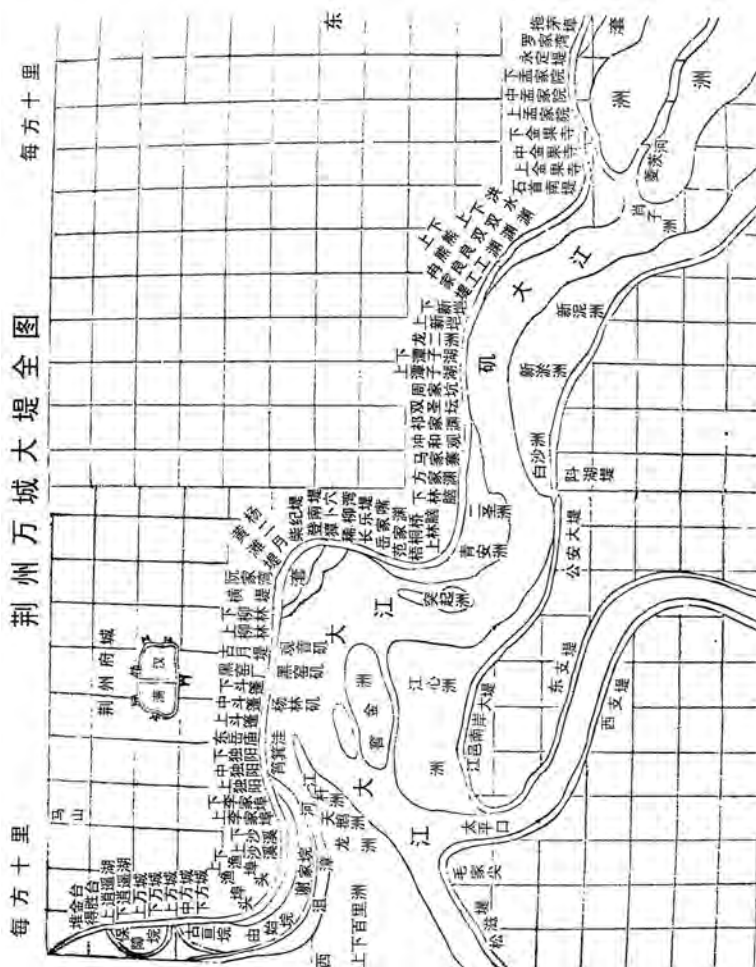


图1-2 清光绪年间荆州万城大堤全图

三、洲滩的发展与河道的演变

从文献资料来看,宋代以降上荆江河道洲滩的演变,以明代中叶为转折点,前后有着明显的不同。从《荆州记》、《水经注》的成书时代至南宋期间,上荆江河道的大型江心洲并不多,上文所见“满百”的传说能够流传数百年即可从侧面证明。“满百”传说一方面反映了河道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心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心滩在不断地成毁更替,对河道的影响并不太大。明中叶以后,大型洲滩不断形成,多分布于枝江县河段;清乾隆以后,江陵与公安县河段亦分布了较多的大型江心洲,而且随着泥沙的不断落淤,洲滩形成的速度加快,对河道的影响日渐增强。

在洲滩的演变过程中,水沙条件、河势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河势变化包括河道边界、水流主泓线和岸线等方面的变化。

有关河道边界的变化,本研究重点关注宋代以来由于修筑堤防而引起的边界变化(详下章)。上文提及的百里洲被一分为二,渐、洋二洲合二为一,洄、渚、关三洲逐渐下移直至最终消失,既反映了嘉靖以来的大水次数较以往更多,也是宋代以来堤防发展改变河道边界的产物。

元明时期,荆江频遭洪水,如公安县,“元大德七年,竹林港堤大溃,自是堤不时决”^①;明正统十一年至隆庆二年(1446—1568年),公安沿岸险堤共溃决十一次。^②又如江陵县,明中叶以后江堤屡决:弘治十一年(1498年)李家埠堤决,弘治十四年(1501年)文村堤决,正德十一年(1516年)文村堤与黄滩(潭)堤皆为水冲决。^③此外,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十九年(1550

①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公安县堤考略》。

② 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公安县·堤防考略》。

③ 见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江陵》“李家埠堤”、“文村堤”、“黄潭堤”条,湖北省图书馆藏嘉靖元年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无此部分内容,现据湖北省图书馆藏本补阙。以下所引本书,除说明为湖北省图书馆藏本外,均为书目文献出版社本)。又,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二《水利一·荆州府》“李家埠堤”条记弘治间决堤于弘治十三年。

年)、三十九年(1560年)荆江三遇大水,其中嘉靖三十九年的洪水“决堤无虑数十处,而最为要害者: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朝英口,江陵之虎渡、黄潭镇,公安之窑头铺、艾家堰,石首之藕池,诸堤冲塌深广,最难为力者也”^①。大水期间,水流漫滩,河道冲刷,使得洲滩逐渐发生变化。同时,洪水过后泥沙淤积严重,又会导致新的洲滩形成。明中叶枝江河段江心洲开始增多,清乾隆以后江陵、公安河段洲滩大量形成,反映上游来沙量呈不断增长之势。如枝江县河段,渐洋洲淤长,志书中新出现了偏洲、金沙滩^②、青夹洲、河夹洲与芦花洲等,都与来沙增多有关。其中,偏洲在芦洲之下,与河夹洲、芦花洲同在百里洲南岸;金沙滩在百里洲北岸。百里洲河段本为江心洲聚集处,江心洲仍持续增加,说明泥沙不断淤积于此。又如初见于乾隆《荆州府志》的窖金洲,曾因被指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荆州大水的祸因而“永禁开垦”,并于对岸修筑石矶以挑水冲刷洲体(详下章),但四十年后,“虽洲地垦禁未弛,而宽广已较前者增倍,徒劳无功是其明验”^③。同治《枝江县志》有关縹洲、关洲的记载可进一步说明来沙的变化。其卷二记关洲咸丰十年(1860年)“水洗殆尽”,但又称:“若洲脑筑一横堤以杀水势,复可淤积”。^④ 卷三记縹洲西垵“强半沙压”。^⑤

另一方面,宋代以来荆江两岸不断修筑堤防,尤其在明代,堤防更是得到大规模发展(详下章),沿岸堤防的修筑使得河道边界发生变化,并将江水主流逼向对岸,导致洲滩迎流顶冲,不仅滩面受到冲刷,滩体亦不能免。滩体冲刷使洲地结构不能稳定,康熙十四年(1675年)百里洲南陷^⑥;乾隆年间(1736~1795年)縹洲

①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荆州府堤考略》。

② 康熙《荆州府志》卷四《山川》“金沙滩”条。

③ (清)王凤生:《楚北江汉现在情形及堤工积弊说》,见《楚北江汉宣防备览》,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道光刻本。

④ 同治《枝江县志》卷二《地理志中·疆域》“关洲”条。

⑤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縹洲西垵”条。

⑥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堤防考略》。

内一学田区“坍塌殆尽”，另一民田区“存十之三”。^①

导致洲滩演变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河道的南移。顺治《江陵志余·志陵陆》“金堤”条提到，五代高季兴修筑金堤后，“江势改徙，堤迁于外”。考古发掘证实了河道的南移：1953年斗湖堤江边挖出一方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墓碑，其上注明，墓地距江八里远。^②今人从地理学角度对河道的南移作过解释。周凤琴先生的研究表明，由于受到由西北向东南的掀斜运动和地球自转的科氏力等影响，水流向南汇聚，沙市河段经历了由东北向西南的迁移过程。^③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也认为是科氏力导致了长江中下游河道长期摆向右岸。^④李长安先生同意历史时期的荆江河道不断发生南迁，但他认为南迁的原因在于桐柏—大别山掀斜隆升，而非传统的科氏力。^⑤无论原因为何，河道南迁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事实，其结果之一便是加速了本河段古江心洲的消失。直到今日，河道南移的影响仍在继续，从航空照片可见，自1869年以来，白沙、白脚、新淤、新泥和石洲这“南五洲”在逐渐向北岸推进。^⑥

此外，环流也对洲滩的变迁起了作用。环流能使泥沙产生横向输移，尤其在分汊河段，环流促使汉道兴衰及洲滩消长。^⑦

①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縊洲西垸”条。

② 转引自张应龙等《长江中游公安河段河床演变分析》，载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水文局编《长江中下游河床演变分析文集》（第二辑），1993年内部刊印本。

③ 参见周凤琴《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特征》，载《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载《历史地理》第十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④ 参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第三章“河道历史变迁”，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⑤ 参见李长安《桐柏—大别山掀斜隆升对长江中游环境的影响》，载《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⑥ 参见前揭张应龙等《长江中游公安河段河床演变分析》。另据笔者2006年的实地考察所见，今南五洲已靠岸，属公安县管辖，其上人烟稠密，但仍为蓄洪区。

⑦ 参见李楚南等《荆江市河段河床演变分析》，载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水文局编《长江中下游河床演变分析文集》（第一辑），1993年内部刊印本。

洲滩的消长变迁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洲滩的演变又对荆江河道产生重要影响：直接导致主流线的变化，有时年际间主流线的变化也较大，从而带来河床的演变。

百里洲所在河段的变化即是典型。该河段原本洲滩甚多，除百里洲以外，洑、渚、关三洲顺江而列，镡、灞、羊角三洲在其下流，又有苦草洲、芦洲、萍洲、澌洲、洋洲与松滋的上莱洲、河夹洲、芦花洲，等等，众多洲滩分汊并减缓了水流。嘉靖以来，一些庞大的洲体不断变化，如百里洲一分为二，澌、洋二洲合二为一，这使得河势的变化更加增大。道光十年（1830年），由来已久的“外江内沱、南江北沱”^①的形势发生剧变，“洪流徙行内江，而沱胜于江矣”，此为“数千余年江流一大变局”。^②随后，洑、渚、关三洲俱被江水冲没。洲滩此消彼长，并最终影响到主流线的变化，于此足见。

公安河段洲滩消长的变化也较明显。今公安河段包括斗湖堤河弯、郝穴河弯、马家嘴过渡段和郝穴至新厂过渡段（参见下章图2-1《荆江大堤形势图》）。在马家嘴河段，突起洲形成后将河道分为左、右两汊；同样，郝穴河弯中，彩石洲与南五洲也将河道分为左、右两汊。夏季丰水期，水流带来大量泥沙而产生淤积，洲滩增大；汛期后水流归槽，洲滩露出水面，连续出现的江心洲加上新增的边滩，影响主流线的变化，使之出现摆动。^③从表1-2中的“石洲”条与表1-4中的“马家寨”条可见，由于石洲渐长，逼流北趋，不断冲刷北岸，不仅促使马家寨边滩形成，也使张家洲至吴秀湾一带堤岸受害严重；同时，水流还冲刷了吴秀湾原有洲体，使左汊河道变宽。洲滩的这种此消彼长引起了主流的频繁摆动，进而又加速了洲滩的消长，彼此影响，连锁反应。今天的公安河段仍呈现出这一特征。^④

① 江沱之分自古有之，《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山南东道五·荆州·枝江县》下记：“江沱出邑西，东入江”；“南为外江、北为内江”。

② 同治《枝江县志》卷二《地理志中·山川》“大江”条。

③ 参见前揭张应龙等《长江中游公安河段河床演变分析》。

④ 参见前揭张应龙等《长江中游公安河段河床演变分析》。

第二节 下荆江洲滩的变化

下荆江流经今湖北省石首市、监利县，湖南省华容县和岳阳市，主要包括今石首河段与监利河段。石首河段起自湖北省新厂镇，下至湖南塔市驿^①；监利河段自塔市驿迄洞庭湖口城陵矶。^②

下荆江的自然条件与上荆江明显不同。上荆江为微弯分汊河道，河道分布着较多的江心洲；下荆江河曲发育，两岸边滩多于江心洲，崩岸较多，西岸崩岸又多于东岸。^③

据林承坤先生等研究，下荆江边界条件是沙层上复有厚层粘土的二元结构，或沙与土互层结构的土质条件，穴口淤塞而引起江流增加与水位变幅增大，频繁的崩岸使河床产生了强烈的横向摆动与河弯下移；加上逐渐增多的人类活动，如堤防的修建堵塞了穴口、增强了河滩的堆积，筑堤围垸使河弯凸岸不断扩张，等等，促进了下荆江河曲的形成。14 世纪中叶以后，荆江水系在新的边界条件下开始形成河曲，河型产生了重大变化，河床中沙洲逐渐消失，河弯迅速发展。^④

林承坤先生等人的研究与方志中关于石首、监利河段洲滩的记载较为吻合。据《水经注》卷三五《江水》，下荆江河道中有赭要洲、北湖洲、杨子洲、清水洲、生江洲、太洲、爵洲等。这些洲在宋元方志中较少记载。明代，杨子洲同见于湖北与湖南的方志。明

① 参见晏济远《长江中游石首河段河床演变分析》，载前揭《长江中下游河床演变分析文集》（第二辑）。

② 参见单剑武等《长江中游监利河段河床演变分析》，载前揭《长江中下游河床演变分析文集》（第二辑）。

③ 参见前揭《长江中下游河道基本特征》之《长江中游枝城至城陵矶（荆江）河道基本特征》第一章“河道概况”，第 38 页；第五章“河床形态”，第 95 页。

④ 参见林承坤、陈钦峦《荆江河曲的成因与演变》，载《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5 年第 1 期。亦可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之二“监利县”所引林文。

末雷思霈之《荆州方輿书》称杨子洲“在大江中”^①，但嘉靖《湖广图经志书》称杨子洲为“杨子洲院”^②，说明杨子洲在嘉靖之前已经靠岸，而且被围筑成垸，《荆州方輿书》的记载是误袭旧说。弘治《岳州府志》^③卷六与隆庆《岳州府志》^④卷七皆有“杨子洲”条，前志仅记“洲在县境”而不言具体方位；后志称其在“县东北，大江中”，同时又指出此杨子洲并非《水经注》所记石首或监利县的杨子洲，故弘治与隆庆《岳州府志》所记“杨子洲”实为明代监利河段某个无法实指的江心洲。“杨子洲”外，嘉靖《湖广图经志书》记有兔儿洲^⑤；万历《华容县志》记有王家洲、白沙洲、永兴洲^⑥；隆庆《岳州府志》记有新生洲、龟鹤滩、爵洲、永兴洲、团鱼洲。^⑦其中，永兴与团鱼二洲相连，在监利县对岸；新生洲、龟鹤滩位于荆江与洞庭湖的交汇处，形成于元代或元之前，由于来沙不断累积，洲体持续增大，并分离出龟鹤滩、金滩、龟鹤嘴等小洲。清代方志将杨子洲记入古迹。^⑧总体上看，明时期监利河段的洲滩不多，但在河曲发展的清代，洲滩数量明显增加。

下面，将清代不同时期方志的洲滩记载辑录制成表 1-5 至表 1-8，据表及相关记载，细致考察清前期与清中后期石首、监利二县的洲滩发展情况。

一、石首县

据表 1-5，清前期石首河段洲滩大发展，至迟在乾隆朝河道中已有江心洲 6 个，边滩 23 个（江南岸 16 个，江北岸 7 个），直至

① 载康熙《荆州府志》卷三六《艺文》。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石首》“洪家套”条。

③ 上海书店 1990 年影印天一阁藏明弘治刻本。

④ 上海古籍书店 1963 年影印天一阁藏明隆庆刻本。

⑤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监利》“兔儿洲”条。

⑥ 万历《华容县志》卷一《輿封·山水》，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校点本，第 46 页。

⑦ 隆庆《岳州府志》卷七《职方考》。

⑧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古迹》“杨子洲”条，乾隆六十年刻本，海南出版社 2001 年影印故宫珍本丛刊。

光绪朝无大变动。与宋元明时期相比，清前期的洲滩增长迅速，而且南岸朱家套、税洲、永锡洲、鸟宿洲、福兴洲、枕心洲、塔市驿洲等洲已经相连。^①

结合表 1-5、表 1-6 可见，从 1795 年乾隆《石首县志》修成到 1866 年同治《石首县志》^② 修成，数十年里石首县新增了附团合洲等 7 洲；光绪初年又增加了天生、刘家、蔡家等洲^③。另据记载，团合、挂口、木嘴、边洲等洲相连，还与戏子、刘发等洲一起有向南岸靠拢的趋势。^④

表 1-5 清乾隆时期石首河段洲滩分布表

| 洲 名 | 方 位 | |
|------|---------------------|-----------------------|
| | 乾隆《石首县志》 卷二《方輿志》 | 光绪《荆州府志》 卷一九《堤防志三》 |
| 柳驿洲 | 距县五十里 | 距县五十里江东岸 |
| 江心洲 | 距县四十五里江北岸 | 距县四十五里江东岸 |
| 朱家套洲 | 距县六十里江南岸 | 县东六十里江西岸 |
| 税 洲 | 距县七十里江南岸 | 县东七十里江西岸 |
| 永锡洲 | 距县七十里江南岸 | 县东七十里江西岸 |
| 顶江洲 | 距县七十五里江南岸 | 县东七十里江西岸 |
| 鸟宿洲 | 距县七十五里江南岸 | 县东七十五里江西岸 |
| 枕心洲 | 距县八十里江南岸 | 县东八十里江西岸 |
| 江发洲 | 距县四十里江南岸 | 县西四十里江西岸 |
| 赵 洲 | 距县三十里江南岸 | 县西三十里江西岸 |
| 杨林洲 | 距县三十里江南岸 | 县西三十里江西岸 |
| 团茨洲 | 距县四十里江南岸 | 县西四十里江西岸 |

①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洲》“倒湾洲”条。
②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同治五年刻本。
③ 光绪《荆州府志》卷三《地理志三·山川》“江水”条。
④ 参见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洲》“木嘴洲”条、“戏子洲”条，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山水》“南河”条，康熙《荆州府志》卷四《山川》“白沙潭”条；并参见第三章图 3-4《清乾隆年间石首县北乡示意图》。

续表

| 洲 名 | 方 位 | |
|------|---------------------|-----------------------|
| | 乾隆《石首县志》 卷二《方輿志》 | 光绪《荆州府志》 卷一九《堤防志三》 |
| 麦粮洲 | 距县四十五里江南岸 | 县西四十五里江西岸 |
| 柳子洲 | 距县五十里江南岸 | 县西五十里江西岸 |
| 汀 洲 | 距县一里江南岸 | 县西北一里江西岸 |
| 杨发洲 | 距县二十里江北岸 | 县北五里江东岸 |
| 团合洲 | 距县二十里大江中 | 县北二十里大江中 |
| 边 洲 | 距县二十里大江中 | 县北二十里大江中 |
| 掛口洲 | 距县二十里大江中 | 县北二十里大江中 |
| 永发洲 | 距县四十里 | 县北三十里江东岸 |
| 木嘴洲 | 距县三十里大江中 | 县北三十里大江中 |
| 小岳洲 | 距县三十里江北岸 | 县北三十里江东岸 |
| 刘发洲 | 距县三十里大江中 | 县北三十里大江中 |
| 季嘴洲 | 距县四十里江北岸 | 县北四十五里江东岸 |
| 百塌洲 | 距县五十里江北岸 | 县北五十里江东岸 |
| 福兴洲 | 距县七十五里江南岸 | 县西七十五里江西岸 |
| 塔市驿洲 | 距县八十五里江南岸 | 县东八十五里江西岸 |
| 倒湾洲 | 距县五十里江南岸 | |
| 戏子洲 | 距县三十里大江中 | 县北三十里大江中 |

说 明：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注明“府志以北为东,以南为西。今因江行自西至东,仍分南北岸”,据此可判别乾隆县志与光绪府志中记载的方位。

表 1-6 清同治至光绪时期石首河段新增洲滩表

| 洲 名 | 方 位 |
|------|-----------|
| 附团合洲 | 县东三十五里大江中 |
| 香炉洲 | 县东五十里 |
| 大望洲 | 在县南 |
| 石湾洲 | 县北一里 |
| 文义官洲 | 县北一里江东岸 |
| 新裕洲 | 县北三十里 |

续表

| 洲 名 | 方 位 |
|--------------|-----------|
| 泥窝洲 | 县北四十五里江东岸 |
| 天生洲、刘家洲、蔡家洲等 | |

资料来源：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光绪《荆州府志》卷三《地理志三》、卷一九《堤防志三》。

说明：据光绪《荆州府志》卷三《地理志三·山川》“江水”条，天生洲、刘家洲、蔡家洲俱为江心洲，但具体位置不详。

随着江心洲逐渐靠岸，加上原有的较多边滩，沿岸势必形成河弯凸岸边滩。明代以来尤其是清代，石首县沿江“私堤林立，多借官堤外防为名，若不严禁，则外防之外又有外防”^①。围筑河弯凸岸，“对河曲凸岸起了保护作用，不但使其免受侵蚀，而且相反的还可以在河弯环流作用下，使河弯凸岸不断堆积，扩张，河曲随之得到发展”^②。

二、监利县

表 1-7、表 1-8 显示了清代监利河段洲滩数量快速发展的状况。

应该说明的是，表 1-7 中，井家洲至观音洲的洲滩都形成于康熙中期以前。乾隆以后，监利河段洲滩的增幅超过了石首河段。乾隆时，监利河段除兔儿等洲外，较明代增加了 30 余个洲滩，基本上以边滩为主，多数位于北岸。至 1872 年同治《监利县志》^③ 修成时，又增加了 26 个洲滩，这尚未包括原有洲滩一分为二或三的情形，如新冲、槁头、殷马、南薪等洲。光绪时，南北两岸再增多个洲滩。当然，也有少数洲滩销毁，如大荆洲与水心洲在光绪时已全部坍塌。^④

① 《荣太守押毁私堤批》，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成案》。
② 参见前揭林承坤、陈钦峦《荆江河曲的成因与演变》。
③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同治十一年刻本。
④ 光绪《华容县志》卷二《建置志》。

表 1-7 清康熙、乾隆时期监利河段洲滩分布表

| 洲 名① | 方 位 | 洲 名 | 方 位 |
|------|-------------------|-------|--------------------|
| 井家洲 | 距县十五里，江北岸 | 江口船湾洲 | 距县五十里江北岸 |
| 南薪洲 | 距县十里江北岸 | 蒲家洲 | 距县二十五里江北岸 |
| 天鹅洲 | 距县十里江北岸 | 兔儿洲 | |
| 唐家洲 | 距县七十里，江北岸 | 祖师殿 | 距县四十里江北岸 |
| 殷马洲 | 距县八十里江南岸 | 鹅毛洲 | 距县二十里江北岸 |
| 广兴洲 | 距县九十里江南岸 | 槓头洲③ | 距县三十里江北岸 |
| 蔡家洲 | | 王心淡洲 | 距县八十里江北岸 |
| 上近江洲 | 距县九十里江北岸 | 金牛洲 | 县东南 |
| 丁家洲 | [距县一百二十里江北岸] ② | 观音洲 | [距县一百二十里江北岸] |
| 易家洲 | [距县一百三十里江北岸] | 水心洲 | 距县二十五里江南岸 |
| 王家堡 | [距县一百三十里江北岸] | 零星洲 | 距县七十五里江北岸 |
| 西洋洲 | | 殷家洲 | |
| 铁牛洲 | 距县八十里江北岸 | 白沙洲等④ | 以下各洲位于华容县东 百二十里 |
| 新冲洲 | 距县六十里江北岸 | | |

资料来源：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康熙四十一年抄本，海南出版社 2001 年影印故宫珍本丛刊；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乾隆《华容县志》卷一《方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影印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说 明：①康熙《监利县志》记有 25 个洲滩，无“水心洲”与“零星洲”。

②方括号中的内容据光绪《荆州府志》卷一九《堤防志三》补入，下同。

③槓头洲，又名隔头洲、格头洲。

④白沙洲以下有金（荆）山洲、大荆洲、团洲、杨家洲、新淤洲，皆录自乾隆《华容县志》卷一《方輿志》；该卷另记有水心洲，与监利县水心洲为同一洲。

表 1-8 清同治至光绪时期监利河段新增洲滩表

| 洲 名 | 方 位 | 洲 名 | 方 位 |
|--------|---------------------------------------|----------------|--------------|
| 七堵垸洲 | | 艾家洲 | 距城三里，在县南 |
| 大公湖洲 | | 上南薪洲 | 县南，距城五里 |
| 三岗洲 | | 南薪边洲 | |
| 黄泥洲 | | 下南薪洲 | 县南，距城六里 |
| 廖王黄洲 | | 上下殷马洲 | 距城八十里，分列三处 |
| 杨发洲 | | 瓦湾洲 | |
| 大院洲 | | 河浹洲 | |
| 上下新冲洲 | 距城五十里 | 永固洲 | |
| 田家洲 | | 八十工洲 | 距县一百五里，江北岸 |
| 上下槁头洲 | 县西北，距城三十里 | 镇江洲 | 距城一百一十里 |
| 西河上下坝洲 | | 华家洲 | 距城一百二十里 |
| 油榨洲 | 距城二十里，县西北 | 安土洲① | 距县百里，江北岸 |
| 孙尹万胡洲 | 孙洲距城十六里、尹洲距城十八里、万洲距城十九里、胡洲距城二十里，俱在县西南 | 下近江洲 | 距县一百二十里江北岸 |
| | | 南新洲 | 距县十五里江北岸 |
| | | 大马洲 | 古赭要洲相近位置 |
| 复兴洲 | 县西 | 杨家洲新洲② | 华容县东百余里 |
| 兔老岸洲 | | 青泥洲、长林洲、杨花洲、泡洲 | 皆位于华容县东北百二十里 |
| 复兔洲 | 县西南，距城二十三里 | | |

资料来源：同治《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洲名》；光绪《荆州府志》卷三《地理志三》，卷一九《堤防志三》；光绪《华容县志》卷二《建置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影印光绪八年刻本。

说 明：①安土洲至大马洲录自光绪《荆州府志》卷三《地理志三》，卷一九《堤防志三·顺江堤》。

②杨家洲以下录自光绪《华容县志》卷二《建置志》。

与石首河段相同,监利河段的洲滩在乾隆时有了较快发展,其原因也不外乎自然与人为的作用。如清初至乾隆朝下荆江的泥沙淤积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咸丰二年(1852年)藕池堤马林工溃口不筑,使得同治以后洲滩加速形成^①;藕池决口不仅带来大量泥沙,加速洲滩的形成,而且对下荆江蜿蜒性河段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②;监利河段新堆积的河弯凸岸在清代亦被围筑,加上环流的作用,凸岸不断淤长,江面束窄,凹岸因水流冲顶不断崩坍后退,河宽增大,引起河岸线的变化,进一步促成了河曲的发育、洲滩的发展。^③

对于上游田土垦辟带来监利河段泥沙淤积、洲滩增多的问题,清人已有认识。王凤生在《上湖广讷制军筹议江汉宣防略》中指出:“上游秦蜀各山多为民开垦,土石掘松。每大雨时行,山水挟沙冲卸,水缓沙淤,以致江河底益垫高,在在易生洲渚。其在中流者为洲,小民贪利,报升辄种芦苇,久渐涨宽;其近两岸者为滩,沿堤居民亦各报升垦成田亩,并私筑堤垸,自谋捍御,二者兼之,故江面日为侵占,两旁既靳其淤蓄之宽,中央复阻其畅流之势,未有不横溢四出者……”^④今人研究也表明,明代以来,聚集在秦巴山区的大量流民开垦山区资源,三峡地区及嘉陵江中下游沿岸各路的农业垦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以重庆府为中心的川江—嘉陵江“Y”型区^⑤的耕地数增长较快。清康熙时期,仅六十多年的时间,四川的总耕地数就超过了明末。从乾隆朝开始,随着秦巴山区及其他上游地区人口的迅速增加,垦殖进入高潮。秦巴山区的林业资源大规模开发,三峡地区、川江—嘉陵江“Y”型区

①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南岸堤》“藕池堤”条。

② 参见前揭晏济远《长江中游石首河段河床演变分析》。

③ 参见前揭单剑武等《长江中游监利河段河床演变分析》。

④ (清)王凤生:《楚北江汉现在情形及堤工积弊说》,见《楚北江汉宣防备览》,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道光刻本。

⑤ 郭声波提出了“川江—嘉陵江Y型农区”的概念,它包括川江及嘉陵江沿岸各地区(重庆、夔州、叙州、顺庆),由宋元之际南宋遗民集中而成。参见氏撰《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及第81页。

的水田改造运动迅速向丘陵与半山地区延伸，旱地垦殖亦逐渐拓展。^①尤其是随着乾隆五年（1740年）清代垦殖政策的更新即垦种山头地角等零星土地免科政策的颁布，带动上游丘陵与山区不断得到开发并达到高潮，“此一决策对垦殖扩张的影响是深刻的，对中国资源、生态的影响是深远的”^②。

与石首河段不同的是，监利河段的洲滩还受到了洞庭湖水顶托的影响。汛期，江湖并涨，荆河口一带受洞庭湖水顶托，水流壅阻，加之荆河口以下之杨林、白螺、临湘等山束缚河道，导致泥沙日益沉积。时人对此已有清楚认识，王凤生《上湖广讷制军筹议江汉宣防略》^③便论及这一点。同治年间（1862—1874年），荆河口附近已堆积有观音洲、永固洲、华家洲、镇江上中下洲、八十工洲、上近江洲、蔡家洲、安工洲、瓦湾江南洲、巴陵洲等多个边滩^④，皆与洞庭湖水的顶托有重要关系。

总之，清代是下荆江河曲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泥沙的大量落淤推动了河弯的发展，泥沙的持续堆积进一步引起河岸线的变化，河曲曲折率逐渐攀高，最终导致自然裁湾的发生。继明末自然裁湾形成东港湖后，大公湖、西湖、月亮湖、王家大路等河湾也在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发生大规模的裁湾取直。^⑤由此，河道的变化更趋剧烈。

本章小结

南北朝时期，荆江河道已堆积了较多的洲滩，仅上荆江枝江县

① 关于秦巴山区的人口移动与资源开发，参见张建民先生的系列研究；关于三峡地区的开垦，参见蓝勇先生的系列研究；关于四川的开发，参见前揭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

② 参见张建民《17~19世纪秦巴山区的人口变动》，载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③ 见《楚北江汉宣防备览》。

④ 参见同治《监利县志》之《舆图》。

⑤ 参见前揭林承坤、陈钦峦《荆江河曲的成因与演变》。

河道就有数十个江心洲，明代以后，洲滩的数量呈增长趋势，清代更为明显。

明清洲滩数量的增多，反映出上游来沙的增多。尽管荆江河道泥沙多的现象并非明清时期独有，更不仅仅是清代开发上游山区以后才开始的^①，但明清以后泥沙明显增多的趋势无疑与上游地区垦殖活动的加大有密切关系。

洲滩演变还受到了堤防修筑的影响。人工堤防改变了荆江沿岸的边界条件，将水流逼向对岸，冲刷洲面与洲体，加速洲滩的演变。

从洲滩的分布看，上、下荆江有较明显的不同：上荆江河道中有较多江心洲，下荆江则以边滩为主。“边滩能否充分横向发育是上下荆江不同河型的一个最显著特征”^②，直至今天，荆江河道的洲滩分布仍呈现这一特点。

在河道的演变中，洲滩是一个活跃因子。在上荆江，江心洲将河道分为左右两汉，使主流线频繁摆动，冲刷堤岸，影响堤防，并引起河道变化，以至造成“江、沱易道”，酿就“数千余年江流一大变局”^③。在下荆江，受边界条件、来水来沙、环流及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边滩不断淤长，带来河道的频繁崩岸，促进河曲发育。

无论是洲滩的演变还是河道的变迁，都以自然因素为主要动力，唐宋至明清以来日益增强的人类活动则起了加速作用。

① 鲁西奇等有关汉江的类似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参见前揭《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五章“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建设的时空特征及其制约因素”，第394~395页。

② 参见前揭《长江中下游河道基本特征》之《长江中游枝城至城陵矶（荆江）河道基本特征》，第99页。

③ 同治《枝江县志》卷二《地理志中·山川》“大江”条。

第二章

堤防修筑：以长江干堤为中心

在现代地貌上，江汉平原是典型的河间洼地洪泛平原，河流纵横，湖泊密布，间有若干洼地，其中以长湖—三湖—白露湖—洪湖所命名的四湖洼地地势最低，范围最广。两宋时期，长湖、洪湖等大型湖泊还没有形成^①，在这些低洼地的中心地带，主要是众多的呈珠状分布的小型湖泊。在长江、汉水筑堤防洪以前，每当洪水泛滥，这些低洼地带就是一片积水区，洪水过后，又还原为众多的小湖群。这种湖泽密布、地势低洼的条件，显然不利于古人开发利用，于是，在与自然长期抗争的过程中，人工堤防逐渐发展起来。

^① 长湖、洪湖水体很早即已存在，但面积较小，其水体扩大、成为江汉平原的主要湖泊，是明清以后的事。赵艳博士对这一问题作了探讨，指出明清小冰期是全新世晚期以来的一次重要成湖期，长湖与洪湖均在这一时期形成，气候是主导因子，人为的因素（如围垸造成的江堤溃决）也不可忽视，洪湖即得名于它是由洪水淤积而成的。详参赵艳《江汉湖群历史环境演变》第三章“全新世湖群环境演变过程和规律”之“几个典型湖泊的演变”一节，武汉大学199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5~65页。

江汉平原堤防修筑的历史或可上溯到战国楚令尹孙叔敖时期。^①中唐以后,江汉平原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堤防的增长。以江陵为例,《旧唐书·地理志二》称:“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并邑,十倍其初。”^②众多人口聚居江陵,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集中于岗坡、台地或天然堤上,而是“人俗多居于江津诸洲”^③,这就必然促进沿江堤防的增长。再看农业生产的发展。江陵与江汉平原其他地区一样,气候温暖湿润,“其土宜谷稻”^④。稻作农业的历史开始很早,本区普遍可见的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即已种植水稻。唐中叶以后,江陵进入农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江陵东北的水稻生产即号称“亩收一钟”^⑤;又如韦宙在“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⑥;柳谋在江陵“有田五百亩”。^⑦如此大面积的稻田,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主要分布于零星的岗丘坡地,势必以修筑堤堰、开垦平原为主要方式,因此,中唐以来稻作农业的扩展也就意味着堤防的扩展,反映出本区堤防的修建进入到一个更为重要的时期。

宋代是本区堤防发展的重要时期,该时期人口的增多、农田的垦辟、城镇的成长等,都促使了堤防的增长,堤防的修筑和治水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开发,农耕面积进一步扩大,并逐渐向湖区低地扩展。在堤防修建中,长江堤防的修筑难度

① 参见《江陵县水利志》(内部资料),1984年铅印本。

②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③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山南东道五·荆州》“风俗”条。

④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荆湖南北路·总论”条。

⑤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九“疏凿利人”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校点本,第1923页。

⑥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九九“韦宙”条,中华书局1961年排印本,第4095页。

⑦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四《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本。

最大。流经江汉平原的长江干流主要为荆江河段。上荆江为顺直微曲性河段，水流枝分，汉河发育；下荆江河道蜿蜒曲折，素有“九曲回肠”之称，江水泛滥的问题尤为严重，因此堤防的修筑至关重要。宋代本区堤防的发展，恰在江堤方面有突出表现，其他河湖堤防的修筑也有明显增长。明清以降，荆江堤防连成一线，为今著名的荆江大堤奠定了基础。今荆江两岸有长达数百公里的人工堤防，其中最为著名的荆江大堤位于荆江北岸，上起荆州枣林岗，下迄监利城南，全长 182.35 公里^①（见图 2-1《荆江大堤形势图》^②）。

有关荆江堤防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从清人撰修的《荆州万城堤志》到当代编写的《荆江大堤志》，以及今人的一些水利史、农业史论著^③，都程度不同地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但其研究范围多集中于明清以后，且重在荆江北岸堤防，对宋代及荆江南岸堤防虽有所涉及，却相当有限。本章拟全面复原宋元明清时期的荆江堤防^④，并对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加以探讨，以求对今日长江防洪、环境整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借鉴。

① 参见本书编委会《荆江大堤志》之《概说》，河海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 页。

② 引自前揭《荆江大堤志》，河海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如前揭周凤琴《荆江堤防与江湖水系变迁》，程鹏举《古代荆江北岸堤防考辨》，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周魁一、程鹏举《荆江大堤的历史发展和长江防洪初探》（载《长江水利史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江陵堤防志》（内部刊行本 1984 年），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等。前揭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也以较多篇幅讨论了宋代荆江堤防的问题，本研究即是对原有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充实，个别地方有所修正、更新。

④ 由于河道变迁、河水冲刷、泥沙淤积等原因，加上堤防质量不高，元朝末年本区又发生了长期的战争，使得宋元的堤防多数在明朝已毁损无存，至清代只剩下有限的记载，因此今人要恢复宋元荆江堤防的面貌十分困难，这里只能对此作初步探讨，有些地方不得不借助于逻辑推理。明清的情况则好得多，堤防地望基本可以指实。

第一节 荆江北岸堤防的发展

宋元明清荆北堤防的发展，主要在江陵县，其次在监利县。

一、江陵县

在荆江北岸诸县中，江陵县的总地势比较低洼，尤其是东南部如沙市一带，经常受到江水泛滥的威胁（即使在今天，这一带的防洪问题仍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因此，沿江堤防的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

宋代，江陵府人口的增长带来了对土地需求的上升和商业的兴盛，促进了以堤防为重要内容的水利事业的发展。环城西南筑有金堤，据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江陵知府张孝祥《金堤记》记载：

蜀之水既出峡，奔放横溃，荆州为城，当水之冲。有堤起于万寿山之麓，环城西南，谓之金堤。岁调夫增筑，夏潦方淫，府选才吏，分护堤上……异时岁修堤，则太守亲临之，庠者益之，穴者塞之，岁有增而无损也，堤是以能久……①

乾道四年（1168年）金堤溃损，是年八月，张孝祥以江陵知府的身份组织江陵人户再次大规模培修，上引《金堤记》细致记述了这次培修：

乾道四年，自二月雨，至于五月，水溢数丈，既坏吾堤，又啮吾城……秋八月，某自长沙来，以冬十月鸠材庀工作新堤，凡役五千人，四十日而毕。已决之堤，汇为深渊，不可复筑。别起七泽门之址，度两阿之间，转而西之，接于旧堤，穹崇坚好，悉倍于旧。

①（宋）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一四《金堤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校点本，第141页。

结合上引《金堤记》的两处记载，“有堤起于万寿山之麓，环城西南，谓之金堤”；“别起七泽门之址，度两阿之间，转而西之，接于旧堤”，可知旧堤即金堤，张孝祥别址另筑的新堤是为了弥补“已决之堤”留下的缺口，它在折而向西之后与金堤相接，亦当在城西南一带。

张孝祥称为“金堤”的这段堤防，在《輿地纪胜》、《方輿胜览》等书中，又作“寸金堤”^①。其中的原因：一个可能是因为《輿地纪胜》、《方輿胜览》所用的版本与今人所见《于湖居士文集》的版本不同^②；另一个可能是这段堤防“穹崇坚好，悉倍于旧”，堤身坚固，可称得上寸寸如金，故名。

另据楼钥《攻媿集》卷一〇六《朝请大夫曹君墓志铭》，与张孝祥大约同时在任的江陵县令曹盅也曾任城修堤，“调夫均平，躬自督课，增卑培厚，以为永利”^③。墓志铭还说，在此之前，当地“岁役人夫数千”筑堤，恰可与张氏《金堤记》所谓“岁调夫增筑，夏潦方淫，府选才吏，分护堤上”互相印证，反映出当时江陵城修筑堤防的工程经年不断。

此外，《朝请大夫曹君墓志铭》复称“寸金堤，去城二里，实捍大江冲突之患”，“又以农隙修筑沿江官堤，使前日巨浸冲决之地，复为膏腴，流移归业”。据此可知，城西南的寸金堤与沿江官堤皆为防护江陵城堤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堤之外，南宋修筑的“三海八柜”，在江陵城的防护体系中亦具有重要地位。

“三海”的前身是五代荆南高氏之“北海”。《輿地纪胜》卷六四有“北海”专条，称：“周显德二年，高保融自西山分江

① 《輿地纪胜》卷六四《荆湖北路·江陵府·景物（下）》“寸金堤”条称：“在府城外万寿寺之西。张孝祥有《寸金堤记》。”（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輿胜览》卷二七《江陵府·山川》亦有“寸金堤”条，称：“在府城外万寿寺西。张孝祥记。”中华书局2003年校点本，第482页。

② 前揭《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对此有过考辨，可参，第136页。

③ （宋）楼钥：《攻媿集》卷一〇六《朝请大夫曹君墓志铭》，中华书局1985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流，方五七里，筑堤而居，谓之北海。”^①“三海八柜”则是南宋为抵御金兵而修建的工程。据《輿地纪胜》卷六四“三海”条：

江陵以水为险，陆抗之筑大堰、高氏之名北海是也。《通略》“建隆二年”：先是，荆南高保勉退其弟节院使保寅归贡。上因保寅归，谕旨令决去城北所渚水，使道路无阻……绍兴，逆亮渝盟有渐，李师道柜上、下海，以为遏敌之计。开禧元年，兵端既开，刘帅甲又再筑上、中、下三海。吴帅猎继之，引沮、漳及诸湖之水注三海，绵亘数百余里，弥漫相连。又为八柜。丁卯春，敌犯荆门，距江陵才百余里而去，亦知有三海之险，不可侵軼也。

《宋史》卷三九七《刘甲传》、《吴猎传》，卷四〇三《赵方传》以及卷四一二《孟珙传》等，都记载了这类事，内容大同小异。《刘甲传》称：

甲谓：“荆州为吴、蜀脊，高保融分江流，渚之以为北海，太祖常令决去之，盖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遗址浚筑，亘四十里。^②

《吴猎传》记：

猎计金攻襄阳，则荆为重镇，乃修成“高氏三海”，筑金鸾、内湖、通济、保安四匮，达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长林、药山、枣林四匮，达于下海；分高沙、东奖之流，由寸金堤外历南纪、楚望诸门，东汇沙市为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遏走马湖、鬲斗陂之水，西北置李公匮，水势四合，可限戎马。^③

① 《輿地纪胜》卷六四《荆湖北路·江陵府·景物》。

② 《宋史》卷三九七《刘甲传》。

③ 《宋史》卷三九七《吴猎传》。

《赵方传》云：

（赵方）增修三海八匱，以壮形势。^①

《孟珙传》又云：

珙至江陵，登城叹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敌一鸣鞭，即至城外。盖自城以东，古岭先锋直至三镡，无所限隔。”乃修复内隘十有一，别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数十里者。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因障而东之，俾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匱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万，民不知役，绘图上之。^②

由上可知，五代高保融曾在传说中的三国陆抗所筑大堰处分江流筑“北海”，南宋时刘甲等重新修复北海遗址，吴猎、赵方将北海扩为“三海八柜”。“三海八柜”加上城西北的李公匱，使江陵城可以恃水为险。后，孟珙再引沮、漳之水贯通三海，江陵城周围“三百里间，渺然巨浸”矣。

从江陵城西至城东南，“三海八柜”构筑起一道浩荡的护城堤防，成为南宋江陵的又一道生命线。

距江陵城东南十余里沙市，唐时全称为沙头市，常简作沙市或沙头，如元稹有“吠声沙市犬”的诗句^③，杜甫则称“飞急到沙头”^④；北宋在此设立税务，故又称“沙市务”。^⑤沙市始于何时不

① 《宋史》卷四〇三《赵方传》。

② 《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

③ （唐）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〇七，中华书局1960年校点本，第4531页。

④ （唐）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见《全唐诗》卷二三一，第2541页。

⑤ 参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二之二四“盐法”，熙宁十年（1077年）江陵府解盐额，中华书局1957年缩印本。

详，中唐以后已从江陵附近的一个江津渡口发展成为商业交通繁盛的大型集市，并筑有相应的沿江堤防。^① 宋人有诗曰“千年堤岸围沙市”^②，“千年”当是诗人的夸张，但说明沙市堤防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

宋代沙市已成为江陵府的经济中心，“商贾辐凑，舟车骈集”^③，相当繁荣，官府曾数度修固江堤，有明确记载的一是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二是在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熙宁间郑獬曾修筑捍水长堤，庆元时，受当时沙市河弯常遭冲刷的影响，御江长堤难以维持，故庆元三年（1197年）有重修江堤之议。《宋史·河渠志》称沙市“地本沙渚，当蜀江下流，每遇涨潦奔冲，沙水相荡，摧圯动辄数十丈，见存民屋，岌岌危惧”^④。这种情形意味着南宋时沙市河弯已遭到较为严重的冲刷，与江陵一道面临着严峻挑战。今日荆江大堤以江陵、沙市为重要险段，其历史的由来至迟可追溯到宋代。

有关南宋的沙市江堤，宋人留下的记载较多，如陆游、张孝祥、范成大等都写过此类文字。乾道六年（1170年）闰五月陆游自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沿水路西行入蜀，沿途写下了著名的长江游记《入蜀记》。从九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陆游在沙市停留了十余天，在他的《入蜀记》中，曾几次提到沙市的江堤，如称“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则与蜀人为婚姻者也”；又称其离开沙市之际，“解舟，击鼓鸣舳，舟人皆大噪，拥堤观者如堵”。^⑤ 沙市堤上既有常居者，又可容纳“如堵”之“观者”，说明堤防是比较宽阔的。再如，张孝祥的词有“闻道玺书频下，看

① 参见前揭程鹏举《古代荆江北岸堤防考辨》。

② （宋）袁说友：《东塘集》卷四《泊沙市》，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舆地纪胜》卷六四《荆湖北路·江陵府·景物（下）》“沙头市”条。

④ 《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荆襄诸水”条。

⑤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即沙堤归去”之句^①；范成大的诗写沙市：“大堤少人行，谁与艺稷黍……薄暮有底忙？沙头听鸣橹。”^② 这些记载都反映出南宋孝宗“隆兴议和”后的沙市江堤已有相当规模，是民户居住之地，人马往来之途。

沙市堤段从距江陵城西约二三十里处始，向东延伸的一段区间，称黄潭堤（又名黄滩堤），见于《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

绍兴二十八年，监察御史都民望言：“荆南江陵县东三十里^③，沿江北岸古堤一处，地名黄潭。建炎间，邑官开决，放入江水，设以为险阻以御盗。”既而夏潦涨溢，荆南、复州千余里，皆被其害。去年因民诉，始塞之。乞令知县遇农隙随力修补，勿致损坏。”从之。^④

都民望称黄潭堤为“古堤”，说明该堤始筑于南宋以前。清人诗称：“黄潭一线势危哉，骇浪惊涛打岸回……每念筑堤能捍水，始知高氏亦雄才。”^⑤ 视黄潭堤为五代高氏所修。

由于黄潭堤的开决对江陵、复州地区影响巨大，又处于“沙水相荡，摧圯动辄数十丈”^⑥的沙市河弯，因此，筑塞后的黄潭堤不仅地位重要，而且培修难度较大。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筑塞决口后直至明代，黄潭堤的培修一直受到重视，使得这段堤防

①（宋）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三一《水调歌头·凯歌奉寄湖南安抚舍人刘公》，第298页。

②（宋）范成大：《范石湖集·诗集》卷一五《荆渚堤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校点本，第203页。

③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二《水利·荆州府·江陵县》“黄滩堤”条称，堤在县东南二十里。据江陵城的位置，长江流经城西南至东南，因此，“县东”的准确说法应为“县东南”。

④ 《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荆襄诸水”条。

⑤ 转引自（清）陈诗编《湖北旧闻录》卷一〇《水程一·荆州府》，武汉出版社1989年标点本。

⑥ 《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荆襄诸水”条。

得以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了作用，为日后万城大堤的修筑提供了基础。

元代荆江两岸堤防的情况，现存记载不多，但从下引元人所撰《石首重开古穴记》中可以看到，宋元之际荆江两岸堤防有较大发展：

按《郡国》，古有“九穴十三口”，沿江之南北，以导荆水之流。夏秋泛滥，分杀水路，民赖以安。宋以江南之力，抗中（原）之师，荆湖之坛日开，荆湖之费日广，兵食常若（苦）不足，于是有兴事功者出而画荆南留屯之策，保民田而入官，筑江堤以防水，塞南北诸古穴，阴寓固国之术，舍小利害大谋，急近功（遗）远患，策何善耶？图锄既兴，工以万计，屯田之夫不足供其役，则取之民；一邑之民不足，则取之他邑，甚而他郡皆征焉。集夫之名，岁以冬十月迄春三月筑堤，以夏五月迄秋八月防水，终岁勤动，良农废业。归附以来取几何？纵令捍御，有备无虞，官人之数，偿民出之什一，堂堂天朝，梯航效贡，岂与此水争咫尺之利哉？今稽故址，或摧而江，或决而渊，或渚而湖。七十年间，水土之工，皆生民之膏血……①

宋元时期修筑堤防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湖区与荆江河道产生了不利影响，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三江总会堤防考略》云：

汉唐以来，代苦水患。至宋，为荆南留屯之计，多将湖渚开垦田亩，复沿江筑堤以御水。故七泽受水之地渐涸，三江流水之道渐狭而溢，其所筑之堤防亦渐溃塌。

① 引文取自（元）王廷端《石首重开古穴记》，载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文》。原文脱误之处，另据同治《石首县志》卷七《艺文志》所录（元）林元《重开古穴记》补正，补正文字加（ ）表示。

这种不利影响又与宋元以来上游地区的开垦活动密切相关。对此，时人已有认识：“近年深山穷谷、石陵沙阜，莫不芟辟耕耨。然地脉既疏，则沙砾易崩，故每雨则山谷泥沙尽入江流，而江身之浅涩、诸湖之湮平，职此故也。今可尽心力以捍民患，惟修筑堤防一事耳。”^① 因此，明代以后，修筑堤防成为本区捍御水患、保证开发活动进行的最重要手段，明代也成为荆江堤防大发展的时期。至迟在明中叶，荆江两岸修筑了数万丈堤防。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荆州府堤考略》称：

江水之患，全在荆州一郡。夹岸南北凡六县，北岸则江陵、监利堤，凡四万九千余丈；南岸则枝江、松滋、公安、石首堤，凡五万四千余丈。嘉靖庚申岁，洪水决堤无虑数十处，而最为要害者：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朝英口，江陵之虎渡、黄潭镇，公安之窑头铺、艾家堰，石首之藕池，诸堤冲塌深广，最难为力者也。每岁有司随筑随决，讫无成功。至四十五年十月，知府赵贤估议请筑，务期坚厚。自丙寅历戊辰，凡三冬，六县堤稍就绪，始立“堤甲法”：每千丈堤老一人，五百丈堤长一人，百丈堤甲一人，夫十人。江陵北岸总共堤长六十六人，松滋、公安、石首南岸总共堤长七十七人，监利东西岸总共堤长八十人，夏秋守御，冬春修补，岁以为常……

明代荆江堤防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堤防长度的增加上，还体现在修防制度的建立上。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大水冲溃了沿岸大部分堤防，客观上促使了堤防修防制度的创立。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赵贤建立堤甲法；其后，本区又将修堤古法与本区渐变的河势相结合，制定了“可经久而通行”的十条修防措施，即审水势、察土宜、挽月堤、塞穴隙、坚杵筑、卷土扫、植杨柳、培草鳞、用石甃、立排

^①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修筑堤防总考略》。

桩等。^① 其中前三项尤为重要，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修筑堤防总考略》详解道：

一曰：审水势。东洗者必西淤，下涩者必上涌。筑堤者，审其势而为之址，而最难御者，莫如直冲之势，议者退而曲防，故荆州虎渡穴口之堤，先年愈退愈决，而近日直逼江口以遏水冲，乃得无恙。他如顺注之倾涯，则堤势宜迂；急湍之回沙，则堤势宜峻。二曰：察土宜。一遇决口，必掘浮泥，见根土乃筑堤基，其所加挽者，必用黄、白壤。三曰：挽月堤。洗在东涯则沙回而西，淤在南塍则波漩而北，故往往古堤反抱江流者为水所啮，即临倾涯之上，势甚孤悬，必先勘要害之地而预筑重护之堤。

除了上述十项防护之法，同书卷三三《护守堤防总考略》还列举了立堤甲、豁重役、置铺舍、严禁令等法，这些都体现了本区堤防建设水平的提高。

具体到江陵县，明清两朝堤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万城堤的逐步形成。

万城堤，初见于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荆州府堤考略》：“郡西上六十里有万城堤，在当阳、江陵之界。嘉靖十一年一决，直冲郡西，城不浸者三版。”据此，早期的万城堤是位于江陵城西六十里的一段堤防，修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以前。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以后，堆金台至拖茅埠的二百二十里堤防被统称为“万城堤”^②，至此，万城堤有了较大拓展，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以下参照图 1-2《清光绪年间荆州万城大堤全图》，结合今日

①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修筑堤防总考略》。

② 《荆州万城堤志》卷三《建置·堤防》“万城堤”条。

上荆江河段之划分^①，将清代荆北堤防分为阴湘城堤至古月堤、柳林堤至獐卜穴堤、稀柳湾堤至马家寨堤、冲和观堤至洪水渊堤四段，逐一进行考察。

（一）阴湘城堤至古月堤

1. 沮、漳河下游对江陵城西地区的影响

阴湘城堤至古月堤之间的河段位于江陵城西北至西南一带（参见图 1-2《清光绪年间荆州万城大堤全图》），并紧邻沮、漳河下游，此区间堤防不仅受江水倒灌的影响，更有沮、漳河来水的威胁。

沮、漳河为半山地河流，上游属鄂西山地，中下游为山地向江汉平原过渡的低山丘陵地带，由于流域地形为西北高、东南低，有利于偏东和偏南气流的侵入和抬升，故多暴雨。^② 沮、漳流域这种西北—东南的走向以及多暴雨的气候特征对下游的影响相当明显。以同样位于沮、漳下游的枝江县为例，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称县内滨沮、漳河沿岸诸垸在沮、漳水盛涨时，“自瓦窑湖下无完堤；大江水盛，则自义兴而下俱波及之”。而沮、漳水与江水同涨时，情势更为危急。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五月，由于连日大雨，沮、漳“陡发蛟水，加以川江水势建瓴而下，容纳无所，泛滥旁溢，致将官民各堤漫溃，实缘水势过大，非人力所能挽回”。这次大水还将上渔埠头堤冲出溃口约宽六十八丈，冲刷成潭，水深六、七尺。^③

① 今之上荆江主要包括沙市河段与公安河段。沙市河段上起杨家脑，下至观音寺（参见前揭李楚南等《荆江沙市河段河床演变分析》），本书考察的堆金台至獐卜穴堤河段大致与此相当；公安河段上起观音寺，下至石首县新厂镇，由斗湖堤河弯与郝穴河弯组成（参见前揭张应龙等《长江中游公安河段河床演变分析》），本书考察的稀柳湾至洪水渊河段大致与此相当，其中稀柳湾至马家寨河段大致与斗湖堤河弯段相当，冲和观至洪水渊河段大致与郝穴河弯段相当。

② 参见本书编委会《湖北水利志》第一篇《水利自然环境概况》第三章“河流”，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5～116 页。

③ 《裕泰奏渔埠头溃口情形疏》，见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

沮、漳河对江陵城西的影响还体现在入江口的迁移方面。汉代及其以前,漳水于江陵入杨水,东注于沔;汉末至六朝,漳水已不入杨水,而是与沮水合流后于枝江县入江。^①宋代沮、漳水仍于枝江县入江^②,但南宋孟珙修“三海八柜”时,曾引沮、漳水绕江陵城北入于汉水。大约在明代,沮、漳水分两支分别于枝江县、江陵县入江,随后两支入江的情形又有变化。据乾隆《荆州府志》卷五《山川》“沮水”条:“沮水入江处,今谓之两河口,即沮口也。沮水旧分二支,一支自江陵入江,一支自枝江入江。枝江之流,明万历二十五年因沮水泛滥,陂堰塞之,沮水遂径从江陵入江。”关于沮、漳水在枝江县的分支,同治《枝江县志》的说法与此不尽相同,称:“沮、漳会于当阳界两河口,流至凤台入邑境,又流至娄家洲分流,至窑子口入江。后窑子口淤塞,遂尽归江陵地界箐箕洼入江。”^③按:箐箕洼即水师营处。^④乾隆初,水师营前的天鹅洲规模尚小,“为害尚浅”,但至迟在乾隆后期,天鹅洲由于不断淤长,已逼近御路口(又称“玉路口”),造成“水势阻逼汹涌,万城以下大堤受害弥甚”。^⑤不仅如此,天鹅洲以下又新生了江干新淤洲。^⑥江心洲的发展逐渐淤塞了沮漳河的入江口,光绪时,沮、漳水的入江口延伸至御路口。^⑦

上述可见,沮、漳水的盛涨及江水的倒灌顶托会给江陵城西一带造成较大影响,宋明以后,随着江陵县社会生产的发展,筑堤御

① 参见前揭《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二章“汉水下游支流与分流河道的历史演变”,第104页。

② 《舆地纪胜》卷六四《荆湖北路·江陵府·景物》“沮水”条。

③ 同治《枝江县志》卷二《地理志中·山川》“沮水”条。

④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九《堤防志三·顺江堤》“江干新淤洲”条。又据乾隆《荆州府志》卷一九《乡镇·江陵县》“箐箕洼市”条,箐箕洼市在县西南六里。

⑤ 《江邑水道形势》,见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堤防》。又据乾隆《荆州府志》卷一九《乡镇·江陵县》“御路口市”条,御路口市在城南六里。

⑥ 乾隆《江陵县志》卷三《方輿·山川》“江干新淤洲”条。

⑦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三《方輿三·山川》“沮水”条。

水成为必然。

2. 阴湘城堤至万城堤

至少在明正统（1436—1449年）初年或之前，江陵城西已有沿江堤防。“荆州民言：‘城西江水高城十余丈，霖潦坏堤，水即灌城。请先事修治。’”^①

明代有明确记载的是万城堤和逍遥湖堤。

上文已述，万城堤在江陵城西六十里、当阳与江陵之间，为城西、城北一线的屏障，所防备者除了倒灌的长江水，还有对江陵城西（北）威胁更大的沮漳河来水。明人袁宏道论万城堤与江陵北城的密切关联道：“万城之水，朝决朝注，高与堞齐，名虽曰城，其实堑也。”^② 故该堤为“郡治之大要害”^③。嘉靖十一年（1532年）万城堤决，致使“城不浸者三版”^④，危害甚巨。

清代的万城堤分为上、下两段，上段长六百六十二丈，下段长五百八十丈。^⑤

逍遥湖堤在万城堤之上，清代亦分为上、下两段，上段长四百六十二丈，下段长五百三十五丈。^⑥ 同时，逍遥湖堤以上增筑了堆金台堤、得胜台堤和阴湘城堤（参见图1-2《清光绪年间荆州万城大堤全图》），其中堆金台堤九百一十四丈，得胜台堤一百六十六丈。^⑦

清代之所以在江陵城西增筑上述堤防，与当时日益增加的水患密切相关，如顺治十年（1653年），万城堤溃决，“水灌城足，西门倾塌”^⑧。尤其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特大洪水冲开了江

① 《明史》卷八八《河渠六·直省水利》。

② （明）袁宏道：《荆州修复北城记》，见乾隆《江陵县志》卷四五《艺文·记》。

③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荆州府堤考略》。

④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荆州府堤考略》。

⑤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江北大堤”条。

⑥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江北大堤”条。

⑦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江北大堤”条。

⑧ 《水患纪略》，见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江防》。

陵西、北两门，全城巨浸。^①这次大灾，再次凸显了江陵城西和城北一带自古存在的难以防御的特点。此后，逍遥湖以上堤防逐渐延伸，至迟在嘉庆时，增筑得胜台堤，并以此为“万城堤”之始。光绪时，又筑堆金台堤，万城堤的起点也因此上推，其终点亦由过去县南约六里的御路口下延至约一百三十二里的拖茅埠。^②至此，万城堤完成了从江陵县西的一段区间堤防扩展为江陵整个江北堤防的转变。

堆金台以上另有阴湘城堤，在城西七十里，自马山起至枣林岗止，长约十里，由当地居民随山岗地势，“于土岗上加筑二三尺，致成堤形”^③。枣林岗也是今天荆江大堤的起点。^④在此处筑堤，取决于该处“地居上游，为害匪浅”^⑤，“外临沮漳、内积山水”^⑥的形势。

3. 方城堤至李家埠堤

本段堤防包括方城堤、渔埠头堤、沙溪堤和李家埠堤（参见图1-2《清光绪年间荆州万城大堤全图》）。

李家埠堤见于明代文献，筑于洪武（1368—1398年）中期以前^⑦，在县西三十里，当水势之冲要^⑧，明代荆州府民谣称“水来打破李家堤，荆州便是养鱼池”^⑨，可见李家埠堤之重要。成化（1465—1487年）初年，知府李人仪（又作李文仪）于堤之要害处埋柱板、遏水势，修建一系列护岸工程；后柱板为居民盗用，李家

① 《荆州万城堤志》卷首《谕旨》“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四日”条。

② 《荆州万城堤志》卷三《建置·大堤》“万城堤”条，乾隆《江陵县志》卷九《建置六·乡镇》“御路口市”、“拖茅铺”条。

③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堤防》“阴湘城堤”条。

④ 参见前揭《荆江大堤志》第二章“堤防工程沿革”，第55页。

⑤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堤防》“阴湘城堤”条。

⑥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堤防》“吴家桥闸”条。

⑦ 嘉靖《荆州府志》记，洪武十八年（1385年）李家埠堤决。转引自前揭《荆江大堤志》第二章“堤防工程沿革”之“荆江大堤决溢表”，第67页。

⑧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二《水利·荆州府》“李家埠”条。

⑨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江陵》“李家埠堤”条，湖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元年刻本。

埠堤亦在弘治十一年（1498年）溃决，“淹死人畜不可数计”。经过知府吴彦华的重筑，堤“势甚坚厚，至今赖焉”^①。

李家埠堤与万城堤为“唇齿之势”，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万城堤溃决时，“赖李家埠为障蔽，郡城免于昏垫”^②。

总体上看，明代至清前期对李家埠堤的培修与保固颇有成效，这从清代志书众口一辞地转述该堤“修筑坚厚，至今赖焉”的说法中可知，文献记载也反映了这一点。除了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特大水灾的冲击外，明代直至清道光（1821—1850年）以前，李家埠少有溃堤的记载。这一方面可归结为堤防的培修与保固得法；另一方面河道南移也是一个原因。关于河道的移动，清人曾有考察：“……乃步履以审其地，所恃仅在一坻。江之坻，自上代来者，郡以西，较今坻盖五里而缩；郡以东，较今坻三里而缩……盖江渐淤而为洲，堤渐废以为田，而今坻之外，又复为洲。”^③可见，河道南移在城西表现得比城东明显。

李家埠堤受到的大冲击发生在乾隆与道光年间。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大水冲决万城堤至玉路口堤一线二十余处，损失难以估量。^④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李家埠堤上游的张家场堤溃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家埠堤与邻近上渔埠头堤亦溃决，这两次大水均直灌城西，城门口被冲成深潭，白马坑城崩坍。^⑤日渐加重的水患使得堤防不得不再增筑、加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上渔埠头堤、李家埠堤分别挽筑月堤四百八十七丈和四百七十八丈。^⑥

①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江陵》“李家埠堤”条，湖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元年刻本。

② 《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八《湖广四·荆州府》“李家埠堤”条，第3662页。

③ 《严以方堤防议》，见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江防》。

④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六一《外志一·祥异》。

⑤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六一《外志一·祥异》，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李家埠堤”条。

⑥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月堤”条。

清代还从方城至李家埠逐段培修了方城堤（上段五百一十丈、中段五百九十七丈、下段四百九十四丈）、渔埠头堤（上段七百九十丈、下段七百丈）、沙溪堤（上段三百七十二丈、下段五百二十丈）和李家埠堤（上段四百九十四丈、下段六百六十八丈）。^① 上述堤防与前述阴湘城至万城之间的各堤段相连，在城西沿沮漳河下游至沮漳河入江处逐段设防，以此屏障江陵城。与明代主要依靠万城堤和李家埠堤相较，有显著发展。

江陵城西频遭洪水入侵，除了降水原因之外，上游枝江县河道中洲滩的演变与开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枝江河道中洲滩的演变，最要者在百里洲。上章已述，嘉靖年间（1522—1566年），百里洲被冲为上、下两段，间隔约为二十里。^② 嘉靖十一年（1532年）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两次大水，两岸冲决数十处，百里洲堤即为其中之一。^③ 此后，百里洲的位置逐渐向下游东移。嘉靖年间百里洲在枝江县东北六十里的河道中^④，至乾隆五年（1740年）以前，上百里洲已距离枝江县一百里（一说八十里）。^⑤ 随着百里洲的东移，下百里洲逐渐靠近沮漳水入江口，迫使江陵城以西河段的水流发生变化，增加了该河段的不稳定性，进而冲击河岸。

同时，对万城至李家埠河段沿岸边滩的开发，也对洪水期行洪造成很大影响。

清朝前期，万城至李家埠一线垦辟的主要堤垸有保障垸、古埂垸、由始垸和谢家垸。保障垸，“据万城堤上游，当邑辖十之七，江邑辖十之三，长约二十余里”；古埂垸，“上接保障垸，下至下

①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江北大堤”条。

② 乾隆《枝江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百里洲”、“上百里洲”、“下百里洲”条。

③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荆州府堤考略》。

④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枝江》“百里洲”条。

⑤ 乾隆《枝江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之“百里洲”、“上百里洲”、“下百里洲”条。

李家埠，约长二十余里”^①；古埂垸之下依次是由始垸、谢家垸。诸垸皆修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以前。

从乾隆至道光的百余年间，朝廷及地方官员有关诸垸“议修议毁”的争论持续不休，据《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垸名》，保障垸是“议修议毁，积年有案”；古埂垸“屡经札飭创毁，有案”；由始垸“札飭创毁，有案”；谢家垸也是“积年押毁，有案”。

主张筑垸的既有地方官员也有当地绅衿、民人。如古埂垸民人余名传等称：古埂垸“外御沮、漳二河之水，内护大堤十工，关系匪轻，由来久矣”；当地生员陈光国等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大水后稟请政府督修；时任水师营守备张永兴亦称：“古埂垸系历来民堰，虽被江水漫溃（按：即乾隆五十三年大水），旧堤尚存，其残缺低矮之处需工无几。且坐落万城堤外，上自保障起，下至渔埠止，包护大堤二十余里之遥，一经补筑，匪独该垸赋命有全，实为万城之捍御，下游之保障。”^② 太守雒氏也持诸垸有捍御之功的说法，认为：

自今修筑以来，凡于沮、漳盛涨以及大江泛涨，各垸堤俱资抵御，江水均未淹到大堤。惟于十八、二十等年，沮漳与川江并涨，以致漫逾垸堤，淹至大堤。迨至水落后，各垸民等仍复照旧修补，连年均无盛涨，江水仍为垸堤抵御，大堤并未受水。^③

再如保障垸，主张保垸者称：

该保障垸不惟不碍水道，亦不阻遏江流，并可为大堤外护。设遇沮漳河水及荆江大汛同时涨发，大江之水由筲箕洼倒

① 《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垸名》。

② 《张郡丞移覆保障、古埂等垸由》，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成案》。

③ 《雒太守请修古埂垸稟》，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成案》。

漾而上，则沮漳为江水顶托不消，亦系该垸先受冲刷，如果垸堤稳固，足资抵御，大堤即可保护无虞。至于大江急溜，势不能旁趋逆上，故历来未闻该垸有碍江流。迨至道光十九年，江水盛涨，漫过枝江百里洲堤，水势泛滥，通连沮漳，汪洋一片，冲溃保障垸堤，以致水到万城堤脚，日为风浪所击，间有洗刷浪坎，并非该垸束水冲溃之故。细加查勘，是保障垸既为大堤外护，并未阻碍水道，存之似尚有益。况昔年取名“保障”二字，似亦保障大堤之义。垸内，军民田亩参错其间，为数不少，既有军田，则知该垸由来已久，与沿江洲地所筑私垸阻遏江流者不同，抑且民赋攸关，屯粮倚赖，一旦废弃，又与国计民生两有窒碍。^①

可见，由于利益所在，“保垸派”并不认为沿万城堤一线围筑垸堤会对江堤产生不利影响，即便是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特大洪水之后亦是如此。

但是，在主张毁垸者看来，保障等沿万城堤一线围垸的存在是水患加重、导致溃堤的重要原因。每当水患发生，人们便疾呼刨毁私垸，如嘉庆元年（1796年）郡丞张氏曾对古埂垸进行过勘查，指出：

（古埂垸）坐落万城堤外滩地，上接保障垸，下接渔埠头，绵长二十余里。其沮、漳二河水，涨即由此地宣泄，径达沙市，顺流而下。该垸若任挽修，河面日渐窄狭，水势必至漫溢，下游一带堤工势必受惊，难资捍卫。当复询访，土人僉称：该垸虽名古埂，实系旧有路埂一条，并非有堤之垸……今查古埂垸并非报部官垸，胆敢私行修筑，阻遏江流，所关甚巨，应请嗣后听其自废，不许复行修筑，以遏水道。^②

① 《孙、沙二令会覆保障垸稟》，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成案》。

② 《张郡丞移覆保障、古埂等垸由》，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成案》。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裕制军奏毁保障等垸疏略》称：

李家埠向有淤洲一片，名曰保障、古埂、谢家等三垸。该垸民私筑土堤以拦沮、漳之水，并于李家埠对面设闸宣泄，遂致河身逼仄，水难畅行。一遇泛涨，垸堤辄溃，大堤因而吃重。现在该堤外沟道即由闸口直贯而入，冲刷成河，是其明验。查，该垸民仅完芦课，为数甚微，臣现飭该道府督同江陵县勘明，押令全行刨毁……①

倪文蔚看到的问题更加深刻，他在裕氏的奏折之后写了这样一段按语：

保障一垸，议修议毁，率以江涨为言，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此垸距江尚远，而当沮漳上游，一面临河，两头紧接大堤，周遭万余亩。沮漳俗呼“小河”，宽不过数十丈，对岸私垸林立，万一蛟水暴发，江涨并兴，水道太窄，宣泄不及，势必漫溢为害。垸溃，则兜水不消，逼溜内射；不溃，则由堆金台空处漫堤而过，皆属可忧。②

筑堤围垸本为造福民生，变沮洳之地为良田，但过度膨胀甚至以私害公、“以邻为壑”，良法便成为大害，何况在堤外洲滩围垸本身就是利弊参半之举。明清以后对围垸究竟是保是毁，如何控制，一直摇摆不定，保障等垸的屡修屡毁就集中体现了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矛盾心态。这种复杂心态至后代仍有体现。今人以为：沿堤洲滩民垸“在一般洪水情况下，对大堤有一定掩护作用，但在较大洪水时，则又严重阻碍泄洪，因而前清、民国时期一再为官府所严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南军政委员会于1951年

① 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成案》。

② 《裕制军奏毁保障等垸疏略》按语，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成案》。

正式明确了态度：“荆江两岸大堤之间所有洲滩民垵一律作为蓄洪垦殖区，即大水时用以蓄洪，小水时用于垦殖。”^① 此虽折中之举，亦不失为一务实良策。

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明清万城一带堤防的压力日渐增大。乾隆朝开始，民谣盛传“水来打破万城堤，荆州便是养鱼池”^②。

4. 独阳堤至古月堤

清代本河段堤防包括独阳堤、东岳庙堤、斗篷堤、黑窑厂堤和古月堤（参见图 1-2 《清光绪年间荆州万城大堤全图》）。独阳堤分上、中、下三段，分别长三百七十二丈、六百七十四丈、五百五十五丈；东岳庙堤长六百七十四丈；斗篷堤亦分上、中、下三段，各长五百六十四丈、五百丈、三百一十丈；黑窑厂堤长九百丈；古月堤长一千二百九十五丈。^③

对该河段而言，江心洲的威胁颇大。

至迟在乾隆初，李家埠至古月堤一带的河道中分布着龙洲、天鹅洲、新淤沙洲、窖金洲、杨林洲等江心洲^④，加上东移至江陵以西四十里的下百里洲^⑤，该河段呈现出“下百里洲、龙洲、天鹅洲、江杆洲横亘于右，窖金洲障塞于左，江流洄漩攻激，最为险要”^⑥的河势。当洪水到来时，江心洲便改变水流方向，猛烈冲刷河岸，对堤防产生不利影响。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的水灾即是一例：是年六月，大水冲决了万城堤至玉路口堤一带二十余处。

① 参见前揭《荆江大堤志》第二章“堤防工程沿革”第五节“沿堤洲滩民垵”，第 84 页。

② 见乾隆《江陵县志》、光绪《荆州府志》、光绪《续修江陵县志》等志的“万城堤”条。

③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江北大堤”条。

④ 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乾隆《江陵县志》卷三《方輿》。

⑤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三《方輿三·山川》“百里洲”条称洲在郡西四十里。

⑥ 《荆州万城堤志》卷一《说略》“中斗篷堤”条。

灾后，窖金洲被指为造成江堤溃决的重要原因之一^①，这直接导致了在黑窑厂堤上下修建数个矾头护岸工程，即杨林矾、黑窑厂矾和观音寺矾。杨林矾为鸡嘴坝，矾长二十一丈，土坝长一百四十丈；黑窑厂矾初为碎石裹头，后亦改为鸡嘴坝，矾连土坝长十八丈八尺。^②在这两个护岸工程的修建中，逐渐延伸的石矾迫使水流南趋，对岸窖金洲的浮沙一时间被冲刷去几百丈，洲体有所溃塌，一时收效显著。^③不久，由于“北岸从前塌崖处所，渐次涨有新沙”，又增筑了观音寺矾。^④

然而，三十年之后，窖金洲非但未被冲毁，反而“沙倍多于三十年前矣。昔江流至此分为二，一行洲南，一行洲北；今大派走北者十之七八，洲南夏秋尚通舟，冬竟涸焉”^⑤。时人颇感无奈：“石矾原为挑溜而设，无如对面窖金洲，坚如铁板，江面逼窄，置一石矾于急溜之中，不能挑动，徒费万金，而急溜仍归北岸，则何如废矾而固北岸之为愈也？”^⑥

杨林矾、黑窑厂矾与观音寺矾作为护岸工程，可以在短期内逼流南趋，保护北岸堤防，但希望以此可以挑流并冲毁江心洲，则难以实现。清末，受窖金洲西北新淤出之学堂洲^⑦增长及沮漳河口下

① 据《荆州万城堤志》卷首《谕旨》“五十三年七月十四日”条，窖金洲“向来只系南岸小滩，近来沙势增长，日渐宽阔，江流为其所逼，渐次北趋，所谓南长北坍，以致府城濒江堤岸多被冲塌，屡致淹浸”。

②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杨林矾”、“黑窑厂矾”条。

③ 《荆州万城堤志》卷首《谕旨》中多篇奏折提到这一问题。

④ 《毕制军续添石矾疏略》，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四《岁修·石工》。

⑤ 《阮元窖金洲考》，见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堤防》。

⑥ 《周制军改石用砖札》，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四《岁修·石工》。

⑦ 据黄传俊研究，光绪末年，随着上游浈市河弯的变动，沙市河弯观音矾以上河道由于过于弯曲，主流在该处取直，产生撇弯情况。沙市至万城堤段近岸河床开始逐年淤积，在窖金洲西北渐涨成今学堂洲。参氏撰《长江中游沙市河弯河床演变分析》，载前揭《长江中下游河床演变分析文集》（第二辑）。

移影响，杨林矶与黑窑厂矶均不再临江而逐渐淤塞。^①

要解除江陵城西一带堤防的威胁，必须同时对沮漳河进行综合治理。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沮漳河流域进行了初步整治：一是在上游结合灌溉兴建水库拦洪；二是扩大沮漳河下游两岸堤距与重开入江河口。通过整治，新建成的漳河水库不仅减轻了下游洪水灾害，而且避免了沙市水位的骤然增高，从而缓解了沮漳河洪水对荆江大堤的压力。但直至20世纪60年代，沮漳河对荆江大堤的威胁并未根本解决，仍可听到希望实施“沮漳河改道方案”的呼声。^②

（二）柳林堤至獐卜穴堤

柳林堤至獐卜穴堤河段（参见图1-2《清光绪年间荆州万城大堤全图》）正处于沙市河弯的弯道，直接迎流顶冲，自古以来为荆江北岸防护的重点和难点河段。清代本河段包括柳林堤（上段五百六十丈，下段五百五十八丈）、横堤（六百九十二丈）、阮家湾堤（六百五十丈）、黄滩堤（又名黄潭堤，五百九十二丈）^③、杨二月堤（五百四十三丈）、柴纪堤（五百七十九丈）、登南堤（五百七十六丈）和獐卜穴堤（五百六十五丈）。^④

以上诸堤中，黄滩堤南宋之前已有，载于史籍则始自南宋，是本河段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堤防（详见上文）。明代黄滩堤“当江流

① 参见前揭《荆江大堤志》第二章“堤防工程沿革”第四节“护岸工程”，第78页。

② 本段参见前揭《荆江大堤志》第四章“综合治理”第三节“河道整治工程”，第160~162页。

③ “黄潭堤”之名初见於宋代，见前引《宋史·河渠志七》“荆襄诸水”条。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与万历《湖广总志》称之为“黄滩堤”，清前中期志书复称为“黄潭堤”，至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光绪《荆州府志》时复改“黄滩堤”。一堤二名，反复变化，当与“潭”、“滩”二音相近有关，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当地环境的变化。从宋代的“潭”到明代的“滩”，很可能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堵筑黄潭决口后潭水干涸有关。经过明代的数次决口，尤其是万历十九年（1591年）大决后，“水势冲激，潭深叵测”，见顺治《江陵志余·志水泉》“黄潭”条。既因冲刷而积水变深，故清代前中期的方志复称该堤“黄潭”。以后随着堤防与围垦的发展，黄潭或又干涸，遂再称“黄滩堤”。

④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江北大堤”条。

二百余里之冲，一决，则江陵、潜江、监利民为鱼鳖，诚要害也”^①。在此背景下，当地对黄潭堤进行了较大力度的培修与防护。正统年间（1436—1449年），太守钱听筑黄潭堤数十里^②，此后的数任知府都坚持修护。成化（1465—1487年）初年，知府李文仪（一作“李人仪”）沿堤甃石，首建黄潭堤的护岸工程。正德十一年（1516年）大水决堤后，知府姚隆增筑了三处月堤，共千余丈，“地方赖焉”。但至万历（1573—1619年）中，三处月堤已“势渐崩颓”^③，足见黄潭堤河段受到的冲刷强度之大。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荆江遭受特大洪灾，沿江决堤“无虑数十处”，黄潭堤是其中“冲塌深广、最难为力者”^④之一。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黄潭堤再遭重创，“堤防荡洗殆尽，民之溺死者不下数十万”^⑤。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月开始，知府赵贤重筑堤防，“务期坚厚”，工程历时三年；赵贤还在隆庆二年（1568年）“堤稍就绪”时立“堤甲法”：“每千丈堤老一人，五百丈堤长一人，百丈堤甲一人，夫十人”；堤甲法设立后，“江陵北岸总共堤长六十六人……夏秋守御，冬春修补，岁以为常”^⑥。其后，太守徐学谟大规模培修堤防，包括黄潭堤在内共修整“南北岸堤数十处，计千万丈”^⑦。万历十九年（1591年）黄潭堤复决，导致数万人丧生。^⑧万历年间的水患使“黄滩诸堤益圯”，时任知县孔贞一集民力进行维护：“置总督、纡长筑之，秋冬缮治，一遇水发时，远近之民鳞集而响应。”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七月，水盛如盈，孔贞一力守黄滩堤，“随窞随塞，水不得入”^⑨。

①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二《水利·荆州府》“黄滩堤”条。

②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堤防》“黄潭堤”条。

③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二《水利·荆州府》“黄滩堤”条。

④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荆州府堤考略》。

⑤ 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堤防考略》。

⑥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荆州府堤考略》。

⑦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堤防》“黄潭堤”条。

⑧ 《水患纪略》，见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堤防》。

⑨ 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堤防考略》。

清初，黄潭堤防洪形势依然严峻。孔贞一修护之堤至清初“既逾五纪，堤上渐就夷削，议者欲筑月堤”^①。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十一年（1682年）、三十五年（1696年），黄潭堤数度溃决，严重程度堪比万历十九年（1591年）。^②为此，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郡守许廷试挽筑黄潭堤及与之相邻的阮家湾堤、杨二月堤、柴纪堤等堤，共约一千五百二十八丈。^③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阮家湾堤及相邻的横堤又挽筑月堤一千五百丈。^④雍正六年（1728年），黄潭堤再度得到培修。^⑤嘉庆元年（1796年），黄潭堤以下的杨二月堤、柴纪堤同时溃决，其中杨二月堤溃决处冲出一个木城渊，漫口阔达一百十七丈，人们在补筑溃口、修建月堤之后，复筑柴纪矶和杨二月矶等矶头护岸，以期挑流攻沙、减杀水势。^⑥

由于本河段处在沙市河弯，宋人笔下“沙水相荡，摧圯动辄数十丈”^⑦的状况在清代非但没有改观，反而因受到江心洲发展的影响更趋于严重。如刘大巷堤，位于古月堤及相邻堤段之间，与窖金洲相对。窖金洲逼流北趋，造成水流冲刷堤脚，“形同壁立”，且由于迎流顶冲，刘大巷堤外“多系潭渊，有水深数十余丈”，若在该堤外修建石矶，“非长三十余丈不能杀水势，工程浩大，把握全无。况相距观音矶不过百余丈，两矶逼近，激成回溜，冲刷堤身，即使于刘大巷有益，仍不能顾及沙镇全局”^⑧。可见其难度极

① 顺治《江陵志余·志水泉》“黄潭”条。

② 《水患记略》，见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堤防》；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六一《外志一·祥异》略同。

③ （清）柳维钦：《黄潭挽筑纪事》，见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

④ 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堤防》“月堤”条。

⑤ 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堤防》“黄潭堤”条。

⑥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杨二月堤”、“柴纪堤”、“杨二月矶”、“柴纪矶”条。

⑦ 《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荆襄诸水”条。

⑧ 《孙观察劝捐修沙市刘大巷石岸稟》，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四《岁修·石工》。

大。为保护堤身，乾隆年间修建了康家桥矶，同治十年（1871年）巡道恭镛又劝谕沙市绅商修建了刘大巷矶。^①在此基础上，同治十二年（1873年），巡道孙家谷“传集沙市十三帮首士及地方绅衿，再四筹商，拟自米厂河起至康家桥止，紧靠堤身，向外展放数尺，一律修建驳岸。外用尺宽、尺厚大条石，层层铺砌，高与堤平；内将老堤原土翻筑加增，层土层砌，以固根本，共计四百丈有零”^②。光绪十七、十八年（1891年、1892年），再于康家桥至九杆桅之间修建驳岸二百余丈，时人以为“三经大泛，巩若金城”^③。作为荆江地区的重要城镇，沙市的河岸保固工程始终受到重视，“逐年宜加岁修，以保成工”^④。

此外，镇流砥的存在与消失也反映了明清时期本河段的剧烈变化。镇流砥在县南十五里，黄潭堤之上，“突出大江数十丈，捍激江水，声如万雷，砥状如象鼻然，故又名象鼻嘴。盖江势东下，砥镇于此，则水势迂缓，而黄滩之冲少杀，沙市之地可保。成化初，知府李人仪沿砥砌以巨石，纵横相压，其势甚坚，水患多赖以免。后居民渐窃其石砥，堤少坏。正德中，布政使周季凤措财募工，重修筑之”^⑤。清初，人们已不知砥于何处，竟指郝穴为其故址。^⑥

明清时期沙市河弯的堤防与护岸工程正是在河势的剧烈演变中不断增筑并发展起来的。明代护岸工程的出现，又反过来对沙市河弯的外形与河床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刘大巷矶、康家桥矶、杨二月矶、柴纪矶等，在避免堤防直接迎流顶冲的同时，对下游一定范围内的岸线冲刷亦有明显的掩护作用，但矶头上、下与矶头头

①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康家桥矶”、“刘大人巷矶”条。

② 《孙观察劝捐修沙市刘大巷石岸稟》，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四《岁修·石工》。

③ 《沙市新修石驳岸图》，见《荆州万城堤续志》卷一《图说》。

④ 《沙市接修石驳岸图》，见《荆州万城堤续志》卷一《图说》。

⑤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江陵》，湖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元年刻本。

⑥ 顺治《江陵志余·志水泉》“镇流砥”条。

部近岸河床的冲刷却很严重。另外,由于护岸工程的修建,河弯的发展与河道外形受到人为限制,弯道的平面变形趋于稳定。同时,河弯河势又因护岸工程发生变化。护岸工程虽然改变了天然河道以横向冲刷为主的汛期冲刷形态,却又使得河床的冲刷方向在空间上从横向转为纵向,以纵深冲刷为主,且护岸后河床年内纵深冲淤的幅度远较未护岸时为大。当纵、横两度空间均受到堤防、护岸工程等边界条件制约时,河床冲淤变化就可能在三度空间作沿程转移,即冲淤变化向下游河床地质条件薄弱的方向转移,从而对下荆江河床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①

(三) 稀柳湾堤至马家寨堤

稀柳湾至马家寨河段在今斗湖堤河弯河段内(参见图1-2《清光绪年间荆州万城大堤全图》),清代时包括稀柳湾堤(五百九十丈)、长乐堤(五百九十七丈)、岳家嘴堤(五百五十四丈)、范家渊堤(五百七十六丈)、梧桐桥堤(五百八十丈)、林脑堤(上段六百零四丈,下段五百八十丈)、方家渊堤(五百五十八丈)和马家寨堤段(四百三十五丈)^②,其中岳家嘴堤又名文村堤^③,初见于明代文献。

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文村堤在黄滩堤以东三十里,弘治十四年(1501年)一度溃决,时任知府吴彦华筑堤四百余丈;正德十一年(1516年)堤再决,知府姚隆复筑之。^④清康熙五十三

① 本段参引自前揭黄传俊《长江中游沙市河弯河床演变分析》。

②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江北大堤”条。

③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文村堤”条称是堤即岳家嘴堤,“前有突起洲,亦称文村洲,故以名堤”。据此,文村洲当形成于明嘉靖以前,然明代方志与清代方志均未记载过文村洲。另,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坊乡·江陵》记江陵县东南有文村庄;乾隆《江陵县志》卷九《建置六·乡镇》记文村在城东南六十里,则文村堤名当以文村名故,非因洲名堤。文村洲的形成当较晚。前揭张应龙等《长江中游公安河段河床演变分析》一文称:“1830年以后,随着陡湖堤河弯南岸不断崩坍,河面不断展宽,逐渐形成突起洲。”然未详所据。

④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江陵》。

年（1714年）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文村堤又两次溃决。^①文村堤的多次溃决与该河段的边界条件有关。该河段两岸地质组成为冲积性的三元结构，上层为黏土、粉壤土及沙壤土组成的黏性土层，中层为中细沙层，下层为卵石层。^②清人亦认识到文村堤河段“沙岸易崩”^③的特点，故溃堤之后，一方面增筑月堤等防护工程，一方面疏浚泥沙、减轻淤积。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与文村堤相邻的长乐堤挽筑月堤五百丈；乾隆十五年（1750年），文村堤增修月堤二百三十丈；其下梧桐桥堤亦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增筑月堤；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文村堤再筑月堤五百零六丈。^④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文村堤还修建了矾头护岸。^⑤再如，雍正六年（1728年）既发帑修堤，又一并疏浚了小柳口、洪鱼口、柘林港、林家桥等处^⑥；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溃堤后，贺市桥、西马滩等处皆为沙淤，同治四年（1865年），太守张建基将淤塞之处开浚，方大湜继之，“稍免沮洳之患”。^⑦

除了边界条件，洲滩也是影响本河段堤防的重要因素。进入乾隆朝后，文献所见上荆江洲滩的数量较明代明显增多，对河道影响甚大。^⑧如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江防》“马家寨”条称：“昔年江面宽平，淤沙无多，前系报部‘平顺’。近因南岸石洲渐长，逼流北趋，水势汹涌冲激，旋于乾隆五十五年报部改为‘险隘’。”可见，马家寨滩的形成与对岸石洲的淤长关系密切。又据同书卷三《方輿·山川》“石洲”条，此洲长六七里，“近淘金

①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六一《外志一·祥异》。

② 参见前揭张应龙等《长江中游公安河段河床演变分析》。

③ 《疏浚纪略》，见光绪《荆州府志》卷二〇《堤防志四·院堤》。

④ 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江防》，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

⑤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岳家嘴矾”条。

⑥ 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江防》“文村堤”条。

⑦ 《疏浚纪略》，见光绪《荆州府志》卷二〇《堤防志四·院堤》。

⑧ 参见本书第一章及陈曦《宋元明清时期荆江洲滩的变化及其对河道的影响》，载《江汉论坛》2006年第12期。

者众，石子排挤，中流益渐增长，扫塌北岸，自张家洲至吴秀湾被害为甚”。实际上，石洲排挤江流的原因是上游推移质的不断补给，并非淘金者的影响。马家寨边滩因受石洲的影响逐渐淤长，吴秀湾边滩的冲消虽使“江流畅泄”，却造成堤防的冲刷更为严重，道光六年、七年（1826年、1827年），吴秀湾堤两度溃决。^①

上述不利条件加大了本河段筑堤的难度。

（四）冲和观堤至洪水洲堤

冲和观至洪水洲河段在今郝穴河弯及郝穴至新厂的河段内（参见图1-2《清光绪年间荆州万城大堤全图》），俗称郝穴河段，清代记载的该河段堤名分别有冲和观堤（六百九十五丈）、祁家洲堤（五百九十九丈）、双圣潭堤（六百二十四丈）、周家坑堤（五百五十三丈）、潭子湖堤（上段五百五十八丈、下段六百三十丈）、龙二洲堤（七百九十一丈）、新垸堤（上段四百零八丈、下段五百九十七丈）、冉家堤（六百一十五丈）、熊良工堤（上段五百七十丈、下段五百三十五丈）、双洲堤（上段五百八十八丈、下段五百二十九丈）和洪水洲堤（五百五十五丈）。^②其中，新垸堤的前身为郝穴堤，明代改为新开堤，乾隆朝后因讳言“新开”改称新垸堤。^③

新开堤初见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江陵》：“在县东一百二十里，成化间知府李人仪重修，后圯。正德中，布政使司周季凤重加修筑，（长）四百五十丈。”成化间（1465—1487年）既是重修，则初筑在此之前，具体时间未详。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新垸堤”条称，是堤即郝穴堤，“旧有新开闸，后因闸上累土为堤，故名”。可见新开堤因郝穴堵塞而筑。清代新垸堤分上、下两段修筑，分别长四百零八丈和五百九十七丈，较明中叶显著增加。

熊良工堤，原称周公堤，在郝穴以下十里。雍正十一年（1733

①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六一《外志一·祥异》。

②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江北大堤”条。

③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新垸堤”条。

年)六月当地的旧堤溃决,同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知府周钟瑄捐赀,筑堤三百一十六丈,费金八千余。周钟瑄还沿堤植柳,深受里人喜爱,故名周公堤。^①堤外旧有三閼祠,为纪念周钟瑄筑堤的功绩,当地人将他与三閼大夫同祀,并将三閼祠改为两贤祠。^②在重筑后的六七十年里周公堤“安然无恙”,后改称下熊良工堤。^③

本河段位于郝穴河弯,常有溃堤之忧,因而月堤的修筑相当普遍。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除冲和观堤和洪水渊堤外,区间各堤均筑有月堤,月堤数量占江北月堤总数的大半(参见表2-1),这也是郝穴河弯堤防与沙市河弯、斗湖堤河弯堤防的不同之处。

另外,本河段建有潭子湖矾和郝穴镇矾,其中潭子湖矾自咸丰十年(1860年)崩坍后矾嘴即无法接砌;郝穴镇矾曾因咸丰年间(1851—1861年)兵乱停工,期间老庙台石岸崩坍入江,后设法退筑上湾,“砌碎石、迎面嵌版石、抛石护脚、加撑内帮,岁费巨万,今为要工”^④。

表 2-1 清代江陵县江北岸月堤简表

| 月 堤 名 | 长 度 | 修建时间 |
|-------------|--------|-------|
| 下新开丁子月堤 | 二百五十丈 | 雍正五年 |
| 下新开丁子堤下月堤 | | |
| 双渊月堤 | 三百二十丈 | 雍正十一年 |
| 祁家渊上节月堤 | 二百六十五丈 | |
| 祁家渊下节接双圣坛月堤 | 三百六十丈 | 乾隆元年 |

① 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江防》“周公堤”条。
②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堤防》“周公堤”条。
③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周公堤”条。
④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潭子湖矾”、“郝穴镇矾”条。

续表

| 月 堤 名 | 长 度 | 修建时间 |
|--------------------------------------|----------|--------|
| 双圣坛月堤 | 一百六十丈 | 康熙五十七年 |
| 双圣坛接周家坑月堤 | 二百二十丈 | 乾隆二十年 |
| 周家坑月堤 | 一百八十九丈 | |
| 下潭子湖月堤 | 二百丈 | 乾隆四十九年 |
| 龙二渊月堤 | | |
| 冉家堤月堤 | 一百四十九丈 | |
| 万城、梧桐桥、祁家渊、双圣坛、上下潭子湖、龙二渊、上新开、冉家堤等工月堤 | 共长三百一十八丈 | 嘉庆二十五年 |
| 横堤、阮家湾月堤 | 一千五百丈 | 康熙三十六年 |
| 横堤工内月堤 | 二百三十丈 | 乾隆十二年 |
| 长乐堤月堤 | 五百丈 | 康熙五十四年 |
| 岳家嘴工内顶冲处所月堤 | 二百三十丈 | 乾隆十五年 |
| 上渔埠头月堤 | 四百八十七丈 | 道光二十三年 |
| 岳家嘴内月堤 | 五百零六丈 | 道光二十三年 |
| 李家埠月堤 | 四百七十八丈 | 道光二十五年 |

资料来源：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江防》，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

上述可见，明清时期冲和观至洪水渊河段的堤防与护岸工程有明显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以来，这一发展是在郝穴河段洲滩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获得的。如前所述，至迟在乾隆后期，石洲、白沙洲、新淤洲、新泥洲、白脚洲（即南五洲）已首尾相连，横亘在郝穴河段中。^① 南五洲的形成与发展，迫使主流线发生改变，加剧了对左岸边滩如吴秀湾边滩的冲刷，进而造成堤外无滩，使郝穴

^① 乾隆《江陵县志》卷三《方輿》，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并参见本书第一章。

河弯凹岸一带的堤防成为险工段。清代后期，月堤在本河段堤防之内连成一线，郝穴矶亦成为要工，便是一证。直至最近几十年，南五洲的影响仍在继续。根据研究，20 世纪 70 年代，南五洲虽已靠岸成为边滩，但仍在发育增大，导致了左岸方赵岗边滩的消失，有如当年的吴秀湾边滩。而且，由于南五洲边滩的发展范围已超过河宽的一半，“其结果逼水流更加贴左岸而下，增大了郝穴镇矶头群的挑流作用”，处于河弯凹岸的冲和观—祈家渊段、灵官庙—黄灵垸、龙二渊—郝穴等段，成为今天荆江大堤著名的重点险工段。^①

二、监利县

从地理位置上说，从沙市以东的监利县（宋代属江陵府）往北偏东至玉沙县（宋代属复州）的这片地区，属于江汉平原的腹地，地势相当低洼，特别是玉沙境内沔阳镇一带，有“泽国”之称，“江溢则没东南，汉溢则没西北，其穿穴经络于沔之腹者，则潜水也”^②，明清时因水患频仍而“十年九不收”的“沙湖沔阳州”^③即在此处，现当代人常说的“水袋子”主要就指这个地区。在这样一片地区，江堤及其他河流堤防的修筑显然十分重要。

监利县江堤始于何时，由于史料的缺乏，暂难明了。现在可以确知的是，北宋时期这里已有“濒江汉筑堤数百里，民恃堤以为业”^④。宋仁宗以前，为修堤“岁调夫工数十万，县不足，取之旁

① 参见前揭张应龙等《长江中游公安河段河床演变分析》。

② （清）俞昌烈：《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一《沔阳州水利堤防纪》，同治四年湖北藩署刊本。

③ 明中叶以后，这一带垸田大兴，改变了原有的河湖关系；加上荆江水位的抬高，造成日益严重的内涝外洪问题，“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说法开始出现，流传至今，仍是湖北人耳熟能详的一句民谚。这里所说的“沔阳州”在唐时为县（治今湖北仙桃市），北宋废为镇，升镇西南的唐代白沙院为玉沙县（今湖北仙桃市西南沔城），属复州；元代改复州为沔阳府，明洪武九年（1376 年）降府为州，直隶湖广省。

④ （宋）刘攽：《彭城集》卷三八《著作佐郎周（喻）君墓志铭》，中华书局 1985 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县。然岁常决坏，则庐舍田亩皆为鱼鳖居”^①。反映出堤防修筑比较经常，规模也不小，每年有数十万民工投入，但堤防的质量不高，常常受到洪水的威胁。

仁宗时期是北宋南方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的一个时期，这在监利县的堤防修筑上也有反映。当时的监利县令周喻对堤防用力尤多，“身自行视，得当水冲者十余处，益工高厚筑之。是岁遂不复决，役民大省。其后二十余年，民犹能指其处，曰是周令之力也”^②。仅周喻就培修江堤“得当水冲者十余处”，说明监利县当时的江堤已有一定规模。

从仁宗时期曾任江陵观察推官的刘摯所留下的诗句中，也可看出当时监利堤防的情况。是时，刘摯曾数度往返于江陵与监利之间，与监利县令王某唱和诗词，其《将至监利先寄王令》诗有“屈指中秋六晓昏，大堤丛竹见霜筠。未干醉月题笺墨，随蹶还家走马尘”^③之句；《马上和王监利见寄兼简邹泽民》诗又称：“忆昨西归春未穷，重来堤竹已成丛。川塍足水稻齐插，霖雨涨江河欲通。”^④可见堤边秀竹成林，堤内稻田齐整，说明大堤的质量较仁宗以前已有提高，得以捍御江水，保护农稼；同时，诗句反映出，当时从监利至西边的石首，西北的公安、江陵的堤防，已经能够骑马而行，荆江北岸堤防开始成为与水运互补的交通线路。

刘摯描写的是监利以西的沿江大堤，南宋以后县东亦有江堤，其中一段名为车水（一名“车木”）堤。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车水湾”条称：“车水湾，在县东三十里，宋时江水泛涨，堤岸冲决，忽夜雷雨大作，明日有司往视之，得雷车轂木于堤上，水势籍卫，堤不颓坏。又名车水堤。”在嘉庆《重修一统志》和同治《监利县志》中，“车水堤”皆作“车木堤”，如嘉庆《重修一

①（宋）刘攽：《彭城集》卷三八《著作佐郎周（喻）君墓志铭》。

②（宋）刘攽：《彭城集》卷三八《著作佐郎周（喻）君墓志铭》。

③（宋）刘摯：《忠肃集》卷一七《将至监利先寄王令》，中华书局2002年校本，第384页。

④（宋）刘摯：《忠肃集》卷一七《马上和王监利见寄兼简邹泽民》，第385页。

统志》卷三四五《荆州府二·堤堰》有“车木堤”条，称：“在监利县东四十里。宋末大水，决堤。一夜大雷雨，明日得雷车轂于其上，邑人循轂迹为堤，至今赖之。此堤与瓦子湾堤皆捍江水上流，防洞庭溢，极为要害。”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所载“车水堤”文字虽不完全相同，但显然是指同一对象。

车水堤东端延伸至何处？明代，自监利起，东北走向经过复州（明清称沔阳州）至汉阳县以西，有一道“长官堤”，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一一《沔阳州·山川》“长官堤”条称：“上接监利县界，下接汉阳县界。”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二《水利·沔阳州》亦称：“长官，在州南，起监利，至汉阳，长一百余里。”可见，长官堤始于嘉靖以前。那么，这道西自监利、中经玉沙、东迄汉阳的江堤是否与南宋车水堤有关？笔者尚无资料说明，但可作一些推测。监利至汉阳之间，主要为长江支流沌水流经之地，南宋前期王十朋、陆游、范成大等曾先后舟行此地，留下不少记载。^①在他们笔下，沌水流域比较落后，甚至有人踪罕见的“百里荒”地段^②，但总体上“时时有人家”^③，人口、经济皆有一定发展，并筑有沌水堤防。陆游的《入蜀记》卷五便称：“过东场，并水，皆茂竹高林，堤净如扫。”东场地望已难确考，根据陆游在沌中的行程以及东场附近毕家池等已知地点推算^④，东场大约位于监利东北百余里处。既然在相对落后的沌水流域已有洁净“如扫”的大堤，那么同一时期在监利以东的荆江北岸筑有防洪堤段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堤段，有可能即日后长官堤的前身，换言之，长官堤有可能创始于南宋，是车水堤的扩展。

① 参见（宋）王十朋《梅溪后集》卷一一至卷一五，明正统五年刘谦等刻，天顺六年重印本；（宋）范成大《吴船录》，见《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校点本；（宋）陆游《入蜀记》等。

② 沌水流域在南宋前期有“百里荒”之称。笔者曾对“百里荒”与江汉平原开发的关系进行过研究，指出“百里荒”只是沌水流域的小部分地段，南宋时的江汉平原较前代有显著进步。参见杨果《南宋江汉平原“百里荒”考辨》，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 （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第225页。

④ 据陆游《入蜀记》卷五，毕家池“属复州玉沙县沧浪乡”。

明代监利县沿江堤防的发展，从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监利县堤考略》可窥见一斑：

（监利）县东至沔阳、西至江陵、南至华容、北至潜江，周遭四百五十里，正江湖汇注之地，势甚污下，乡民皆各自筑垸以居。而县治临江，有一枝河流贯城中，岁苦水患。元大德间，赵通议开赤剥穴，江流以杀。迨我国朝初，此穴已湮，乃筑大兴、赤射、新兴等二十余垸。成化间，又修筑黄师庙、龙潭、鼃渊等一带诸堤。嘉靖十八年，筑塞十八湾河，又塞祝家垸，其垸随决。至四十四年，堤决黄师庙、李（朱？）家埠、何家垸、文家垸、金沙湖诸堤，而大兴垸亦大溃。尝一修筑，自龙窝岭至白螺矶，凡二百六十余里。顷年，江势南啗，而水患渐消矣。

引文中的黄师庙堤（一名黄师堤），“在县西四十里，边荆江，岁久湮颓，正德十年监生张安上请行委修筑”^①（参见图 2-2《清同治年间监利县古迹图》^②）。龙潭堤，即龙潭口堤，在县北，长一百丈，正德年间（1506—1521 年）布政使周季风修筑。^③鼃渊堤在县东十里。^④祝家垸堤，临石首界，堤脚属石首县。^⑤朱家埠堤在县东南三十里。^⑥何家垸堤所在河段与巴陵县共有，清代属巴陵堤。^⑦文家垸堤、金沙湖堤无考。

①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监利》“黄师庙堤”条。从本条记载看，正德十一年（1516 年）之前黄师堤即已存在，但具体起始时间不详，待考。

② 底图虽取自同治十一年（1872 年）《监利县志·监利县古迹图》，但可据此了解明代以来监利县河湖及堤防的地望。

③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监利》“龙潭口堤”条。

④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监利》“鼃渊堤”。

⑤ 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堤》“祝家垸堤”条。

⑥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监利》“朱家埠堤”条。

⑦ 同治《监利县志》卷三《江防志·江堤界分及名目》“下乡堤”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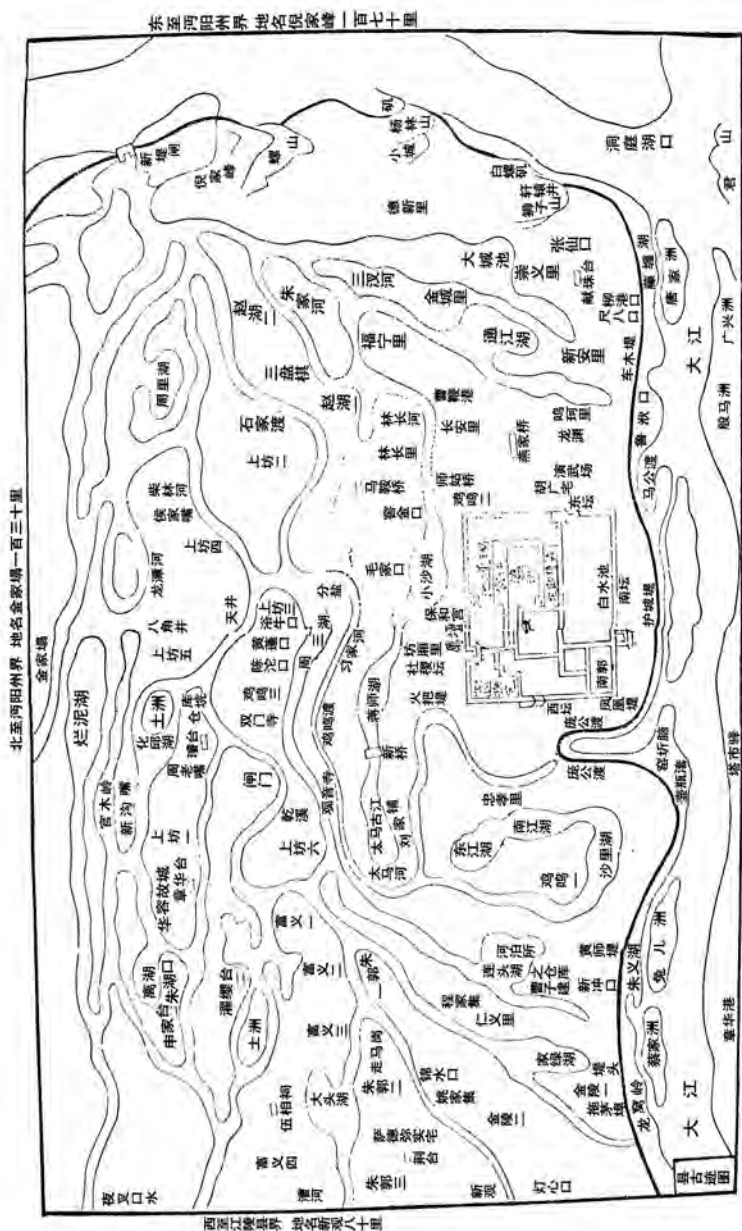


图2-2 清同治年间监利县古迹图

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监利》，明代监利县尚有县东南八十里的瓦子湾堤^①；县东三里的龙渊堤；县西南五十里“极为险峻”的新冲堤；县北五里的火把堤；县东三十里的车水堤（一名“车木堤”），永乐九年（1411年）曾筑堤四千四百余丈。^②此外，同书同卷还列有张公堤、范公堤、刘公堤、朱公堤、潘公堤和唐公堤，“俱隆、万、启、祯时历年修筑”，但地望不详，且“明末兵燹尽圯”。上述诸堤，除龙潭口堤在县北外，多沿江而筑。

嘉靖年间（1522—1566年），黄师堤及其他沿江堤防的修筑情况在《王公修筑黄师堤记》（简称《王公记》）、《殷公增筑黄师堤记》（简称《殷公记》）^③等文中亦有记载。《王公记》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江水横溢，（黄师）堤复决”，死者不可数计；是年十二月郡守率民夫二万复筑，“荷畚执锸者如鱼鳞”，次年正月堤成，“比旧制增高一尺，广称之”。《殷公记》记录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的水灾，是时黄师堤、车木堤、银杏堤和瓦子湾堤一并溃决，“溺死者无虑千人，田庐勿论也”。县令殷公在全力拯溺救荒的同时，克服“堤防溃败、财竭力疲”的困难，“规画精详，冲冒风露，躬亲督劝，虽公子病疹亦置不问。西自黄师堤、东至王家堡，延袤三百余里，万夫效力，一时并作，不数月，堤成”。

前引万历《湖广总志·监利县堤考略》尚称，嘉靖十八年（1539年）监利县筑塞了十八湾河和祝家垱。十八湾河，位于县西四十里的陈家湾潭上，曲折注入陈家潭；而陈家潭又与县西北五十里的连头湖（一名“莲头湖”）相连，嘉靖时，连头湖“浩无涯际，人烟荒落，舟行者恒慎之”，陈家潭亦“周二百余里，于此足

①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记瓦子湾堤在县西北五十里，误，应在县东南八十里，同治《监利县志》卷三《江防志·旧堤各名及护城堤》“瓦子湾堤”条所记为是。

② 《明史》卷八八《河渠六·直省水利》。

③ 均录自康熙《监利县志》卷九《艺文上》。

见水聚山止之概”^①。祝家垱与石首临界，祝家垱的筑塞意味着监利县堤防进一步向西延伸，在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中，祝家垱堤被列为上乡首段堤，成为监利县江堤的起点。但祝家垱筑而即决，这是因为该堤在监利县以西，除了县境内的河湖，尚需防范来自萧子渊的分流以及石首县西（北）一带汇聚的众水。荆江河道在石首新厂以上的萧子渊（一名蛟子渊）分流至石首、监利境内，与石首县北六十里的王家湖、陈家湖及三汊港等水相汇，经监利县西二十里的壶瓶套复入江（见石首县部分）。诸水汇聚导致了祝家垱不堪冲击，筑而即决。

监利县东南一带捍御江水与洞庭上凑之水的重要堤防有上文提及的瓦子湾堤与车木堤。由于下荆江北岸特殊的边界条件，瓦子湾堤具有“沙堤易塌”的特点。^②下荆江南岸，自石首县塔市驿至城陵矶一带因有桃花山、墨山丘陵等节点存在，组成土层较厚，抗冲性较强，有利于控制流势；而北岸土层较薄，砂层顶板较高，抗冲性较差，容易引起河床摆动。^③明人孙存有《瓦子湾》诗：

三月此湾两度过，江岸渐见倾颓多。
岸上壁立更痕露，豆田半圯紫青莎。
农人初将豆种掷，去江余地犹十尺。
而今苗没浸町畦，若至秋深何止极。
桑田变迁固其常，江湍百年殊未央。
膏腴不足填巨浸，贡赋宁免输虚仓。
东消西长吾不计，但欲计亩蠲租税。
吁嗟平地灾犹疑，愁杀江圯无左契。^④

①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监利》“连头湖”条，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山川》“陈家潭”条。

② 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堤》“瓦子湾堤”条。

③ 参见前揭单剑武等《长江中游监利河段河床演变分析》。

④ （明）孙存：《瓦子湾》，见同治《监利县志》卷一一《艺文》。

农历三月正是枯水时期，此时主流线紧贴凹岸，岸脚受水流淘刷，岸坡变陡，于是河岸发生崩坍。这类崩坍多出现在弯顶附近^①，故孙存所描述的是处于河曲发展之中的瓦子湾。

不仅是瓦子湾堤段，县东二十五里的柳港口、县东八十里的蓼湖口以及县东南九十里的尺八口一带^②，堤外亦呈现出“洲尽崩，堤皆边江”的状况，自崇祯至康熙中期（约1628—1701年），堤岸“崩溃殆尽”，且“江流崩北淤南之势，犹然汹涌”^③。

万历《湖广总志·监利县堤考略》所说的“自龙窝岭至白螺矶，凡二百六十余里”堤防，基本上将监利县整个沿江地区都纳入防护范围^④，较宋元时期显著发展。随着沿江堤防的扩展，下荆江河道摆动大的特点也逐渐显现，引文中可见大概。河道频繁摆动的直接影响便是堤防随筑随决，黄师堤即是一例，初筑时“堤工视诸堤最巨，盖合潜、沔之力成之”^⑤，但“隆、万以来，屡决屡修，明末尽圯”^⑥。随着河曲的进一步发展，自崇祯朝（1628—1644年）以后，监利县东一线出现了大范围的崩岸。

进入清代，监利河段的变化更大，江堤的修防难度与日俱增。与明代相比，康熙年间（1662—1722年）监利河段的险工段明显增加。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堤》云：

邑前江后汉，东洞庭北沱沔，诚《诗》所谓：江汉之间者也。平原巨薮，犹恃诸堤以为固。防江大堤，承荆达岳三四百里。上而郑公渊、荷叶渊、石碑渊、鱼蓝渊、北坝、八十工、谭家渊、蛇进工，皆险要，而石碑为最。上决，则邑之北

① 参见前揭晏济远《长江中游石首河段河床演变分析》。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监利》“柳港口”、“蓼湖口”、“尺八流水口”条。

③ 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四至交错》。

④ 据同治《监利县志》之《监利县古迹图》，龙窝岭与拖茅埠紧邻，而拖茅埠堤正为江北大堤江陵县所属的末段堤防。

⑤ 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黄师堤”条。

⑥ 同治《监利县志》卷三《江防志》“黄师堤”条。

土暨潜、沔、汉川等处，并受害矣。下而骆家湾、文公庙、红花湖、尺八口、流水口、张心口，皆险要，而骆家湾、文公庙为最。下决，则太马垸暨沔、汉皆受害矣……其南堤，则上十四里、下十九里，岁有加修；北堤，自孔家潭而下，险要甚多。辛酉黄潭之决，北堤溃一百八处。盖庞公渡既塞，江不合汉，而民苦于旱，堤渐低狭，偶大堤告溃或汉水甚涨，皆能为灾也。

江防形势日趋严峻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决堤次数显著增多，其详参见表 2-2。

表 2-2 清代监利县堤防决塞简表

| 决堤时间 | 决 塞 堤 段 |
|--------|-----------------------------|
| 顺治七年 | 张公堤、范公堤、刘公堤、朱公堤、潘公堤、唐公堤溃。 |
| 康熙七年 | 林家潭堤溃，康熙八年退挽。 |
| 康熙十一年 | 红花湖堤溃。 |
| 康熙十五年 | 永泰山小月堤、新冲堤、骆家湾堤、何家湾堤、薛家潭堤溃。 |
| 康熙十七年 | 车湖港堤溃。 |
| 康熙十九年 | 上牛舍垸堤溃。 |
| 康熙四十三年 | 挽筑石碑渊月堤、韩家埠月堤。 |
| 康熙五十二年 | 中汛潘家棚堤溃，康熙五十五年请帑挽筑潘家棚堤。 |
| 康熙五十四年 | 朱河汛瓦子垸、李黄月堤溃。 |
| 雍正五年 | 永兴渊堤溃。 |
| 雍正六年 | 请帑挽筑杨林山月堤、永兴庵月堤、张家峰月堤。 |
| 乾隆九年 | 挽筑何家月堤，长二百二十四丈三尺。 |
| 乾隆十六年 | 挽筑赵家月堤。 |
| 乾隆十七年 | 挽筑李家月堤、周家月堤、南刘埠月堤，长二百二十八丈。 |
| 乾隆十八年 | 挽筑孙家月堤。 |

续表

| 决堤时间 | 决 塞 堤 段 |
|--------|---|
| 乾隆十九年 | 挽筑杨家月堤，长三百余丈；又筑彭家月堤。 |
| 乾隆二十年 | 挽筑曹家月堤、吴家月堤，长二百六十一丈。 |
| 乾隆五十三年 | 朱家渊堤溃，五十四年挽筑；瓦子院上溃米黄月堤、下溃王公月堤。 |
| 嘉庆七年 | 瓦子院顺江堤溃。 |
| 嘉庆九年 | 文固院萧家畈堤溃。 |
| 道光四年 | 文固院郑朱月堤溃。 |
| 道光十年 | 刘家铺梅亭渊堤溃。 |
| 道光十一年 | 上汛铁牛寺堤、中汛祖师殿堤、湖洛渊堤、朱河汛安庆月堤、义成月堤、萧家汛李家湾堤俱溃。 |
| 道光十六年 | 上汛朱三工溃。 |
| 道光十九年 | 上汛廖六工，朱河汛沙城院铁甕月堤、何家埠头堤俱溃。 |
| 道光二十一年 | 白螺汛界牌上堤溃。 |
| 道光二十四年 | 螺山崔家堤溃，道光二十五年复筑。 |
| 道光二十八年 | 上汛麻布拐，中汛八十工、高小渊，朱河汛瓦子院保安月堤、粮码头堤俱溃。 |
| 道光二十九年 | 朱河汛竹庄河、洞庭庙下首薛家潭、下新挽院堤俱溃；白螺汛自青泥院起，殷公、越子、清水、杨林、牛车、张家、郑家、倪家、三峰共溃大小二十八口；中车湾堤溃，覆没百余家，冲压二十余里。 |
| 道光三十年 | 退挽下新挽院堤；复筑螺山市后堤；发帑修筑中车湾钦工月堤，长七里许；邑侯彭公以工代赈，堤始坚。武码头挽月堤。 |
| 咸丰六年 | 挽筑王心浹洲堤。 |
| 咸丰九年 | 螺山上张家峰堤、双龙港堤溃。 |
| 咸丰十年 | 龙潭下永兴渊堤溃，十一年复筑。 |
| 同治五年 | 何家埠堤决。 |
| 同治八年 | 涂家埠北、六坵等处堤溃，发帑修复，以工代赈，新挽堤膝共长九百六十七丈五尺。 |

续表

| 决堤时间 | 决、塞、堤、段 |
|------|--|
| 同治九年 | 邹码头、引港、螺山等处堤溃，邑令林瑞枝请帑，以工代赈，并劝殷户捐助，修复三处，挽筑新堤共长七百七十三丈。 |

资料来源：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堤》，同治《监利县志》卷三《江防志·历年决塞》、《江防志·旧堤各名及护城堤》。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表 2-2 中较少雍正与乾隆时期的溃堤记录，但并不说明这一时期的荆江处于安流状态。

同治年间（1862—1874 年）决堤有加剧之势：

上乡洲宽，离江七八里，伏汛时漫滩宽广，一望无际，自朝真观起，至窑圻脑止，数十里皆当南风，南风浩大，波浪轩腾，人力难支。下乡车市一带，江流冲刷堤脚，年晚年崩，尺八口、郑家湾亦甚。若洞庭水发倒漾，尺八口先受其害；川南并涨，则遍处皆形吃重，是所贵于思患预防也。^①

御江形势的不断紧张是在下荆江河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

据林承坤等研究，下荆江河曲的发展存在三个周期：一是明中叶至明末；二是道光年间（1821—1850 年）；三是现代。^② 本研究所关注的监利河段正处于河曲发展的前两个周期。在河曲的成因上，林承坤等先生认为，荆江河曲形成的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松散的、具有两元结构或互层结构的土层组成河床的边界，这是主要原因；二是流量增加与水位变幅的增大，这是河曲形成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一点上，穴口淤塞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穴口淤塞、分流淤积，引起了荆江流量增加与水位变幅增大，形成了有利于河曲发展的河床土质结构，促使河曲形成。河曲形成还有其

① 同治《监利县志》卷三《江防志·江堤形势》。

② 参见林承坤、陈钦鑫《下荆江自由河曲形成与演变的探讨》，载《地理学报》1959 年第 2 期。

他的辅助原因,如近代构造运动下降的幅度与性质,河滩上植物的生长与人类经济活动。其中,河滩植物的大量生长使洪水期漫滩水流的流速减小,大大增加了悬移质泥沙的堆积,这些不断增长的河滩凸岸边滩,反过来又促进了凹岸的侵蚀,使河曲不断发展。同时,人类的筑堤活动不仅堵塞了穴口,也保护了河曲凸岸,使河弯凸岸不断堆积、扩张,河曲随之发展。^①

受到河曲发展的影响,清代监利县江堤的修防相当艰难。

清前期,监利数位知县用力颇多,正如县令程藻所说:“邑之所重在堤,则邑政所首者,莫如堤工为急,故冬春兴筑,夏秋堤防,岁岁相因,未有已也。”^② 顺治七年(1650年),大水造成县东、西堤防俱溃,知县蔺完琯大兴堤防,西筑蒲家台堤,东筑骆家湾堤(后更名方宁堤),“皆屹然雄镇”。^③ 蔺完琯还重筑了上乡险堤黄师堤。^④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下乡险堤之一的红花湖堤溃决,知县郑公予以修筑,“计长一千三十八丈有奇,堤极坚厚”。上文已见,骆家湾堤是下乡最险要的堤防,康熙十五年(1676年),是堤与何家湾堤、永泰山小月堤、新冲堤、薛家潭堤等同决,知县李公挽筑诸堤。康熙十七年(1678年)前后,知县程藻不仅修筑了溃决的车湖港堤与牛舍垸堤,还增修了骆家湾堤,并在“素有鳝穴、频年告急”的鳝穴堤内挽筑月堤,称“新挽垸月堤”。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大水再致沿江堤溃,县令郭公“昼夜躬督固护”,于骆家湾、文固垸、尺八工、红花湖、薛家潭、沈家渊、倪家峰等处“倍加修筑”;康熙四十年(1701年)、四十一年(1702年)郭氏复修北坝、刘家湖、石碑渊、八十工、蒲家渊、蛇进工、谭家渊诸堤,康熙四十一年大水来临时,“皆恃以无虞也”。^⑤

① 参见前揭林承坤、陈钦峦《荆江河曲的成因与演变》。

② 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堤》。

③ 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堤》。

④ 同治《监利县志》卷三《江防志》“黄师堤”条。

⑤ 以上各条俱见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堤》。

康熙年间（1662—1722 年）监利县所修诸堤分布于上乡和下乡（见表 2-3）。上乡堤共长一万一千九百二十八丈六尺六寸，其中，祝家垱堤自石首碑界起，长八十四丈；北坝堤“素称险工，况又当浪所，宜急修”；永泰山堤，原为前任县令唐公所筑之艮山垱，“委任里民王国储为总理，修筑得法……后特此玩忽，有派无修，至康熙十五年有新冲河口、小口子之决，今为急修矣”；谭家渊堤为新兴垱南工段，因渊险、堤又当风，属急修工段；八十弓堤亦为急修工段。下乡堤，自白衣庵至瓦子湾止共长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丈四尺二寸，自瓦子湾起至倪家峰止共长一万四千一百七十一丈八尺。^① 上、下两乡堤防合计三万八千余丈。从永泰山堤、谭家渊堤与堤垱的关系来看，康熙时部分临江之地已被围垱开垦。

表 2-3 清康熙、同治年间监利县上、中、下乡江堤名称表

| 方位 | 康 熙 | 同 治 |
|----|---|---|
| 上乡 | 祝家垱堤、朝真观堤、铁牛寺堤、北坝堤、庙堤、永泰山堤、关庙堤、荆南山堤、李家湖堤、八尺弓堤、祖师殿堤、谭家渊堤、窑圻垱堤、庞公渡堤 | 拖茅铺、石首毛老垱、朝真观、朱三工、铁牛寺、卡子垱、北坝、刘家湖、中九工、程公堤、红旗营房、窑圻司堤头、狗头湾、荆南山、孟兰渊、李家湖、冬青树、八尺工 |
| 中乡 | | 蒲家渊、流水口、窑湾、祖师殿、张景湾、上湖洛渊、下湖洛渊、仙风台、谭家渊、余进工、久安月堤、窑圻垱、药师庵、资安寺、凤凰嘴 |

^① 本段俱见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堤》。令人疑惑的是，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的《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记监利县江堤总长仅有一万三千余丈：“上乡大堤，接石首县界，上自石碑界起，至汤家剏止，共二十八工，长七千五百二十五丈一尺七寸六分；下乡大堤，自护城堤至倪家峰止，共四十一工，长五千九十三丈五尺八寸。”这一数字远较康熙年间为低，待考。

续表

| 方位 | 康熙 | 同治 |
|----|--|--|
| 下乡 | 白衣庵堤、黄公垸堤、车木堤、文公庙堤、新挽垸堤、口子河堤、王心嘴堤、尺八口堤、红花湖堤、瓦子湾堤、薛家潭堤、杨马头堤、张仙口堤、白螺矶堤、杨林山堤、螺山堤、倪家峰堤 | 护城堤、黄公垸、半头堤、九工湾、太和月堤、顺镇月堤、长保月堤、久奠月堤、史家月堤、安定月堤、秦家月堤、万年月堤、永安月堤、安全月堤、长安月堤、万安月堤、安澜月堤、蒋家垸月堤、陶家埠口、巴陵堤一段竹庄河、林家潭、巴陵堤一段何家垸、长安月堤、长保月堤、袁吴月堤、定江月堤、尺八口月堤、巴陵堤一段瓦子湾、上镇江月堤、下镇江月堤、赵刘月堤、杨刘月堤、观音洲堤、殷公垸、巴陵堤一段鲁家埠、涂家埠、白螺矶、越子垸、平安月堤、引港永安月堤、邹码头长安月堤、万安月堤、螺山、倪家峰 |

资料来源：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堤》，同治《监利县志》卷三《江防志·江堤界分及名目》。

表 2-3 可见，自康熙后期开始，监利县增筑了月堤，且多集中在下乡。乾隆《荆州府志》有关月堤的记载较为详细，据此制成表 2-4。数十年间频繁地在县东至东南之下乡修筑月堤，说明这段时间里这一带常有决堤发生。

表 2-4 清康熙至乾隆前期监利县月堤修筑简表

| 月堤名称 | 修筑时间 | 长 度 |
|-------|--------|-----|
| 石碑渊月堤 | 康熙四十三年 | |
| 韩家埠月堤 | 康熙四十三年 | |
| □家庙月堤 | 康熙五十五年 | |
| 杨林山月堤 | 雍正六年 | |

续表

| 月堤名称 | 修筑时间 | 长 度 |
|---------|-------|----------|
| 永兴庵月堤 | 雍正六年 | |
| □草 月堤 | 雍正十三年 | 一百七十三丈一尺 |
| 下乡大山坡月堤 | 雍正六年 | |
| 下乡张家峰月堤 | 雍正六年 | |
| 下乡何家月堤 | 乾隆九年 | 二百二十四丈三尺 |
| 下乡宋家月堤 | 乾隆十六年 | 三百五十二丈 |
| 下乡赵家月堤 | 乾隆十六年 | 三百五十丈 |
| 下乡李家月堤 | 乾隆十七年 | |
| 下乡南刘埠月堤 | 乾隆十七年 | 二百二十八丈 |
| 下乡周家月堤 | 乾隆十七年 | |
| 下乡孙家月堤 | 乾隆十八年 | 二百十六丈 |
| 下乡杨家月堤 | 乾隆十九年 | 三百余丈 |
| 下乡彭家月堤 | 乾隆十九年 | |
| 下乡吴家月堤 | 乾隆二十年 | 二百六十一丈五尺 |
| 下乡曹家月堤 | 乾隆二十年 | 一百五十丈六尺 |

资料来源：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监利县》。

说 明：因原书漫漶难识，部分阙如据同治《监利县志》卷三《江防志·历年决塞》补正，无补则用“□”表示。

同治初年，监利县江堤段数与名称较前更加细化（见表 2-3），上、中、下三乡堤防分别责成县丞、朱河、窑圻、白螺四汛管辖。其中，窑圻汛管辖江堤共长九千零四十丈零四尺，计程五十里零二分二厘；中乡县丞汛管江堤共长九千一百零五丈，计程五十里零五分八厘；下乡县丞汛管江堤共长一万五千四百八十四丈，计程八十六里零二厘；朱河汛管江堤一万一千五百一十八丈三尺，计程六十三里九分九厘；白螺汛管江堤共长二万二千零四十五丈，计程一百

二十二里四分七厘。^① 四汛堤防总计三百七十二里二分八厘，长六万七千一百九十二丈七尺。与明代二百六十余里、康熙时三万八千余丈的江堤总长相比^②，同治初年的长度有了大幅增加。沿同样的河段筑堤，清同治初较明万历时多了百余里，这多出的数字即是随河曲增长而加筑的堤防长度。随着穴口湮塞、泥沙不断落淤、堤防发展以及来水增多等因素变化，在逐渐变窄的河床中，下荆江只能以增长河曲长度的方式来适应日益增长的流量。^③

表 2-2 与表 2-3 所记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的月堤修筑简况，反映了监利河段河曲变化的时间与空间特征。再结合表 2-4 与同治《监利县志》卷三《江防志·江堤弓口》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至同治初年，监利县下乡即县东南沿江一带修筑了相当数量的月堤，在堤防总数中占了很大比重，以至于月堤名称取代原有堤防而载入志书。这种情况在荆江两岸诸县中是独一无二的。此种情形表明，监利县东南一带的一些堤防已随河曲发展而崩决不存，决岸后退挽的月堤或新筑堤防与原有堤防的位置之间产生了偏离。有学者指出，这种在决堤后退挽的新堤，加上对不断形成的边滩的围垦，人为地巩固了河床中新形成的地形，改造了原来的河床，从而有助于凸岸的增长。^④

上述可见，下荆江监利段河曲发展的第二阶段，至迟在康熙末至雍正年间已经开始，河道变化已显示出增大的趋势；乾隆时变化频率加快；道光时达到顶峰。监利县的堤防建设亦同步发展，至同治初年堤防总长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值。

① 同治《监利县志》卷三《江防志·江堤弓口》。

② 明清时期的营造尺长度大体相当，均约 1 尺 = 32 厘米，参见吴慧《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第八章“明清的度量衡”，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2 ~ 150 页。

③ 参见前揭林承坤、陈钦銓《下荆江自由河曲形成与演变的探讨》。

④ 参见前揭林承坤、陈钦銓《下荆江自由河曲形成与演变的探讨》。

第二节 荆江南岸堤防的发展

与长江下游江南胜过江北的情形相反，荆江南岸的发展水平逊于北岸。由于缺少荆北那样大面积的富含有机质的湖积、冲积平原，南岸的人口、耕地有限，堤防建设亦较逊色。但随着经济的进步，宋代以后荆江南岸的堤防在唐末五代的基础上得到显著发展。

一、枝江县

枝江县“洲渚之地，什居四五”^①，江心洲势必成为本县开发的重点地区。

（一）百里洲

作为枝江县河段中形成较早、“延袤百里”^②的大型江心洲，加之洲体上部为砂质层，适宜开垦，百里洲很早就得到开发，至迟在南北朝，已成为“其上宽广，土沃人丰，陂潭所产，足穰俭岁，又特宜五谷”^③的美丽田园。

北宋时，枝江县治一度设于百里洲西首之岑头洲，南宋后期嘉熙元年（1237年）至咸淳六年（1270年），县治迁至江南的淝淠（一作“淠”）洲，咸淳六年以后，又迁治于白水镇下沱市。^④百里洲既是县治所在，说明北宋时百里洲的开发已达相当的程度，而在百里洲这样的大型江心洲上生存，堤防的修建是首要条件。南宋时，百里洲的堤防已有一定规模，据载，淳熙年间（1174—1189年），“用工二十四万，大为堤防，水不能啮”^⑤。

①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

② 康熙《荆州府志》卷四《山川》“百里洲”条。

③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山南东道五·荆州·枝江县》“百里洲”条转引《荆州图》。《荆州图》约为晋宋间人所作，撰人不详，参见前揭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229页。

④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江陵府》“枝江”条。

⑤ （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七一《宋故连州彭史君（尧辅）墓志铭》，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别墅欧阳荣刊本。

元朝本区堤防修建的情况不详，但大体可知元初本邑堤防得到过培修，《元史》卷一七〇《畅师文传》说畅氏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任职山南道，“松滋、枝江有水患，岁发民防水，往返数百里，苦于供给”^①，反映的即是这种情况。《元史》又称，至顺年间（1330—1332年），荆湖北道“修治沿江堤岸”，可能也包括枝江等县。^②

明代以前，百里洲长期较为稳定。明中叶以降，百里洲经历了大变化。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荆州府遭受的特大水灾使百里洲堤成为“冲塌深广、最为力者”之一^③，最终导致百里洲分裂成上、下两部分，间隔约二十里。^④百里洲的分裂使原有堤防体系发生变化，导致洲体遭受更大冲击，同时加重了洲上的积水，使防洪形势更为艰难。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枝江县堤考略》描述当时的江防困境道：

县治颇依高阜，向无堤防，惟县东南有百里洲，延袤百里；南有芦洲、澌洲、洋洲、漳洲，皆夹生大江之内者。故北自百里洲、杨林洲、赛砖滩、蒋斗湾、窑子口至流店驿，复转北，自董滩口、土台、古城脑而下至嚙嘴滩、流店湖，又自嚙嘴滩而南，转至澌洋洲、观音寺，直抵松滋朱家埠，对岸皆有堤。举其最要害者，莫过于古城脑、蒋斗湾二处；系通洲上流，一决，则势若建瓴，莫能捍御。又，洲内军民杂处，互相规避，故堤工视他县尤难。

明中叶以后，针对洲体的变化，上、下百里洲进行了各自的堤防重建。

① 《元史》卷一七〇《畅师文传》。

② 《元史》卷三六《文宗本纪》。

③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荆州府堤考略》。

④ 乾隆《枝江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百里洲”、“上百里洲”、“下百里洲”条，并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1. 上百里洲

上百里洲堤周遭八十五里，为阖邑“最为险要”处，明代洲民龚春台倡筑。^① 由于来水的冲击增大，原有堤防不足以防护洲体，万历四十年（1612年）知县钱奏勋在上百里洲大堤外“筑护浪堤，上边种柳，危险处搬小石作淤，法最善”^②。这种“堤外堤”的功能与同期荆江河段的护岸工程相同，但由于百里洲位于河道中，其边界条件与沿江堤岸不同，因此“堤外堤”更适于江心洲。

清初，上百里洲多次遭遇大水，加上明末以来江防疏失，致使堤防屡溃。顺治四年（1647年）香积寺总堤决；顺治七年（1650年）徐旧总堤决，知县李花白复筑之；顺治九年（1652年）上百里洲流店闸倾圯；顺治十年（1653年）徐旧总新堤复决，知县曲允斌捐俸助修月堤二百余丈；顺治十二年（1655年）再筑香积寺堤决口；顺治十三年（1656年）筑塞闸口堤；顺治十五年（1658年）徐店、流店、香积三总大堤同时溃决。^③ 次年，县令田禹稼督修流店闸口，“功力倍前”^④，此外，田禹稼还复筑了徐旧总溃口数百丈，萧、毕二总及北岸之宁家总堤，香积渡口堤数百丈等。^⑤

康熙年间（1662—1722年）上百里洲水患频仍，堤防复筑亦经历坎坷。康熙二年（1663年）九月江水暴涨，“各堤塍一时俱坏，淹溺人畜，漂荡民居，村落一空如洗”。隔年知县周廷桂莅任后，“岁岁修筑，民稍安居”^⑥。然而，洲民苦于差扰之累，康熙八年（1669年）请求停工，此后洲堤不修“历二十余年，坍塌四千四百余丈”。在经历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的大水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洲民向县令孔毓基表示，情愿每年修筑百里洲

①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堤防考略》，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上百里洲”条。

② 乾隆《枝江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上百里洲”条。

③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百里洲堤”条。

④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百里洲堤”条。

⑤ （清）刘治臣：《重修流店闸记》，见乾隆《枝江县志》卷九《艺文志》。

⑥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百里洲堤”条。

堤附沿江大堤，于是当年复起堤工，次年冬竣工。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大水时，上百里洲堤经受住了冲击，是时“下百里洲堤溃，而上百里洲无恙”^①。

至迟在康熙时，上百里洲堤分为了九总：古毕、徐旧、庾台、杨辉、白水、宁家、华流、香渡、萧家。^②后有所变动，九总分别为：古毕、徐旧、庾台、杨辉、宁白、华流、香渡、萧罐、冯口^③（参见图2-3《清同治年间上、下百里洲示意图》^④）。

乾隆三年（1738年），知县王世爵令民“沿堤补栽杨柳以固堤脚，以拒狂澜，砍者有罚。此亦未雨绸缪之一法也，犹是胜朝钱令（按：即明万历时知县钱奏勋）之遗意云尔”^⑤。此后近百年间，上百里洲大体风波不惊。道光十年（1830年）百里洲再次遭遇大冲击，“洪流徙行内江”，自古以来的“外江内沱”河势一改而为“沱胜于江”^⑥，受此冲击，“堤又大废”。大水过后，洲民屡次请求复筑堤防，却因“工巨费绌”未果。咸丰八年（1856年），县令朱锡绶“率洲民通力合作，将次告成”。但咸丰十年（1858年）严重的水患使“枝城内外皆沈于水，其南北诸垸、江心各洲，勿论有堤无堤，无不向若而叹”，洲堤“复亏于一篲”。^⑦

对于上百里洲“其形中坳，若釜”^⑧的地势而言，在修筑堤防的同时，还需设法下泄洲内积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知县周仲士在上百里洲尾流店驿建闸，“以消上下沮洳之水”；万历三

①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堤防考略》。同卷又称，此次堤工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一月起，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止。

② 乾隆《枝江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百里洲”条。

③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下百里洲堤”条。

④ 据同治《枝江县志·枝江县上下百里洲图》绘制。

⑤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百里洲堤”条。

⑥ 同治《枝江县志》卷二《地理志中·山川》“大江”条，并参本见书第一章第一节之三“洲滩的发展与河道的演变”。

⑦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考略》及同卷“上百里洲堤”条。

⑧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堤防考略”。



图 2-3 清同治年间上、下百里洲示意图

十七年（1609 年）知县刘廷论重修闸门，明末复圯。^① 顺治十六年（1659 年），知县田禹稼修复流店闸，“工力倍前”。^② 后吴三桂变乱期间堤防大废，闸亦淤塞，五十余年间百里洲上“积潦为灾”。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洲人上请修治，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闸复建成。道光十年（1830 年）大水，再度堤废闸塞，百里洲“外淤日高，内溃愈下”。咸丰九年（1857 年），曾谋划于老闸上加筑新闸，然“旋开旋淤，迄无成功”。^③

① 乾隆《枝江县志》卷二《建置志·闸口》“流店闸”条。

②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百里洲堤”条。

③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上百里洲堤”条。

2. 下百里洲

与上百里洲堤防为阖邑“最为险要”^①不同，下百里洲的堤防“较上百里工稍易”，然其北临沮漳河，“惟沮漳之水一发莫遏，势与江颀颀……为今计，筑堤兼理闸，是为急务”^②。可见，受江水与沮漳河的夹击，下百里洲防水亦非易事。

下百里洲堤共分十一总：洪山、坝林、沧港、晒谷、桑家、蒋斗、兴山、砖滩、木堤、杨林、枸林，前三总属荆州左右卫，后八总隶枝江。与上百里洲堤相同，明末兵燹及清初吴三桂变乱给下百里洲堤造成了严重影响，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平乱后，居民渐次复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起，堤防、港闸逐渐修筑，下百里洲“桑麻禾黍，顿成沃野”^③。

其后，洲堤间或溃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咸丰十年（1858年）大水相继冲溃洲堤。^④其间，道光时（1821—1850年）的决堤事件尤其频繁。道光二年（1822年）大水溃堤；道光六年（1826年），知县谢丕绩莅任后“捐俸饬修，亲董其役，复请于府，令江陵三总协助焉”^⑤。但道光七年（1827年），大水又将枝江县境除上百里洲与渐洋洲以外的堤防尽数冲决；道光十年（1830年），县境诸洲堤防再决，良田多为沙淤；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诸洲堤又溃。^⑥道光年间的多次溃堤给百里洲的开发造成极大干扰。

因介于长江与沮漳河之间，积潦是百里洲的一大灾害。下百里洲与上百里洲一样，都以建闸的方式解决排涝问题，而且下里洲的建闸早于上百里洲。万历八年（1580年）知县余能继创建了下闸，该闸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重修，以消洲上六总之水^⑦，文

①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堤防考略”。

②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下百里洲堤”条。

③ 本段俱见乾隆《枝江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下百里洲”条。

④ 同治《枝江县志》卷二〇《杂志·灾异》。

⑤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九《堤防志三·顺江堤三》“下百里洲堤”条。

⑥ 同治《枝江县志》卷二〇《杂志·灾异》。

⑦ 乾隆《枝江县志》卷二《建置志·闸口》“下百里洲下闸”条。

章、沧港两湖的积水亦由下闸泄出。^① 由于下百里洲“中亘一脊”，除下闸外，明末还另建了一座上闸，分头消泄。^②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上闸重修石闸，以消杨林湖、上四总之积水。^③

（二）其他江心洲

明清时期，除了百里洲之外，枝江县的其他江心洲也逐步得到开发。

渐洋洲 洲在县东南九十里（一说七十里），是枝江县至松滋县河段中洲体仅次于百里洲的大型江心洲。该洲原为渐、洋二洲，约在明嘉靖至清康熙前期并为一洲。明万历（1573—1620年）中县令赵善鸣、司理耿志伟、太守胡一鸿三人曾捐廉协修渐洋洲堤，故洲堤又名“三公堤”；三公堤“中亘横堤，因名曰‘渐洲垸’、‘洋洲垸’，俱有闸”^④。清代，渐洋洲上围垸渐增。雍正十一年（1733年），知县傅采于渐洋洲首修筑新垸；乾隆四年（1739年），洲民胡一正、黄西周等人呈请知县王世爵于洲南岸修筑南河坝垸。^⑤ 乾隆初年以后，二垸置闸。^⑥ 与上百里洲不同，渐洋洲除了洲上修闸外，诸垸内部又各自筑闸，可见该洲消泄积水的难度更大。

道光七年（1827年），受到大水冲击，枝江县仅渐洋洲与上百里洲的堤防得以保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渐洋洲堤的修防质量比其他多数洲堤要好。另一方面，渐洋洲的坚固堤防改变了洲体的边界条件，逼迫水流冲刷对岸，使得松滋七里庙堤出现老堤年年崩洗、月堤年年加修的困境（详见下文）。

镡洲 洲在县东六十里。乾隆年间（1736—1795年），洲内修筑了东、西二垸，二垸毗连。其中，西垸内本有学田、民田各一

① 乾隆《枝江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下百里洲”条。

② 乾隆《枝江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下百里洲”条。

③ 乾隆《枝江县志》卷二《建置志·闸口》“下百里洲上闸”条，光绪《荆州府志》卷二〇《堤防志四·院堤》“下百里洲闸”条。

④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三公堤”条。

⑤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新垸子”、“南河坝垸”条。

⑥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新垸”、“南河坝垸”条。

区，随着洲体的变化，学田坍塌殆尽，民田亦仅存十分之三；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大水，西垸由于更靠近洲首，处于迎流顶冲之地，半被沙压；道光七年（1827年）砌石淤三十余丈加以防护。^①

濞洲 洲在淝洋洲之上，是枝江县较早筑堤的江心洲之一。嘉靖之前已“筑堤以防水患”^②。

关洲 洲土“最宜麦、粟、绵花、豆、麻”^③，开发较早，嘉靖之前已有民居。至迟在乾隆初年修建了王家堰，堰在洲之尾。^④由于枝江县“外江内湖，高原下隤，计亩五十万有奇，而洲渚之地什居四五，故陂渚塘堰之在枝者，视他邑为亟”^⑤，因此王家堰的修建表明关洲得到进一步开发。随后，乾隆年间又修筑了关洲堤，“内俱民地”^⑥。可惜咸丰十年（1860年）关洲被水洗殆尽。^⑦

与关洲顺江而列的涖洲与澧洲，明代亦已得到开发，嘉靖之前有民“耕业于内”^⑧。然而，同治初年二洲发生巨大变化，与关洲一样“皆为水洗”^⑨。

坝洲 一名灞洲，在县东六十里。坝洲堤筑于乾隆年间，并修有闸。道光七年（1827年），大水冲塌北岸堤防，县令谢丕绩又督筑新堤一百二十余丈。^⑩

羊角洲 即南渚洲，在县东南六十里。康熙年间（1662—1722

①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濞洲西垸”、“濞洲东垸”条。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枝江》“濞洲”条。

③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枝江》“关洲”条。

④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王家堰”条。

⑤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

⑥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关洲堤”条。

⑦ 同治《枝江县志》卷二《地理志中·疆域》“关洲”条。

⑧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枝江》“涖洲”、“澧洲”条。

⑨ 同治《枝江县志》卷二《地理志中·疆域》“澧洲”条。

⑩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坝洲堤”条。又，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枝江县》称有“灞洲堤”。

年)修筑堤防,道光八年(1828年)县令谢丕绩再度督修。^①

作为江心洲,无论是合为整体,还是分为数块,其抵御洪水的难度都远远超过边滩或其他地区。江心洲不仅四周过水,而且受邻近河道其他江心洲的影响,因此需要随时、全方位地面对主流线的变化。在岸堤未筑的时期,江心洲所在河段的河势还不算复杂;随着上游来沙量的增多,邻近江心洲在数量、形态等方面发生改变,它们分汊河道,不断改变水流从而对洲体进行冲刷。另一方面,随着对岸江堤及其他江心洲堤防的不断修筑,堤岸与江心洲的边界条件均发生了改变,迫使水流冲刷江岸及各江心洲。与上、下百里洲相比,其他江心洲由于洲体较小,在与复杂多变的河势进行对抗时往往处于劣势,除非逐渐靠岸成陆,否则将倍遭冲刷,甚至消逝。同时,由于上游来沙的持续落淤,又会形成新的江心洲。江心洲此消彼长,导致主流线的频繁改变。主流线的变化不仅冲击着沿岸堤防,反过来又影响江心洲的发展,彼此相互作用。

正是在这种复杂条件下对江心洲进行的长期开发与利用,集中体现了本区开发水平的提高。

二、松滋县

地处荆江西端的松滋县,至迟在北宋后期出现了御江之堤。据陆游《入蜀记》卷五记载,陆游曾在桂林湾“与儿辈登堤观蜀江”。桂林湾具体地望不详,据陆游的行程推算,在从沙市出发西行三日后所抵达的地点,当不出今松滋县老城镇东南一带。桂林湾堤始于何时?尚无资料说明。可以推测的是,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路过此地时有“西游六千里,此地最凄凉”的感叹^②,说明当时尚未从战争的破坏中复苏,修堤的可能性不大,故此堤很可能是北宋天下尚太平时所筑。此堤在元明文献中均有反映。上引《元史·畅师文传》称: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松滋、枝江有水

①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羊角洲堤”条。

② (宋)陆游:《松滋小酌》,见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患，岁发民防水，往返数百里，苦于供给，师文以江水安流，悉罢其役”^①。由于至元年间（1264—1294年）荆湖地区尚未从宋末元初的兵燹中恢复，松滋县难以在此期间创筑新堤，里民岁岁防水之役，当是对宋代所修堤防的维护。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有“大堤”条，称是堤“自堤尾桥直抵虎渡，延袤八十余里，洪武二十八年重修”^②。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松滋县堤考略》亦云：“县东五里有古堤，自堤首（尾）桥抵江陵之古墙铺，长亘八十余里。”陆游与儿辈所登，有可能即此堤。

入明以后，松滋县的溃堤事件屡有发生。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松滋县堤考略》云：

县地势平衍，三峡之水迸流至此，始得展荡，势若枹马脱缰，随性奔逸，最难防御。而本县又当公安、石首诸县之上流，江堤一决，正冲诸县胸腹而下，其形势尤为要害。县东五里有古堤，自堤首（尾）桥抵江陵之古墙铺，长亘八十余里；且旧有采穴一口可杀水势，宋元时故道湮塞。迨国朝洪武二十八年决后，时或间决。自嘉靖三十九年以后，决无虚岁，下诸县甚苦之。较堤要害，惟余家潭之七里庙、何家洲之朝英口、古墙之曹珊口为大；其余五通庙、胡思堰、清水坑、马黄冈等堤，凡十有九处，中多獾窝、蚁穴，水易浸塌。

明清时期，松滋县的堤防在河势演变中艰难发展。

（一）朱家埠与车老湾堤

朱家埠镇在县东十五里，乾隆时“居民繁盛，为一邑之胜区”^③。朱家埠堤早在康熙时已为险工堤段，当时曾筑堤五十丈。^④康熙之后，朱家埠堤数次溃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堤决于

① 《元史》卷一七〇《畅师文传》。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松滋》“大堤”条。

③ 乾隆《荆州府志》卷一九《乡镇·松滋县》“朱家埠”条。

④ 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险工堤考》。

朱市孔明楼，乾隆六十年（1795 年）与道光十年（1830 年）堤再溃。^①

车老湾堤与朱家埠堤相连。嘉庆七年（1802 年）六月车老湾堤溃，知县洪范即行督修，“高厚逾于旧堤，晚禾补种，尚属有秋”^②。道光十年（1830 年）朱家埠决堤时，与朱市相邻的车老湾被冲出大小二口，时任知县张希吕“率绅耆抢筑完固，补种秋禾，亦获半收”^③。张希吕所修之堤较为坚实，但因累年增高，所培之土厚度不够，加之继任督修不力，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因“江涨愈增，淘洗日深，水涸后以绳测之尚五丈有奇”，车老湾堤复溃，是冬，新任知县李葆树重筑堤防，道光三十年（1850 年）三月堤成，“较前数次经理为独善焉”^④。

（二）七里庙堤

七里庙堤在县东二十里余家潭，为“堤防要口”^⑤。此段堤防属“多獾窝、蚁穴，水易浸”之列^⑥，较难防护。加上“濒河一带，正当渐洋洲、冯口两河交射之冲”，故“老堤年年崩洗”^⑦。隆庆元年（1567 年）“七里庙堤溃决，乃由溃口内挽筑月堤”^⑧。新堤“长十里，起高家套，止江亭寺”^⑨。次年“新堤又溃，复由溃口外挽筑月堤”^⑩。松滋军民自知本地“江水之患甚于荆州”，“安固同庆、溃决均忧”^⑪，遂协力修筑堤防，七里庙“恃加修月

① 同治《松滋县志》卷四《水利志·堤工》，卷一二《杂志·灾祥》。

② 同治《松滋县志》卷四《水利志·堤工》。

③ 同治《松滋县志》卷四《水利志·堤工》。

④ 同治《松滋县志》卷四《水利志·堤工》。

⑤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松滋》，光绪《荆州府志》卷三《地理志三·山川》“余家潭”条。

⑥ 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堤防考略》。

⑦ 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松滋县》。

⑧ 同治《松滋县志》卷四《水利志·堤工》。

⑨ 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松滋县》。

⑩ 同治《松滋县志》卷四《水利志·堤工》。

⑪ 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堤防考略》。

堤得以无患”^①。康熙中期以后，未见有七里庙决堤记录。^②但同治时，余家潭已“淤浅”^③。

（三）采穴堤及相邻堤防

前引万历《湖广总志·松滋县堤考略》可知，采穴于宋代以前曾分江流，宋元时湮塞。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至嘉靖年间（1522—1566年），采穴堤时有溃决，万历二年（1574年）再次筑塞。^④清代，采穴堤又数遭冲决。顺治十年（1553年），皇木坑堤溃，较“明嘉靖、万历决裂倍甚，倒口且数十丈”；康熙二年（1663年），皇木坑复决，“水势愈急，大非前崩溃可比，决处在癸巳（按：即顺治十年）决口之西”^⑤。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七月，灵钟寺即顺治皇木坑溃口旧处复溃。^⑥多次溃决，对采穴堤和采穴支堤产生了很大影响。

清初，采穴以下筑有支堤。西支堤自灵济寺（即灵钟寺）至沙道观，东支堤自采穴市至双庙湖，共二十五里，高一丈，宽一丈五尺。但支堤疏于修防，康熙时“积久崩坏”^⑦，道光时支堤旧址犹高四五尺，同治前期“江防屡溃，沙泥淤积”，支堤只剩旧迹，“未尽没也”^⑧。支堤的修筑与采穴溃决之后的随即补筑有关，支堤的衰颓也是采穴堵筑的必然结果。

采穴一带的堤防易决，除了与堤身“多獾窝、蚁穴，水易浸”^⑨有关外，嘉靖以后河势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采穴位于百里洲之南，百里洲与采穴之间的河道尚有芦花洲、偏洲等江心

① 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松滋县》。

② 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堤防考略》。

③ 同治《松滋县志》卷四《水利志·堤工》。

④ 《明史》卷八八《河渠六·直省水利》。

⑤ 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堤防考略》。

⑥ 同治《松滋县志》卷四《水利志·堤工》。

⑦ 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支水堤》“采穴支堤”条。

⑧ 同治《松滋县志》卷四《水利志·采穴支堤》。

⑨ 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堤防考略》。

洲，诸洲阻碍江流，致使水流线频繁改变。^①道光十年（1830年），百里洲所在河道江沱易道，主流线大变（参见上文），巨大的河势变化给松滋堤岸带来严重冲击。

（四）河夹洲及其上下堤防

河夹洲，又名何家洲、河家洲，是位于县东五十里的一个边滩。《明史》卷八八称，永乐八年（1410年）松滋县修筑了何家洲堤岸^②，则前此已有河夹洲。

河夹洲三面临江，洲上腴田过百顷，规模较大，其北为枝江百里洲，故洲体发展颇受百里洲变化的影响。由于嘉靖以后百里洲逐渐东移并被冲为上、下两洲，逼迫水流南激，位于百里洲以南的河夹洲渐受其害，堤岸易崩。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大水冲决河夹洲之朝英口，后得益于知府赵贤创立堤甲法，每岁修防，“堤恃以无恐者几四十年”^③。

与万历《湖广总志》不同，在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堤防考略》中，河夹洲上下的柳林子、杨润口、易家湾、王满湾等堤段被置于本县要堤之列，这表明清初河夹洲所在河道的形势已经变化。与此相对应，康熙县志同卷《险工堤考》也将杨润口、易家湾、王满湾等堤列入了险工段，反映出清初河夹洲的防洪形势严峻。顺治十年（1653年）杨润口堤决，康熙九年（1670年）再决，知县李子炎尝试通过改筑圭形堤来抵御水势，两年后，新堤又一次溃决，遂“复坚筑古堤，民以无患”^④。康熙年间（1662—1722年）王满湾堤等也挽筑了月堤。^⑤

为了应付河势的变化，康熙时河夹洲上筑有堤防六段，长度共二百四十二丈，另有月堤一处八十五丈，均属险工。道光十三年（1833年），洲南塌陷，洲民填筑塌陷地后，将长十余里的圭形南

① 参见陈曦《宋元明清时期荆江洲滩的变化及其对河道的影响》，载《江汉论坛》2006年第12期。

② 《明史》卷八八《河渠六·直省水利》。

③ 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堤防考略》。

④ 同治《松滋县志》卷四《水利志·堤工》。

⑤ 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险工堤考》“王满湾险堤”条。

堤与长二十余里的北堤连接为垸，遂“屡获丰登”。但是，河夹洲最终未能抵挡住水势的变化，咸丰十年（1860年），受下游江陵溃堤、水流不畅的影响，“水归垸内者日积日深，无可疏消，致令合洲沈没，舍宇无一存者”^①。

（五）浣市堤及相邻堤防

浣市镇在县东北九十里，“地滨大江，水陆通衢，人烟辏集”^②，为县东北之要津，浣市堤是其重要防护。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堤防考略》将浣市之江灌子堤列为要堤之一；同书同卷还将浣市堤和江灌子堤记为险工堤段。浣市堤成为险工，是受到了对岸百里洲石套子“挑溜南趋”^③的影响。

清初，浣市堤、江灌子堤与史家湾堤分别筑达二百八十二丈、四十丈、一百一十八丈，然而，此三处老堤在康熙年间“崩洗殆尽”，只能“恃月堤为保障耳”^④。后，自杨四庙五里至关帝庙复筑浣市新堤。^⑤浣市堤受到的最大冲击发生在道光年间。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四年（1834年）、十九年（1839年）、二十年（1840年）、二十一年（1841年），浣市堤连续五次决口。^⑥

道光年间（1821—1850年），松滋县沿江堤防自庞家湾起，至与江陵交界的古墙止，共一万二千三百余丈，约七十八里。^⑦

明清时期，松滋县沿江堤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复杂的河势变化。时人深谙此道：“（松滋）江水之患甚于荆州，荆属之逼近江干者，惟松尤甚矣。”^⑧道光年间，水患严重冲击着朱家埠至采穴一带的堤防，同治年间（1862—1874年）松滋河成于此地实非偶然。

① 同治《松滋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河夹洲”条。

② 乾隆《荆州府志》卷一九《乡镇·松滋县》“浣市”条。

③ 《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一《松滋县水利堤防记》。

④ 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险工堤考》。

⑤ 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浣市新堤》。

⑥ 同治《松滋县志》卷一二《杂志·灾祥》。

⑦ 《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一《松滋县水利堤防记》。

⑧ 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堤防考略》。

三、江陵县

自松滋县流市镇以下，荆江进入江陵县河段，中经虎渡口（一名太平口），流入公安县界，故江陵县尚有部分江南大堤。

江陵县素以江北大堤为重，江南大堤则“堤塍单薄，不及北岸之半，故历年来灾不胜纪”^①。乾隆朝时江南大堤已见规模，上段“自上古墙起，至王家湖止，共十六工，长九千二百六十八丈，进虎渡口”；下段“接虎渡口，自石家庙起，至王家渊止，抵公安县界，共十二工，长五千八百二十丈”^②。

虎渡口分江南注，直接影响江南大堤。为防护大堤，明代曾在虎渡口两旁砌石，清初吴三桂变乱时，石矶尽被拆毁。^③道光二十年（1840年）虎渡口溃决，并改道于故道以东三里的易家湾分流。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太平堤溃，候补道查炳华筑塞溃口，同时捐资修建石矶护堤，还“置洲田三百十有二弓，备岁修之用。里人德之，为立生祠”^④。

江南大堤西岸的险工上古墙、中古墙和下古墙三段皆筑有月堤。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修建上古墙月堤三百八十丈，雍正五年（1727年）修建中古墙月堤一百六十四丈，雍正八年（1730年）修建下古墙月堤六十丈。江南大堤东岸，雍正八年（1730年）修建接官厅月堤一百七十五丈，乾隆六年（1741年）修建东岳庙月堤一百七十丈，康熙四十年（1701年）和乾隆五年（1740年）、十六年（1751年）、十八年（1753年）分别修筑白庙几月堤一百七十丈、七十二丈、九十一丈和七十一丈。^⑤

对于虎渡口一带而言，不仅虎渡口沿江堤防受到来水冲击，而且虎渡分流沿岸地区还受到江水所挟带泥沙落淤的影响，至清末，

①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堤防》“江南堤”条。

② 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江陵县》。

③ 雍正《湖广通志》卷九《山川志·荆州府·公安县》“虎渡口支河”条。

④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堤防》“江南堤”条。

⑤ 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江防》。

“江南全淤渐高，其势日强”^①，对北岸堤防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引发“南北之争”。由于该问题不在本研究之列，此处从略。

四、公安县

公安县沿江河段自西向东分属沙市河弯、斗湖堤河弯与郝穴河弯，河势多变，加上位于荆江南岸，颇受河道南移影响，因此，“莅斯土者，堤防其首务也”^②，沿江堤防“险工林立，防护维艰”^③。

至迟在唐末五代，公安县已有长江堤防。五代王周《藕池阻风寄同行抚牧裘驾》诗称：“船檣相望荆江中，岸芦汀树烟濛濛。路间堤缺水如箭，未知何日生南风。”^④此诗当作于由公安北上江陵的途中，因遇北风不得行而滞留于藕池镇，故有盼“生南风”的愿望。诗中可见，藕池以下有江堤，诗人所泊的地方则无，大约正是河口处，即藕池口。五代公安江堤的出现，说明荆江堤防已从北岸向南岸发展。

宋代，公安江堤进一步扩展。北宋时陶弼曾有诗云“门沿大堤入，路趋浅莎行”^⑤，既称大堤，则很可能是江堤。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经过公安县时，县令周谦称当地“堤防数坏，岁岁增筑不止”^⑥，说明修堤相当经常。南宋后期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筑堤活动，其中孟珙五堤影响最大。孟珙五堤的确切记载初见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公安》，即县东三里之赵公堤，县南半里之斗湖堤，县西北三里之油河堤，县东北二里之仓堤，布政分司之横堤，皆在县治附近。其中赵公堤、仓堤直接

①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堤防》“江南堤”条。

② 同治《公安县志》卷三《民政志·堤防》。

③ 《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一《公安县水利堤防记》。

④ 《全唐诗》卷七六五，第8680页。

⑤ （宋）陶弼：《邕州小集》“公安诗”，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抵御江水；横堤既阻拦油河又防江水倒灌^①；斗湖堤用以屏障公安县城，防止县西南一里的斗堤湖泛滥，是湖号称“邑之巨障也，以形似名”^②，大约从公安县治西南向西、向南展开；油河堤用以阻拦县西北三里的油河泛滥。至此，公安县城的四周基本为堤防所环绕。

元明时期，公安县最重要的堤防是沿江而建的“大江御水堤”。据记载，“大江御水堤”始筑于南宋孟珙；元代继续修筑，竹林港堤为其中的重要堤段，时有溃决；明代，“大江御水堤”扩展至全县的沿江河岸，正德十三年（1518年），巡抚鄢阳都御史王鉴之委派张澜修堤，上自江陵灌洋，下至石首新开堤，长一万二千五百余丈^③，此即大江御水堤。

由于公安县堤防的较大一部分沿河弯分布，使得明代的公安县与同时期的松滋县相比，决堤的次数更多，面临的河势变化加剧、水患渐重的形势更严峻。据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公安县堤考略》记载：

至元大德七年，竹林港堤大溃，自是堤不时决。迨国朝修筑沿江一带堤塍，西北接江陵上灌洋，东南接石首新开堤，堤凡万有二千五百余丈。其间，雷胜旻湾、窑头铺、艾家堰、竹林寺、二圣寺、江池湖、狭堤渊、沙堤铺、新渊堤、郭家渊、施家渊诸堤，更为要害。成化五年，决施家渊。弘治年间，决狭堤渊。正德十一年，决郭家渊。嘉靖十一年，决江池湖；三十五年，决新渊堤；三十九年，决沙堤铺；四十年，决深渊堤；四十四年，决大湖渊及雷胜旻湾；四十五年，崩洗竹林

① 由于布政分司位于县北二里，油河在县北三里处西东方向注入长江，因此横堤既可防油河水泛滥，又可防江水倒灌。

② 《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八《湖广四·荆州府·公安县》“东湖”条，第3666页。

③ 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公安》“沙堤铺堤”条，湖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元年刻本。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公安县堤考略》略同。

寺。隆庆元年，崩洗二圣寺；二年，决艾家堰。水患殆无虚岁。

引文提到的二圣寺被崩洗在隆庆元年（1568年），但前此数百年间该寺就因河道南移、洪水威胁而不断迁徙。二圣寺在县北二里，东晋太和三年（368年）建于江滨，原名远安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改名兴化寺，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复称报恩光孝寺，不久更名为二圣寺，直至清代。唐代时二圣寺由滨江处迁往油河口旧县治梅园；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因“水倾”^①，梅园“圯入江”^②，二圣寺徙椒园；嘉靖间（1522—1566年），“江水复啮，遂移东南郭外”^③。二圣寺的不断南迁反映出斗湖堤弯的河道在唐代已开始南移，明代以后南移加快。如明人袁宏道所见：“公安治倚江，江水啮岸者，百有余年。至近岁，遂割城之半以予水。”^④今考古发掘亦证实了这一点，1953年斗湖堤江边挖出一方嘉靖年间的墓碑，碑文可见当时墓地距江八里远。^⑤

清初顺治、康熙两代，公安县修护江堤的活动比较密集。顺治十六年（1659年），太子庙堤溃口三百六十丈，时任知县楚煜予以重修；顺治年间（1644—1661年）还重修了明代杨公堤。康熙初年，江堤之大河湾、姜家渊、陈家潭等堤段决口；康熙十八年（1679年）后逐年修筑；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县沈尔爆修筑了金龙庙堤溃口；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知县许磐修筑了斗湖堤、小关庙月堤三百六十丈和兴隆庙月堤三百八十丈；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许磐复筑黄家湾月堤五百四十九丈；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知县陆守采筑大河湾、何家潭堤，并置木城以防护波浪；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知县杨之骈加修民安驿、大河

①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八《祠祀志二·寺观·公安县》“二圣寺”条。

② 同治《公安县志》卷一《地舆·古迹》。

③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八《祠祀志二·寺观·公安县》“二圣寺”条。

④ （明）袁宏道：《东门护城堤记》，见雍正《湖广通志》卷一一〇《艺文志·记》。

⑤ 转引自前揭张应龙等《长江中游河段河床演变分析》。

湾、何家潭、小关庙四堤，并将沿堤蚁穴、獾洞“搜剔无遗”。^①同时，在决堤之处加筑月堤，如雍正、乾隆两朝修建了萧家湾月堤七百丈、窑头铺月堤一百八十丈、陈七湾月堤四百六十四丈、余（涂）家巷月堤二百二十二丈等。^②同治时，公安县沿江大堤的起点已由明代的江陵上灌阳界上延至吕江口，下接石首新开铺堤，共长二万一千六百余丈^③，比明代的堤长增加了约九百丈。

至于宋代以来的古堤，在清代已随着河道的演变或废或圯：赵公堤、横堤与明代石浦河堤同溃入江^④；斗湖堤先成为市肆，继而在同治九年（1870年）尽没于江^⑤；油河堤仅存其迹，仓堤废弃。^⑥

此外，石首沿江堤防与河道洲滩开发的关系值得注意。以涂家巷（又作余家巷、涂家港）至沙堤埠（又名沙堤铺）一线堤防为典型。涂家港市，在县北八十里。^⑦涂家港至沙堤埠间的四十余里堤防，“卑矮残缺，赖申梓、平滩、柳子三洲民堤为护。至西湖庙石工、兴隆工、高李么（工）坍岸，逼近大河湾，其险不待言矣”^⑧。在来水量变化不大时，申梓、平滩、柳子三洲的垸堤可以起到保护卑矮江堤的作用；来水量变化较大时，洲垸便会壅塞水流，导致行洪不畅，从而对下游河道产生重大影响。前述万城一带堤防与保障、古埂等垸间的关系即是如此。沙堤埠以下是石首县杨林工、烟堆、马林工等“险工”堤段，咸丰二年（1852年）大水造成马林工溃口、终致藕池河形成，与涂家巷至沙堤埠河段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① 同治《公安县志》卷三《民政·堤防》。

② 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公安县》。

③ 同治《公安县志》卷三《民政·堤防》。

④ 同治《公安县志》卷三《民政·堤防》“旧志所载各堤”。

⑤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九《堤防志三·顺江堤》“斗湖堤”条。

⑥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九《堤防志三·顺江堤》“油河堤”、“仓堤”条。

⑦ 乾隆《荆州府志》卷一九《乡镇·公安县》“涂家港市”条。

⑧ 同治《公安县志》卷三《民政·堤防》。

五、石首县

北宋时今石首境分为石首、建宁二县，南宋省建宁为镇。^①至迟在北宋中后期，建宁县已有江堤，时人称之为“建宁南堤”。熙宁至政和（1068—1117年）间人范致明称：“华容地皆面湖，夏秋霖潦，秋水时至，建宁南堤决，即被水患。”^②说明当时的建宁已有御江堤防，但限于资料，其规模、起止暂不清楚。

此外，北宋中叶石首县西部有一道“谢公堤”，因县令谢麟而得名。《宋史》卷三三〇《谢麟传》称：“再调石首令，县苦江水为患，堤不可御，麟叠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号‘谢公堤’。”谢公堤又名“万石堤”，后世地理书常提及此，如《大明一统志》卷六二《荆州府·山川》“万石堤”条云：“在石首县西五里。宋县令谢麟所筑，用米万石，因名。”^③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石首》、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二《水利·荆州府·石首县》等略同。谢麟修堤并非新筑，而是以石护岸，这在堤防建筑史上是值得书写的贡献。万石堤在明代仍存，乾隆《石首县志》卷二对明代万石堤的经行有具体记载：“此堤自小南门外摇铃冈起，西接大堤，中间长街、接官亭等处，皆是。”^④

元代石首县的堤防状况从元人王廷端《石首重开古穴记》中可略知一二：

萨德弥实以忠翊授石首县达鲁花赤，大德七年五月视篆。六月，堤决县东之陈瓮港。急筑内之开口，再筑黄金、白杨之

① 建宁设为县，事在北宋初年。乾德三年（965年）升石首县东大江南岸的白白巡为建宁县，此后数度废置，如熙宁六年（1073年）省入石首县，元祐元年（1086年）复为县，南渡后省废。参见（宋）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校点本；《宋史·地理志》等。

② （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小石山房丛书本。

③ （明）李贤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六二《荆州府·山川》“万石堤”条，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④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南岸堤》“万石堤”条。

两堤。邻境岌岌，又增筑内垸之新兴堤。方完，公安竹林港大溃，新兴无恙，保全数村。自是究心于堤。明年之上司合数郡大兴工役。不再岁，陈瓮再决，波及数邑，民堕流亡，官费赈给，皆堤祸之。九年八月，偕尹、王承事询其利病。皆曰：“开穴为便，塞穴为不便。”遂定不筑陈瓮港之请。是岁，上司体覆方如所乞。十年，夏潦，独陈瓮导下流之浸，注之洞庭，而无常岁冲溃之患，农亩稍收。乃大合士民讲究之词，力陈古穴必合疏导之利，以告于府……遂下今闻六穴之令。郝穴则江陵，赤剥则监利^①，石首则杨林、宋穴、调弦、小岳与焉。元年秋，大熟。夫诸穴通则利，塞则为害。其塞也，溢斯堤；其通也，分则泄水。一利一害，较然明甚……

从引文可见，元初石首县筑有陈瓮港堤、黄金堤、白杨堤和新兴堤。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石首》，黄金堤在县南五里；白杨堤在县西南五里^②；新兴堤在县西南七十里，主要防御竹林港水患，保护“内垸”。陈瓮堤，为清代陈公堤的前身（详下）。大德九年（1305年），陈瓮堤决，造成数邑大灾，灾后，合府决定重开往昔的六个穴口，为日后的洪水寻找出路，此即大德间“重开古穴”。重开古穴反映出元人的防水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究心于堤”转为“开穴为便，塞穴为不便”，并以堤为祸，视筑堤为“射小利害大谋，急近功遗远患”。这种观念与宋人“恃堤为命”的态度明显不同。究其原因，宋代以来逐渐堵塞穴口与屡兴堤防促进了荆江水位的上升，一旦年际降水量发生变化，原有的堤防高度便难以抵御洪水，造成溃堤决口。不过，从明初六穴口“止余其一”^③的情形来看，穴口重开不久即渐遭湮塞，面对已

① 应为“江陵则郝穴，监利则赤剥”，原文有误。

② 白杨堤即白洋堤，清代又称白杨潭堤，乾隆时堤桥与剝口俱废，同治时进而淤废。见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堤防》，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白杨潭堤”条。

③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江防考》。

经围垦的农田、定居的人口，元人不得不仍以修筑堤防作为防汛的重要手段。同治《石首县志》卷三《民政志》即称：“元末，达鲁花赤请筑沿江长堤，计程一百五十五里，以防水患。”

明代以后，石首县着力修筑荆江南岸的堤防。永乐四年（1406年），修治临江的万石堤。^①宣德六年（1431年），修筑临江三堤，但其地望不详；正统元年（1436年），修复近江决堤。^②正德年间（1506—1521年），布政使周季风于县西南三十里的杨林口创筑杨林堤，长百余丈^③，至此，元大德时开浚的杨林穴被堵。嘉靖年间（1522—1566年）邑人王乔衡捐修元代兴筑的黄金堤，但数年后圯毁。^④

嘉靖年间的水患进一步刺激了石首南岸堤防的大力兴修。据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石首县堤考略》：

（石首）县东西广三百八十里，南北袤一百里，俱夹江南北，而县治一面滨江，势复下隰。自元大德七年决陈瓮港堤，萨德弥实挽筑，再筑黄金、白杨二堤。护之不一岁，陈瓮再决。赵通议始开杨林、宋穴、调弦、小岳四穴，水势以杀。迨我国朝，四穴故道俱湮，堤防渐颓。嘉靖元年，决双剏垸；三十四年，冲洗戴家垸；三十五年，决车公脑；四十五年，决藕池。顷年，始修南岸自公安沙堤至调弦口堤，凡四千一百余丈；北岸自江陵洪水渊至监利金果寺堤，凡千有余丈。其间，杨林、瓦子湾、藕池、袁家长剏尤为要害。

引文中的南岸堤防止于调弦口堤，说明元代重开的调弦口已被堵塞，下荆江南岸的分流穴口消失，由此进一步推动了荆江水位的

① 《明史》卷八八《河渠六·直省水利》。

②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南岸堤》“临江大堤”条。

③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石首》“杨林堤”、“杨林口”条。

④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堤防》“黄金堤”条。

升高。

石首县北岸有江北大堤，明代以后，江北大堤起自与江陵交界处，止于监利县西界，长千余丈，石首县称之为滨江北岸堤。^①

在发展沿江堤防的同时，明代也开始修筑石首城防。弘治十七年（1504年），知县何洽“始筑土城，四门甃砖。正德中，知县高岩李棻修，周围八百丈，高八尺，广一丈，池前阻江”^②。这种情形表明，明代以来的石首堤岸颇受河道摆动的影响。

明末的社会大动荡使石首沿江大堤疏于修护，加上河道南移，“昔之堤即今之北岸，昔之田即今之中流”。至清初，石首沿江大堤“崩溃将半，近堤田地俱归江流，稍远未崩者，水冲沙压，废不成田……如罗童垸、藕池，其崩卸田地八百八十八顷九亩七分；陈公堤、调弦，其崩卸田地九百六十三顷八亩八分；杨桃垸、港口等处，其崩卸田地一千四百一十一顷八十一亩五分以上”^③。

清初致力于恢复、重建，至乾隆时，石首境内江南岸的堤防上接公安界，自军民界东至米市街，再自县北门西至列货山止，共长九千三百丈。^④

以下择万石、藕池等要堤来考察清代石首县堤防的发展。

（一）万石堤等

万石堤在石首县西^⑤。“此堤自小南门外摇铃冈起，西接大堤，中间长街、接官亭等处，皆是。因江水屡圯，今已堙废无存，始有沿冈之筑”^⑥。

①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滨江北岸堤”条。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城池·石首》。

③ 同治《石首县志》卷三《民政志·土田赋役》。

④ 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石首县》“临江大堤”条。同书同卷复称：“滨江大堤接公安县界，上自杨林市起，下至梓楠堤止，共十八工，长八千八百七十五丈。”

⑤ 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石首县》称万石堤在县西五里，然而成书晚三十八年的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南岸堤》则称堤在县西二里，同治《石首县志》的说法与乾隆《石首县志》相同。

⑥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南岸堤》“万石堤”条。

“沿冈之筑”即沿冈堤，筑于乾隆八年（1743年），在县西南五里，至大南门外马鞍山之右，距城半里，长八百九十丈五尺；乾隆十五年（1750年）续筑一段，长一千三百五十二丈，亦称沿冈堤；乾隆五十年（1785年）再筑一段，至大南门外文峰山（即笔架山）右侧。沿冈堤实为临江堤防的子堤。^①沿冈堤既筑于乾隆八年（1743年），则万石堤应废于之前，堙废时已较明代堤址南移约三里。

万石堤堙废后，县丞王永镇在县西三里的大堤外复筑王公堤，“亦足为沿冈保障”^②。

沿冈堤之上有荷花堤，亦为月堤，在县西南十里，上接大堤，长二百三十丈，筑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

（二）藕池堤与黄金堤

藕池堤在县西南十里，是石首诸堤中“尤为要害”^③者。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曾经溃决。道光十年（1830年）大堤坍塌十余丈，后退挽月堤二里。咸丰二年（1852年）大水，马林工溃口，因民力拮据未能筑塞，后竟成“入湖孔道”^④，藕池河最终形成。

黄金堤，明代志书称其在县南五里，清代志书称其在县东南五里，长三百六十丈。黄金堤始建于元代，明清两代多次修治。随堤设桥、闸、剏，“桥之设，虽防外浸，亦消内积。每岁初夏闭闸，孟冬放水，以便开塞，防蓄泄也”^⑤。由于石首“邑治踞湖百余里，每逢秋霖鼓浪城下，东南小湖皆助为害”^⑥，黄金堤不仅用以防备北边江水泛滥，同时防备南面的洞庭湖及诸湖水涨。对于这样一道重要堤防，元代以来一直重视修护，并建止澜堤、横堤垸^⑦等作为

① 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石首县》，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南岸堤》“沿冈堤”条。

②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南岸堤》“王公堤”条。

③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石首县堤考略》。

④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九《堤防志三·顺江堤》“藕池堤”条。

⑤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堤防》“黄金堤”条。

⑥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堤防》“黄金堤”条。

⑦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黄金堤”条。

其外围屏障。但是，在江湖夹击之下，黄金堤屡遭严重威胁。乾隆《石首县志》卷二“黄金堤”条记：

嘉靖间，邑人王乔衡捐修，数年辄圯。国朝，知县王大年派夫修筑，数年又圯，因移堤稍北，春塞秋开……康熙丁亥，止澜堤溃，冲决黄金堤剝，知县张登杰派夫修筑。康熙庚子，止澜堤又溃，冲决黄金堤剝，因崩成塘。县令顾之孜移向东北数十丈，仍派民夫修筑。雍正丁未年，南水冲决，剝又溃……

剝口一再溃决，剝闸亦由“初夏闭闸，孟冬放水”变为“春塞秋开”，显示出江、湖水患的日趋严重。

（三）止澜堤、张成垸及相关垸堤

止澜堤或称梓楠堤，自县北门山尾起，东至列货山止（见图 2-4《清同治年间石首县东乡示意图》^①），是石首县临江大堤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上文可见，康熙时期止澜堤数次溃决；此后，道光十二年（1832 年）、二十四年（1844 年）、二十八年（1848 年）、二十九年（1849 年）和咸丰十年（1860 年），止澜堤又屡遭冲决，每次决堤之后，时任知县均及时修复，以保护黄金堤及县城。^③

与止澜堤关系密切的有堤外之张成垸（见图 2-4《清同治年间石首县东乡示意图》）。张成垸，始于明代，为准修官垸，原有田三万亩，系围筑边滩而来，倚为止澜堤外防。^④ 后因垸堤圯废，民苦水患，雍正十年（1732 年）魏篆苍等人请修长堤七千四百丈，“江流顺下，水不为害”。同治四年（1865 年），附贡李霖、生员徐

① 据同治五年《石首县志·石首县东乡图》绘制。

②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南岸堤》“临江大堤”条，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止澜堤”条。

③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罗城垸”条。

④ 《方太守申覆张成垸详稿》，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成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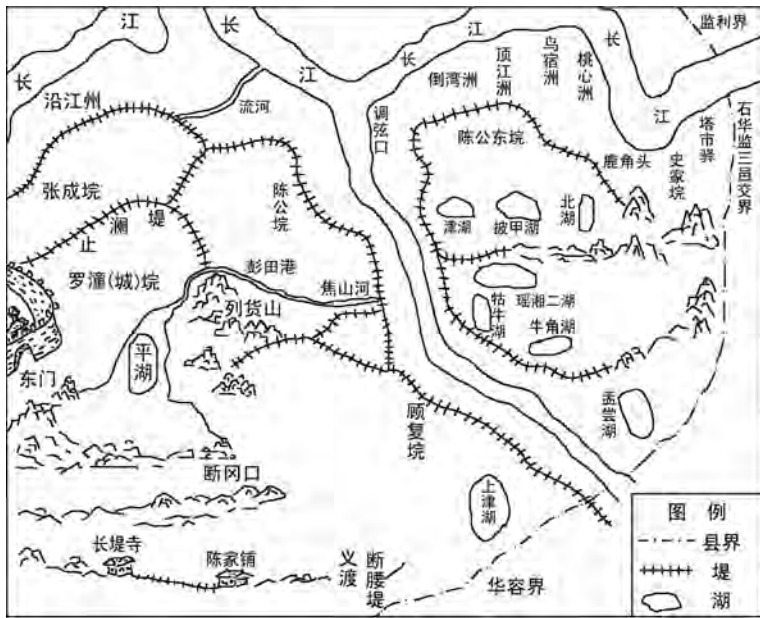


图 2-4 清同治年间石首县东乡示意图

凤翥、张锦珩等人请分上、中、下三段修筑，“永作罗城垸北堤保障”^①。虽然称为“罗城垸北堤保障”，但实际这上、中、下三段却是在明代张成老垸之外所筑的新堤，“长堤五十余里，内包七洲，计完芦稞田地三万余亩，垸宽二三十余里，横挺江心，阻遏江流，逼水北趋，汕刷郝穴一带，大堤崩陴，关系匪轻”^②。同治时，张成老垸尚有高低田三千余亩，而添筑于老垸之外的新垸范围更加宽广，其对河道的壅塞不言而喻。受到新垸影响的不仅是止澜堤，上游的郝穴堤防亦受其害，故同治八年（1869 年），太守下令刨毁除张成老堤三千余亩田地以外的上、下私堤及上、中、下三局，严

①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张成垸”条。按：罗城垸，“环县之北，即止澜堤，自北门外起，至列货山止，山麓向有剏”，见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罗城垸”条。

② 《荣太守押毁私垸批》，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成案》。

禁私挽垸堤。^①

石首县的沿江堤防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像张成垸这样的垸堤组成的，如藕池以上之柳平垸，原系围垦柳子洲而成，垸堤上接公安县之申梓、平滩二洲，下接公安沙堤埠，道光时移作公安大堤，保障公安、石首两县，由两县认修。马林工溃口后，柳平垸连带被淹，同治元年（1862年）得到兴修。^②再如横堤垸，建于咸丰八年（1858年）马林工溃口后。马林工溃口导致了“水向南趋，沙从东积”，绅耆王予峰、刘经邦等呈请挽筑长堤“以保内堤”，次年堤成；咸丰十年（1860年）堤溃，时任知县劝捐并督修垸堤；同治四年（1865年）堤复溃，同年知县朱公修复。修复后的横堤垸，“其堤西由柳湖坝迤邐而南，经蒋家窖、陈币桥至刘田冈、王家嘴止，北借（接）杨树工大堤，东循东双湖上桥至黄金织布街，跨徐家、二都等坊及正、副六总地，水出蔡家沟，冬开春闭，为黄金工保障，实系要工”^③。

（四）陈公堤及其他

陈公堤，又作陈瓮堤、列货山废堤。^④据前引《石首重开古穴记》，陈瓮堤在县东，大德间（1297—1307年）曾两次决堤。乾隆《石首县志》引旧《志》称：列货山废堤东至东山，长六十余里，“岁久荡没，堤迹犹存，屡议兴筑未果”^⑤。东山，在县东七十里^⑥，调弦口在县东六十里，元代陈瓮堤既已筑至东山，则当时的调弦口为陈瓮堤所堵筑。大德年间虽曾开浚，但此后并未保持通流，直至明末堤圯（详见下章）。这道“逾调弦至东山”的元代长堤，到乾隆时修县志时，已是“未详起于何代，废于何时，姑照旧《志》存其略而已”^⑦。明代，陈公堤“西抵公安，东至调弦”，

① 《荣太守押毁私垸批》，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成案》。

②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柳平垸”条。

③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横堤垸”条。

④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南岸堤》“列货山废堤”条。

⑤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南岸堤》“列货山废堤”条。

⑥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山川》“东山”条。

⑦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南岸堤》“列货山废堤”条。

至明季仍旧；清代“则止至列货山也”^①。列货山不过在县东三十里^②，清代该堤仅至于此，主要原因即在于调弦口的分流。调弦分流使江水穿陈瓮堤址而过，导致了陈瓮堤的废止，因此出现了“列货山废堤”一名。

上述堤防之外，石首县的重要堤防尚有杨林、新兴、白杨三堤，元明时期兴筑，清代仍为堤防要害。其中，白杨堤原长一百零八丈，有桥有剝口，乾隆时堤桥与剝口俱废。^③

第三节 荆江以下江汉平原长江段堤防的发展

监利以下至今武汉河段不属于荆江，但考虑到本研究的完整性，在此一并考察属于此区间的今湖南华容县、岳阳市和湖北嘉鱼县、武汉市的堤防发展。

一、华容县与巴陵县

华容县（治今湖南同名县）河段起自塔市驿，迄于巴陵县（治今湖南岳阳市）界。本河段以南即华容县东北一带分布有小墨山、桃花山、官山、石龙山、弹子山、倒马岩、鹿角山、望夫山等山峰^④，防水重点在调弦口分流即华容河上。北宋时华容、巴陵已有若干湖堤、河堤，如华容境华容河畔有黄封堤（详见下章），巴陵城西有偃虹堤^⑤、东有白荆堤^⑥，等等，但江堤无考。明清以来江防的主要设施是在江边修筑垸堤、圻堤等。

①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南岸堤》“列货山废堤”条。

②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山川》“列货山”条。

③ 参见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南岸堤》“杨林堤”、“新兴堤”条，同书卷二《方輿志·堤防》“白杨潭堤”条。

④ 乾隆《华容县志》卷一《方輿志·山》。

⑤ 见《方輿胜览》卷二九《岳州·山川》“偃虹堤”条，第513页。

⑥ 白荆堤，一名紫荆堤，或作白津堤，在巴陵县东十五里。北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对白荆堤有专门记载，称：“阁子镇有堤，曰白荆堤，石壁潭在其下。”

华容县垸、圻的围筑，主要在清代。乾隆时本河段增加了金山洲（荆山洲）、大荆洲、团洲、阳家洲（杨家洲）、水心洲和新淤洲，光绪时再增新杨家洲、青泥洲、长林洲、杨花洲、泡洲，同时，大荆洲与水心洲坍塌殆尽。^① 随着边滩的增多，筑堤围垸、开垦滩地的活动逐渐展开。据光绪《华容县志》卷二《建置志·堤垸》，在县东北百余里的临江一带，筑有上萧何垸、下萧何垸、白沙垸、上白杨垸、下白杨垸、白杨北垸、黎家老垸、杨家垸、合成垸、双合垸、樊家垸、刘家垸、吴家垸、韩六垸、荆湖垸、公和垸、双家垸等。不仅如此，垸外临水之地亦被围筑为圻，“夏秋水涨，圻尽淹没；至冬水落，始有圻耳。潦年，麦及早稻可以半收；若遇水不泛涨之年，圻田肥美，可以倍收”^②。

巴陵县，明代以后堤防发展，且与大江对岸监利县的江堤互为影响，如县西二十里的旧江村堤，明代始筑二百五十丈；顺治十二年（1655年），监利堤溃，为防连带影响，巴陵增筑了竹庄河、何家垸、瓦子湾、鲁家埠等四处堤防，新旧堤共长一千一十二余丈。旧江村堤还曾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和雍正五年（1727年）的两次大水决堤后复筑。^③

二、嘉鱼县

自荆江东端岳阳城陵矶以下至今武汉市，除监利以外，长江还流经了今湖北洪湖、赤壁（由蒲圻改名）、嘉鱼，以及武汉市的汉南、江夏、蔡甸、汉阳、武昌等区。今人从自然地理分区上通常把赤壁、嘉鱼划在江汉平原以外，本书亦是如此，但为了照顾江堤的完整性，这里也一并简述。

洪湖、赤壁江堤无考。

嘉鱼，宋代始建江堤，称“新堤”。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二

① 乾隆《华容县志》卷一《方輿志·洲》，光绪《华容县志》卷二《建置志·诸洲》。

② 光绪《华容县志》卷二《建置志·堤垸》。

③ 乾隆《岳州府志》卷一四《水利志·巴陵县》“旧江村堤”条。

《水利·武昌府·嘉鱼县》“新堤”条称：“新堤，在县北，地势卑下，其承上流若建瓴，不数年溢为渚泽。春水泛涨，与蒲圻、咸宁、江夏三邑均罹水患。宋政和间，知县唐均始集四邑之民筑之。靖康兵兴，堤坏。至乾道初，知县陈景去旧堤三百步，因两山距杨家潭上横亘为堤，是名新堤。”元代，皇庆元年（1312年）嘉鱼知县成宣再筑长堤，“一名成公堤，上自马鞍山，下至三角铺，捍护嘉鱼、蒲圻、咸宁、江夏四县近湖滨江田地，民受其惠”^①。明天顺、成化（1457—1487年）以来，长堤遭水啮圯坏，弘治五年（1492年）知县姜溥加以补筑，“其脚阔二丈，其高一丈余，堤左右栽柳，五尺一间，约有万株”。正德以后，长堤再次倒塌，“但遇川广二江水涨，近湖田地即被淹没，下受其灾”，正德十三年（1518年），都御史吴廷举予以修筑。^②吴廷举称：“嘉鱼长堤，自鱼山水驿起，至簪州下夹口止，延亘一百二十余里。”经嘉鱼、蒲圻、咸宁三县至江夏县五重湖、板桥、纸坊、龙泉铺、潘家桥等处，障护四县田庐。^③自万历二年（1574年）起，成公堤由江夏、蒲圻、咸宁、嘉鱼四县协筑。^④

明人熊廷弼曾作《嘉鱼蒲圻咸宁江夏长堤碑记》，说自己看到“嘉鱼老堤，自马鞍山至簪洲艾家墩，蜿蜒百里，古木苍苍”^⑤。在今天的湖北省嘉鱼县，从马鞍山到簪洲，有一条全长54.23公里的百里长渠^⑥，这条长渠的走向，当与宋元时的嘉鱼堤防相近。

新堤、长堤之外另有通江堤，“在县东北，自龙潭山至鱼山驿，高凡丈许，广半之，旁植以柳，知县姜溥所筑”^⑦，嘉靖三十

①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嘉鱼县》“长堤”条。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嘉鱼县》“长堤”条。

③ （明）吴廷举：《长堤奏略》（节文），见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文》。

④ 万历《湖广通志》卷三二《水利·武昌府·嘉鱼县》“成公堤”条。

⑤ 见雍正《湖广通志》卷一一三《艺文志·碑记》。

⑥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县概况》“嘉鱼县·水利”，1984年内部铅印本，第321页。

⑦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嘉鱼县》“通江堤”条。

二年（1553年），知县吴翰重筑。^①

清代，长堤所在河段的河势变化远比明代时大，堤防因此受到了严重冲击。清代，长堤所在河段的河势变化远比明代时大，堤防因此受到了严重冲击。雍正五年（1727年），长堤尽被洪水冲塌，朝廷曾拨给帑银三千余两重修，且“堤旁植柳”，加以维护。但雍正十二年（1734年），江岸再崩，遂改筑月堤一道，长八百丈，并将全堤加高五尺，宽五尺，使堤“坚厚结实，遂得稳固”。乾、嘉年间（1736—1820年），长堤屡修屡溃，这种状况延续至道光年间，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二年（1832年）、十三年（1833年）、二十一年（1841年）、二十八年（1848年），长堤五次大溃，堤“几乎废矣”。期间既有官民合力，如数任知县曾请帑加修，嘉鱼、咸宁、蒲圻、江夏四邑乡绅协助筹款，促成堤防的加修，亦有因经费问题而罢修数年的困境，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之后，“赖有岁修银两，每年修补，是以不至大坏”^②。

长堤自乾隆朝以后屡修屡决，修防难度增大，这与同期荆江堤防所面临的困境基本一致。

三、汉阳县、江夏县等

地处今江汉平原东部边缘的武汉市，宋时分属于鄂州和汉阳军，其中，鄂州治江夏（今武汉市武昌区），汉阳军治汉阳（今武汉市汉阳区），分别位于大江南、北。

汉阳军 军城地处长江北岸，与南岸鄂州城隔江相望，军城北面多残丘，南面濒大江。北宋时汉阳是否有御江之堤，尚无资料说明。南宋宁宗时，知汉阳军黄榦则明确说到“郡城之南，皆沿江堤岸，每岁修筑，率费二三千缗”^③，可见此时不仅有江堤，而且

①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二《水利·武昌府·嘉鱼县》“通江堤”条。

② 本段俱参同治《重修嘉鱼县志》卷一《封域志·堤》“长堤”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同治五年刻本。

③（宋）黄榦：《勉斋集》卷二八《汉阳申朝省筑城事》，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江堤对于维护军城安全十分重要，只是这些“沿江堤岸”始于何时不详。

军城以西不远处是沌水入长江之口“沌口”，沌口以西的堤防情况不详，上文提到南宋时沌水岸边已有堤防，据此，汉阳往西这一线很可能有堤，但规模有限。军城以东，江堤有所延伸。据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所见，在汉阳城东面的杨罗湫（今湖北新洲县阳逻港），“大堤高柳，居民稠众”^①，说明这里的堤防规模比较可观。

从汉阳军城至杨罗湫，河岸线不足30公里长，其中今武汉市江夏区境内有一段是海拔不足30米的湖沼区，包括今海拔仅16.5米的武湖烂泥洲，宋时期这一带人口分布的情况不详，江堤修治的情况亦不清楚。总的来看，南宋时的汉阳军与一江之隔的鄂州相比，地位比较低，其主要意义在于充当鄂州的军事外围，自身所拥有的人口、耕地都比较有限，据此似可推知，汉阳军城至杨罗湫之间可能有堤防，但规模不会大。

清代，汉阳县有一道长三十里、高一丈三尺余的江堤，名“拦江堤”，在县治西南，东至三里坡药王庙，西至沌口虾蟆矶。道光以前，“旧以江岸为堤，夏秋水涨，必资抢险，历年由邑人徐荫堂、胡直夫、易素恬、倪玉山等经理。嗣因火巷沟、拈花寺二处冲溃，道光戊申年，胡元募费重修完固。同治戊辰，邑令王庭楨以虾蟆矶低于堤，堤身易伤，复加石六层以护之，计高五尺有奇”^②。

江夏县 宋代为鄂州州治，当时已有江堤，《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称：“南湖在望泽门外，周二十里，旧名赤栏湖。外与江通，长堤为限，长街贯其中，四旁居民蚁附。”《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火灾》亦称：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十月，鄂州大火，燔民居万余家，江风暴作，结庐于堤、泊舰于岸者，焚溺无遗”。民户不仅聚集在长堤附近，而且在

① （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② 同治《续辑汉阳县志》卷七《堤防志》“江堤”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同治七年刻本。

堤上结庐居住，可见鄂州江堤规模不小。

江夏江堤始于何时？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诗类》“鹦鹉洲”条录五代王周的诗句，称：“岸生沙叠出江堤，大别山前夕照西。”据此五代时江夏县已有江堤。宋代鄂州江堤，根据明代方志记载，系宋徽宗政和（1111—1118年）间的鄂州知府陈邦光所筑。如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江夏》“长堤”条称：“在平湖门内。旧志云，政和年间，江水泛溢，漂损城垣，知州陈邦光、县令李基筑堤以障水患，至今赖之。”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二《水利·武昌府·江夏县》亦称：“在平湖门内，政和间江溢漂损城垣，知州陈邦光、县令李基筑以障水，至今赖之。”明代的江夏县城，西、南两面临江，平湖门是西偏南临江的一座城门。宋代御江的江夏长堤到明万历时已在城内，反映了河道的变化。民国《湖北通志》记载了这一变化，称：“如《雍正志》载长堤，宋政和间知鄂州陈邦光筑……此即今会垣内花堤……昔皆在城外，今则易为城市矣。”^①

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年），在鄂州城西南，长堤之外加筑了一道外堤，名曰“万金堤”。关于该堤的修筑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在高宗绍兴（1131—1161年）间，如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二《水利·武昌府·江夏县》称：“万金在县西南，昌堤（按：即长堤）之外，宋绍兴间役大军筑之，建压江亭。”《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六《湖广二·武昌府·江夏县》“鹦鹉洲”条，引旧《志》云：“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外有万金堤，宋政和、绍兴间所筑也，至今赖之。”一说认为是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年）的事，如《輿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万金堤”条称：“在城西南隅，长堤之外，绍熙间役大军筑之，仍建压江亭其上。”《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武昌府·山川》“万金堤”条亦采此说。“绍兴”与“绍熙”仅一字之差，但相隔数十年，两说哪一种较为正确？从《輿地纪胜》和《大明一统志》记载宋朝

^① 民国《湖北通志》卷三九《建置志一五·堤防一》“各县古堤”条，清宣统三年修，民国十年刻本。

史实比万历《湖广总志》、《读史方輿纪要》诸书较为原始，因而也往往较为准确来看，似应以绍熙说为是。同时，从陆游的《入蜀记》也可得知，乾道时的鄂州城还没有内、外两道堤防。乾道六年（1170年），从十月二十三日三十日，陆游曾在鄂州城停留一周，在他的《入蜀记》卷五中，曾两次提到鄂州的江堤：二十七日，“由江滨堤上还船，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盖”；二十九日，陆游从泊舟的鄂州税务亭“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楼阁重复，灯火歌呼，夜分乃已”。如果说此时江滨之堤以内还有一道护城堤的话，陆游是不可能那么清晰地从江中船上看到城内的情形的。绍熙以后，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年）鄂州地方官再度修治万金堤。《水心文集》卷一五《司农卿湖广总领詹公墓志铭》称，詹体仁在鄂州知州任内“与鄂州运司同筑武昌万金堤”。宋代鄂州为江夏郡、武昌军节度使，“武昌万金堤”亦即鄂州江夏万金堤。詹体仁于开禧元年（1205年）“移鄂州”^①，翌年卒于鄂州任上^②，可见其修堤是开禧元年至二年间（1205—1206年）的事。

明代，长堤与万金堤仍在继续发挥作用。此外，江夏县还于成化三年至成化九年（1467—1473年）历时六年修砌了沿江岸堤，“起竹籐门，至马坊闸，凡长八百六十七丈，高二丈六尺……自是江无沸腾，军民愿家于其地，商贾愿藏于其市，行旅愿出于其涂，无复遗憾矣”^③。

清初，原万金堤与长堤尚在，但均有变化。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三《水利志·江夏县》称，万金堤，“今大堤口是也”；

①（清）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卷下，嘉泰四年（1204年）条引《詹公碑》，中华书局校点本，第589页。

②（宋）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一五《司农卿湖广总领詹公墓志铭》，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86页。

③（明）黎淳：《修砌江岸碑记》，见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

长堤亦易名为“花堤”^①。在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尚有花堤街，位于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南，上起紫阳路，下至彭刘杨路，街名即因地当花堤故址而得。康熙年间（1662—1722年），江夏所称的“长堤”特指与嘉鱼共有、长达二百余里的御江大堤，由江夏、咸宁、蒲圻、嘉鱼四县协修，江夏县负责自赤矶山至嘉鱼夏田寺（又作“下田寺”）的堤段，约五千五百四十余丈。^②雍正六、七年（1728年、1729年），政府两次发帑改筑长堤，将堤从赤矶山延至金口，故长堤在江夏县的部分又称为“金口长堤”，或“部堤”。^③至此，“江水在旧堤北，港水在新堤南，不独周遭四十里，不受水患，而堤亦得保固，可省民力”^④。

自金口山后龙床矶以下，至城南金沙洲共六十里的区间，修筑了路堤，长约九千丈，“驿递铺舍、官使往来，实重赖焉”^⑤。

本章小结

堤防是本区经济开发的基本前提与保障。在各类河湖、城池堤防的修筑中，荆江堤防的难度最大，意义也最重要。荆江堤防开始较早，宋代有较显著的发展；明清两代是大发展时期。明代，沿江堤防已基本建成，并创立了“堤甲法”，提高了筑堤技术，采取沿堤砌石、增修月堤等措施加以防护，为日后以至今天荆江大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代，荆江堤防得到进一步的修护与加固，月堤与护岸工程明显多于明代，堤防对荆江两岸地区的保障日益增强。荆江堤防的发展是在荆江河道演变加剧、洪水过程日益增强的背景下

① 见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三《水利志·江夏县》“花堤”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康熙二十六年刻本；雍正《湖广通志》卷二〇《水利志·武昌府·江夏县》“花堤”条，等等。

② 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三《水利志·江夏县》“长堤”条。

③ 雍正《湖广通志》卷二〇《水利志·武昌府·江夏县》“部堤”条。

④ 《江夏县堤防考略》，见雍正《湖广通志》卷二〇《水利志·武昌府·江夏县》。

⑤ 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三《水利志·江夏县》“路堤”条。

取得的，来之不易。

随着荆江堤防的发展，江汉平原的开发步伐逐步加快。明清时期，本区人口增殖、农田扩展，经济迅速上升，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堤防的保护密不可分。尽管宋代以降荆江堤防的发展也对本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日渐增强的干扰，但作为本区以至整个长江流域生存与发展的首要选择和最重要屏障，堤防在历史上的功效有目共睹。今天以至未来，荆江河道的演变仍将继续，堤防建设作为本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仍是重中之重。

第三章

穴口演变与农田垦殖

江汉平原土地垦殖最主要的方式是垆田，它兴起于宋代，明清以后大盛，对本地区的开发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至今仍在当地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伴随着垆田的发展，荆江两岸的堤防不断扩展，河湖关系日益变化，而这一过程又与荆江分流穴口的开塞密切相联。本章集中考察宋元明清时期江汉平原以垆田为中心的农田垦殖与穴口开塞、河湖演变的历程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荆江分流穴口的演变

唐宋荆江统一河道形成以前，荆江两岸存在着众多分流水口，当地人称之为“穴口”。据《水经注》卷三四《江水篇》，江水自枝江县而下至岳州，沿岸有沮口、曾口、马牧口、豫章口、涌口、油口、景口、沦口、高口、故市口、子夏口、侯台水口、龙穴水口、俞口、清阳口、土坞口、饭筐上口、清水口、生江口、饭筐下口、湘江口等分流江水。^① 每

^① 见（北魏）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校点本，第796～802页。

一个穴口，都是长江分泄洪水以削洪峰的一条汉流。万历《湖广通志》卷三三《水利二·开穴口总考略》称：“穴口所以分大江之流，必下流有所注之壑，中流有所以之道，然后上流可以分江澜而杀其势……江水分流于穴口，穴口注流于湖泊……此古穴所以并开者，势也。”直到元初，荆江尚有“九穴十三口”^①之说。明中叶以后，伴随着沿江堤防的大规模修筑，荆江两岸的穴口逐渐消失，万历（1573—1620年）以后，北岸硕果仅存的郝穴最终湮塞，南岸仅剩虎渡（又名太平口）、调弦二口。至清代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洪水冲开旧有的松滋口及藕池口，遂形成南岸虎渡、调弦、藕池、松滋四口，四口以下分流河道分别为虎渡河、调弦河（又名“华容河”）、藕池河和松滋河（参见图3-1《清代荆江南岸四口分流示意图》^②）。自此以后，北岸是连成一线的荆江大堤严密防护，南岸则自西向东有松滋河、虎渡河、藕池河、华容河^③分流江水，成为荆江两岸的独特景观。

在荆江地区垸田开发和江湖关系的演变历程中，分流诸口是极重要的影响因素，本节试以宋至晚清的志书为主要资料，对荆江穴口分流与湮塞的历史变迁加以考察，厘清以往的相关歧见，以便更正确、客观地理解今人地关系、江湖关系的格局及其走向，为制定

① “九穴十三口”之说，初见於元代王廷端的《石首重开古穴记》，载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但王廷端仅称“古有‘九穴十三口’，沿江之南北，以导荆水之流”，未提及“九穴十三口”之名。其文可见，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重开六古穴之名，分别为江陵郝穴、监利赤剥、石首杨林、宋穴、调弦、小岳。“九穴十三口”所指说法不一，如明末雷思霁《荆州方輿书》（载康熙《荆州府志》卷三六《艺文志》）将江陵郝穴、獐捕，松滋采穴，监利赤剥，石首杨林、调弦、小岳、宋穴，潜江里社穴，以及虎渡、油河、柳子、罗堰四口，合称为“九穴十三口”。又如清代倪文蔚《荆州万城堤志》卷二《水道》引旧说称：北岸江陵有便河口、獐卜穴、潭子湖口、郝穴、拖茅口、蓝穴、石碑穴，监利有新河口、黄穴、赤剥口、庞公渡口，北岸共五穴六口；南岸松滋有新穴、西溶口，江陵有虎渡口、东溶口，公安有油河口、三穴、东壁口、芭芒口，石首有杨林穴、宋穴、调弦口，南岸共四穴七口。

② 据本节参引诸资料综合绘制。

③ 1958年调弦口设关，华容河断流，遂余松滋、虎渡、藕池三口分流。

适宜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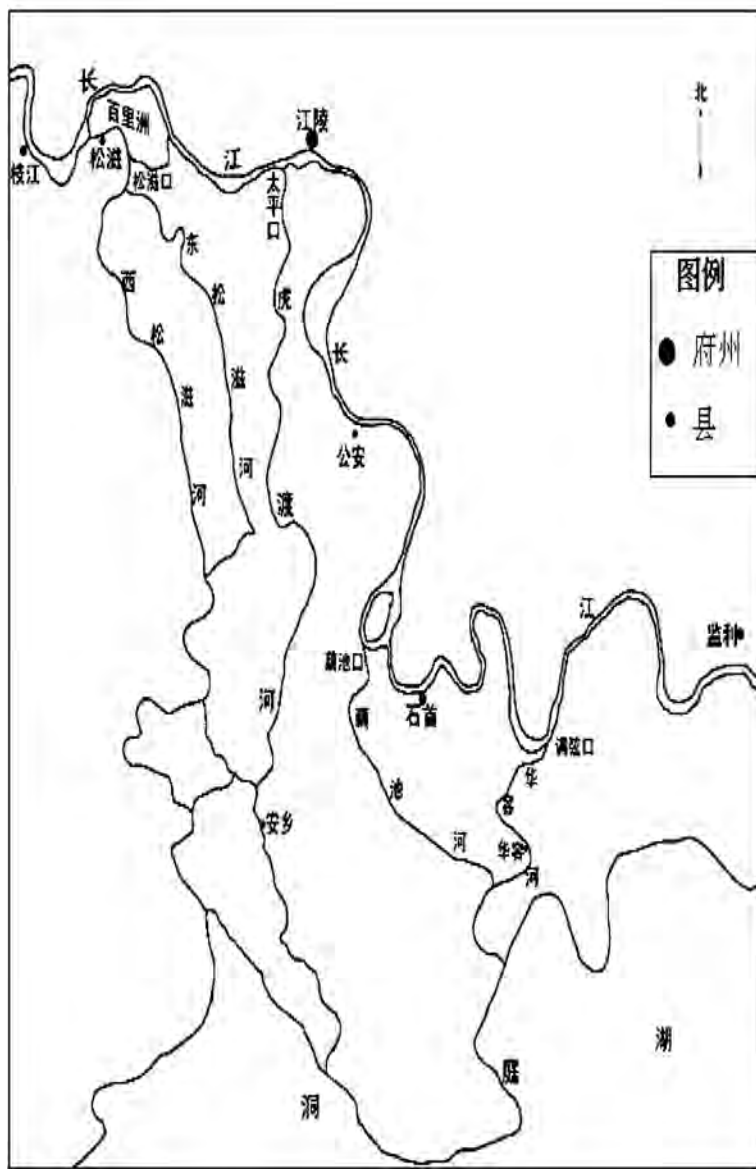


图 3-1 清代荆江南岸四口分流示意图

一、南岸分流四口开塞考

（一）虎渡口

作为荆江南岸的主要分流河道之一,虎渡河形成于何时,今人说法不一,一说“后汉时即已存在”^①;一说形成于南宋乾道初年^②。

据南宋《舆地纪胜》,“虎渡”之得名,与后汉法雄有关。是书卷六四《荆湖北路·江陵府·景物(下)》“虎渡里”条称:“人传后汉法雄为郡太守,先是猛兽为害,雄令毁去陷阱,政以恩惠,虎暴逐去。”《大明一统志》沿用是说。^③今人有关虎渡“后汉时即已存在”的看法,当源自于此。

但是,有关虎渡河分流的确切记载,始见于北宋中期。宋仁宗时荆州公安县人张景的诗句描写当地景观:“两岸绿杨遮虎渡,一番青草覆龙洲。”^④这是北宋中叶虎渡河分流江水的确凿证据。此后,虎渡或开或塞,几番变化。《舆地纪胜》卷六四《荆湖北路·江陵府·景物(下)》“虎渡堤”条记:“虎渡堤,在大江之南岸。乾道四年,寸金堤决,水啮城不退。帅方滋夜使人决虎渡堤,以杀水势。”可见,虎渡河在乾道四年(1168年)以前已塞,不能分流江水。方滋决堤后不久,虎渡口又再次筑堤。《玉海》卷二二:“(乾道)七年十月十七日,湖北漕臣李焘请修江陵、潜江县里社、虎渡二堤。诏明年修筑。”^⑤此后到明朝,虎渡口偶有湮塞,但以开为主,至明代后期未有大变。

宋明时期的虎渡口门宽度有限,南宋人有关记载即可见此,如范成大记其自桂林经安乡进入公安县(均今同名县市)时,在虎

① 参见前揭《荆江大堤志》第一章“荆江”第三节“汇流与分流”,第37页。

② 参见前揭《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第七章“各历史时期的荆江变迁”第三节“历史时期荆江河道的塑造过程”,第114页。

③ 《大明一统志》卷六二《荆州府·山川》“虎渡”条。

④ 《方輿胜览》卷二七《湖北路·江陵府·题咏》,第488页。

⑤ (宋)王应麟:《玉海》卷二二《地理·河渠》“乾道江陵二堤”条,大化书局合璧本。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及《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八等略同。

渡河下游的孙黄渡“舍舟从陆”，“登陆至公安，渡江过沙头”^①。可见虎渡河水量较小，不便行舟。明代虎渡河的情况，可从万历《湖广总志》中略见。据是书，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荆州府多处河堤遭洪水毁坏，虎渡堤是其中“冲塌深广、最难为力”者之一，此后数年间，“每岁有司随筑随决，讫无成功”^②。明代特别用心修护，一方面保持穴口分流；另一方面尽力维护口门一带堤防的稳定，并在“虎渡口两旁皆砌以石，口仅丈许，故江流之入甚细”^③，防止分流过大损害下游，收到成效，史称：“荆州虎渡穴口之堤，先年愈退愈决，而近日直逼江口，以遏水冲，乃得无恙。”^④

明末清初，虎渡口门的石矶折毁，口门被大水冲至“数十丈”宽，“狂澜奔溜”，造成三穴桥坍塌、黄金支河淤塞。^⑤

虎渡分流颇受来水与来沙量变化的影响，来水量大，分流量就大，同时带来的泥沙也更多，久之便导致口门及河道的淤塞。道光二十年（1840年）虎渡因“近年浅涸”，终致溃决，口门改道于距故道东三里的易家湾。^⑥

（二）调弦口

调弦口在石首县东六十里^⑦，江水自调弦口分流，经石首境进入湖南华容县，由华容县城北一里至县南三十里之县港口入洞庭湖，称为华容河。^⑧

在荆江南岸分流四口中，调弦口的分塞情况较为复杂。

①（宋）范成大：《范石湖集·诗集》卷一五《孙黄渡》，第202页。

②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荆州府堤考略》。

③ 雍正《湖广通志》卷九《山川志·荆州府·公安县》“虎渡口支河”条。

④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修筑堤防总考略》。

⑤ 同治《公安县志》卷三《民政·堤防》“虎渡口支河”条。

⑥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九《堤防志三·顺江堤·江陵县》“虎渡口西支堤”条。

⑦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石首》“调弦口”条。

⑧ 乾隆《华容县志》卷一《方輿志·山川》“华容河”条，弘治《岳州府志》卷六《华容县·山川志》“县港口”条。

前引元人王廷端《石首重开古穴记》保存了元前期调弦口开浚的较完整资料：

萨德弥实以忠翊授石首县达鲁花赤，大德七年五月视篆。六月，堤决县东之陈瓮港。急筑内之开口，再筑黄金、白杨之两堤。邻境岌岌，又增筑内垸之新兴堤。方完，公安竹林港大溃，新兴无恙，保全数村。自是究心于堤。明年之上司合数郡大兴工役。不再岁，陈瓮再决，波及数邑，民堕流亡，官费赈给，皆堤祸之。九年八月，偕尹、王承事询其利病。皆曰：“开穴为便，塞穴为不便。”遂定不筑陈瓮港之请。是岁，上司体覆方如所乞。十年，夏潦，独陈瓮导下流之浸，注之洞庭，而无常岁冲溃之患，农田稍收。乃大合士民讲究之词，力陈古穴必合疏导之利，以告于府……遂下今闻六穴之令。郝穴则江陵，赤剥则监利，石首则杨林、宋穴、调弦、小岳与焉。元年秋，大熟。

调弦等六口既称“古穴”，则其由来已久，且此前早已堵塞。

调弦口究竟塞于何时？史无明载。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开浚后也并未一直保持通流。据万历《湖广总志》，明朝以来，元大德所开六口“复湮其五”^①，“今只存郝穴，而他皆不可识焉”^②。隆庆年间（1567—1572年），调弦口复被开浚^③，但为时不久，至迟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之前，又再度被筑堤堵塞。^④

清初，在调弦口的开塞问题上曾有过争论。据雍正《湖广通志》卷九七《水利论》：“至于调弦开塞之议，虽靡成说，以势观之，塞固涨而西，开亦漫而东，今开者几百载，即欲塞之，莫能

①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川江堤防考略》。

②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开穴口总考略》。

③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江防考》。

④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附开复荆承二府属穴口疏》。并参见乾隆《华容县志》卷三《水防》。

也。”事实上，在清代的多数时间里，调弦口都保持着分流。

元代至明隆庆年间调弦口的开塞不定，反映出此时期荆江水位时涨时落，总体上水位不高，石首县东南一带诸湖之水可以通过县南与县西的河流分入洞庭。据载，隆庆年间调弦口开浚时，首要任务并非分流江水，而是“泄湖水之溢者，十居其七；可以杀江水之怒者，十居其三”^①。当时的荆江水位与石首县以南诸湖水位相比，后者反倒更具威胁，这与元大德年间为分泄江流而开浚穴口的情形相比，有较大差别。至清代以后，随着荆江水位的日渐升高，曾屡塞屡开的穴口经常保持开浚状况，正说明“古今时势不同，江流迁徙靡常，穴口之开断难议复，故今之言水利者，必以堤防为首重焉”^②。

调弦口的分流给石首县与华容县的防洪与农田垦辟带来了诸多困扰，但也促进了两县水利工程的发展。

以华容县为例，早在北宋至和年间（1054—1056年），华容知县黄照就沿华容河之滨修筑了黄封堤。^③明初，为抵御华容河与洞庭湖的双重水患，华容河两岸又修筑了县堤、黄公堤等四十六处垸堤。^④弘治以后，堤垸增至五十二处。^⑤隆庆时，进一步增加到六十八处，并逐渐向华容河东岸及县治东南一带延伸，向洞庭湖区靠近。^⑥不断增多的垸堤给华容县带来很大变化。隆庆《岳州府志》卷一二《水利考·华容县》称：“嘉靖末年，垸或少委。修饬无方，臻至大毁……昔者垫溺，揭妻子逃。今来故土，田园其饶。田园人辟，户口人增。官逋以足，国赋以盈。”可惜，“讵知辛未，

① 《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一《石首县水利堤防记》。

② 《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一《石首县水利堤防记》。

③ 隆庆《岳州府志》卷一二《水利考·华容县》。

④ 弘治《岳州府志》卷六《华容县·津梁志》“院堤”条。又，万历《华容县志》卷三《水坊》所录华容人孙羽侯之碑记称：“成祖十年，邑人以水决四十六垸，请命发旁郡邑民修之。”则此四十六垸筑于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之前。

⑤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七《岳州府·山川·华容》。

⑥ 隆庆《岳州府志》卷一二《水利考·华容县》。

洪流再扬，诸院尽坏，不辨疆场”。辛未即隆庆五年（1571年），当时的“洪流”正来自调弦口分流。

至清代后期，华容河两岸的垸堤皆深受调弦口分流及其挟带泥沙的影响，而垸堤的不断修筑又导致分流不畅，使湖区饱受渍涝之苦。光绪《华容县志》称：“邑东北滨江，南滨湖，江水浊多淤，湖水清无淤。因涨淤而堙塞，因堙塞而沈塌。附郭诸垸，动辄受渍，外成高岸，湖皆为田，内如釜底，田皆为湖。徙宅耶？田不能徙；弃田耶？粮不能弃。水无出路，遂至逆行……”^①

总之，调弦口的分流作用随着荆江与洞庭湖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直至1958年调关设置、华容河断流后，调弦口分流的影响才逐渐消失。

（三）藕池口

藕池堤在石首县西南十里，素为堤防要害。^②清咸丰二年（1852年），马林工溃决不筑，终致藕池口“成入湖孔道”^③，这是藕池河形成的明确记载。

但据宋人资料，北宋之前已有藕池口。北宋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紫港湖”条云：“紫港湖，在县西，今曰私港。夏秋水涨，与赤沙湖会，北通于江，今曰藕池。”五代人王周曾有《藕池阻风寄同行抚牧裘驾》诗，称：“船檣相望荆江中，岸芦汀树烟濛濛。路间堤缺水如箭，未知何日生南风。”^④诗句可见，诗人“阻风”停泊的藕池，正可望见分水口，藕池口在五代时应已存在。

北宋以后，藕池口堵塞，其具体时间不详。据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之“藕池堤”条：“明嘉靖四十五年江决于此，亦堤防要口。”藕池口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以前已经堵塞。

① 光绪《华容县志》卷一《地理志·水道变迁纪略》。

②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藕池堤”条。

③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九《堤防志三·顺江堤·石首县》“藕池堤”条。

④ 《全唐诗》卷七六五，第8680页。

清人视藕池堤为江防要害。道光以后，随着荆江水位的逐渐升高，藕池堤面临更大的压力。道光十年（1830年），藕池堤坍塌十余丈，事后虽修筑月堤加固亦无济于事，终于咸丰二年（1852年）堤溃不筑，形成藕池河。此后，江水由藕池直入湖南华容县境。^①

藕池河的形成对洞庭湖地区的水系演变影响巨大。如在华容县西北地区，藕池来水“汹涌澎湃，一泻千里，无垠不当冲，无冲不成河，无河不分支。自老山嘴经陈碧桥，其间若上三汊河、下三汊河，支则分而又分，派则别而又别，或外绕邑西北诸垸而过，或内冲邑西北诸垸而过”^②。不仅如此，藕池口分流带来的大量泥沙还加剧了洞庭湖的演变，使湖泊的淤浅过程变快。

（四）松滋口

松滋河形成的时间，今人或以为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光绪《荆州府志》卷一九所记是年松滋县黄家埠溃堤之事可证此说：“同治癸酉，黄家埠堤筑而复溃。自采穴以上，夺溜南趋，愈刷愈宽，至今未能堵塞。”^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成书于同治八年（1869年）的《松滋县志》之《松滋县全图》有这样一段附识：

黄家埠溃口以来，东南一带成为泽国，后渐淤高，水道纷歧，沿岸置堤，遇水堵塞，建筑繁多，不及备载。

可见，黄家埠溃堤的时间与县志成书的时间相当接近，以至于县志还来不及正式记载溃堤带来的各种变化。正是同治八年的这幅《松滋县全图》，清晰地描绘出江水由黄家铺口（即黄家埠）分流为东、西两支，至公安汇合，下注湖南。图中虽未标注河名，但对照今图，其河道、分支与流向皆与今松滋河相同。换言之，松滋河

①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列口”条，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长河”、“大江”条。

② 光绪《华容县志》卷一《地理志·水道变迁纪略》。

③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九《堤防志三·顺江堤·松滋县》。

在同治八年（1869年）县志成书前已经形成。

黄家埠的决堤以及松滋河的形成并非偶然。据《松滋县全图》，黄家埠口与枝江县最大的江心洲百里洲相对，其上游有庞家湾、朱市，下游有灵钟寺（即皇木坑旧口）、采穴。采穴在明代已经堙塞，清代以来，灵钟寺、朱市、庞家湾诸堤时有溃决。据同治《松滋县志》卷四，顺治十年（1653年）皇木坑堤溃，“较明嘉靖、万历倍甚，决口且数十丈”；康熙二年（1663年）皇木坑堤以西再决，“崩溃较甚”；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朱市堤溃。道光以后，决口频率增加，道光十年（1830年）朱市堤溃，道光二十年（1840年）庞家湾堤溃；咸丰十年（1860年）与朱市水道密切相关的高石碑堤溃，更使得“长堤百里，俱岌岌不可终日”^①，终致“朱市水道塞矣”^②。清初以来黄家埠上、下游堤防的频频溃决，反映出此时期荆江来水的迅猛及对该河段的冲刷剧烈。

道光十年（1830年），自古存在的“外江内沱”、“南江北沱”^③的形势发生变化，“洪流徙行内江，而沱胜于江矣”，成为“数千余年江流一大变局”。^④同时，百里洲以南河道中较多洲滩的存在^⑤，改变了水流的方向，为后来堤防的不断溃决埋下隐患。康熙《松滋县志》即言：“七里庙濒河一带，正当淝洋洲、冯口两河交射之冲，年年老堤崩洗，所筑月堤年年加修，民以无患。浣市老堤崩洗，深入堤里，每当夏秋，凡堤上居民，势若乘桴。是以月堤之修，逐岁最为急务。”^⑥加上上游朱市水道的堵塞，更加速了黄家埠的决口。

① 同治《松滋县志》卷四《水利志·堤工》。

② 同治《松滋县志》卷四《水利志·附论》。

③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山南东道五·荆州·枝江县》“百里洲”条记：“洲首派别，南为外江，北为内江。”道光十年（1830年）以前，百里洲所在荆江河道为“南江北沱”之势。

④ 同治《枝江县志》卷二《地理志中·山川》“大江”条。

⑤ 关于宋代以降荆江河道的洲滩状况，参见前揭陈曦《宋元明清时期荆江洲滩的变化及其对河道的影响》。

⑥ 康熙《松滋县志》卷六《水利·支水堤》。

松滋河形成后，松滋县东南一带逐渐淤高，如县东二十里的大桥河，数十里河道很快就“尽沙淤”^①；县东南四十里的清幽溪，原与湖南澧州北上之水相汇后支分为二，一从虎渡口，一径孙黄渡入江^②，松滋河形成后，阻断了南水北上的线路，使其被迫改道。松滋县特别是其东南地区，受到极大影响。

综上所述，入宋以后，荆江南岸的古穴口多已湮塞，四口分流局面逐渐形成。虎渡口自南宋以后逐渐稳定分流；调弦口自元代大德年间开浚后时开时塞，约从明朝末年起持续分流，至1958年调关设置；藕池口出现较早，但与调弦口相似，开、塞多变，清时期成为堤防要口；松滋河于清代形成。四口分流客观上疏通了荆江南岸的水系脉络，但也带来了大量的泥沙，造成洞庭湖的剧烈演变，极大地改变了荆江南岸水系的格局，并对洞庭湖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随着调弦口设闸断流与三峡工程的运行，松滋、虎渡、藕池三口口门附近逐渐淤积，三口分流分沙量减少，多方面的变化，使江湖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

荆南四口的变迁，受上游来水来沙的变化的直接影响，也与始自早更新世晚期、至今仍在发生作用的自北向南的桐柏—大别山掀斜隆升运动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构造运动推动着长江主河道的不断南移。^③

二、北岸穴口的湮塞：以郝穴为中心

郝穴在江陵县东南一百二十里^④，是荆江北岸最重要的分流穴口。据前引《石首重开古穴记》，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曾开浚郝穴，至明朝前中期，郝穴基本保持着通流。明朝地方官数次加以修治，成化间（1465—1487年）“知府李文仪重修，后圯”，

① 同治《松滋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大桥河”条。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松滋》，康熙《松滋县志》卷三《山水志》“清幽溪”条。

③ 参见前揭李长安《桐柏—大别山掀斜隆升对长江中游环境的影响》。

④ 万历《湖广总志》卷四《方輿志·荆州府·江陵县》“郝穴”条。

正德间（1506—1521年）布政使周季凤又筑郝穴堤，“长四百五十丈”^①。明人称：“迨我国朝，六穴复湮其五”^②，这硕果仅存、未被“复湮”的穴口即是郝穴。

明代后期，郝穴几度开塞。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后曾有“筑塞郝穴口”之举^③，不久后被疏浚；隆庆年间（1567—1572年），郝穴口浚而复塞^④；万历时期（1573—1620年），郝穴再度通浚。万历《湖广总志》同卷《水利二·开穴口总考略》云：

近年郝穴筑塞其口，今岁议开旧口，必先将枝堤修筑就绪，然后开水门以受江流，方无东西泛滥之患……元大德间曾开六穴，郝穴、赤剥、杨林、采穴、调弦、卜（小）岳之故道并开矣，今只存郝穴，而他皆不可识焉。

郝穴在万历时期被开浚通流的情形，在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川江总会堤图》中清晰可见，成书稍晚的万历《承天府志》所记也可证之：“江水自郝穴口溢入，东北径三湖、芝江湖，至（潜江）县南二里为马市潭。”^⑤可是，万历时期郝穴的通流似未持久，而且这似乎是郝穴的最后一次通流。成书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荆州府志》卷八已称郝穴为“久塞”之旧穴。

郝穴的屡开屡塞，反映出明中叶以后江陵县以至荆北平原所面临的农田开发与水患增加之间的矛盾。明后期最终选择了筑堤塞

①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荆州府·江陵县》“新开堤”条。

②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川江堤防考略》。

③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江陵县堤考略》。

④ 关于郝穴在隆庆间的开塞，光绪府志与县志的记载有所不同。光绪《荆州府志》卷三《地理志三》只记隆庆中复浚郝穴；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三《方輿》记“隆庆二年塞”，卷八《建置五》称：“隆庆中议开浚，后仍闭塞。”据此，郝穴在隆庆年间因塞而浚，浚后又塞。

⑤ 万历《承天府志》卷四《山川》“潜水”条，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影印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三十年刻本。

穴，正与宋代筑堤开发湖区的做法一脉相承。

郝穴之筑塞以及相邻堤防的修筑，为江陵东南地区农田的拓展提供了保障，但也造成了该地区“诸湖渚又多浅淤”^①，河湖关系悄然变化。

随着明中叶以后荆江北岸的穴口尽数湮塞，北岸低洼地带的蓄泄关系失调，水域面积逐渐扩大，约在清中期达到鼎盛状态。^②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的记载相比，清代志书所记录的江陵县湖泊数量明显增多。据记载，明末清初江陵城东地区已分布着长湖、三湖、红马湖、白鹭湖等大型湖泊^③，乾隆时城东又有豉湖、沱湖、中湖、上党湖、谷湖、五谷湖、潘泊湖等小湖^④，这些小湖通过各支河、水口与大湖相连，或进入潜江，或流入监利，同时它们还不断接纳荆门、潜江的分流，充盈相激。乾隆时，今“四湖”水系在江陵县境的主体部分已经形成。此后，有的湖泊面积逐渐缩小，而新的湖泊仍在形成。光绪时期的方志就记录了郝穴以东和以南地区新增的一些湖泊，如大军湖、李白湖、孟家湖、永丰湖、台湖和玉藻湖等，这些湖泊仅出现在光绪时期的方志中^⑤，当形成于清中后期。

第二节 江汉平原垸田的兴起与发展

垸田是江汉平原人类垦殖活动最主要的手段与结果。宋元时期垸田在本区兴起，并日益成为本区最主要的经济形态。学术界有关

①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江陵县堤考略》。

② 参见前揭《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五章“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建设的时空特征及其制约因素”，第383~387页。

③ 顺治《江陵志余·志水泉》。

④ 乾隆《江陵县志》卷三《方輿·山川》。

⑤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三《方輿·山川》，光绪《荆州府志》卷三《地理志三·江陵县》。

江汉平原垸田经济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①，本研究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以志书为主体的文献资料出发，集中考察宋元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垸田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探讨其与本区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及其主要特点与规律，希望借此为今天和未来本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某些历史的借鉴。

一、垸田的兴起

垸田的兴起与江汉平原的自然环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当地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垸田的兴起，首先取决于江汉平原湖区的地理条件。江汉平原自古即是湖沼泽国，长江自西向东、汉水由北而南在此汇聚，平原上还有长江、汉水的若干支流。众多河流挟带大量泥沙，在此不断沉降聚集，形成大小不等的陆上三角洲。日积月累，这些陆上三角洲不断合并，形成典型的内河冲积平原。年复一年的河水泛滥，泥沙淤积，使得河流两岸形成较高亢的地势，其间较低洼的地方则淤积成田，这里自然肥力高，土质疏松，质地较轻，易于耕作。^② 古人对此深有体会：“每当溪涨，迅发两岸，浊流淤积即为粪田，一次禾稼倍收。”^③ 然而，湖区地势低洼，常被水患，要在江汉平原进行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非筑堤围垸不可。

同时，中唐以来本区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促成了垸田这种新的开垦方式出现。中唐以降至元代，江汉平原的人口呈逐渐上升趋势，尽管由于受到唐末战乱、宋金交兵、宋蒙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人口上升的进程曲折、迂回，其间还有过下降与反复，但总的

① 从石泉、张国雄《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到张国雄《清代江汉平原的水旱灾害与垸田生产》（载《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再到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垸田农业经济特性分析》（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以江汉平原垸田经济为主题的研究论著较多，此不赘举。

② 本书编写组：《湖北农业地理》第一章“自然条件与农业资源”第三节“土地资源和土壤资源”，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③ 同治《松滋县志》卷四《水利志·堰埝》。

趋势仍然是向上发展的，特别是北宋中叶和南宋孝宗朝以后，人口增长较快。本区人口的增长，一部分由于自然增殖，一部分得自外来人口的移入。本区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三个方向：北方中原、西部川蜀和东面江西，如安史之乱、北宋末年的中原战争导致了大量北方人口的南下，五代、两宋和元代有众多来自江西的开发性移民。人口的增长必然带来对土地需求的增长，同时也为农田垦辟、堤防修建提供了必需的劳力，因此，北宋中叶和南宋孝宗朝以后成为宋代本区经济上升最快的时期。此外，南宋时期，由于对金以及以后对蒙战争的需要，江汉平原的政治、军事地位凸显，鄂州为荆湖北路转运司治，并驻有重兵。军粮的需求推动了屯田的开展，驻军成为屯垦的重要力量。

作为一种新型水利田，“垸田是两湖平原河湖交错的水乡地区一种四周以堤防环绕、具备排灌工程设施的高产水利田。垸堤、涵闸、渠系是判别本地区垸田的必备的条件”^①。垸田最主要的特征是筑堤挡水，具体围垦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原有熟耕地转垸挡水，如荆州“民间于田亩周围筑堤以御水患，其名曰垸”^②；另一种是筑堤围湖，涸水为田^③，这种垸田的形成时间长，其间有一个慢慢熟化土壤的过程，因此“竭湖水造田，未成垸者始则业藕，久乃成田，在在有之”^④。南宋时期，对江汉平原的垸田来说，这两种方式皆有，以后者而论，最明显的例子是江陵“三海”。

自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开始，江陵府数位知府刘甲、吴猎、赵方等先后在城外筑上、中、下“三海”以御敌军。^⑤“三海”本是蓄水御敌的军事工程，但其所覆盖的广大区域因长期处于积水之中，表层有机质大量积累，逐渐形成养分较高的

① 参见前揭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四章“垸田的开发”，第91页。

②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〇《堤防志四·院堤》。

③ 参见前揭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98~100页。

④ 《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二。

⑤ 参见《宋史》卷三九七《吴猎传》、《刘甲传》，卷四〇三《赵方传》等。

可耕土壤。于是，在战事趋缓以后，这一地区自然成为人们的耕作目标。嘉定三年（1210年），荆襄制置使刘光祖请求“复上、中海，以限戎马。下海非敌冲，则以为陂田七千顷，收其租实边，有警复潴水为海”^①。刘光祖的请求得到批准。“下海”废为田后，“不惟官耕以为田，又有从民户所请，佃之以为田。初佃之时，租数少而田亩多，人情竞于得田，于是厚赂在官者。既佃之后，田亩多，岁租少，人情又竞于得田，于是复以赂在官者。今官、民户遂占护此田以为己有”^②。“三海”的决废有力促进了本区土地垦殖的扩展。但是，嘉定间的废海为田并没有持久，淳祐五年（1245年）孟珙守江陵，为抵御蒙古，下令废田还湖，“乃修复内隘十有一，别作十隘于外”，又障沮、漳之水“东流，俾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匿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③，“三海”再次成为江陵天险。

江汉平原垸田的真正兴起，在南宋末年孟珙为江陵守将时期。^④

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为防御蒙古的需要，荆襄地区驻扎了大批军队，亟待解决军粮问题，孟珙受命先后以京西湖北路安抚副使、制置副使、制置使等知江陵府，又以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在荆襄一带主持屯田事务。孟珙屯田，用力颇多，《宋史》卷四一二本传称：“珙大兴屯田，调夫筑堰，募农给种，首秭

①（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三《刘阁学墓志铭》，明崇祯十一年重修万历二十六年景贤堂刻本。

②（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二八《奏措置江陵府三海八柜》，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

④ 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主要有西晋说、明代说等。业师石泉先生等曾详细考证垸田何时出现于江汉平原，指出南宋末年孟珙在江汉平原的长江沿线大兴堤防和大规模屯田，反映出至迟不晚于13世纪中期的南宋端平、嘉熙年间（1234—1240年），江汉平原兴起了垸田，其标志是长江穴口的堵塞。参见前揭石泉、张国雄《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笔者赞同业师等提出的观点，即认为江汉平原垸田始于南宋末年孟珙屯田。

归，尾汉口，为屯二十，为庄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① 为兴办屯田，孟珙主持修筑了多处堤防，仅在公安县治就修筑了赵公堤、斗湖堤、油河堤、横堤和仓堤等。^② 这些由堤防护卫的农田，显然多为垸田。实际上，“要开发利用像江陵城北那样的湖沼地区，非垸田这种水利田不行”^③。南宋末年孟珙的“荆南留屯”，成为江汉平原垸田兴起的开端，此后，长江沿线堤防大兴，大规模屯田出现。

南宋末年垸田的兴起，反映了江汉平原对湖区的开发逐渐加深，标志着自唐代以来江汉平原土地利用方式的实质进步。由此，江汉平原的地理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二、垸田的发展

以下按照从北到南、由西向东的区域排列，依次考察南宋至清代江汉平原垸田的发展。

（一）江陵县

江汉平原垸田最早兴起于江陵，已如前述。入元以后，南宋末年留存的大范围屯田旧址得到有效利用。至元十二年（1275年），廉希宪入江陵，见“江陵城外蓄水捍御，希宪命决之，得良田数万亩，以为贫民之业”^④。元人“经理荆湖屯田废地，岁可出粟百余万”^⑤。

虽然元代留存的相关资料较少，但通过江汉平原其他地区的少量记载可管窥元代江陵农田垦殖的扩展情况，如平原腹地、地势低洼的沔阳府，元时“号称陆海”，元朝廷曾一次赐田八千亩作为公

① 《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

② 参见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公安》。

③ 参见前揭《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四章“垸田的开发”，第94页。

④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⑤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八《梁国何文正公神道碑》，湖北先正遗书本。

田^①，可见该地区垦田之广。再如德安府，至元十八年（1281年）成立了屯田万户府，分置十屯，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参与屯田的百姓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士兵五千九百六十五名，垦田达八千八百七十九顷九十六亩。^②如此大规模屯垦，正是宋末以来垸田逐渐发展的结果。

明代以后，受堤防体系形成的影响，江汉湖群有了明显发育与扩张^③，江湖之间的地区成为围垸开垦的主要目标。尽管有关明代荆江两岸垸田的资料较为疏略，但从中可以看到，至迟自明中叶开始，本区垸田开发有了一定规模，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开穴口总考略》即称：“今日生齿渐盛，耕牧渐繁，湖渚渐平，枝河渐湮，穴口故道皆为廛舍畎亩。”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则云：“荆州自嘉靖来数十余年，水患无岁无之，一遭冲决，则湖河淤浅，水道闭塞，垸塍倒塌，田亩莱芜，民内顾则虞赋，外顾则虞力……”至康熙初年，“水道之趋塞，岁易月迁，与景淳所见之时不侔，非大者江堤、小者垸堤，多方捍蔽之，则国赋民生皆无所赖”^④。

就江陵县的围垸筑堤而言，防范汉水决堤的冲击与荆江水患的威胁同等重要。汉水分流对江陵县的影响自古存在，明嘉靖以后这种影响更为显著。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沙洋堤溃决后，水灾殆无虚岁。^⑤清代，随着农田的不断开垦，汉水分流的影响非常突出：“汉水自圻口入江陵界，西灌草市，南径白鹭湖，枝分流曲。两岸设堤以御，稍或不坚，厥害甚巨。”^⑥因而，至迟在乾隆前期，

①（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二《元故奉元路总管致仕工部尚书韩公神道碑铭》，中华书局1997年校点本，第184页。

②《元史》卷一〇〇《兵三》。

③参见前揭《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五章“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建设的时空特征及其制约因素”，第383~387页。

④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按：景淳即杨景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任荆州教授，升国子监博士时，荆州守涂嘉会、江陵令孔贞一聘与雷思霈修葺《郡志》，见雍正《湖广通志》卷四四《名宦志·荆州府》“杨景淳”条。

⑤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

⑥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江防》。

不仅“荆门、潜江、江陵交界处的西荆河下游各分支入借粮湖、长湖之处均已筑起堤垸”^①，在汉水分流进入江陵县的沿线地区也逐渐修筑了堤垸。据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自江陵城东草市沙桥门起，至陈子头止，筑有襄河堤。是堤在乾隆七年（1742年）山、襄二水并发时曾为水所漫，次年将堤身加高一尺余；乾隆二十年（1755年），“于单薄危险处各加撑帮，又加高二尺，面宽一丈五尺，至次年四月毕工”。关沮口、诸倪冈二处的堤防亦防山、襄二水，乾隆二十年（1755年）时曾为山、襄水冲决，后堵筑加高。另有龚家垸等十六垸与襄河堤接连，长四十余里，“历系垸民自修”，乾隆二十年（1755年）龚家、广谷、穆家先后漫决，同年十二月复筑，次年四月竣工。

沙桥门在城东三里；关沮口在城东北十七里，长湖水自龙口径太白湖至此，达于草沙二市；诸倪冈在城东三十里。^② 据此，乾隆前期已筑有襄河堤、关沮口堤、诸倪冈堤、龚家等十六垸堤，在较大范围内有效防御了由潜江入境直抵江陵城东的汉水分流以及长湖、海子湖等水。

乾隆时，在江陵县东南的襄河堤两岸，已筑有“大小百数十垸”，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江防》云：

比东南百余里，大小百数十垸，其地既广，其势亦分，此堤不官修而属之民也。垸各有总、有夫，立法久矣。然力有强弱，地有远近，厥弊非一。强者，不亲身赴堤，捐微费以付佃民，佃疲无能为役，黠则藉以自肥，其弊一。远者，地处高阜，谓灾非切近，不赴堤，亦不捐费；近者，人少力微，难以坚修，其弊二。至垸总之设，非同于江堤之堤老、圩甲，逐年更易，每总一姓为之，若世及然。筑时通垸敛费，多至数百

^① 参见前揭《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四章“汉水下游重要支流堤防考述”，第358页。

^② 乾隆《江陵县志》卷一〇《建置七·津梁》“沙桥”条，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三《方輿三·山川》“关沮口”条，乾隆《荆州府志》卷五《山川·江陵县》“诸倪冈”条。

金，少亦百余金，或草率完工，徒饰耳目；夏秋泛涨，仍催垸民抢筑，全则贪天为力，溃即委以费用不支，弊更深于堤老、圩甲。诟知力强则田多，堤决被害尤甚；远则小水俸全，洪潦亦汪洋无垠，此数十年来均归于瘠苦，皆董率玩事者之咎也。近日白茆、葫芦两垸力挽其弊，岁稔。通垸合修，不计强弱、不分远近、不专任垸总，分段计亩派夫，富者捐资，贫者出力，各举一老成人督之，彼此纠察浮薄处，众共罚之，令及时赔补，不阅时而堤岸屹立巩固。乾隆戊申大灾，江汉合流，下乡田禾尽付波臣，惟两垸卒保无虞。孟家、永丰二垸恃白茆为保障，亦未被灾。人定胜天，其信然耶？此后，同垸之人不规小利，不计苟安，强弱远近，一心同力。冬春农隙，未雨绸缪，木杵石碓，整埽坚筑；夏秋水涨，齐力防护，蚁穴獾洞，宵昼巡视，庶几汙莱皆为乐壤。

为克服垸总之弊，白茆、葫芦两垸率先变革，加上白茆垸还建有两级涵闸系统，排渍效果较好^①，堤垸生产一时颇有成效。然而“积久弊生”，咸丰八年（1858年）再行更张，“始归县估办，不准举派绅士保充局首，亦不许假手胥役浮派”^②，进一步加强了对围垸的管理。

道光年间（1821—1850年），汉水分流沿线基本都修筑了堤垸。据考订，道光时，襄河堤三段即沙桥门至陈子头、陈子头经观音埭至昌麻埭、孟屯寺至张家场已筑有堤垸七十余里，其中的险要堤段还砌石为岸。^③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堤防》称，时襄堤各工长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一丈，“国赋强半出其中焉”。

同时，清代频繁的决堤与湖泊的大规模扩张使邑内备受沮洳之患，亟待疏浚，嘉庆至同治年间（1796—1874年），江陵县进行了

① 参见张国雄《江汉平原垸田的特征及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载《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②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堤防》“襄河堤”条。

③ 参见前揭《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四章“汉水下游重要支流堤防考述”，第361页。

一系列疏浚工程。嘉庆十三年（1808年）制军汪志伊奏开新河，“由李家口东南行十余里抵永丰院，出张家湾，入白鹭湖，患始息，土人呼为‘汪新河’”。汪志伊又开鄢家垱，引香岭返垱之水顺流入腰河，径归白鹭湖。嘉庆十五年（1810年），太守林岚捐俸开浚林新河，由周家沟抵苏林套入白鹭湖，河长三里。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阮制军于郝穴东南的范家堤畔浚渠建闸，试图分三湖水入江，然而，当时荆江水位已高出闸位，水不能出而渠亦湮。道光二十七年（1827年）尹穗开双新河，以泄黎冈湖水南入豉湖，河长二里。同治二年（1863年）张建基开浚郝穴堤内故道，以消道光五年（1825年）溃堤以来形成的积潦，使淤地“复为沃壤”。同治四年（1865年）之后，张建基等再行开浚因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文村堤溃造成的贺市桥、西马滩等处淤积，但由于文村堤河段为沙岸，容易崩塌，所浚之处复塞，后又疏截口河，“首受獐捕穴，东南流为熊家河，迤邐达三湖”。道光年间（1821~1850年）龙二渊堤数次崩决，淤积处长达三十里，后得到乡民捐资疏通。^①道光时的多次决堤还造成郝穴一带淤塞严重，疏通后涸出了数万亩农田，于是在郝穴汪家口修建老垱口、严家口两闸以“善后”。^②

在湖泊集中的龙湾，开有多个水口分消水势。但这一带周围盘布着三湖、白鹭湖、红马湖等大小湖泊，皆近壅塞，一遇汉水泛涨，夜汉口来水经三湖下注龙湾，为害更大。^③康熙时龙湾不堪通流之害，“乃堵腰河刘申口以御水势”^④。后又于龙湾北十余里置韩家闸，道光十八年（1838年）巡检方纯熙于龙湾南四里建大官垱闸，“一御水患，一泄积潦”^⑤。

据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记载，经过乾隆以后多年的发展，光绪时江陵县的堤垱增加至一百七十九座，其中沙汛、捕东汛

① 本段参见光绪《荆州府志》卷二〇《堤防志四·疏浚纪略》。

②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堤防》“老垱口、严家口闸”条。

③ 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堤防考略》。

④ 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江陵县》“姚一溥书”。

⑤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堤防》“韩家闸”、“大官垱闸”条。

辖五十二垸，郝汛辖三十垸，龙汛辖九十七垸。从全县垸田的分布来看，各汛垸田的数量恰可反映所在地区湖泊的存在状况，龙湾一带仍是湖泊最为集中之地（参见图 3-2《民国初年江陵县堤防示意图》^①）

垸田的发展促进了江陵以北堤防的扩展。

清朝末年，江陵北面堤防以直路河堤与襄阴堤最为重要。直路河堤，长三十余里，“江陵北面倚为屏障，黎家月堤、庐潭垸、阳长堤、李家滩等处为最险工……堤捍御中襄之激流，于江陵、潜江、监利三县均有关系”^②。襄阴堤，又名中襄河阴湘城堤，长一百七十余里，其中，中襄一段自草市头工起，至芙塘垸堤止，分十一工；阴湘一段，自中襄起，上至堆金台止，分十四工；另置一座大闸以泄长湖渍潦。襄阴堤“为江陵全县之保障，万城为其门户，此堤系其尾闾”。^③ 上述二堤的重要性正如《湖北堤防纪要》卷二《民堤图说》所云：

江陵，南以万城大堤为屏障……北以阴襄、直路为命脉，计二百余里。上捍沮漳之水，下当中襄之冲，河泓逼堤，急流如矢，险工林立，黎家月、李家滩等处尤关重要。每届工费向分南北局征收，南费修官堤，北费修北堤。近年阴襄、直路^④等堤工费浩繁，入不敷出，是非切实筹划不足善其后也。该县堤防情形与他县少异，所重者仅南北两堤，内部子垸隔堤勿须修挽。一旦南北堤塍不固，势必全县覆没，两堤关系之重如此。论者谓，该县工费过巨，议设法补助，惟以全县之财力修南北之堤防，诚不为重。较之他县民垸棋布、节节布防，稍有不同也。

① 据《湖北堤防纪要·江陵县堤防图》绘制。

② 王兆虎：《湖北堤防纪要》卷一《民堤表·江陵县》“直路河堤”条，民国十四年石印本。

③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民堤表·江陵县》“襄阴堤”条。

④ 直路堤即直路河堤防，直路河在潜江县东南五十里，“通官口小河，经沙矶长河，汇洪湖，出沌口入江”。见康熙《潜江县志》卷三《輿地志·山川》“直路河”条，康熙三十三年刻本，海南出版社 2001 年影印故宫珍本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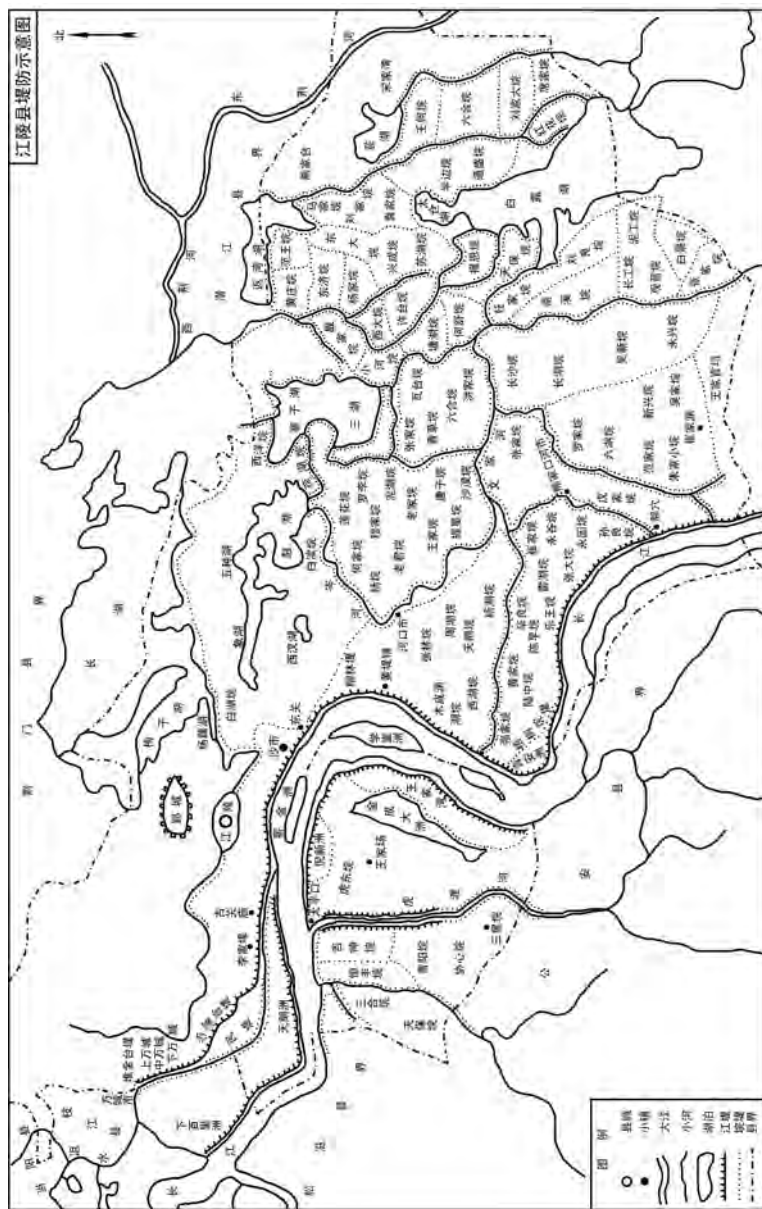


图3-2 民国初年江陵县堤防示意图

（二）监利县

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中，监利是荆江两岸各县中垸名最多的县，这种情形正是其特殊地势的必然反映，正所谓“正江湖汇注之地，势甚汙下，乡民皆各自筑垸以居”^①。

明代是监利堤垸大发展的时期，仅以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所载成化八年（1472年）为例，知县焦钦修建了县东四十里的周城垸、县东北三十里林长垸、县东南三十里蔡家垸、县西十里的新兴垸、县西一百里沧湖垸、县西北八十里仓库垸^②、县北九十里梅林垸，以及桑柘垸、双车垸、董家垸、万家垸、长湖垸、戈家垸、杨林垸、大兴垸、吉老垸、刘家垸、赵家垸、马路垸、谭家垸、白湖垸、天井垸、株梅垸、高家垸等二十四个垸。^③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监利县堤考略》亦称，明中期以前监利已有大兴、赤射、新兴等二十余垸。

结合同治《监利县志·监利县舆图》来看，林长垸濒临林长河北岸，林长河在县东北二十里，“其河周回县治三百余里，通舟楫往来，两岸林木蓊蔚，故名”^④。与林长垸相邻的有蔡家垸、长湖垸，林长河南岸有双车垸，南、北周城垸则分布在林长河两岸。上述各垸均在太马长河南岸，太马长河北岸则有吉老垸。又如县西四十里的新冲河^⑤，两岸沿线“俱系成熟麦地……两边麦地之外间有粮田，各有小垸”^⑥。嘉靖年间（1522—1566年），像上述多个堤垸沿县邑河流分布的情况并不少见。

从同治《监利县志·监利县舆图》中还可可见位于县西北八十

①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监利县堤考略》。

② 前引明末雷思霈《荆州方輿书》称，县下有“曹子建之仓库垸、高季兴所筑之古堤垸，至今赖防水患”。据此，宋代以前监利县似已开发垸田，而仓库垸在县西北八十里，正濒汉水，似又与上章所述北宋中叶监利县“濒江汉筑堤数百里”的情形相符。但目前尚无其他资料可证，待考。

③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监利》。

④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监利》“林长河”条。

⑤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监利县》“新冲河”条。

⑥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附开复荆承二府属穴口疏》。

里的仓库垸以南有赤射垸，西南有白湖垸、戈家垸、马路垸、谭家垸，东南有朱（株）梅垸、天井垸等，诸垸均在县北、西北、东北一带，距东荆河不远。

清代，监利县的垸田迅速发展。至咸丰九年（1859年），监利县已有四百九十一垸，遍布全邑（参见图3-3《民国初年监利县堤防示意图》^①），其中朱河汛一百三十八垸，中汛一百三十七垸，窑圻汛八十九垸，分盐汛八十六垸，白螺汛四十一垸。^② 垸的数量众多，规模亦相当大。据研究，清代监利县的垸田规模“以几千亩者占大多数”^③；而太马垸早在康熙时即号称产“民粮万石”^④。

同治《监利县志》在咸丰九年清丈垸田的基础上，胪列出当时监利县的全部垸名，据此整理成表3-1《清咸丰九年监利县各垸名称一览表》。

表3-1可见，监利县较多的垸以河、湖、滩、港命名，反映出这些堤垸或沿河流而筑、或将湖泊围垦。

垸田的大量围筑，使得县邑内河湖分离，水系紊乱。同治《监利县志》所记“邑东北之水”反映了这一后果。首先，由于江堤阻隔，县西垸子需将水排向太马长河，如新兴、禾获垸之水“俱出太马河，赴鸡鸣渡”。其次，县北太马上垸和太马湖之水与城东之水俱汇沙湖，出林长河。林长河还接纳了大吡等十六垸之水，其一支至丈完墩出洪湖，另一支则入沔阳蚌湖。再次，朱河汛、白螺汛等水改道。朱河汛新挽垸、尺八口等水为堤所阻无法入江，曲折转行至三汊河、檀子湖抵螺山；白螺汛之水也由于无法直接入江而转注蚌湖。朱河、白螺二汛“东北毗连洪湖，汪洋浩渺，诸水皆以洪湖为归也”。虽有洪湖为泄，但无论是太马长河、林长河，还是三汊河，其沿线皆布满了大小各垸，水道壅塞成为必然。

① 据《湖北堤防纪要·监利县堤防图》绘制。

② 同治《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垸名》。

③ 参见前揭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垸田农业经济特性分析》。

④ 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堤》“护城堤”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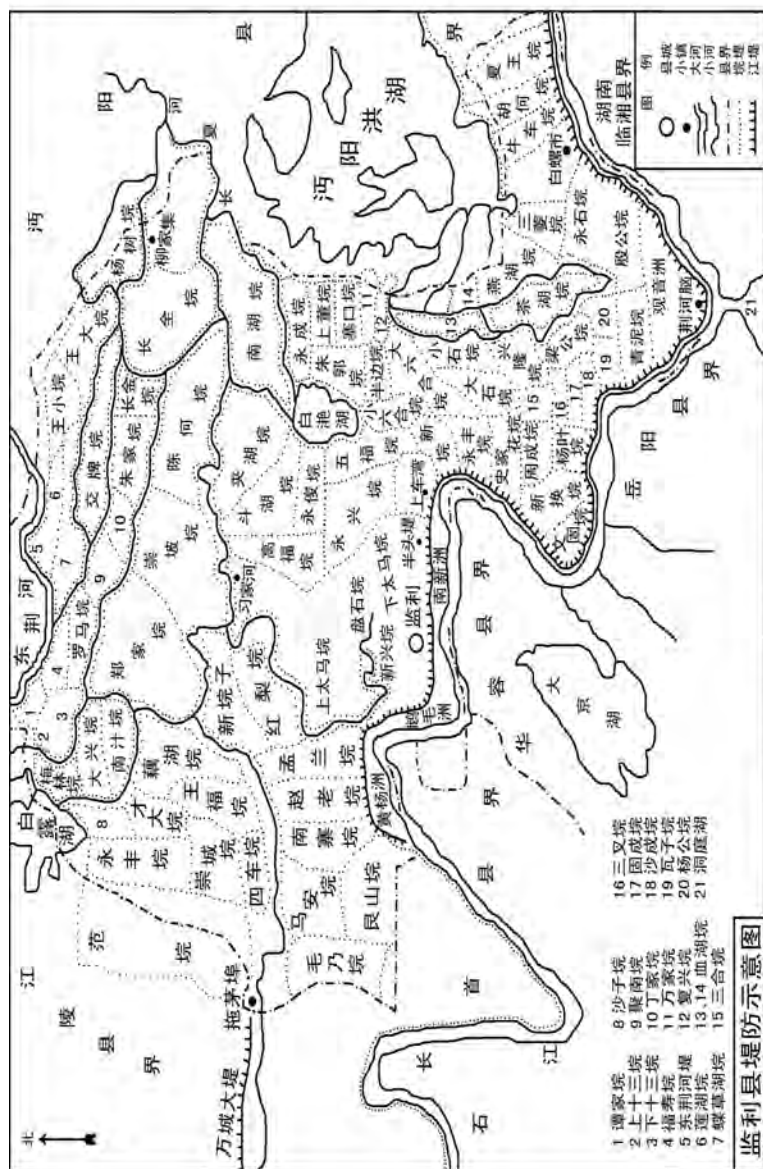


图3-3 民国初年监利县堤防示意图

柴林河的淤浅亦为一例。柴林河在县东北一百二十里,“乃监沔交界诸水会合之处”^①,不仅如此,“上游荆门、江陵、潜江及监、沔两邑五州县湖河诸水下泄新滩口、沌口,出则仅恃柴林河一道”^②。道光十九年(1839年),子贝渊堤^③溃口,“各水由溃口合并,直趋洪湖,柴林河遂致淤浅”。子贝渊溃口虽于光绪二年(1876年)修筑,但柴林河道却因经费不敷迟迟未能疏浚,由此导致了更严重的问题出现。溃口堵筑后,南岸七百余垵之水可由洪湖消纳,北岸九百余垵则水无出路,故两岸之民历年争斗不休,不仅发生械斗,北岸居民甚至以船炮轰决子贝渊堤,两岸俱被害甚巨。^④

表 3-1 清咸丰九年监利县各垵名称一览表

| 所属 | 垵 名 |
|-------------|--|
| 中 汛 垵 | 新兴 禾获 了角 天井 崇埠 太马滩 太马上 郑家 黄公 梅家 庚寅 盘石 铁 老 张家新 皮家 永昌 邓家 冯家 中洲 汤家 樱桃 松阳 赵家 刘小 梅林 鸿 鹄 团湖 班阳 梁子 老 永固 刘母 湛小 皮滩 学士滩 杨家滩尖耳李小 黄 家滩 长堤 丁家 戈家 郭家 朱家 熊家 灌车 肖祁 府民 北六合 合城 徐母 大苏湖 小苏湖 西湾刘小 汪小 孙小 从家滩 下太马 油榨 王甫 樊师 金顶 东郑家 西郑家 禾丰 石螺 六合 么母 黄垢 么盘 新垵 黄土湖 黄丰 平家新 毕家 彭家 赵家 官洲 薛王 满仓 月西 马保 杨林 横水 罗老 丙辛 长发 五 福 福寿 赵港 唐巾 董家 刘家 三多 郭王 南大兴 新洲 任家 范泗新有 梅 小 李耳 夹堤 谭家 马路 永有 中立 罗家 马家 莲台 吉祥 北沼 万家新 张 小 明堂 朱会 扁花 青阳 凡泗 新建 白湖 公郑 仓库 陈小 严家西滩 渥泥 马么 杨旗岭 陈家湖散洲 扁滩 胡小 荒湖 马子 焦荒 新登 王小 塌湖 巴代 戴家 |

① 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山川》“柴林河”条。

② 《涂制军查复子贝渊挖口情形筹议疏河建闸疏》,见《荆州万城堤续志》卷末《志余·疏筑备考》。

③ 据光绪《荆州府志》卷二〇《堤防志四·院堤》,柳家集下为子贝渊堤,距洪湖甚近。另据同治《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柳家集在县东北六十里。

④ 《涂制军查复子贝渊挖口情形筹议疏河建闸疏》,见《荆州万城堤续志》卷末《志余·疏筑备考》。

续表

| 所属 | 垸 名 |
|------------------|--|
| 朱 河 汛 垸 | <p>新挽 固城 南阳林 北阳林 大石 小石 神童 黄老 河港 上杨叶 下杨叶 上茶湖 河耀 三汉 中洲 长垸 大王家 小王 白滢 马儿 丹家 舒家 沙滩 左脚 西湾 固徐 余邹 东郭家 荒垸 小垸 南筲箕 全胜 墨斋 茭牌 杨家 东兴新 新垸 彭家 蔡家 大叱 三兴 周城 文固 南固城 安土沙城 瓦子 金鸡 樟湖 温家 高家 高湾嘴 永丰 徐家 小徐家 大董家 小董家 蒲草 莫家 万家 梅李 隆家 谢家 车马 圪堆 高辛 朱刘 小菜田心 傅家 余家 新城 李家 夏家 佐陈 塘林 北永丰 小湖 兴隆 六合 窖湖 双湖车 吉老 黄金 枪湖 荷林 梅林 毛坂 北筲箕 救苦 荷湖滢 冯家 六途 河南 常张 张家三合 易家 良心 何家 陈家 朱家 双车 护交 郭家 夹湖 斛湖 长湖 杜婆 雁湖 吴家 花市 道周 曹家 张家 王家 青狮 汪家 沅麻 高小 林长董老湖 董家沙湖 长金 交牌 湖南 姚家 王家 杨林 老观陈小 龙孔侯家 金花彭家滢</p> |
| 窑 圻 汛 垸 | <p>曲尺 潘太 莲荷 馒豆 永丰 西新兴 马鞍 西张家 宋庄 丰城 板卧 城林 大理 大台 吃哺 汤家 古堤 浒潮 边家 洪泥 李家 搭耳 塌儿 王老 沧湖东 张家 琦瑛 南雷洲 北雷洲 杜家 毛老 艮山 范候 丁家 温桂 五桂 逢城 陈家 邹家 熊家 彭家 大铜 小铜 百亩坵 官湖粪筐 枚林 兴复 姚夹 四车 沙洲 三角 胡赵 杨林 青滢 河东 藉湖 龚家 王位 十全 王福 赵老 鸦鹊 甘棠 杨李 沙湖 小沧湖 马嘶 建鱼 崇林 沉沙 毕家 东阳 鸭桥 石公 永固 胡麻 南新 梁家 潘兴 青皮 吴家小 西湖小甫 西湖宋徐 萧家 小马嘶 杨堤 邓家 陈小</p> |
| 分 盐 汛 垸 | <p>新创 铁黄 顾小滩 洪沙 黄潭 大钱家 小钱家 周城 周利 河帮 陈小 刘小滩 合尚 大兴四角 南旺 张七 柳家 杜家 永丰 小心 万家 青泛 杨港 灵合 老贯 东湾 官湖四角 碾盘洲 五姓洲 文家洲 杨家洲 邓李 宋尹 李家洲 董老湖 姚家洲 鸡公湖 沅麻湖 麦莲湖 三义 渔泡湖 大兴 龙兴 辛西 天井 董家 赤射 莲荷 官山 永丰 古福 方城 仰家 金库 王小 仁和 王大 菜子 五合 朱枚 实林 龙市 太阳 任小 新筑 永定 龙湖 塌湖 戴丰 张桃 牛射 桃村 地统 花果 大林董小 东港 八分 垵湖 锅底筲箕湖 菜子湖 筲筐圈 泥潘 官马湖 孟家洲 二房湖 黄小</p> |

续表

| 所属 | 垸 名 |
|----|---|
| 白 | 梁公 杨公 青泥 下茶湖 近池 姜心 新庄 黄婆 薛家 沙沟 华家 游老 锡老 |
| 螺 | 王小 长赵 北溪 上达 筲箕 燕湖 越子 许家 彭家 邓家 张谢 曾家 王家套 |
| 汛 | 殷公 清水 杨林 牛车 郑家峰 张家峰 倪家峰 双峰 毛段家滩 双龙港 歇湖 |
| 垸 | 永胜 夏家 蚌湖 下永胜 |

资料来源：同治《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垸名》。

在邑内围垸的同时，监利沿江一线尤其是县东南的朱河汛和白螺汛的辖地内，亦围筑了较多的垸堤。民间为争夺围垸不断产生纠纷，官府不得不多次出面干预。咸丰年间（1851—1861年）《官将（制）军飭押毁私垸札》即反映了沿江围垸的普遍性：“所有万城大堤以至监利之螺山一带南北沙洲，不准民人私行自挽垸堤，有阻江流。有挽者，即行刨除，倘敢故违，即照违令例正法示众。”^①上章已述，明清正是监利河段河曲发育的时期，崩岸频繁，不断的沿江筑堤围垸将新形成的地形固定下来，促进了河曲的进一步发展。

一方面沿江不断崩岸、决堤；另一方面咸同以后县北东荆河的来水渐多^②，加上邑内水道壅塞，导致清代后期监利县水患频发，县内“外滨荆江，内通襄河”的垸田备受其害。据记载，同治五年（1866年）的夏汛中，朱河汛的杨叶等一百三十四座垸因磐石月堤溃口，江水内灌而“概被淹没”；九月下旬，襄、南二水复骤涨，“致将已淹各垸，复行漫漫，直至冬初，仍未退涸”^③。

因此，与江陵县相似，监利县也以县南的江堤和县北的襄河堤防为全县建设之重，希望以此保垸田无虞。《湖北堤防纪要》卷二

① 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成案》。

② 参见前揭《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四章“汉水下游重要支流堤防考述”，第350页。

③ （清）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卷二《以工代赈疏》，光绪二十九年刻本。

《民堤图说·监利县》称：

监利滨江带襄，田庐之保安一，惟堤防是赖。江堤分上乡、中乡、下乡三段，共长二百余里。水流迅急，崩埝为患，每届大工，均系退挽月堤以资捍御。襄堤以北，中汛堤及东荆河堤为要工，共长百余里。襄流自吴家改口分注而下，此堤适当其冲，激流如矢，防护为重。该县所辖江襄诸堤，不独为一县命脉，实即下游数县之保障。此外，虽民垸隔堤星罗棋布，然不过防湖渚之渍，无足纪者。

清末，随着荆、襄水患的日趋严重和水系的紊乱，一些堤垸逐渐合并，以扩大规模，抵御洪水。如铁老南新垸，本为铁老与南新二垸，“因当襄江激流，辅车相依，不可分离，故并为一。周围五十余里，以南新之谢滩黄二总、严五总、焦家月为险工。铁老包田五千余亩，南新包田九千一百三十七亩”^①。莲荷垸与王小金库垸亦是合垸而成。莲荷垸，周围约六十余里，系十三个子垸合挽而成，“为赤射垸保障，有南堤十余里，以御铁湖之水，素称险工，包田一万二千亩”^②。王小金库垸，周围约三十余里，为六垸合挽而成，垸内包田八千七百余亩。^③ 清末监利县内像上述三垸这样由多个子垸合并的大垸不在少数。

同时，为了解决水道壅塞和渍水潴留问题，监利县曾数处建闸。嘉庆十六年（1811年），总督汪志伊开凿了新河，并于福田寺建闸以消积水，积水汇入白澧湖后下注沔阳。除了福田寺闸，另有沔阳县新堤闸帮助泄水。二闸相为表里，福田寺闸每年十月十五日开闸，次年三月十五日闭闸；新堤闸则先开十日，后闭十日，希冀既“不以邻院为壑”，又“不使江水倒灌”。然而福田、新堤二闸俱在同治初闭塞。北乡之水本以“福田寺闸为蓄泄，而以柴林河为尾

①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民堤表·监利县》“铁老南新垸”条。

②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民堤表·监利县》“莲荷垸”条。

③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民堤表·监利县》“王小金库垸”条。

间也”^①，福田寺闸闭塞后，太马长河南岸诸垸之水更难以排泄。

道光初又建窑圻和孟兰渊闸以消北乡之水。孟兰渊闸本为消泄白鹭湖之水，后因江水泥沙不断落淤，使“外洲高于闸门数尺”，闸遂废。同治时窑圻闸亦塞。^②

道光四年（1824年），凿山修建了螺山闸，以泄洪湖一带之水，同治时却因“地处高仰，引河淤浅不能宣泄”，复淤塞致废。^③

光绪初，子贝渊溃口堵筑后，曾建启闭闸座，但因来水过大，闸门狭窄而未能畅消柴林河北岸渍水。后虽于原溃口处添建朝天石闸，长年开放，却与从前溃口无异，导致两岸矛盾加剧。^④

嘉庆以后监利县多次试图建闸以消泄渍水，然而，邑内水道已壅塞紊乱，江堤外亦洲滩拥堵，终难有效。

（三）石首县

石首地跨荆江南北，两岸皆开有垸田。江南垸田略早于江北，数量、规模亦较大。

1. 荆北地区

关于宋元时期石首县荆江北岸地区的堤防修筑情况，目前尚无直接的资料可以说明。仅同治《石首县志》卷七《艺文志》所录《三合垸碑记》提及北岸的三合垸：“自宋及明原有堤址，南则旧有关家套口以防外溢，东则旧有袁家湖口以疏渍水，悉循先时故道。”

明代，石首县北岸地区有百家堤等垸堤。百家堤，又名百家

① 本段参见同治《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山川》“邑东北之水”，光绪《荆州府志》卷二〇《堤防志四·院堤》“福田寺闸”条。

② 同治《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山川》“邑东北之水”，同治《监利县志》卷三《江防志》，光绪《荆州府志》卷二〇《堤防志四·院堤》“孟兰渊闸”条。

③ 同治《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山川》“邑东北之水”，同治《监利县志》卷三《江防志》，光绪《荆州府志》卷二〇《堤防志四·院堤》“螺山闸”条。

④ 《裕制军请开疏冯姓等河以资宣泄疏》，见《荆州万城堤续志》卷末《志余·疏筑备考》。

表 3-2 清乾隆时期石首县荆江北岸垸田简表

| 垸 名 | 方 位 | 范 围 |
|-------------|----------|---------|
| 百家堤 | 县北四十里 | |
| 梅赵（肇）垸 | 距县二十里 | 周长三千九百丈 |
| 顾兴垸 | 倚百家堤一截 | |
| 张惠垸（后分南北二垸） | 倚百家堤中上截 | |
| 张肇垸 | 倚百家堤中截 | |
| 三易垸 | 倚百家堤下截 | |
| 毛老垸 | 距县七十里 | 长九百八十丈 |
| 吴魏垸 | 距县六十里 | |
| 小岳三协垸 | 东抵梅赵（肇）垸 | |
| 三合垸 | 三协垸南 | |
| 沙邱垸 | 三合垸东 | |
| 郝家垸 | | |

资料来源：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

随着河道的摆动，清代石首北岸地区水患日趋严重。至迟在乾隆时期，新厂以上的萧子渊决口，其所分江水由俞家垵至陈、王二湖，东至江陵之拖茅埠、监利之堤头，复东南流至湖坪套（即壶瓶套）出江。^① 萧子渊留口使北岸地区在夏汛时饱受水侵。

与此同时，石首北岸地区出现了较多的堤垸。表 3-2 所列之外，尚有数十个私垸沿江北大堤一线修筑。受水患影响，一些私垸被毁，残垸的留存阻碍江流，进一步加重了水患，于是，萧子渊之留口与私垸之残废成为了北岸地区的两害。每当夏水泛盛，“江北一带悉为泽国，内惟百家长堤一线四面受敌，难资保障”。当地垸

^①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江防考》。

民有能力聚役的则复筑垸堤，如梅赵（肇）、三易等垸可保无虞，而如张惠、顾兴等“土薄民贫，役不能兴”之垸则屡遭崩溃。^①

嘉庆时，私垸修筑有增无减。随着泥沙的不断落淤，沿岸的洲地又刺激着围垦活动的展开。嘉庆十二年（1807年），有洲民瞞案呈请修复废垸，后为江陵、监利士民告发，除梅肇、张肇、张惠、顾兴、三易五垸“本系旧存，应听修复”，以及三协、三合、杨发、张复等垸“遵照原案，只应高不盈丈，不准增修”外，其余二十六处私垸俱被平毁。^②其后，北岸新淤出的杨子、永发二洲被私筑为又一“三合垸”，“堤长二十余丈，高三丈，宽约丈余”，同治六年（1867年）令其平毁。^③直至光绪年间（1875—1908年），石首县北岸地区仍有多达三十四个私垸。光绪《荆州府志》卷二〇《堤防志四·院堤》记其事，并按云：

以上私院俱系石首洲地，在萧子渊、黄鳊口、洪水渊、杀水滩、俞家垸、菱茨港左右，南北宽约六十余里，东西长约八十余里。萧子渊口分流支河入黄鳊口，至监邑之壶瓶套出大江，计长八十里许。现在逐段淤塞，江流不畅，惟张肇、张惠、三义、顾兴四院系咨部请留，其余各院前经县令详明，冲塌残废，院民现复补修，实与江流有碍，历年查勘有案。

清末，江北地区修筑了面积较大的罗公垸，由三合垸、三合外垸、六合垸、六合外垸等垸合挽，堤周长四十余里，“有成功堤一段，北接古长堤，南抵下码头，长六百八十二丈，系称险工，包田一万二千余亩”。罗公垸上游还新筑了梅王张垸，由梅家、王家、

①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江防考》。

② 《陈观察创毁私垸示》，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成案》。

③ 《方太守饬毁杨子洲等私垸札》，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成案》。

张家三小垸合挽，包田一千五百亩。^①结合图 3-5《民国初年石首县堤防示意图》^②可知，面积较大的罗公垸及其上游的新筑堤垸之出现，正是因为河曲发育与河道摆动使得在荆江转而东流的河弯一带留下了大量可以围垦的淤地。

2. 荆南地区

石首县荆江南岸地区的堤垸最早见于前引元人王廷端《石首重开古穴记》。据载，元大德七年（1303 年），石首县因陈瓮港堤决口，筑黄金、白杨二堤；又增筑新兴堤以护“内垸”及“保全数村”。此外，在县南三十里，郑渊率众筑郑家垸，“以御洞庭水患”^③。可见，元朝时石首县荆南的垸田开发已有一定规模。

明代，荆南垸田继续得到开发。郑家垸以外，有大型堤垸张成垸，系围筑边滩而来，最盛时围田达三万亩，发挥着止澜堤外防的作用。^④有东西垸，“在县南六十里，东抵洞庭，西接华容，因名”^⑤。另据万历《湖广总志》，嘉靖元年（1522 年）和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县境有双剏垸与戴家垸分别被洪水冲决，两垸未详所在，当距江不远。^⑥

清代，石首县重点修筑临江堤防，同时，沿江一带的围筑垸田也在扩展。不过，这种临江的垸田颇受下荆江河曲发育的影响。如明代止澜堤以北的张成垸，原围田三万亩，清代时受到河道摆动及江水冲刷的影响，面积不断减小，同治时包田仅三千余亩；至清末，张成垸已不再作为重要的堤垸记载在册（见表 3-3《清代石首县垸田发展简表》）。

①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罗公垸”、“梅王张垸”条。

② 据《湖北堤防纪要·石首县堤防图》绘制。

③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石首》“郑家垸”条。

④ 《方太守申覆张成垸详稿》，见《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成案》。

⑤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石首》“东西院”条。

⑥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石首县堤考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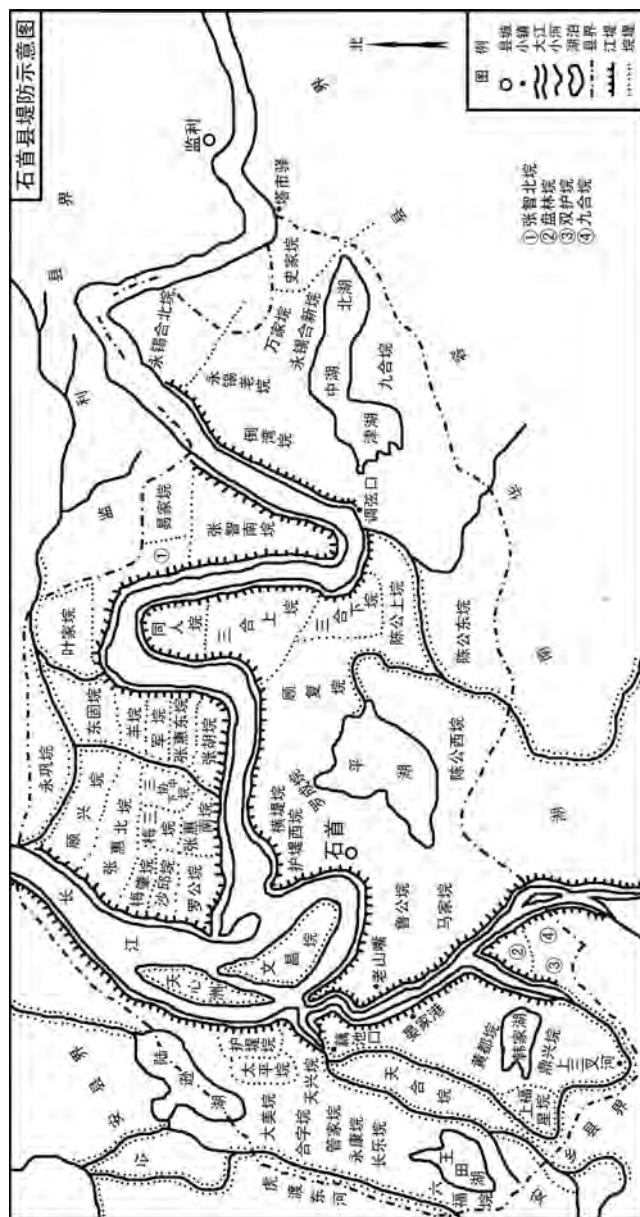


图3-5 民国初年石首县堤防示意图

表 3-3 清代石首县垵田发展简表

| 资料来源 | 乾隆 《石首县志》 | 同治 《石首县志》 | 《湖北堤防纪要》 |
|--|--------------|--------------|----------|
| 垸 < | | | |

| 资料来源 | 乾隆 《石首县志》 | 同治 《石首县志》 | 《湖北堤防纪要》 |
|--|--------------|--------------|----------|
| 垸 < | | | |

至迟在乾隆时,南岸地区主要有顾复、柳平、史家等垸(见表3-3),其中,顾复垸在调弦口以西,距县治三十五里。为了拦防因陈公堤圯废带来的江水冲击,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知县顾之枚应县东乡民所请,于陈公堤西南段旧址之上修建了顾复垸,“垸民感其遗爱,因名‘顾复’”^①。顾复垸原有两座石坝以泄垸内渍水,后俱圯,同治时重修。^②清末时,顾复垸周围计有九十余里,包田二万一千五百余亩,“倚北堤(按:即止澜堤)为保障,有双保、巧岸两堤,素称险工”^③。柳平垸,系围筑县西五十里的柳子洲而成,上接公安县申梓、平滩二洲,下接公安沙堤埠,道光时受河道变化影响移作公安大堤,保障公安与石首两县;咸丰二年(1852年)以后,由于藕池堤马林工溃决不筑,柳平垸连带被淹。同治元年(1862年)复修垸西黄水套及大横堤。^④清末时,柳平垸堤周围计五十余里,分南北两垸,“南垸堤临荆江,为西乡之门户;北垸堤堙虚险,内有深渊,外邻大潭,每届工程分六工段经修,包田一万五千余亩”^⑤。

表3-3系对比乾隆《石首县志》、同治《石首县志》和近人王兆虎《湖北堤防纪要》而作,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时期石首南岸垸田变迁的情况。据表3-3和图3-5,至迟在同治年间(1862—1874年),南岸的县北地区新增了罗城、横堤、同人等主要堤垸。

罗城垸,或称罗童、罗潼、罗潼垸,即止澜堤自北门外起至列货山止一段,故垸名即取包罗县城之意。^⑥清末时,罗城垸“垸堤周围计一百五十余里,北堤临江,自焦家巷至栏北堤计二千二百八十三丈五尺,素为险工,包册田二万余亩,新淤田一万二千五百余

① 《顾复垸碑文》,见同治《石首县志》卷七《艺文志》。

②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顾复垸”条。

③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顾复垸”条。

④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志·洲》“柳子洲”条,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柳平垸”条。

⑤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柳平南垸”条。

⑥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罗城垸”条。

亩”^①。罗城垸黄金工外为横堤垸。横堤垸的修筑与咸丰二年（1852年）的藕池马林工溃口有关，马林工溃口后，“水向南趋，沙从东积”，影响较大，为保护止澜、黄金等内堤，绅耆王予峰、刘经邦等于咸丰八年（1858）呈请挽筑长堤，次年事毕。咸丰十年（1860年）和同治四年（1865年）横堤垸两次溃决，复筑后横堤垸“为黄金工保障。实系要工”^②。清末，横堤垸周围达百余里，“北堤滨江，长约三千四百余丈，每届出险，均系此堤，险工林立，不易修挽，包册田二万七千余亩，外新淤田二千五百余亩”^③。同人垸在县治以北的河弯处（见图3-5），嘉庆二年（1797年）修筑，“以御汛涨”^④。同人垸所在地区“地势低下，堤塍单矮，十年九水，居民寥落”，清末时同人北垸堤周围计五十余里，包田七千三百余亩。^⑤

罗城、横堤、同人三垸的增筑，大范围的新淤田，以及险工的出现，都反映了乾隆以后河势变化日益趋大，御江形势日益紧张，河道的摆动与不断落淤的泥沙使垸田围垦的范围逐渐扩大，但难度亦更大。

明中叶以后，石首县南岸的垸田发展既受到下荆江河曲的发育的影响，又受到调弦、藕池分流的困扰，该县众多堤垸在此压力下艰难发展。

调弦分流，首当其冲的是石首县治以东地区。这一带本为“石邑财赋强半”之地，陈公堤废止后，清初曾屡议兴筑，却因经费困难而未果，县东一带遂有“付之沧桑”之忧。^⑥道光四年（1824年），在陈公堤的西北旧址，即自止澜堤十工起、沿调弦口至顾复垸一带修筑了陈公垸。^⑦至此，在县治以东、调弦以西的地

①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罗城垸”条。

②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横堤垸”条。

③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横堤垸”条。

④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同人垸”条。

⑤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同人北垸”条。

⑥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陈公堤”条。

⑦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陈公垸”条。

区，有止澜堤、罗城垸、陈公垸、顾复垸等相连共同防御调弦口分流。陈公垸的范围在清末有所变化，陈公垸分为上垸、西垸和东垸。陈公西垸在罗城垸之下，“周围堤计六十余里，地势低下，险工林立，以列货山堤为门户，包田一万三千余亩”^①。陈公东垸，在调弦口以东、陈公堤迤东旧址，道光二十年（1840年）修筑，垸堤起自县东六十里的焦山河、黄陵山，止于县东九十里的鹿角头，前后经过数任知县的严加催修，垸堤始固，原陈公堤在调弦口以东的一段废堤已由陈公东垸“全行修复”^②。然而，由于受到河道摆动的影响，临江的北面垸堤时有坍塌，虽经连年退挽，耗费巨大，却“难资保固”，清末时陈公东垸分十工段修治，周围计七十余里，包田一万五千余亩。^③

调弦口以东另有永锡百合（永锡合北）等垸（见图3-5），永锡百合垸堤由三垸合挽，三面临江，周围堤计二十余里，包田四千二百二十八亩。^④

藕池河成之后，河水挟带巨量泥沙南下，致使藕池河沿线土地大量淤阜，大规模的垸堤迅速出现。从图3-5可见，藕池河石首段两岸分布有天兴垸、永康垸、天合垸、长乐垸、黄都垸、鲁公垸、久（九）合垸等，分述如下：

天兴垸，位于藕池河西岸，垸堤周围计六十余里，分东、南、西三局经修。东局地势高阜，堤塍稳固，包田八千八百余亩；西局多系岗岭，包田一万五千余亩；惟南局地势低洼，险工林立，包田一万三千余亩；全垸包田合计三万六千八百余亩，建有三十八座矾。^⑤天兴垸南局因险工较多，曾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溃决，由于无力修复，遂于垸西南附挽永康垸，暂资保固，永康垸包田一千余亩。^⑥

①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陈公西垸”条。

② 同治《石首县志》卷一《方輿志·堤防》“陈公堤”、“陈公东垸”条。

③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陈公东垸”条。

④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永锡百合垸”条。

⑤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天兴垸”条。

⑥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永康垸”条。

天兴垸上游附堤挽修康夹垸，内包田三百余亩。^①

天合垸，亦在藕池河西岸，垸堤周围计三十余里，包田一万一千余亩，其东北附堤挽修长乐垸，包田四百余亩，俗称“耳垸”。^②天合垸之下为黄都垸。

鲁公垸，在藕池河东岸，包田二万五千亩，规模较大，由军民、同兴、黄金、长裕、张泽等五垸合挽。其中军民、长裕辖堤滨江，素称险工，并于渊子口建剏一座、三汊港建闸一座。^③

久合垸，在藕池支河沿岸，由合心、彭田、护双等垸合挽而成，周围堤计八十余里，东西两面滨江，素称要工，包田三万五千余亩。^④

总体上看，由于石首县地当下荆江河段之首，河弯多，河道摆动频繁，此地进行围垸垦田相当艰难。正如《湖北堤防纪要》卷二《民堤图说·石首县》所说：

石首当大江之激流，藕池口之顶冲，所恃为捍御者，首推罗城、横堤及陈公诸垸滨江堤塍。盖诸垸虽各自独立，而江堤则互相接连若长堤，然实不仅关系一二垸之利害，亦即全县之门户也。惟以上有公安之淤垫，前有万城堤之屹立，中有天心洲之陡塞，江流至此，几以该县为汇注之区，加以地势低下，保固匪易。

（四）枝江县

与其他各县不同，枝江县大型江心洲上的可耕地占了全县耕地总量的将近一半：“视之枝邑，外江内湖，高原下隰，计亩五十万

①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康夹垸”条。

②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天合垸”、“长乐垸”条。

③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鲁公垸”条。

④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石首县》“久合垸”条。

有奇，而洲渚之地什居四五。”^① 早在《水经注》成书的年代，枝江县的大型江心洲已得到开发，《水经注·江水篇》云：“（枝江）县左右有数十洲，盘布江中，其百里洲最为大也。中有桑田甘果，映江依洲。”宋代以来，百里洲的堤防修筑已有相当规模，已见上章。

明代，江心洲进一步得到开发。万历中（1573—1620年），县令赵善鸣等捐廉协修渐洋洲堤，是堤位于渐、洋二洲的结合处，原二洲地遂称“渐洲垸”、“洋洲垸”，“俱有闸”^②。渐洲垸与洋洲垸的出现，表明渐洋洲已环洲筑堤，俨然一座大型垸田。^③

清代，枝江县在荆江和沮漳河沿线、江心洲上以及县邑内的其他地方均开发了垸田（参见图3-6《民国初年枝江县堤防示意图》^④）。

沿江一线，乾隆年间（1736—1795年）修筑了福兴垸、义兴垸、永兴垸、长泰垸和复兴垸。^⑤ 与此同时，在沮漳河沿线围筑了太平垸、保宁垸、永丰垸、娄洲垸，其中太平垸将西湖、鹅湖围在其中，保宁垸内则有陶家湖和官柴湖；嘉庆年间（1796—1820年），复筑世兴垸和朱家桥垸。^⑥ 上述堤垸颇受江水和沮漳河影响：“沮漳水盛，则自瓦窑湖下无完堤；大江水盛，则自义兴而下俱波及之。”^⑦

各江心洲围垸，主要有：上百里洲，康熙后期修筑了黄冢湖垸、瓦窑湖垸和冢子湖垸；嘉庆时（1796—1820年），黄冢湖之下复筑戴家垸，后为水圪，同治五年（1866年）改筑为丽新垸。^⑧

①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

②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三公堤”条。

③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即有“上百里洲垸”、“下百里洲垸”、“芦州垸”、“羊角垸”、“渐洋洲堤（南北两合垸）”、“芦花洲垸”等记载，视上述江心洲为一大型垸田。

④ 据《湖北堤防纪要·枝江县堤防图》绘制。

⑤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

⑥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

⑦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

⑧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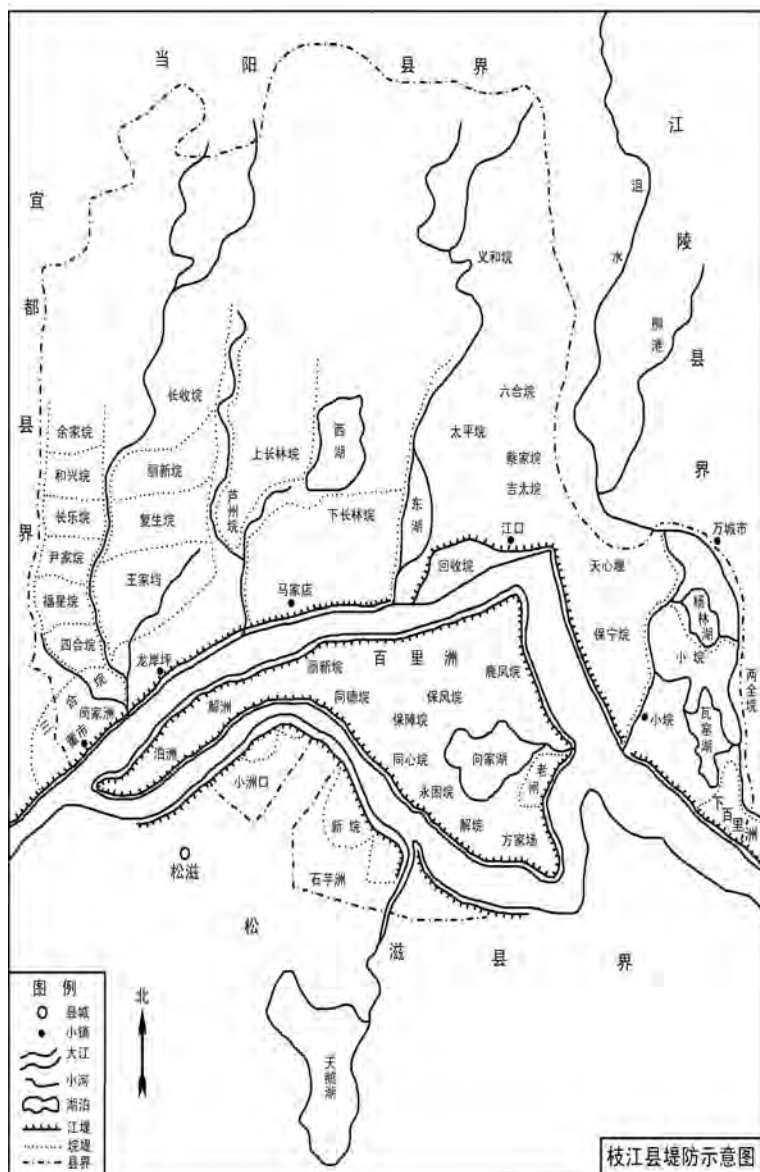


图 3-6 民国初年枝江县堤防示意图

澌洋洲，雍正十一年（1733年）洲首修筑新垸，乾隆四年（1739年）南岸修筑南河坝垸，两垸均设有闸。^①縑洲，乾隆时筑有东、西两垸，后因洲体变化，西垸内的一处学田坍塌殆尽，另一处民田仅存十分之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大水冲刷洲体，导致西垸“强半沙压”，遂于道光七年（1827年）砌石淤三十余丈。^②

枝江县“西南多山，土瘠民贫，土物供给不敷分配”，洲渚成为主要围垦之地，垸民“竞挽淤洲以资移殖”，“尤以上、下百里及羊角等垸工程为巨”。^③

（五）松滋县

从文献记载来看，松滋县的垸田与荆江两岸各县相比，出现时间较晚，数量亦较少，这或许与松滋县邑内“地势高阜，其倚堤为固者仅十之二三”^④的环境特点有关（参见图3-7《民国初年松滋县堤防示意图》^⑤）。光绪《荆州府志》记载了邑内的泰来垸、同泰垸等三十余垸，其中包括了太平垸、观音垸等八个沿江围筑的官垸，沿江另有苦草洲垸、张家河垸等私垸。^⑥民国初年，全县“计民堤十余垸，工程较巨者为长寿、天福诸垸，其余小垸傍山凭阜，管域甚微，无关轻重”^⑦。

（六）公安县

公安县“内湖外江，河港纵横，素倚堤防为命。往昔地势低下，各垸堤塍十年九淹”，入清以后“则沧桑变迁，日渐淤阜，回非昔时矣”^⑧。

《湖北堤防纪要》卷二称：

-
- ① 乾隆《枝江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
 - ②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
 - ③ 《湖北堤防纪要》卷二《民堤图说·枝江县》。
 - ④ 《湖北堤防纪要》卷二《民堤图说·松滋县》。
 - ⑤ 据《湖北堤防纪要·松滋县堤防图》绘制。
 - ⑥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〇《堤防志四·院堤》。
 - ⑦ 《湖北堤防纪要》卷二《民堤图说·松滋县》。
 - ⑧ 《湖北堤防纪要》卷二《民堤图说·公安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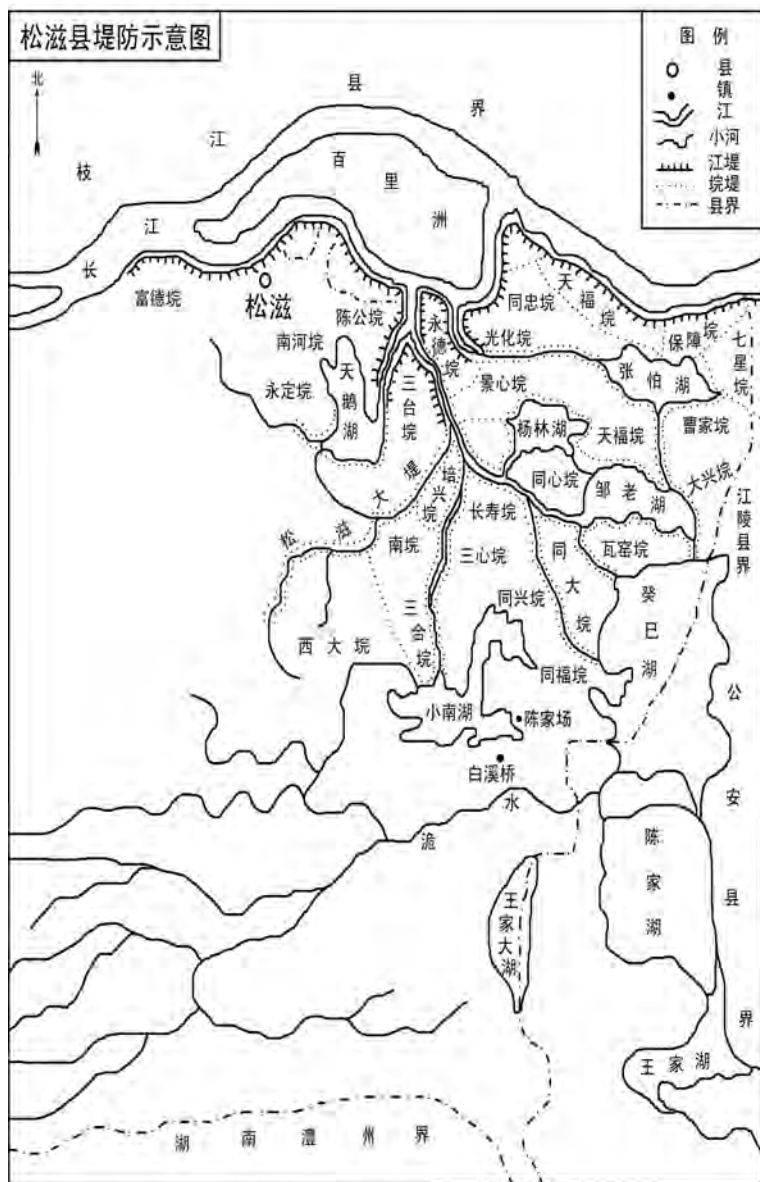


图 3-7 民国初年松滋县堤防示意图

上有百家湾江堤为该县门户，与万城官堤对峙，河泓南趋，急流如矢，防护之法讲求颇精，每届以石工为重赖，地势高阜，迭庆安澜。内有虎渡河直贯中部，陆逊、淤泥、大扁诸湖复参厕其间，垸堤星罗计七十余垸之多。下游以姚公堤为尾闾，每届江水倒漾，势甚汹涌，此堤为内垸屏藩，关系亦称重要。此该县堤防情形也。县治自油江旧址崩入江心后，凡三迁，其他一片汪洋，素称泽国。近年淤垫日高，荻湖草场渐挽堤塍，湘省石澧客籍及江监民人视为移植之区云。

可见，沿江堤防对公安县的防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贯全县的虎渡河则对邑内的垸田影响甚大。

北宋中叶已在虎渡河两岸修有堤防，并留意维护。乾道初，公安又与松滋、江陵共“有虎渡堤，蓄水溉田数万亩”^①。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洪水冲溃荆江两岸数十处堤防，其中一些要堤“冲塌深广、最难为力”，且“每岁有司随筑随决，讫无成功”^②，虎渡堤即是其一。至乾隆前期，除江陵县境河段虎渡西岸支堤长三千二十丈、东岸支堤长四千一百九十丈外^③，公安县境河段虎渡东岸支堤自蒋家堤至七节堤，共三十工，长三百一十丈四尺，西岸支堤自邓龙朱至陈郭范，共六节，长一百三十丈。^④此后，公安县内虎渡河支堤进一步发展，至道光八年（1828年），东支堤自沙河口至酆家榨，堤工二十三，共长七千七百五丈，计四十五里；西支堤自李家口至吕家汉，堤工二十三，共长八千五百丈，计四十七里；东、西支堤各工名称也与前多有不同。^⑤

①（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七八《均州黄使君（牧之）墓碣》。原文作“松滋、潜江两邑之间有虎渡堤，蓄水溉田数万亩……”虎渡河位于荆江南岸（右岸），流经江陵县南岸地区、松滋县、公安县，下注华容县后流入洞庭湖，称虎渡堤位于松滋、潜江两邑间实误，此处“潜江”应为江陵。

②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荆州府堤考略》。

③ 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江陵县》。

④ 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公安县》。

⑤ 同治《公安县志》卷三《民政·堤防》。另据《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二《公安县水利堤防记》，东支堤自沙河口至酆家榨，长八千五百四十丈，计四十七里；西支堤自李家口至吕家汉，长八千三百六十丈，计四十六里。

同治年间（1862—1874 年），虎渡两岸垸堤逐步修筑，分布渐广（见表 3-4），两岸湖泊渐被围垦。如西岸之董家湖、张家湖、刘家湖、杜家湖“旧俱有堤，水绕城西、南、北三门，为护城垸”，管田湖在道光时曾筑有堤；东岸之郝家湖则称为“邹郝院”，南、北二湖虽籍隶公安，粮则纳于江陵县。^①

表 3-4 清同治年间公安县垸田分布简表

| 垸 名 | 方 位 |
|--|----------|
| 护城垸（即范、彭、张三垸） | 绕祝家冈旧城西北 |
| 小月垸 | 祝家冈城南门外 |
| 西理垸、辛向垸、永盛化家垸、 | 牛头里 |
| 护道垸（即牛马蒋垸）、管驿垸、稳子垸、大秉垸、王郭垸、小庙垸、侯老新兴垸、六合垸、吕家垸、宋家垸、刘陈垸、接龙垸 | 东村里 |
| 白家垸、义和垸、范林垸、毛公垸、西泥垸、 | 茅穗里 |
| 鳌山垸、大昌垸、管田垸、 | 谷升里 |
| 顺河上垸、顺河南垸、野猫垸、三合垸、同心垸、陈廖垸、军民二垸 | 刀环里 |
| 新兴垸、协心双合垸、 | 廖解里 |
| 马子垸、松林垸、双田垸 | 长安里 |
| 胡文龙垸 | 瓜大平廖等里 |
| 史家垸 | 板、市等里 |
| 武侯垸 | 大光里 |
| 东吕家垸 | 鲁陂里 |
| 古驿垸、官大垸 | 西辛里 |
| 邹郝垸 | 长、廖二里 |
| 淤泥垸 | 长特鲁赴里 |
| 人和垸 | 市镇里 |
| 胡斌垸（胡斌塄） | 赴陂里 |

资料来源：同治《公安县志》卷三《民政·堤防》。

① 同治《公安县志》卷一《地輿·湖陂》。

清末至民初，公安县垸田进一步发展（见表 3-5）。虎渡河两岸筑有虎西、虎东、大定、三善、大胜、维新、同泰、恒德、永长、福星、萧家、永昌、黄金、同兴、保和、蔡田等多垸，在黄金支河沿岸亦筑有大胜垸、同泰垸、恒德垸、永长垸、西大垸、双合垸、春和垸以及全、永、接、福四小垸等（见图 3-8 《民国初年公安县堤防示意图》^①）。其中，西大垸、东大垸、护道垸、恒德垸、顺河垸以及与江陵合修的虎东垸、大定垸，与江陵、松滋合修的三善垸等，包田各超过二万亩；恒德垸更是惊人，达四万五千七百六十亩；此外，大兴、和顺、复兴、全永接福垸等包田分别超过了一万亩。^②

虎渡河以东的大定垸、黄金垸、大胜垸，以西的同兴垸等，垸内均有险要工段。诸垸多处设闸、剷以消泄积潦，于险工段或筑石矶护岸、或抛碎石护堤脚、或筑月堤，防江措施与修垸技术均有使用，开发水平较前代明显进步。

与监利县类似，清代后期公安县的一些小型堤垸也出现了合垸之势。如顺河垸，“系松陶、合兴、淘溪、后来、复昌五垸合挽，以御顺河之水。建石矶一座，石闸二座，每届工程由五垸共举经理经修。松陶包田二千四百亩，合兴包田六千亩，淘溪包田二千一百五十亩，后来包田八百三十七石七斗七升（一石为五亩），复昌包田九千亩，共计受益田亩约二万余亩”^③。又如全永接福垸，由全福、永平、接福、福田四小垸合修，“全福包田千亩，永平包田四百余亩，接福包田六千亩，福田包田四千余亩”^④。

今虎渡堤北接江陵县长江干堤，下分为西岸堤和东岸堤，虎西支堤北段属江陵县，虎东支堤属公安县，两堤隔河相望，是江汉平原江南支堤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据《湖北堤防纪要·公安县堤防图》绘制。

②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

③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顺河垸”条。

④ 《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全永接福垸”条。

表 3-5 清同治至民国初年公安县垸田简表

| 垸 名 | 工 程 简 况 |
|-------|---|
| 虎东垸 | 周围百余里，四面环水，包田五万余亩，系大工。 |
| 大定垸 | 周围计八十余里，有支堤临顺大河，长三十余里，素称险工。包田三万五千亩，系大工。 |
| 三善垸 | 周围计长二百余里，包田三万六千五百四十四亩，系大工。 |
| 大美垸 | 周围堤计三十六里，包上田二千一百亩、中田三千二百亩、下田三千七亩，系小工。 |
| 全福垸 | 周围计长二十余里，包田六千九百亩，系小工。 |
| 西大垸 | 周围计长六十余里，包田二万四千亩，系中工。 |
| 东大垸 | 周围计长七十余里，有石矶一座、石闸二座，包田二万七千七百亩，系中工。 |
| 申阮平洲堤 | 三洲堤共包田一万余亩，系小工。 |
| 大兴垸 | 上自东大垸、下至石首县，计长三千五百六十三余丈，包田一万七千二百亩，系中工。 |
| 全永接福垸 | 即全福、永平、接福、福田四小垸，包田共一万四千四百亩，均系小工。 |
| 中兴垸 | 附挽于恒德垸之外，原系一小淤洲。包田六百九十余亩，系小工。 |
| 人和垸 | 周围计十七里，建石闸一座，包田三千三百四十亩，系小工。 |
| 护道垸 | 周围计百余里，包田二万八千亩，系中工。 |
| 和顺垸 | 周围计四十余里，包田七千亩，系小工。 |
| 顺河堤 | 堤长二十余里，系松陶、合兴、淘溪、后来、复昌五垸共同经理，建石矶一座、石闸二座，共包田约二万余亩，系中工。 |
| 义和垸 | 垸堤长二千四百余丈，修有闸四座，包田四千亩，系小工。 |
| 德金垸 | 周围计长十八里，由德顺、金狮二垸合挽，包田三千五百二十亩，系小工。 |
| 同泰垸 | 周围计二十四里，包田六千零六十三亩，系小工。 |
| 兴盛垸 | 周围计长四千一百余丈，包田一千六百亩，系小工。 |
| 同福垸 | 垸堤四面临河，周围计长二十余里，有石矶三座，包田二千九百亩，系小工。 |

续表

| 垸 名 | 工 程 简 况 |
|--------|---|
| 同兴垸 | 周围十七里，素为险要，有石矶八座，包田三千零八十亩，系小工。 |
| 保和垸 | 堤长计一千四百余丈，有矶工五座，包田五千二百余亩，系小工。 |
| 太定垸 | 周围计长三十余里，在大美、全福之下，素称要工，包田八千五百亩，系小工。 |
| 复兴垸 | 四面滨河，周围计长三十四里，包田一万一千七百余亩，系小工。 |
| 彭范垸 | 周围计二十余里，内有顺河堤长七百三十余丈，素称险工，有石矶一座、大闸一座、小闸二座，包田四千余亩，系小工。 |
| 福星垸 | 周围计十五里，与协心垸有唇齿相依之势，协心不固，该垸亦不能独全。有剏一座，包上、中田六十余石，下渍田三十余石，系小工。 |
| 南大美垸 | 堤长十二里，滨江临河，险工居多，包田一千六百六十二亩，系小工。 |
| 黄金垸 | 即淤泥垸，周围计五十余里，有看护港堤及月堤，素称险工，包田三千余石，系小工。 |
| 协心垸 | 周围计十五里，包田二千八百余亩，系小工。 |
| 余德垸 | 周围计十一里，迎流处有矶三座，包田四百余石，系小工。 |
| 邹郝垸 | 周围计四十余里，分南北二堤，包田一千余石，系小工。 |
| 永长（昌）垸 | 周围计十余里，系淤泥垸旧址，包田三百余石，系小工。 |
| 顺河上堤 | 堤所以御松滋朱家埠下流之水，于天保、天申、保顺三垸关系至为密切，全堤长一千三百七十四丈，包田共九百余亩，系小工。 |
| 铁马垸 | 周围计十余里，包田二千余亩，系小工。 |
| 重新垸 | 原名永镇垸，周围计二十余里，计险工有四千六百余丈，堤身低矮，难于保固，包田六千余亩，系小工。 |
| 维新垸 | 系大扁湖、老城、苏家渡旧址，周围计三十九里，包田二万余亩，荒熟各半，系中工。 |
| 均益垸 | 倚顺河堤挽修，长八百余丈，包田七百二十一余亩，系小工。 |
| 春和垸 | 周围计十余里，建闸一座，包田二千三百余亩，系小工。 |
| 官垸垸 | 长六里，包田二百石，系小工。 |

续表

| 垸 名 | 工 程 简 况 |
|-----|---|
| 大胜垸 | 周围长十余里，有斗湖堤临江，素称要工，迎流顶冲抛碎石护脚，包田三千五百亩，系小工。 |
| 恒德垸 | 靠百家湾江堤为屏藩，堤长四千六百余丈，包田四万五千七百六十亩，系大工。 |

资料来源：《湖北堤防纪要》卷一《荆江段民堤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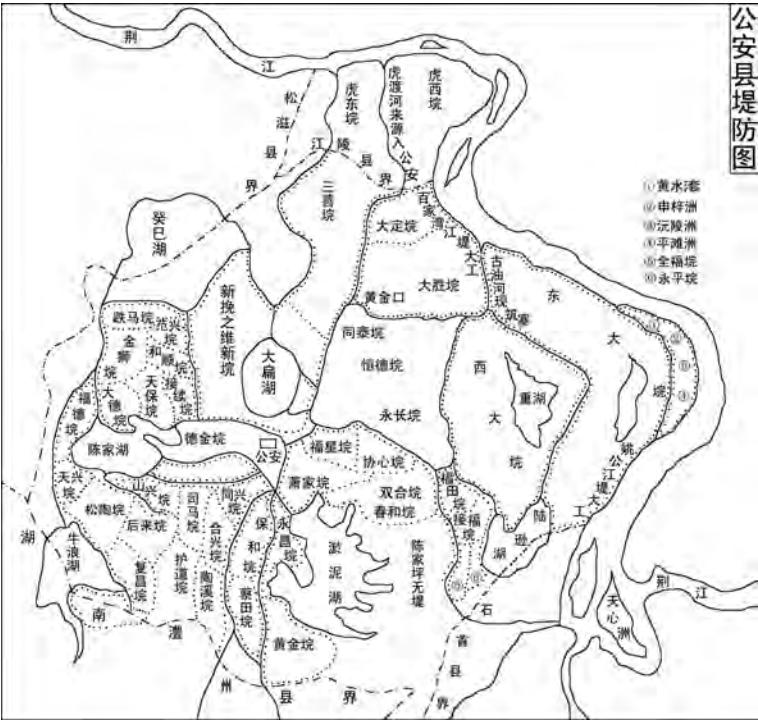


图 3-8 民国初年公安县堤防示意图

（七）华容县

北宋至和年间（1054～1056年），华容县河之滨有堤，为知县黄照修筑。黄照为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中第后初任归州（治今湖北秭归县）司理参军，后移华容县令。华容“邑西有田数千百顷，皆腴田也，而夏燥秋潦，民弃不耕”，黄照“筑堤置门，以时启闭之，遂常为丰岁”^①。此堤因黄照而得名“黄封堤”^②。黄照筑堤使华容的农业开发掀开了新的一页，故后人称：“自宋中叶，始建议筑堤捍水为民田，乃有耕种之事。”^③

华容地势低洼，饱受“江、湖两害，然湖水自下而上，其来有渐，故害犹易支；江源远而流狭，发迅且暴，日夕高四五尺、六七尺不等，倾注若建瓴，喧豗、搪突、回旋，挟风雨雷霆而至，声闻数里外，观者为之色变气沮”^④。尤其是元明以来调弦口的开塞不定，给华容县的防洪与农田开垦带来了诸多困扰，如乾隆《华容县志》卷三《水防》所言：

闻长老言：明宏、正时虽有四十余垸，然堤高厚不及隆、万时之半，彼时垸岁有秋，不闻时圯，以九穴十三口未壅，大江分作二十一派、并正派为二十二流归武汉故。正派之水虽涨亦敛，华止患湖而不患江，垸易为力耳。顾此九穴十三口，止石首之调弦及公安之虎渡在江南，余悉在江北。自明嘉靖……将江北之穴口尽塞，而调弦、虎渡仍旧。江水泛时，调弦几分江流之四，故万历中年九载七水，西里半壁绝炊烟，有由来也。时石首滨江田亩一概荒废，石首始从而堤之，石乃无江患，而华亦与有其利。自明末兵燹，陈公堤圯，湖南近水州县悉受其害，而华为甚，以去调弦不三十里故。

①（宋）刘摯：《忠肃集》卷一三《侍御史黄君墓志铭》，第269页。

② 隆庆《岳州府志》卷一二《水利考·华容县》。

③（明）王国祐：《华容田赋文》，转引自光绪《华容县志》卷一四。

④ 乾隆《华容县志》卷三《水防》“按语”。

明代以后，华容河两岸逐渐增修了县堤与黄公堤等四十五座垸堤。“县堤即官院，在县河之滨，周阔一十五里，阖邑居民赖此无垫溺之患”；“院堤在县境，濒洞庭，临大江。夏秋水涨，民遭垫溺。有司虽筑堤以障，随圯。正统间，工部员外郎王士华奉勅重修，内有黄公等堤四十五院，至今民赖以安”。^① 此四十六垸大体皆筑于永乐十年（1412年）之前，后发展为四十八垸。^②

弘治（1488—1505年）以后，分布于华容河沿岸的堤垸已有万庾堤（县北十五里）、涛湖垸堤（县北十里）、黄湖垸堤（县北）、蔡田堤（县西二十里）、朱家垸堤（县东二里）等；同时，华容县境的垸堤数亦增至五十二，较前有所增加。^③

正德至嘉靖间（1506—1566年），荆江水患对华容县产生了较大影响，故自隆庆初（1567年）开始，岳州知府姜继曾命知事刘世科、经历冉夔在县境已有垸堤之基础上，将垸堤数增至六十八座。华容河两岸亦较嘉靖时新见鲁家垸、宋家垸、伍家垸、菱溪垸、黄蓬垸、蔡家垸、澄江垸、蒋家垸、宫娥垸等垸堤（见图3-9《清末华容河及两岸堤垸示意图》^④）与嘉靖时相比较，隆庆以后修筑的垸堤逐渐向华容河东岸一带以至洞庭湖区扩展。

隆庆初修建的堤垸给华容县带来了较大变化。隆庆《岳州府志》卷一二《水利考·华容县》录有孙斯亿撰写的碑铭，称：“嘉靖末年，垸或少委。修饬无方，臻至大毁……昔者垫溺，揭妻子逃。今来故土，田园其饶。田园人辟，户口人增。官逋以足，国赋以盈。”不过，碑铭最后写道：“讵知辛未，洪流再扬。诸院尽坏，不辨疆场。”辛未即隆庆五年（1571年），此时的洪流来自调弦口分流，正是因为该时期调弦分流量增大，才有了万历三年、四年

① 弘治《岳州府志》卷六《华容县·津梁志》。

② 万历《华容县志》卷三《水坊》所录华容人孙羽侯之碑记称：“成祖十年，邑人以水决四十六垸，请命发旁郡邑民修之。至睿皇帝时……即其地画为四十八垸。越数载，绩成。”由于县堤直接防御华容河水、拱卫县城，地位重要，其修筑不当晚于四十五垸，成祖十年（1412年）溃决之四十六垸当包括县堤。

③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七《岳州府·山川·华容》。

④ 据《华容县水利志·华容县1882年堤垸位置图》绘制。



图 3-9 清末华容河及两岸堤垸示意图

(1575年、1576年)石首陈公堤的复筑。

万历年间(1573—1619年),华容县加强了垸堤建设。万历十五年(1587年),知县孙春芳“概修诸垸,仍合筑安津、蔡田,去其界”;万历三十年(1602年),经知县王绪力请,分守右布政使梁云龙“发旁郡邑粟若干石、金钱若干缗,大加修筑”;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和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华容县又两度复修诸垸。^①

明末,调弦口分流外加陈公堤废止,使华容县水患日渐加重。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雍正五年(1727年)、乾隆七年(1742年),县邑垸堤三次遭受大水侵袭。乾隆中期,华容县进一步加强华容河两岸的垸堤修筑。在西岸,堤垸(官垸)周长十七里,较明代略长;蔡田垸堤长十五里,涛湖垸堤长五里,菱溪垸堤长二里,伍家垸堤长一里五分,张家垸堤长四里,安息垸(又名安津垸)堤长八里四分;七垸已“迫近江水”,其面积较明代时有所扩展。东岸,黄蓬垸堤长十五里,张家垸堤长三里,朱家垸堤长三里五分,兔湖垸堤长十五里。此外,县西有桃树、宋家、林家等二十一垸,“迫近洞庭”^②。

乾隆之后,华容河两岸又增修了一些堤垸。据光绪《华容县志》卷二《建置志·堤垸》,东岸有罗合垸、五一垸、双南垸、夏铺垸、伍田垸、蔡家大兴合垸、磐石垸、陈德垸、陈兴南北垸、承恩垸(陈恩垸)、止澜垸等新垸(见图3-9)。其中,双南垸已接近石首界,使东岸堤防愈加向北延伸;罗合垸则沿华容河东北一支向东延伸,更接近洞庭湖;蔡家大兴合垸、磐石垸、陈德垸、陈兴南北垸、承恩垸、止澜垸等亦逐渐向县治东南的洞庭湖区推进。西岸,新修了陈公垸与护三垸。陈公垸在县南,内包田亩约一千三百亩;护三垸在县西南,长七十余里,为官垸、蔡田垸和安津垸的保障堤,其中还围有多个小垸。

要之,自宋元以来,华容河两岸的堤垸不断变迁,光绪《华

① 本段参见万历《华容县志》卷三《水坊》。

② 本段参见乾隆《华容县志》卷三《水防》。

容县志》卷二《建置志·堤垸变迁纪略》较为详尽地描述了这种变迁，并总结道：“要而论之，国赋民生，以田为命，田以堤为命，堤以护城为最要……官斯土，居是邦者，宜思患而预防也。”

华容河两岸的堤垸多系围湖而成，又受到堤垸增多、调弦口来水增大以及江水泥沙落淤的影响，故各垸均面临着积水难排的问题。下面，以华容河西岸的堤垸为例来考察此问题。

华容河西岸最重要的垸堤是万庾堤，位于县治以北十五里（一说十里）。乾隆时其北有张家、伍家、菱溪、涛湖四垸，南有安津、蔡田两垸，六垸相连。其中张、伍、菱、涛四垸“止畏江水”，安津垸“止畏湖水”，蔡田垸“江、湖两畏”。张、伍、菱、涛四垸之田亩不及安津、蔡田两垸的十分之二，然而，受调弦口分流直接冲击，堤工甚险，难以修护，若四垸堤决，则水“从张、伍而入，中没蔡田，必决安息之南堤而出，犹之贼来后门，去必前门也。尤有憾者，即使张、伍等垸不溃，春雨弥两月，数垸积水尽归安息。安津既无剝可抽，堤皆国帑所修，每一口约费五六十金，谁敢开掘者？故安息于今宛一大湖，不惟本岁无田，并明岁当亦尔也”^①。于是，亟待修治万庾间堤以阻张、伍等四垸来水。

早在明代修垸时，“每垸皆有间堤，使一垸溃，溃止在一垸”。只是明末时，“垸尽荒芜，正堤与间堤皆朽”。在修复万庾间堤的过程中，蔡田、安津两垸士民屡次兴工，但“事举无成”，其原因一是工程难度大，如安津垸有广阔的内湖，又位于多垸之下，水尽归其中，“故急需一剝以为蓄泄之所”；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张、伍等垸民“从而间之”，仍欲“以邻为壑”，故时人呼吁由官府出面主持工程，“不然，安、蔡有垸如无垸耳”^②。

除了加修间堤之外，万庾堤还因地制宜地以植芦种柳等方式进行堤身防护。由于“江水循张、伍、菱、涛四垸而下，直冲万庾堤，纵坚，能砥柱中流乎？”因此，“宜于堤根外远二十余丈，冬月密种芦根，插杨柳数十层。不一二年，芦苇成丛、杨柳成林。

① 本段参见乾隆《华容县志》卷三《水防》。

② 本段参见乾隆《华容县志》卷三《水防》。

水性刚，此物能柔软之；水势急，此物能缓之。万庾不溃，即蔡、安二垸可保矣”。值得注意的是，万庾堤以芦苇与杨柳护堤的做法与其他垸堤“宜种荻苇、不宜植杨柳”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荻短芦长，荻不适于万庾堤；而杨柳“虽易生之物，而牛畜摇动，或值岁旱，十不能生一二；且性不耐久，不十余年即枯，枯则根腐败堤”，又不适于其他垸堤。^①

虽然临河各垸皆加固堤防，彼此之间有间堤隔水，并设剏闸以蓄泄，但垸田的膨胀使得水道壅塞、渍灾严重。光绪《华容县志》卷一《地理志·水道变迁纪略》称：“江水浊多淤，湖水清无淤。因淤而壅塞，因壅塞而沈塌。附郭诸垸，动辄受渍。外成高岸，湖皆为田；内如釜底，田皆为湖。”且垸垸以间堤相隔，水无出路，遂至逆行。如前述安津、蔡田两垸，其内本有大湖，当万庾间堤不能保持完筑时，其上张家、伍家、菱溪、涛湖四垸之水将直入两垸；加之垸剏难修，原本南出之渍水竟改从万庾北口出。^②即便修有垸剏，诸垸之水亦难同时顺畅排出。如护城垸，“向有三剏泄水者，今惟东剏一口。一针之细孔，其能浚万顷之巨浸乎？数日之疏泄，其能导四时之积潦乎？”^③

在王廷端的《石首重开古穴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宋以来的筑堤围堰，一方面使过去低洼多水的地带改造成了农田；另一方面使分流穴口逐渐堵塞，过去调节水量、分流洪水的天然平衡机制受到影响。不过，元朝前期这种逐渐失调的人地关系，尚可可通过重开穴口、退田还水来调整；明代中叶以后，荆江大堤连成一体，长江北岸最后一个分流穴口在嘉靖年间堵塞，垸田渐趋饱和，众多湖泊大量消失；至清前期，随着垸田的膨胀和人口的激增，江汉平原已很难退田还湖，洪涝灾害亦越演越烈。

① 本段参见乾隆《华容县志》卷三《水防》。

② 光绪《华容县志》卷一《地理志·水道变迁纪略》。

③ 光绪《华容县志》卷一《地理志·水道变迁纪略》。

第三节 垸田之外：传统垦殖方式的延续

宋元江汉平原农田垦殖最主要的成就是垸田的兴起，但是，由于垸田的兴建方法较为复杂^①，宋元江汉平原尚未能普遍采用垸田方式，传统的农田垦殖方式仍在延续并发展。

一、水利与屯田、营田的发展

（一）水利事业的进步

与丘陵、山地等其他地形相比，江汉平原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地势平坦、“沃野广袤”^②、“其土宜谷稻”^③，自唐代以来，江汉平原的土地垦殖在河湖水泽地区洲渚的开发上已有显著进步，如前述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李皋在荆州塞古堤辟良田、“亩收一钟”^④；又如韦宙在江陵的别业，号称“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⑤。不过，唐代对江汉平原湖泽洲渚的开发仍以前代沿江筑堤的方式进行，这与南宋末年兴起的四周以堤防防护、具备排灌工程设施的垸田开垦方式在技术上差距甚远，这表明唐代的江汉平原尚未具备全面开发平原湖泽地区的技术与社会条件。^⑥

入宋以后，江汉平原与湖南同被李纲誉为“最为出产谷米财物”^⑦之地。平原区密集的湖泊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灌溉之便，当

① 参见前揭《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四章“垸田的开发”，第89~91页。

②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五《风俗》。

③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荆湖南北路·总论”。

④ 《唐会要》卷八九“疏凿利人”条，第1922~1923页。

⑤ 《太平广记》卷四九九“韦宙”条，第4095页。

⑥ 参见前揭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第二章“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的发展”第三节“唐代长江中游地区的土地垦殖”。

⑦ （宋）李纲：《梁溪先生全集》卷六六《具荆湖南北路已见利害奏状》，道光十四年陈氏重刊本。

发生淤浅时，还“土旷易垦，食物旋给”^①，成为百姓的逐利之地。但是，湖泊的密布和低洼的地势也有不利因素，如湖区面积的广大会使平原的可耕地面积相应减少，汉阳军（治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即为一例：“无湖无江之处十之二三耳。”^②低洼地带易受水患影响，“不宜蚕桑”^③，还常“频歉少穰”^④。由于地处泽国，水患是影响江汉平原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水利事业的好坏是农田垦殖能否开展的前提。用冀朝鼎先生的话来说，农业生产是随着灌溉事业、防洪事业以及人工水道系统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⑤北宋江汉平原的农业正是在水利的兴修与利用中发展的。

本区“农田以堤为命”^⑥，关于堤防的发展与变迁，本书第一和第二章已有研究。不难看到，宋元时期在江汉平原的长江南北两岸、汉水两旁均有不同程度的堤防修筑；在平原腹地的监利县（治今湖北同名县）和玉沙县（治今湖北仙桃市境），局部性的江堤有很大发展；长江南岸的松滋县（治今湖北松滋市西北）、公安县（治今湖北公安县西北）、石首县（治今湖北同名市）境内的江堤或从无到有，或继续拓展，或发展为防水效率更佳的石堤；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江堤在扩展。在堤防的维护下，农田垦殖较前代有了更多的保障。

兴修堤防之外，本区水利事业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浚渠道、通沟洫。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十一月七日的诏书明示荆湖与江淮、两浙、京东西等路“每岁于二月间未农作时兴役”^⑦，开修辖下的

① 嘉靖《沔阳州志》卷九《食货》，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影印明嘉靖九年刊本。

② （宋）黄幹：《勉斋集》卷二八《汉阳申朝省筑城事》。

③ 康熙《荆州府志》卷五《地理志·风俗》。

④ 嘉靖《沔阳州志》卷九《食货》。

⑤ 参见前揭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8页。

⑥ （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二〇《回奏边民习射指挥》，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一一。

圩田、河渠、堤堰、陂塘等处。也是在仁宗时期，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兵马铃辖王逵“浚渠为水利”^①，安州（治今湖北安陆县）陈知州“教民通沟洫，趋农桑”^②。

在陂湖利用方面，皇祐元年（1049年）规定了荆湖路州军的陂湖“明置簿籍拘管，永为众户贮水荫田，更不许人户以起纳租税为名辄行请射”^③。徽宗初年，荆湖北路等处出现了将“久来众共灌溉食利陂湖一概比附坊场，令人户买扑收钱以助学费”的现象，于是朝廷在政和元年（1111年）下诏“弛陂湖塘泺之禁，依元丰旧法与众共利，听其汲引灌溉”^④。水车开始广泛使用，“陂下卧轮车乍歇，田间鸣鼓稻齐秧”^⑤，水车与陂塘相结合，发挥着辅助灌溉的作用。

宋元江汉平原水利事业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懂得充分利用天然资源以资灌溉，尤以荆门军（治今湖北同名市）的蒙、惠二泉最为突出。时人赞誉惠泉“千古灌稻麦”^⑥，“岁常稔谷”^⑦。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年），知荆门军彭乘“延其流至竹陂河入汉江，民引以灌田”^⑧。荆门的南泉则有“溉田千亩”^⑨之效。应城

①（宋）曾巩：《曾巩集》卷四二《荆部郎中致仕王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84年校点本，第574页。

②（宋）曾巩：《曾巩集》卷四七《太子宾客致仕陈公神道碑铭》，第638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一三。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三二、三三。

⑤（宋）刘摯：《忠肃集》卷一七《五月十日发俞潭先寄王潜江》，第387页。

⑥（宋）苏轼：《苏轼全集》诗集卷二《荆门惠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⑦（宋）刘摯：《忠肃集》卷一五《荆门军惠泉呈李使君舜卿》，第325页。

⑧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湖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元年刻本。

⑨《舆地纪胜》卷七八《荆门军·景物（上）》。

县（治今湖北同名市）西南的温泉也在发挥灌溉的作用。^①

作为水利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工水道系统的开发也是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开凿“荆南漕河至汉江，可胜二百斛重载”^②，大大缩短了江陵至襄阳的航程；仁宗时，“又开新河通漕”^③。这类人工水道系统的修建，最初目的是向政府运送贡纳谷物^④，结果也大大便利了区内的水上交通与运输。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湖北上供米粮三十五万石^⑤，其中一部分即来自江汉平原。

宋神宗熙宁三年至熙宁九年（1070—1076年）期间，荆湖北路开发的水利田达二百三十三处，共八千七百三十三顷三十亩^⑥，在北宋全国十九个地区中处于中游水平。考虑到北宋时期荆湖北路的户数较少^⑦、户均垦田数三十九点五亩^⑧，可以认为北宋时江汉平原粮食产量的绝对数量虽不算高，但已经能够自给，这与水利事业的进步密不可分。

（二）屯田、营田的发展

与北宋时期较为不同，南宋江汉平原农田垦殖的发展，采取的主要是大规模屯田、营田形式。

两宋之际发生的战争、动荡，阻断了江汉平原农业的持续发展。一时之间“汙莱弥望，户口稀少”^⑨，人口的大量流失使劳动力极为短缺。但重要的军事地位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使江汉平原在南

①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四四《德安府》。

② 《宋史》卷九四《河渠四》。

③ （宋）曾巩：《曾巩集》卷四二《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志铭》。

④ 参见前揭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8页。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之二。

⑥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六九。

⑦ 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第四章“宋代户口数据的考证和估测”表4-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30页。

⑧ 参见前揭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第一章“各地区的生产环境”，第66页。

⑨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上二》。

宋时期受到较多的关注，东来西移的民众陆续流入本区，政府也鼓励流民返乡垦荒，特别是从绍兴元年（1131年）开始，江汉平原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营田，并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

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时任荆南府归峡州荆门公安军镇抚使的解潜，因看到所辖“五州军一十六县绝户甚多”，荒废官田“不可胜计”，遂乞措置屯田。^①自此，江汉平原开始了南渡后的大规模屯田、营田。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创造出适宜当时需要的屯田方法，将逃亡者的官田和荒田让官吏、弓兵、民兵等各自耕种，以官钱支发牛具种子；有屯兵耕垦不尽的，招集失业之民耕作；招集流亡他乡的农民归业，还给她田产，若已被他人耕凿，则依数拨还，并不得以瘠田充数；轻其租赋；屯田兵有事即征战，无事则忙农田，但兵与民分处，各得其安，民渐归业；农民开垦该地满二年，不拖欠租税且克守己业的，可以将田典卖等。^②绍兴二年（1132年）之后，陈规的屯田法得到推广。随后，在江陵府，百姓“自有耕牛者，除输纳赋税外，不得抑勒耕种营田。其营田许募民间情愿种者，官为给借种粮，每一耕牛纳课一十硕，纳课稍轻，民自应募”^③；在郢州，“诸军下不入队、使臣、军兵及不能披带并拣退军兵等，有所愿请佃之人，并依百姓体例以五顷为一庄，官给耕牛五具并种粮等，其所收物斛以十分为率，四分给力耕之人，六分官收”^④。绍兴五年（1135年）八月，王彦在江陵屯田，又“择荒田分将士为庄，庄耕千亩，治石塘、瓦窑二废堰，计工六万有畸”^⑤。同年十一月，王彦已营田八百五十余顷，为解决耕牛不足问题，从四川购入一千七百头牛。^⑥仅此一处，垦田的规模就相当可观。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七。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九、一〇、一一。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一四。

④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二。

⑤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二，绍兴五年八月壬寅条，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五，绍兴五年十一月丁酉条。

绍兴十九年（1149年）时，由于“旷土尚多”，户部请立赏格：“（淮南、湖北）每州增垦田千顷，县五百，其守宰各进一官，即州亏五百顷，县亏五之一，皆展磨勘年。”^①在政策的鼓励下，流民逐渐归业。然而，在政策推动的同时，官府又对垦荒者征税太快，结果导致回流人员再次逃亡。鉴于此，乾道四年（1168年）二月知鄂州李椿“乞募人请佃，与三年六料税赋三年之外，以三分之一输官，所佃之田给为己业，至六年递增一分，九年然后全输。或元业人有归业者，别给荒田耕种”^②，并得到批准。针对营田过程中出现的土地包占现象，乾道八年（1172年）规定本地“包占田亩以二年为限”，期满的可“展限半年，如违，许人划佃”^③。对于营田中出现的田产纠纷，政府明确抑制诬告行为，乾道八年（1172年），湖北就不受理“妄执契书告讦之人”的官司。^④淳熙五年（1178年）七月，再次重申：“其有妄执契书告讦官司，不得受理。若包占顷亩未悉开垦，自今降指挥日以二年为限，限满不能遍耕，官司拘作营田。”^⑤另外，淳熙元年（1174年）还禁止湖北路出卖营田及科扰百姓，因其“利害尤明。盖一顷岁收谷八十余硕，若出卖价钱止五十缗。不可以五十缗目前之利而失八十斛每岁之人”^⑥。

有效的屯田、营田，使江汉平原在经历了两宋之际的劫难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至孝宗时（1163—1189年）已是一片“麦田千里碧”^⑦的景象，出现了穷乡之民“非江浙、荆湖诸路之比”^⑧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〇，绍兴十九年十一月丁未条。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一八。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二二。

④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二二。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二七。

⑥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二七。

⑦ （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一四《郢州二首》，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宋）王十朋：《梅溪先生集·奏议》卷三《夔州论马纲状》，明正统五年刘谦刻等本，天顺六年重修本。

的说法，与江浙并称，俨然被视为“富乡”。

南宋时期江汉平原长期进行的大规模屯田、营田不仅带动了当地农业的恢复，对驻扎在江陵至鄂州一线十数万大军的军粮供应也发挥着保障作用。据载，绍兴十年（1140年）“荆州之赋仰给于营田者，岁省县官之半”^①。绍兴十二年（1142年），仅岳飞一军的营田便收获稻谷十八万余石。^②

连续的屯田、营田还使一些因战争破坏而人户稀少的地方，如荆门军，“倍垦荆榛以为田而旷野以辟”^③。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洪适知荆门军时，长林（治今湖北荆门市）、当阳（治今湖北同名市）两县多处有官兵营田，营田处“即是良田，实收课利”^④。人户较多的则农田垦殖扩展显著，如鄂州，至淳熙年间（1174—1189年），“诸州田土开耕九亩（分？）以上，其未耕者止是些小高仰瘠薄之地”^⑤。

元代继续实施宋代的垦荒屯田措施来恢复农业。对南宋末年孟珙等人在江汉平原大范围的屯田，元初加以有效利用。元人自称：“经理荆湖屯田废地，岁可出粟百余万。”^⑥其中，又以德安府的屯田为代表。如上所述，至元十八年（1281年），德安府成立屯田万户府，分置十屯，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时，参与屯田的百姓达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士兵五千九百六十五名，垦田八千八百七十九顷九十六亩。^⑦屯田之外又开辟了新的农田。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廉希宪至江陵后，决“三海八柜”之水，“得良田数万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一。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四，绍兴十二年三月庚戌条。

③ （宋）楼钥：《攻媿集》卷五九《荆门军义勇甲仗库记》。

④ （宋）洪适：《盘洲文集》卷四九《荆门军奏便民五事状》，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

⑤ （宋）赵善括：《应斋杂著》卷一《上尚书省札子》，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亩”当作“分”，疑误。

⑥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八《梁国何文正公神道碑》。

⑦ 《元史》卷一〇〇《兵三》。

亩，以为贫民之业”^①。地处平原腹地的沔阳，元代时得到显著开发，“号称陆海”，一次竟赐田八千亩作为公田。^②

（三）粮食产量的提高

有关宋元江汉平原粮食产量的数据缺乏，但从其所在荆湖北路的相关数据以及有关本区粮价、粮米外运的描述，人们不难看到，伴随着水利事业的进步、屯田营田的发展，宋元江汉平原的粮食产量较前大幅上升。

绍兴十八年（1148年），荆湖与江浙因上供米纲仅三百万石，不足行在支出，又在湖北增余十五万石。^③ 营田的成效，在南宋初年已经显现。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湖北常平义仓及和余米达六十三万石，并与十万石马料“赴湖广总领所交收，以备军用”^④。与淳化四年（993年）湖北上供米粮三十五万相比，绍兴时期江汉平原在内的湖北农业产量增幅显著。

米价的变化也可反映本区粮食产量的提高。绍兴十二年（1142年），湖北“雨暘时若，年谷顺成，今米价每斗止于百钱”^⑤，与北宋仁宗宋夏战争爆发后的米价持平，比绍兴初年每斗米过千余钱的价格大幅下降。^⑥ 随后的大丰年，米价又下滑至“升不过六七钱”^⑦。江汉平原呈现出北宋以来少有的年谷屡丰景象。乾道二年（1166年）七月，监户部和籴场郑人杰言：“年来丰熟，米价低平，荆门、襄阳、郢州之米每硕不过一千，所出亦多。荆门、沙市、鄂州管下舟车辐辏，米价亦不过两千，诸州皆有仓廩可以盛贮。”^⑧

①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②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二《元故奉元路总管致仕工部尚书韩公神道碑铭》，第184页。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七，绍兴十八年闰八月甲子条。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〇，绍兴三十一年五月丙申条。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〇之二四。

⑥ 详参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之《北宋物价的变动》与《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

⑦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〇，绍兴二十八年十月壬辰条。

⑧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〇之四四。

鄂州的收获亦不菲。乾道三年（1167年），鄂州“夏秋两科收五万余硕，其黑豆喂牛，大麦、稻谷充马料，所有小麦、粟谷、杂豆巢发价钱……欲乞将已后屯田所收大麦、粟、稻置仓椿顿”^①。乾道七年（1171年），中书门下言，湖北等州军“二麦丰熟倍于常年，理合措置收籴大麦椿充马料”，委任吕游问赴鄂州“收籴大麦十万硕”^②。翌年，黄州、汉阳军与江西、湖南等产粮区丰稔，米价皆“每硕不过一贯四百文”^③。

在产量增多的基础上，江汉平原有了在区内调剂丰歉的能力。绍兴三十年（1160年）鄂、荆大军几十万石的用米量，系由本区德安、荆南府、鄂、复州（治今湖北天门市西北）、荆门、汉阳军与周边州军共同提供。黄榦知汉阳军时曾奏请荆湖南北路与两浙、江东西路一起，“择沿江十数大郡起立仓廩，使可积数十万石。才遇丰熟即于诸郡和籴椿积，则十郡可积数百万石”^④。当汉阳军遭遇大旱时，黄榦曾在德安、复州和本军汉川（治今湖北汉川市）收米四万石用于赈灾，其中仅汉川一县就籴入万石。^⑤

同时，江汉平原还具备了一定的粮食外援能力。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九月十六日，大理正章岵言：“荆湖今岁大稔，米升不过六七钱。汉世江南乏食，则下巴蜀之粟以赈之。望遣于荆湖措置籴米，不惟有益于荆湖之农，亦可以宽江浙民力。”^⑥ 此处荆湖当包括南北二路，江汉平原作为当时荆湖北路主要的生产恢复地区，自包括在内。据宋人所见，当丰收之年，多有荆湖米船“上至归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一七。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〇之五二。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〇之五四。

④ （宋）黄榦：《勉斋集》卷二四《汉阳条奏便民五事》。

⑤ 参见宋代黄榦的《勉斋集》。黄榦在书中多处提到此事，如卷二四《汉阳条奏便民五事》、卷三〇《申朝省乞候救荒结局别行措置筑城事》与《申转运司乞止约客庄搬载租课米事》等。

⑥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〇之二九、三〇。

州、夔州”^①。淳熙七年（1180年），忠州（治今重庆市同名区）、万州（治今重庆市同名区）大歉，饥民甚至“易子而食”，此时的江陵府也遭遇干旱，但知府高夔仍“移粟万计溯江助之”^②。绍熙期间（1190~1194年），陈居仁知鄂州时政绩突出，为民众喜爱，在改知镇江府（治今江苏同名市）后，适遇饥荒，居仁“间遣余运于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陈待制耶？’争以粟就余”^③，于是“米舟沓至，价遂以平，郡民不知饥之为害也”^④。由于江汉平原产米较丰，诸处的余米之舟常不问丰歉如期而至，致使本地若遇灾年自顾不暇时，只得想尽办法“禁米舟下河”^⑤。

元代，江汉平原开始成为所属河南行省的重要粮产区，承担了该行省每年征粮额的相当部分。^⑥天历二年（1329年），淮南遭遇旱灾，荆湖曾漕米一万八千石接济^⑦；同年，还“命江西、湖广分漕米四十万石，以纾江浙民力”^⑧。南宋至元朝时期，每当江淮欠收，朝野的视线就会投向湖北。这种向发达狭乡的米粮输出，是本区粮产量上升的结果，也是明代以后本区米粮大量外运的序曲。

二、农业生产方式与主要作物分布

（一）生产方式

如上所述，宋元江汉平原的粮食产量较前有大幅度的上升，但

①（宋）汪应辰：《文定集》卷四《御札再问蜀中旱歉》，武英殿聚珍本丛书。

②（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五《淮西帅高君夔神道碑》。

③《宋史》卷四〇六《陈居仁传》。

④（宋）楼钥：《攻媿集》卷八九《华文阁直学士奉政大夫致仕赠金紫光禄大夫陈公行状》。

⑤（宋）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卷一六《与章德茂》之五，同治十年大儒家庙重刊本。

⑥ 参见前掲章开沅等主编《湖北通史·宋元卷》第六章“元代湖北经济状况”第二节“农业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⑦（元）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一二《故武德将军吴侯墓志铭》，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元史》卷三三《文宗二》。

是，这种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进步。根据研究，北宋中期荆湖北路户均垦田 39.5 亩^①，较少的人口拥有较多的垦田，决定了此时期本区农业更多地是以广种薄收的方式经营。

彭龟年在《乞权住湖北和籴疏》中称：“湖北地广人稀，耕种灭裂，种而不蒔，俗名‘漫撒’，纵使收成，亦甚微薄。”^②也许正是因为人口稀少，才使得本区的大部分地方失去了追求精耕细作的动力。地广人稀还导致了“耕之不力，种之不时，已种而不耘，已耘而不粪，稊稗苗稼杂然并生，故所艺者广而所收者薄”^③。王炎这么说的时侯，是乾道三年至四年间（1167—1168 年）在知荆南府任上。^④

但与此同时，本区粗放的经营方式也在开始发生变化，淳熙九年（1182—1183 年）鄂州知州罗愿发布的《鄂州劝农文》可以说明这一点。文称：

莠叶初生，于是始耕。务限既入，农事转急。禾当播种，乘雨接湿。高田大豆，榆莢为候。三月区处，油麻穰黍……蚕沙麦种，四月收贮。开渠决窦，以待暴雨。月建在午，秧苗入土……七月芟草，烧治荒田。大麦小麦，上戊社前。禾欲上场，九月涂仓。缉绩布缕，十月多霜。冬至埋谷，预试五种。不宜者轻，宜者则重。腊月粪地，治碓雕桑。修治农器，向春则忙……耕既不深，难行根脉。耘既不勤，众草之宅。粪若不施，谷不精泽。收若不速，风雨狼籍。若能开垦，处处良田。若能灌溉，岁岁丰年。古来开畎，广尺深尺。长畎三条，于中种植。渐锄陇草，爬土畎中。苗根日深，耐旱与风。又有区

① 参见前揭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第一章“各地区的生产环境”，第 66 页。

② （宋）彭龟年：《止堂集》卷六，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③ （宋）王炎：《双溪类稿》卷一九《上林鄂州》，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参见李之亮《宋两湖大郡守臣易替考》“荆南府江陵府”，巴蜀书社 2001 年版，第 28 页。

种，与畎不同。方深六寸，种禾一丛。七寸一区，匀如棋局。区收三升，亩号百斛。用力既到，所收亦多。比之漫撒，效验如何。凡苗之长，全在粪壤。^①

尽管劝农文是在劝诱当地农民改良耕作方式，未必尽是事实，但它毕竟说明当地已开始接触与“漫撒”不同的开渠、除草、选种、施肥、深耕等多种耕作技术，更何况北宋时苏轼就在鄂州看到农民使用秧马拔秧^②，水稻直播方式已为移栽所取代。可见，“漫撒”方式并不代表整个江汉平原。

而且，宋代江汉平原一些地区已善于从当地条件出发，分水陆田、早晚稻进行耕种。荆门军即是如此。荆门军地势较高，多陆田，水田则“大率仰泉在两山之间，谓之浴田”^③。绍兴初年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在辖内推广屯田时，也分水、陆田两种，其所征税分别为“水田每亩秋纳粳米一斗，陆田每亩夏纳小麦五升，秋纳豆五升”^④。江陵学田分“水、陆田、林园”^⑤三类，说明当地也采取了水、陆分种方式。

（二）作物品种及其分布

时至宋元，稻、麦在江汉平原已分别有了千余年、数百年的种植历史。^⑥

水稻一直是本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粳稻与早籼在宋代的江汉平原皆有普遍分布。从本地秋税征收粳米的规定可知粳稻种植范围

①（宋）罗愿：《鄂州小集》卷一《鄂州劝农》，中华书局1985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宋）苏轼：《东坡全集·诗集》卷三八《秧马歌》，第466页。

③（宋）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卷一六《与章德茂》之三。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一〇。

⑤（元）柳贯：《待制集》卷一〇《承直郎管领巴图尔民户总管伍公墓碑铭》，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参见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第八章“粮食作物的分布与轮作方式的变化”第四节“荆湖区与西南区的粮食作物”，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很广；乾道八年（1172年）复州的中等占米每硕二贯六百省。^①糯米的种植较为普遍，产量也不少，宋代有“湖北糯米与饭米同价”^②的说法，元人称：“稻糯今年分外成。”^③糯米主要用于酿酒，糯米的产量较高从榷酒额与买扑额可知一二。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九所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本区诸县的榷酒、买扑额分别为：郢州二万九千六百零一贯六六文，黄州四万一千零一贯六百七十七文，江陵府一十六万五千九百六十五贯三十一文，鄂州八万四千二百六十三贯七十四文，安州五万九千零六十一贯二百六十六文。从宋人的诗文中亦可见水稻种植的普遍。^④如张耒称颂秋季的复州竟陵（治今湖北天门市）“稻穗如植旗”^⑤；王十朋途经鄂州时，留下了“秋深余晚稻”^⑥的诗句。

水稻的种植又分早、晚稻，但不是后世所说的双季稻、轮作制^⑦，严格地说，只可称作“再生稻”，即“早稻收割以后，留下一定高度的稻茎秆，由其自发、抽穗、结实”^⑧。这种“再生稻”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十月的江陵^⑨，景祐元年（1034年）十月的孝感、应城等地皆有分布。^⑩不过，“再生稻的产量，由于它是以‘望天收’的形式经营的……即使在土壤肥沃、雨水比较调适的情况下，产量也很有限”^⑪，因而对水稻的增产并无多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〇之五四。

② （宋）黄榦：《勉斋集》卷三〇《申转运司为客船匿税及米价不同事》。

③ （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一五《宿黄陂县南》，乾隆五十九年王鏊刊本。

④ 本书第五章第三节将对宋人诗文反映的江汉平原稻作生活展开研究，此处从略。

⑤ （宋）张耒：《张耒集》卷九《发岐亭宿故镇三首》，中华书局1990年校点本，第137页。

⑥ （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一〇《朝离华容》。

⑦ 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的相关研究，此从略。

⑧ 参见李长年《农业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⑨ 万历《湖广总志》卷四六《灾祥》。

⑩ 《宋史》卷六四《五行二下》。

⑪ 参见前揭李长年《农业史话》，第185页。

少帮助。

尽管本区的水稻种植面积较广，但限于资料的缺乏，尚无法在品种方面做出详细的统计，而宋代的农业发达地区，如歙州有稻种三十一个，会稽有稻种五十六个，常熟有稻种四十多个，仅乌青一镇籼稻种即有七十个、糯四十余种。^①

与水稻在平原的广泛分布不同，植麦区域集中于南阳以南至江陵的汉水流域。^② 宋太宗时，在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③，推动了植麦范围的扩大。北宋期间，除江陵、荆门等唐代以来的植麦区外，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市）、安州、汉阳军也有麦的分布。^④ 绍兴二年（1132年）闰四月郢州（治今湖北钟祥市）有麦“可刈”^⑤，反映出该地至少在北宋时已开始种麦。

南渡后，麦的种植更加普遍，“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⑥。麦类在江汉平原得到进一步推广，诸州军均有了种植。在绍兴初年开始的屯田中，夏税征收有小麦^⑦；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征收的夏税中，大麦被充作马料^⑧；淳熙年间（1174—1189年），鄂州江夏（治今武汉市武昌区）等县俱征大

① 参见前揭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第三章“种子的引进、培育和优良品种的推广”。

② 参见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续）》，载《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

③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

④ 《宋史》卷六四《五行二下》。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三，绍兴二年闰四月己未条。

⑥ （宋）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校点本，第36页。

⑦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一〇。

⑧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一七。

小麦为税。^① 春日的郢州出现了麦田“千里碧”^② 的景致。由于本地区麦类作物已经普及，所以在淳熙七年（1180年）劝民种麦的诏令中，湖北从需要推广的地区中消失了。^③ 接下来的年代里，大、小麦种植和成熟的记载不时出现。

在大、小麦得到广泛种植的同时，一些旱地作物如粟、菽、荞麦、黍、豆类在南宋的江汉平原也得到了普遍种植。前面提及陈规屯田时对陆田征收夏秋两税：“每亩夏纳小麦五升，秋纳豆五升。”从中可知，尽管南宋的江汉平原尚未实现大范围的稻、麦复种，但已开始陆田连作、一年双收。每当四五月份二麦收获后，豆、粟、菽、荞麦等作物即可下种，所以陆游在农历八月下旬路经鄂州杨罗洲附近时，看到地形渐高的岗丘上种有尚待收获的“菽、粟、荞麦之属”。粟的丰产可与麦相比，“粟、麦倍收，禾稼丰盈”^④，成为粮食市场的重要品种，曾有记载，一次购入可供数千士兵廪食。^⑤ 豆类、油麻也是平原常见的作物，在南宋初年的屯田中，豆是陆田的夏税征收对象之一，其中有黑豆、杂豆等。豆、麻也是荆门、江陵等地向官府输纳的品种。^⑥

经济作物方面，宋代本区最负盛名的当属苧麻。《宋史·地理志》中记载有郢州的白苧、黄州的苧布、江陵府的苧、德安府的青苧，皆为贡品，足证其品质优良。苧布则是复州、荆门军、鄂州的土产。^⑦

①（宋）赵善括：《应斋杂著》卷一《上尚书省札子》。

②（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一四《郢州二首》。

③《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

④（宋）楼钥：《攻媿集》卷一〇二《朝奉郎主管云台观赵公墓志铭》。

⑤（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一《方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85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⑥ 参见宋代洪适《盘洲文集》卷四九《荆门应诏奏宽恤四事状》；宋代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一四《荆南重建万盈仓记》，第142页。

⑦ 参见《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四《山南东道三·复州》，卷一四六《山南东道五·荆门军》，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土产”条。

比之苧麻，本地桑柘的种植更为广泛，无论是地势较高亢的平原周缘还是低洼多水的平原腹地，都普遍种植桑柘。前者如荆门军^①，后者如玉沙县，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陆游在玉沙县境的归子保就看到“多桑柘榆柳”^②。江陵府的丝、绫都是上供朝廷的精品^③，安州的丝也较为有名，熙宁十年（1077年）安州与江陵府分别纳丝一百两和六百六十七两。^④元代延续了桑柘的种植。江陵一带仍普遍植桑，沙市还出现了“紫椹累累桑柘浓”^⑤的景观；在复州，景陵河的两岸桑麻遍地^⑥，桑也成为德安府的屯田作物之一。^⑦

元末至明期间，桑柘种植在本区有萎缩的趋势，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所记各府的“土产”项下，仅有武昌府仍植桑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棉的种植区域扩大。湖北的植棉至迟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以前已经开始，所以这一年的四月，“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⑧。至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武昌府各县、汉阳府、德安府等地皆有棉的种植。^⑨

宋元时期传统的农田垦殖方式仍在江汉平原发挥作用，它与新兴的垸田一起，为本地区农业在明清以后的崛起准备了条件。

①（宋）王之望：《汉滨集》卷五《荆门军回论禁约公人下乡奏议》，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见（元）傅若金《傅与砺诗集》卷八《荆门闸中三首》，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③《宋史》卷八八《地理四》。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九之一六。

⑤（元）宋褰：《燕石集》卷九《沙市道中二首》，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宋）陈杰：《自堂存稿》卷二《景陵湖中宿人村》，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元史》卷五〇《五行一》。

⑧《元史》卷一五《世祖十二》。

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卷三《汉阳府》，卷五《德安府》。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考察了宋代至晚清荆江地区主要穴口的分流、湮塞的变迁及其原因，集中探讨了穴口分塞与当地以垸田为主的农田垦殖的关系。从中可见：

1. 荆江北岸郝穴的从开到塞与南岸虎渡、调弦、藕池、松滋等四口的分塞多变，以及新分流河道的形成，是历史上本区社会生产发展与自然环境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①

清朝前期，荆江北岸的穴口消失。南岸，经宋代以来的长期发展逐渐形成四口分流局面：虎渡口从南宋以后基本保持着稳定分流；调弦口时开时塞，自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 年）开浚后，约从明末开始持续分流，直到 1958 年调关设置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藕池口和松滋口出现晚、影响大，自明中叶以后，由于水沙关系、河势变化、构造运动等因素加速了荆江河道的演变，促使藕池口和松滋口在清后期形成。

从仅有虎渡一口分流到虎渡、调弦同时分流，再到四口分流，分流河道对荆江南岸地区的影响甚大，不仅给沿线地区带来了灌溉之利，还引起了洞庭湖的剧变，大大改变了荆江南岸河湖水系的格局，并造成了严重的水患，使得这些地区除了防范荆江水患之外，还需防范分流河道的侵害，因此，对于南岸地区而言，支堤的建设与江堤同等重要。

2. 垸田是本区人类垦殖活动最主要的手段与结果。宋元时期

^① 有关江湖关系演变研究的成果已十分丰富，此从略。大体上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多从人类活动角度探讨江湖关系的演变，如彭雨新、张建民等指出：“江湖关系的演变——长江两岸分流穴口之开塞，决非如一些旧方志所云，纯粹是由某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而是江汉湖区开发、围垸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参见前揭氏著《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第四章“两湖平原的堤垸水利与农业发展”，第 188 页。自然科学的学者则更关注自然环境的演变，如李长安认为：桐柏—大别山掀斜隆升运动是荆江北岸穴口湮塞与南岸穴口分流的主要原因，参见前揭氏撰《桐柏—大别山掀斜隆升对长江中游环境的影响》。

垸田在本区兴起，并日益成为本区最主要的经济形态。明清时期，在荆江北岸沿江堤防连成一线、穴口尽塞的过程中，荆北平原垸田大规模发展，既构成了本区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对本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日益明显的负面影响，河湖演变加快，荆北平原水道阻塞、水系紊乱，洪涝渍害日趋严重，垸田成为本区环境问题的焦点所在。

3. 垸田兴起的同时，江汉平原的传统农田垦殖在唐五代的基础上持续发展。水利事业的进步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上升；始于南宋初年、持续整个南宋时期的大范围屯田、营田活动直接促进了垦田面积的扩大、粮食产量的提高。尤其是在南宋末年长江沿线大兴屯田的过程中，江汉平原的垦殖方式逐渐由前代的筑堤护田向筑堤围田即垸田这种新兴垦殖方式过渡。传统垦殖方式与新兴的垸田一起，推动着江汉平原的全面进步。

第四章

资源利用：河流、丘陵与植被

——以宋代为例

自然资源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土地、阳光、水、森林、草地、矿产、生物等，无一不是人类所赖以生产、生活的资源。自然资源又具有区域性，“不同的地理环境，使得地球上各个区域资源条件不同，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资源生态环境”^①。本章所讨论的自然资源，仅限于河流、丘陵与植被，集中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探讨宋代江汉平原水路交通的发展、丘陵山地的开发以及矿冶、制瓷等手工业与植被的关系。

第一节 水路交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自古以来，江汉平原即有水陆并举的交通之便，水系纵横、河湖密布的优越地理条件，为本区的开发提供了充足动力。宋代，本

^① 孙颖等：《中国农业自然资源与区域发展》，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 页。

区对水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的一个主要表现便是水运交通的发展。

一、艳曲的散去：荆襄道在宋代的衰落

宋代以前，江汉平原与外界交通的干道是南北向的荆襄道，其中又以荆襄陆驿为主，水路为辅^①；在治水能力提高的宋代，水路交通成为本区交通的主导，陆路交通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交通重心从以陆路为主的荆襄道转移到水路，既促进了宋代江汉平原的经济开发，又是宋代以来江汉平原发展的具体表现。

据谭其骧先生所释“鄂君启节”铭文，早在战国时期人们便懂得利用本地区的水网穿越平原，通达他路：一是由长江入汉水，溯汉水上至白河，进入南阳盆地；二是沿江下至“彭蠡”，由“彭蠡”入庐江；三是从长江进入油河或洞庭湖流域的资、沅、澧三水；四是由长江经洞庭湖溯湘水可达南岭北麓等。^②当然，这一时期的交通利用水平很低。

汉魏迄隋唐，江汉地区的水陆交通逐渐发展，其中以荆襄道最为重要。荆襄道始自江陵（治今湖北荆州市），终于襄阳（治今湖北襄樊市），为南北交通主要路线之一。荆襄道陆驿、水道并举，不仅为南北用兵所倚，更为一般交通及商旅所利用，“商旅繁会，声色之娱最盛”^③。南朝至唐代，荆襄道由于商旅繁茂，“声色之娱之行业亦应运而生”，“考中古时代声色之娱之兴盛，亦惟襄阳、宜城、大堤特为显著”^④，题为《大堤曲》或《襄阳曲》的乐府诗

①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之篇贰捌“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参见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 参见前揭《唐代交通图考》之“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第1040～1041、1075页。

④ 参见前揭《唐代交通图考》之“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第1071、1077页。另据鲁西奇研究，南朝时的“大堤”当指今湖北宜城北境的华山郡治大堤城及其附近大堤，盛、中唐诗人所咏之大堤主要指襄阳城东的汉水堤，参见前揭《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三章“汉水中下游古代堤防考”，第177、181页。

歌极为常见。荆襄道可谓“中古时代最繁荣之交通路线”^①。

据严耕望先生考订，荆襄驿道陆程约五百里，其间经汉阴驿、桃林古馆、岷山、凤林关、鹿门山、疏口、襄河驿、宜城县、善谿驿、宜城驿、蛮水驿、乐乡县、荆门县、团林驿、武宁驿、观风驿、白碑驿、纪南驿等处，江陵县复置江陵驿、临沙驿、五花馆等驿馆。荆襄道另有自襄阳经南漳县（治今湖北南漳县）、四望山、麦城抵江陵之辅线。全程驿馆设置完备，可谓便利。荆襄道之水路由襄阳下汉水，舟行经宜城县（治今湖北宜城市）之古大堤城东、郢州治所长寿县（治今湖北钟祥市）至扬口，由此改浮扬水折向西南行至江陵，亦“极盛”。利用荆襄道，“由白河北运，已近河洛，旁及关中，由汉水南航，以通荆、鄂、湘、赣，远达岭表”^②。

陆驿既已通达，水路亦可“极盛”，这与水路的便捷有关。尤其在安史之乱以后，受时势变化影响，“南方物资之水运有时仍不得不取道汉水，由鄂至襄，或由荆至襄”^③。此外，唐代江汉平原区内的主要水道还有长江干道，连接长江与汉水的夏水等。^④

总体上看，汉魏隋唐时期的荆襄道水陆并举，以陆驿为主^⑤，为沟通南北的要道。

进入宋代，荆襄道的显要地位受到了来自长江干道的挑战。北宋前期，荆襄道的利用不如前代频繁，襄、宜大堤艳曲渐失，正如寇准诗云：“今日汉江烟树静，更无人唱满铜鞮。”^⑥ 北宋时江汉平原陆路交通最重要的枢纽是地处南北大道上的荆南节度江陵府，以此为中心，既连接起本区内的各重要州县，也沟通了本区与外界的联系。

① 参见前揭《唐代交通图考》之“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第1040页。

② 本段参见前揭《唐代交通图考》之“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第1051~1077页。

③ 参见前揭《唐代交通图考》之“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第1044页。

④ 参见前揭《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第四章“商业的发展——草市、交通与都会”，第212~213页。

⑤ 参见前揭《唐代交通图考》之“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第1077页。

⑥ 《舆地纪胜》卷八二《京西南路·襄阳府·岷山汉水诗》。

南宋之后，长江干道更是取而代之，成为当时运输的生命线，昔日繁荣的荆襄陆路降为了长江干道的辅线（详下）。

荆襄道在宋代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不外乎宋代时势的转换、江汉平原较之襄阳地区的后来居上以及江汉河道的变化。

（一）时势转换

唐代的统一局面为江陵以北陆运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①宋代，荆襄陆路的变化不大，重要的陆驿仍旧保持下来，这得益于宋代驿传制度完备，留意各类馆驿、急脚递、斥堠铺、摆铺的设置与驿道的修建。^②《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八之一三中，记载了本区两条陆上交通线：一是广南诸州，自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市）过湖南入湖北，经江陵入荆门（治今湖北荆门市）；二是川陕布纲，由荆南、襄州（治今湖北襄樊市）转运至京西诸军。是书食货四二之一三还记载了天圣六年（1028年），兵士推小车日送二百匹布，从荆门军界至荆南诸铺之间。另据是书“驿传杂录”、“急递铺”等篇，本区内还设有较多的每一日行程设置一处的驿站。

但是，宋代对荆襄陆驿的利用较前代明显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北宋漕运为主、两宋之际兵燹以及南宋时局变化等方面的影响。

北宋定都开封，京城物资仰赖漕运，“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租粟，于真、扬、楚、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溯流入汴，以达京师”^③，因此，荆湖南、北二路的租粟多由鄂州沿江下至真（治今江苏仪征市）、扬（治今江苏扬州市）、楚（治今江苏淮安市）、泗（治今江苏盱眙县）州，不再像唐代那样经由荆襄道北上。聚集在江陵的上游川益诸州物资，大部分会在江陵顺江而下，荆襄陆驿此时主要承担部分的转运任务，如《宋史》所言：“金帛

① 参见前揭《唐代交通图考》之“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第1075页。

② 关于宋代的驿站邮传制度，学界已有较多研究，详参曹家启《宋代驿传制度研究述评》，载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65～373页。

③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漕运”条。

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檐至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①由此，宋代一改唐代依赖荆襄道的情形，将本区的运输线路重点放在了长江沿线，对荆襄道的利用明显不如唐代。这种转变，一方面使得江陵保持了枢纽地位；另一方面大大提升了荆—鄂水路在区域交通网中的地位。唐代荆襄道所具有的命脉地位在悄然变化。

两宋之际的兵燹对荆襄道沿途地区打击极大，如襄阳，“焚毁尤甚，野无耕农，市无贩商，城郭隳废，邑屋荡尽，而粮饷难于运漕”^②，而且这种破坏持续的时间较长，“自修好以来五六十年，流民未复，旷土未辟”^③。又如荆襄道的必经之地长林县（治今湖北荆门市），北宋中叶“主客户十有三万八千，口二十九万”，庆元四年（1198年）“主客户仅一万六百，口三万五百”，故时人异之：“不知何多寡悬殊如此？岂承平时入京便道固应尔耶？”^④

随着宋金对峙局面的形成，襄阳、邓州（治今河南邓州市）一线成为宋金前线，这使得南北陆路交通固有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襄阳府与江陵府在南北大道中的枢纽作用相应降低，荆襄陆驿的修治也不甚完善。乾道六年（1170年）九月，陆游入蜀途中经过江陵，目睹了荆襄陆路江陵段的荒凉：“青旆三家市，黄茅十里冈。蓬飞风浩浩，尘起日茫茫。驰骋多从兽，锄耰少破荒。行人相

①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漕运”条。

② （宋）李纲：《梁溪先生全集》卷八一《论襄阳形胜札子》。

③ （宋）蔡戡：《定斋集》卷三《论屯田利害状》，常州先哲遗书本。

④ （宋）刘宰：《漫塘集》卷一一《回荆门守张寺簿元简》，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原文称“顷见《图经》，长林一县主客户十有三万八千，口二十九万，皆有奇。”目前未见有存世的宋元时期荆门军《图经》，南宋郑樵《通志》卷六六《艺文略·地理·郡邑》亦仅记“《荆湖北路图经》六十三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前引《舆地纪胜》卷七八《荆湖北路·荆门军·军沿革》中多处提及《图经》一书，并在“府尹唐义问奏复为军”条下称：“《图经》，在元祐三年；《舆地广记》，在元祐元年……”据此推测，《漫塘集》提及之《图经》，或即《荆湖北路图经》，当为北宋中后期所修，则《漫塘集》所记长林主客户数时间至迟不超过北宋中后期。

指似，此路走襄阳。”^①

南渡后襄阳仍与江陵、鄂州并称荆湖地区三大重镇^②，但襄阳已逐渐失去原有的命脉地位：“荆襄之势，以鄂渚为腹心，以江陵、德安为两臂，其余皆是十指。襄阳虽大，不过骈拇巨擘耳。”^③而且在屯兵数量上也与鄂州、江陵相距甚远。^④因此，南宋对荆襄道的利用多限于军事之需，如屯驻于襄阳与江陵的数万大军进行季节性的换防^⑤，荆湖南路的粮草由荆襄道补给襄阳等，淳祐十二年（1252年）便从湖南科米十五万石自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市）经荆州至襄阳。^⑥与此相应的是，民间的游历与贸易几近萧条。缺少了商旅繁会与声色之娱，荆襄道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北宋初年襄阳大堤还缭绕的些许艳曲，渐被岁月涤荡。

（二）平原湖区的发展

宋代荆—鄂间水路取代荆襄陆路的最主要动力来自江汉平原的发展，集中体现在政区与人口的变动、经济开发水平的提高等方面。

宋代，今湖北地区的开发由鄂北区逐渐向鄂东和江汉平原转移，江汉平原人口日渐增加，堤防逐步发展，市镇不断增多，并出现了鄂州南草市与江陵沙头市两大城镇，尤其是在平原腹地，人口、堤防与市镇诸方面皆有明显发展。经济与人口的变迁推动了政区的变动，新增了玉沙、建宁、潜江等县。平原的发展与襄阳府在

①（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二《题江陵村店壁》，第153页。

②（宋）王炎：《双溪类稿》卷二一《上葛枢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宋）曹彦约：《昌谷集》卷一二《上宇文宣抚论置司鄂州札子》，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九《奏襄樊经久五事》称襄阳屯兵二万一千余人；（宋）王炎《双溪类稿》卷二一《上葛枢密》称襄阳戍卒才二万人，江陵戍卒不满万人，鄂渚戍卒则五六万人；（宋）吴泳《鹤林集》卷一九《论今日未及于孝宗者六事札子》称“江陵、襄阳三万九千有奇”，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宋会要辑稿》兵五之二五。

⑥（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九《奏湖南运司合支水脚》。

两宋的逐渐衰落形成了较大反差,尤其是南宋以后,襄阳不再熙来攘往,大堤艳曲亦成绝唱;而长江沿线则出现了“长堤行车马,高楼余管弦”的景象^①,即便在荆江南岸的公安县,亦是“楚帆蜀棹日衔尾”^②,本地区的交通重心明显由南北向的荆襄道转向了东西线的荆鄂长江干道。交通重心的转移进一步促进了本区交通网的发展,并开始辐射周边地区,带动了本区经济开发的较全面扩展。^③

下面,将唐宋时期襄州、江陵府与鄂州三地人口的变化制成表4-1,以考察江汉平原地区经济的上升。

据表4-1,元和年间(806—820年)襄州户数较初唐显著增加,元和户数为唐宋时期襄州人口的峰值。江陵府与鄂州的户数至少在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就超过了襄州,至北宋中叶更是有长足发展,即使经过宋末兵燹,两地亦能保持较多的户数。

宋代襄州、江陵府与鄂州三地人口数量的变动反映了同期本区经济开发由鄂北区向江汉平原及鄂东地区转移的趋势。

(三) 汉水—江陵间河道的变化

上文已述,荆襄道水路自襄阳沿汉水南下,至扬口西南折向江陵(参见图4-1^④)。唐中叶以后,此水路仍在发挥转运江南租赋的重要作用。^⑤北宋初年,该水路已湮塞,遂有江陵城东荆南漕河之

① (宋)孙应时:《烛湖集》卷一四《到荆州春物正佳,枢使王公招宴欢甚,已而幕府诸公携饯荆江亭并成四诗》,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王炎:《双溪类稿》卷三《宿公安二圣寺》。

③ 参见拙文《宋代江汉平原水陆交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开发的影响》,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④ 据本目参引诸资料综合绘制。

⑤ 据严耕望先生研究,扬水亦即漕河,即今之西荆河,唐中叶以后江南租赋盖赖此漕河兼济陆运。参见前揭《唐代交通图考》之“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第1046~1051页。另据鲁西奇所考,阳(杨、扬)水自西晋杜预整治疏通后,成为联系江陵与汉水的重要通道,齐梁时阳水运河仍在发挥作用;但唐代阳水水道盖已湮塞,直至北宋初复开凿江汉间运河;北宋所开荆南漕河南起江陵城东,北至今沙洋附近,与汉水相连,相当于六朝时期的杨水通道,参见前揭《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二章“汉水下游支流与分流河道的历史演变”,第106~108、118~119页。笔者以为,自古以来汉水泥沙含量较大,汉水分流河道容易淤塞,因此,唐代中后期连接江陵与汉水的河道即便能够开浚通航,运量亦不会很大,运输当倚重荆襄陆驿与鄂州至襄阳间的汉水河道。

开凿。《宋史》卷九四《河渠志四》称：

端拱元年，供奉官 门祗候阎文逊、苗忠俱上言：“开荆南城东漕河，至师子口入汉江，可通荆、峡漕路至襄州；又开古白河，可通襄、汉漕路至京。”诏八作使石全振往视之，遂发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汉江，可胜二百斛重载，行旅者颇便，而古白河终不可开。^①

表 4-1 唐宋时期襄州、江陵府、鄂州户数一览表^①

| 府州名 | 唐开元 户数 | 唐天宝 户数 | 唐元和 户数 | 宋太平兴 国户数 | 宋元丰 户数 | 宋崇宁 户数 | 元至元 户数 |
|-------------|-----------|---------------------|-----------|-------------|-----------|---------------------|--------------------|
| 襄州 (襄阳府) | 36 357 | 30 392 | 107 107 | 26 892 | 93 027 | 87 307 | 5 090 ^② |
| 江陵府 (荆州) | 86 800 | 30 392 ^③ | | 67 517 | 189 922 | 85 801 ^④ | 170 682 |
| 鄂州 | | 19 190 | 28 618 | 29 203 | 125 257 | 96 769 | 114 632 |

资料来源：宋太平兴国户数出自《太平寰宇记》；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 2000 影印本。宋元丰户数出自《元丰九域志》。宋崇宁户数出自《宋史·地理志》。元至元户数出自《元史·地理志》。

说明：①唐开元、天宝、元和户数，转引自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第四章“隋唐五代的人口分布”，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据《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襄阳路至元户数阙，此为至顺元年（1330 年）钱粮户数。

③据冻国栋考订，荆州天宝户数较开元户数急剧减少“可能是数字记载上的错误，因为没有理由突然减少”。参见氏著《中国人口史》第二卷第四章“隋唐五代的人口分布”，第 244 页。

④据吴松弟考订，元丰至崇宁间并无导致江陵府人口大量死亡的战乱和瘟疫，故崇宁户数或为 185801 之误。参见前揭氏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第四章“宋代户口数据的考证和估测”，第 136 页。

① 《宋史》卷九四《河渠志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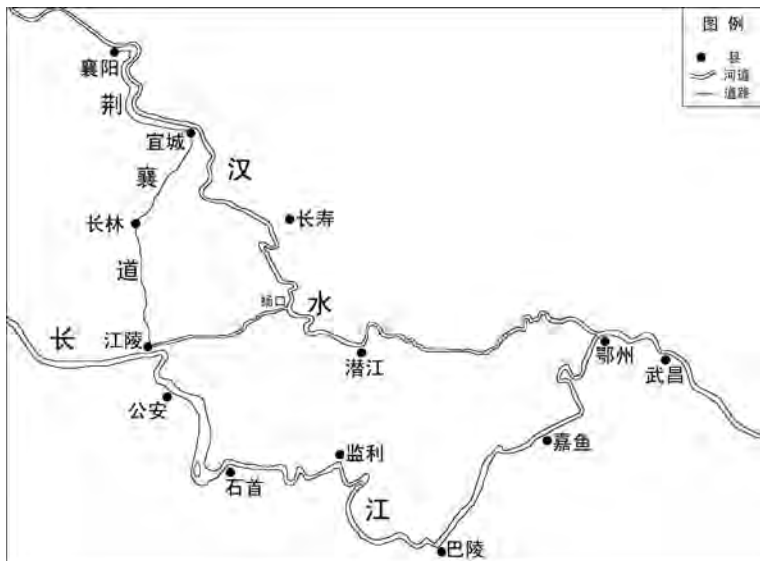


图 4-1 唐宋时期荆襄道示意图

荆南漕河在宋代经过数次疏浚，南宋中期以后逐渐淤废。关于荆南漕河在宋代的变化，学者已有研究，认为在扬水故道或荆南漕河的淤废上，江陵城北军事工程的修建，如五代高氏北海以及南宋后期的“三海八柜”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大规模的工程，使扬水故道或漕河河道发生改变，“大大改变了江陵城北一带的河湖水系”^①，故北宋初年需要开凿荆南漕河。南宋中期，漕河几经疏浚最终失败。漕河的反复淤塞说明了江陵至汉水的河道在宋代已难以正常利用。

相对于陆路交通，两宋时期本区更重要的交通方式是水路，交通重心由过去南北向的荆襄一线向东西向的江陵、鄂州一线转移，东西向的水路交通成为本地区交通的主导。这种变化，既是中唐以

^① 参见前揭《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二章“汉水下游支流与分流河道的历史演变”，第 121 ~ 122 页。

来时势所致，也是鄂州作为地区性商业贸易中心日益崛起与兴盛的结果；同时，五代以来江陵城北军事工程的修建改变了当地的水系格局，连接江陵与汉水间的水道逐渐淤废，都促进了交通重心的转移。

二、水路交通网络的出现

两宋时期江汉平原的交通重心由过去南北向的荆襄一线向东西向的江陵、鄂州一线转移，东西向的水路交通成为本地区交通的主导。江汉平原优越的地理条件是这种重心转变的自然前提。本区内水系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长江、汉江干流，以及夏水、油水、沮水、漳水、富水、潏水、环水等众多的分支河流，都有互通舟楫之利，多数重要州县依江傍湖，构造一个天然、便捷的水路交通网。具体来说，江陵府辖下的松滋、枝江、江陵、公安、石首、建宁、监利（除建宁外，皆治今湖北同名县市，建宁治今湖北石首市东南）七县俱依江而立，潜江（治今湖北潜江市）地近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水；郢州的长寿县（治今湖北钟祥市）被汉水及其分支穿流而过；潏水串起了安州所辖之安陆、云梦（皆治今湖北同名县市），富水经应城，环水从孝感县（今湖北孝感市）旁流过，复州的玉沙县（治今湖北仙桃市西南沔城）靠近夏水，富水、漳水和潏水汇集于汉阳军的汉川县（今湖北汉川市），并向东南与汉水交汇流入长江，汉阳县（治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与鄂州的江夏县（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宝泉监（今湖北武汉市境）则分立于长江北南。平原内的众多河湖将座座城镇连接，编织起一张通达的水路交通网。

这张交通网，在北宋时初具规模，南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

先看北宋。江汉平原与外部的水路联系主要靠长江主动脉：本区的大量物品从鄂州沿长江东下，达淮南东路真、扬、楚、泗州，再入汴河转运到京师^①；川蜀之地和荆湖北路归（治今湖北秭归

^① 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漕运”条。

县)、峡州(治今湖北宜昌市)输送京师的货物,汇集于江陵县,由此或走陆路,经荆门、襄州至京师;或走水路,经长江转运至京。天圣五年(1027年),由于从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市)运抵江陵的布匹量太大,遂在江陵附近的沙市兴盖布库,以缓解转运压力。^①平原内部的地区性水路交通,因江、汉众多分支河流、港汊、湖泊多有通航之便而显得比前代更为细密。有关这一点,从欧阳修和刘摯的记载即可略见一斑。《于役志》称,欧阳修曾自东向西依次经过江夏县的白杨夹渡口、昭化港、穿石矶,监利县的鲁淤,石首县的塔子口、公安渡。《忠肃集》载,刘摯先后在江夏县的汉口,江陵县的俞潭镇和赤岸镇逗留。上述津渡口岸,涉及江汉平原的环水、沦水、沌水、夏水和若干其名不详的河汉湖泊。此外,从平原西部的松滋县白水镇,枝江县赫家洼,到中部的公安县孱陵镇、马头市,石首县藕池镇、万庾巡、刘郎浦、彭田港,监利县监利镇、鸡鸣渡,再到平原东北的长寿县贾璺镇、穴口镇、激河镇、西渡市与金港市,孝感县澧河镇,以及东部的汉阳县蔡店镇、金口市、下港市与沌口市,汉川县刘家隔,江夏县南浦等众多市镇村集,也都有舟楫相通。

进入南宋,长江中游一线的战略地位更显突出,政府对该地区的重视超过北宋,除江陵府依然保持重要地位外,鄂州成为“上流剧镇,屯军数万”^②。沿江斥堠的置立^③,便利了东自江浙西达川陕、利用水路往来于江汉平原的士宦商旅、军队民众,屯驻荆湖千里水域的诸军半年或一年一替^④,上下往来,对本区水网的利用相当频繁。

南宋有关本区水路交通的记载比北宋详细得多,陆游的《入蜀记》和范成大的《吴船录》便是其中的代表。据两书,经水路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之一七、一八。

② (宋)王庭珪:《卢溪文集》卷三六《送刘君鼎序》,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四四。

④ 《宋会要辑稿》兵五之一八。

穿越江汉平原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长江与沌水的交汇处沌口（亦称“通济口”）进入沌水，再沿夏水、鲁沔江西进，在监利附近重归江路，此线用于汛期，可避开岳阳洞庭湖入江处的连天波涛；另一条是在枯水或平水季节从鄂州入江，上岳阳，经监利、公安、江陵西行。自东向西，陆、范二人在江汉平原区经历的主要地点有：鄂州青山矶、白杨夹口，汉阳军谢家矶、金鸡沔、通济口、下郡，复州白臼、八叠沔口、归子保、纲步、毕家池、紫湄、东场、鸡鸣、湛江，江陵府鲁沔、建宁镇、塔子矶、潜军港、三江口、藕池、柳子、公安、弥节亭、升子铺、沙市、新河口、方城、沱、桂林湾、灌子口、杨木寨、龙湾。对比北宋时的记载，可以发现此时对季节性河流——夏水航线的利用明显增多，而且沿途新增了不少停泊点，如江夏县的青山矶，汉阳县的谢家矶、金鸡沔、下郡，玉沙县的毕家池、纲步，监利县的东场、湛江、潜军港、三江口，公安县的升子铺、弥节亭，江陵县的方城、新河口草市，枝江县的沱，松滋县的灌子口、桂林湾等。这一时期，在江汉平原沿江傍河之处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市镇，如鄂州的柳林头（鄂州城下）、猛桥草市（黄州与鄂州之间），玉沙县的沙滩（紫湄以东，今洪湖境内），荆门军的沙洋镇、新城镇（紧邻汉水）等。^①

除了像陆、范二氏那样长距离的行舟外，民间更多的是利用平原区内便利的水网作短距离的航行，如从德安府柞落市沿着湓水而下，“不三日可达武昌鄂州”^②；或由监利县新冲河至江陵县漕河；或在涨水期自石首县小岳套口经柳子口至汉沔^③；或经汉水至荆州；或顺江从岳州至鄂州，以及从长江入油水等。不少地方还可行舟通向本区之外，如石首县的焦山港可通洞庭湖，西湖口通洞庭湖后可达安乡县境，彭田港水泛时亦通达洞庭湖等。^④其中，汉水的

① 参见前揭《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下篇“市镇篇”。

②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二一《上汤相论边事》，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

④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

利用值得注意，随着襄阳府军事地位的提升，大量驻军及军粮沿汉水上下运输，往返不断^①，汉水及其支流构成了一个以汉水为中心，汇集环水、沮水、漳水、富水、潏河等区间河流的辐射状水路网。

为了充分利用水运网，沿江沿汉都较注意修建船舶停靠避风的港口，知黄州李 就曾在黄州“以官钱募饥民开内澳六百丈”^②，得到客商的支持。

较之于陆路，当时的人们似乎更偏爱水路。由于平原区内江河湖泊密布互通，稍有规模的市镇往往顺势而建，加之自北宋以来荆湖两路所具备的造船能力，人们自然会对便捷、低耗的水路多加利用。而且，从中转的性质来看，长江中游的水流已比上游平缓，至下游更是快捷，因此，不仅上游东下可充分利用江陵府的沿江口岸，下游也溯江西上，从而使鄂州“四方商贾所集”^③，成为“淮楚荆湖一都会”^④，进一步带动本区交通的发展，并开始辐射周边地区。

入元以后，政府对水上交通线更加重视，至元十五年（1278年）五月，立上游叙州至荆南府的水驿^⑤；至元十八年（1281年）二月对该航路进行了整治，“自叙州至荆南凡十九站，增户二千一百、船二百十二艘”^⑥。元代在江汉平原各地还设置了水站，江陵路八处：公安站、柳子站、石首站、调弦站、塔市站、龙浣站、白汭站、流店站；荆门州两处：鱼科站、狮子站；安陆府（宋郢州）五处：在城站、达石站、洪磧站、石碑站、旧州站；沔阳府（宋

① （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八《回奏经理事宜》、《出师经理襄樊》。

②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二《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李公墓志铭》。

③ （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④ （宋）戴复古：《石屏诗集》卷一《鄂州南楼》，清嘉庆道光间海宋氏刊本。

⑤ 《元史》卷一〇《世祖七》。

⑥ 《元史》卷一一《世祖八》。

复州)八处:沔阳站、深江站、斗州站、云潭站、沧浪站、候部站、襄下站、玉沙站;鄂州路五处:城下站、石头站、金口站、江口站、阁牌洲站。^① 水站的设立使得本区水路交通网的构建更趋完善。

四通八达的水路除了用于军事方面以外,更对经济的开发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水路交通发展对经济开发的促进

(一) 农业生产的进步

水陆交通发展对本区农业生产的促进是多方面的,最直观的表现是促进了人口的方便迁徙。^② 陆路方面,从中原往岭南和中原往江浙的南北陆路交通线,在唐安史之乱和北南两宋之际都充当了中原人口南迁至长江流域的主干路,北人南下荆州,多采邓州——襄州——荆州一线;留居鄂州,则经邓州——襄州——鄂州一线。水路方面,横贯本区的长江是区内外人口在东西向之间迁徙的主线。便利的交通带来了人口的迁入,为本区开发提供了大量劳动人手。

此一时期,人口迁入的特点是既有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又有东面人口的西移,尤其是在北南两宋之际。当时,荆湖地区饱受战事,人口锐减,农业凋敝,亟待恢复。积极招诱流民开荒种田成为此时期经济恢复的关键。绍兴初年,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创行有效的屯田方法,并轻租拨田,招集失业之民耕作屯兵耕垦不尽的生熟荒地。^③ 乾道年间(1165—1173年),知鄂州李椿在当地免赋给田,募人垦荒。^④ 类似举措颇多,不仅使躲避战火的逃民重返江汉平原,也吸引了外来移民迁入。大量来自北方各地和东面江

①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卷一九四二三引《经世大典·站赤》，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② 关于宋代本区的人口迁徙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论及，20世纪90年代问世的多卷本《中国移民史》（葛剑雄等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此不赘述。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九、一〇、一一、一四。

④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一八。

西、西面四川的农民借助南北向的陆路和东西向的水路相当便利地来到荆湖地区，部分留居江汉平原，从而无论是在劳动力还是在生产技术方面，都成为了江汉平原经济开发的活力。《鄂州小集》卷五称鄂州“生齿繁盛”，其中“民间所须僮奴，多藉江西贩到”^①；《斐然集》卷一则称，“流民渡沔来，拽牛负其犍”，成为鄂州编户。

在南宋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中，驻防本区的十数万屯田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渡之后，荆州的军食得益于屯营田，可“省县官之半”^②。鄂州的收获亦不菲，乾道四年（1168年），鄂州都统制提举措置屯田赵樽等就说：“去岁夏秋两科收五万余硕，其黑豆喂牛，大麦、稻谷充马料，所有小麦、粟谷、杂豆巢发价钱……欲乞将已后屯田所收大麦、粟、稻置仓桩顿。”^③ 淳熙十年（1183年），鄂州江陵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郭杲又说：“本司见管屯田谷麦共一十二万二千余石。”^④ 鄂州因屯积重兵、人手充足而屯田成效较好，同时，作为长江与汉水交汇的重要口岸，当地稠集的屯田兵很容易援发他处，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农业开发，如乾道二年（1166年）正月，一次就有两千八百名官兵从鄂州前往德安府、郢州等地屯垦。^⑤

随着生产的复苏，每年都有来自上游川蜀和荆湖两路的大批上供漕粮通过江陵和鄂州转运至京，同时，平原内各地区的粮食也依靠水陆交通适时运输。如乾道七年（1171年），湖南和余米二十万硕赴鄂州总领所桩管^⑥；开禧年间（1205—1207年）“以湖北漕司和余米三十万石分输荆、郢、安、信四郡”^⑦，又“泄安、复、汉

①（宋）罗愿：《鄂州小集》卷五《鄂州到任五事札子》。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八七。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一七。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五二。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一四。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四〇之五〇。

⑦（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八九《敷文阁直学士赠通议大夫吴公行状》。

阳之米以济武昌”^①。若是没有畅达的水陆交通，如此频繁的粮食流通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渔业与造船业的发展

江汉平原水域广阔，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自古“民食鱼稻，以渔猎山水为业”^②，渔业与稻作农业一起成为本区人民不可或缺的生产方式。至宋代，民间鱼的交易相当活跃，“草市鱼多骨”^③，甚至“鱼未到家人买尽”^④，鱼利丰厚成为本地经济的一大特点。以汉阳军为例，“常赋所入甚薄，全藉湖池鱼利支遣”^⑤。各地渔民、商人因此趋之若鹜，四通八达的水路为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本区渔业的发展。据载，“荆襄、淮西、江东、湖南诸处客人，驾船载网前来湖主家，结立文约，采取鱼利，而与湖主均分之”^⑥。

水路的通达也推动了本地造船业的发展。民用船只的数量比较可观。南宋前期，仅汉阳城外就有居家民船四百只^⑦；江陵江面号称“沙际舟衔尾，相依作四邻”^⑧；鄂州城不仅汇聚了川、广、淮、浙远来的商人，荆湖路内“南则潭、衡、永、邵，西则鼎、澧、江陵、安、复、襄阳数路客旅兴贩”，也“无不辐凑”于此。^⑨用于漕运和军事的大规模船只的数量更不在少数，陆游在鄂州亲见“大舰七百艘，皆长二三十丈”^⑩，感到十分惊叹。

这些船只应有不少是在本地打造的。早在北宋政和年间(1111—

① (宋)黄榦：《勉斋集》卷七《与胡总卿书》。

② (宋)刘摯：《忠肃集》卷一〇《荆南府图序》，第212页。

③ (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一〇《朝离华容，暮宿孟桥》。

④ (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一〇《晚过沙滩》。

⑤ (宋)黄榦：《勉斋集》卷三四《放免渔人纲钓鱼利钱榜文》。

⑥ (宋)黄榦：《勉斋集》卷二八《与漕司论放鱼利事》。

⑦ (宋)黄榦：《勉斋集》卷三〇《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杂米事》。

⑧ (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二《移船》，第154页。

⑨ (宋)王炎：《双溪类稿》卷二三《又画一札子》。

⑩ (宋)陆游：《入蜀记》卷三。

1118年)就曾诏令“荆湖南北路转运司各打造五百料三百只”^①;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荆鄂一带具备了打造五车船、六车船、七车船和八车船的能力^②;嘉定十五年(1222年)“诏令封桩下库,于见桩湖广会子内,取拨二万九千九百七十贯付鄂州都统制司,专克打造济渡船只……”同期汉阳军还措置打造“大小马船三十只、脚船三十只,计料到约用收买材物价钱九万五千六十贯一百七十五文湖会,人工九万八千二百四十五工……欲先行下戎司打造三十只,内一千五百料、一千料、三百料马船各五只,七十料脚船十五只。候了毕日,更与接续打造十只大小船并脚船共有四十只,则尽可济渡。所有计料先造三十只,合用材物三场,价钱当二万九千九百七十三贯五百四十五文,工四万五千七百三十工”^③。

由发达的水路所带动的渔业和造船业,已基本能满足本地区的日常生活之需和军事要求。

(三) 商业市镇的兴盛

宋代是江汉平原市镇获得显著发展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本区共有二十个州县级城镇,一百四十六个县以下镇、市^④,由此构成了一个疏而不漏的市镇网。市镇网络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本区市镇网的形态,恰与当地的水陆交通网基本同构。

具体来说,宋代江汉平原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水资源丰富,航运条件优越的地理条件,直接催化出本区的市镇布局:大多数市镇分布在江河湖泊交通线旁。主要区位可分成三类:一是河流交汇处。数条通航河流汇合的地方往往有较大量的人流、物流在这里集散、中转,因而是市镇发育的良好区位。如汉阳军城、鄂州城位于汉水与长江交汇处;涇水、漳水和富水的汇集滋养了汉川城;即使只是季节性通航的较小河流如沌水的两旁,也出现了若干乡间集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之六。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之二八。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之三四、三五。

④ 笔者根据《宋史·地理志》、《輿地纪胜》、《方輿胜览》、《读史方輿纪要》、嘉庆《重修一统志》及其他多种方志对此作有考订和统计,此略。

市。二是水运中转站。长江出三峡后进入峡州，滩险流急、航道狭窄的江面开始变得宽阔，水流平缓，出川的船只通常在此修整，中转活动促使峡州城及其东面的江陵和长江边重要港口、毗邻江陵的沙市之发展。沙市成为蜀船的终点，成为宋代川盐大量东下的重要中转口岸。三是渡口。河道较窄或水流平缓便于架桥或摆渡、泊舟的地方，往往容易出现市镇，本区内为数众多的以津、渡、桥、步、浦等命名的草市，都在这种地方生成。

南宋时，本区的市镇网络有两大中心——江陵与鄂州，这两大中心的形成，集中反映了交通对于市镇的重要影响。先看江陵。唐代以来，江陵就充当着既是南北陆路又是东西水道交通的双重枢纽，由中原通往湖南、岭南的南北陆路交通大道由此经过，从江浙通往四川的东西水路交通干线也在这里中转，交通运输、转运贸易表现得非常活跃。安史之乱后，由于北方藩镇林立，朝廷财政越来越依赖南方，长江水运路线显得格外重要，不仅官府赋税、军队物资、商贾贩运常由此通过，就连民间采买也常沿江而行。入宋之后，江陵仍然不仅仅是南北陆路同时也是东西水运交通线的咽喉，所谓“凡浮江下于黔蜀，与夫陆驿自二广、湖湘以往来京师者，此为咽喉”^①，所以能够持续发展。鄂州的变化更有代表性。鄂州既处在南北向陆路交通线上，又地当汉水入江之要冲。安史之乱后，襄汉运线的日益重要使鄂州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凡汴河运输阻塞，东南贡赋便在此集中，再转汉水西运，其固有的“实荆襄之肘腋，吴蜀之腰膂，淮南江西，为其腹背，四通八达，古来用武之地”^②的区位优势得以发挥。北宋时，鄂州号称“山水之聚，舟车之会者”^③。至南宋时期，鄂州驻有大量军队，又是荆湖北路转运使司的所在地，为“六道财计之所总，七萃营屯之所聚”^④，因

①（宋）刘摯：《忠肃集》卷一〇《荆南府图序》，第212页。

②（宋）罗愿：《鄂州小集》卷五《鄂州到任五事札子》。

③（宋）黄裳：《演山集》卷一四《鄂州白云阁记》，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本。

④（宋）罗愿：《鄂州小集》卷五《鄂州到任五事札子》。

而交通极其发达，是所谓“通衢大衢，商贾之会，物货之交也”^①，城镇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诸路和采，所产之多者不如所聚之多，当相地势紧要去处措置收采，则简而易办，且如湖湘，唯鄂渚最为要地”^②，吸引了西自四川，东至淮、浙的商人纷至沓来，致使“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③。鄂州附近岳州的“商贾米船溯江而上则聚于鄂渚”^④，“常德府、潭、衡、澧州客旅”，也“兴贩米斛，前来鄂州采场中采，在岸常有万石”^⑤。鄂州城下出现了多路“客旅兴贩无不辐凑”^⑥的情形。

首先是水路，其次是陆路；以南北向为主的陆路和以东西向为主的水路，两相配合，互为经纬，连接起一个个商业市镇，有力地促进了本区市镇的发育与成长。

总体上看，宋代江汉平原的水陆交通与本区的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带动了本区开发的全面扩展。不过，较之于前代，宋代江汉平原陆路交通的重要性下降，水路交通虽有显著进步，但长江“黄金水道”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优越的地理条件还未得到高水平的利用，本区的开发水平还远不能与江浙发达地区差肩比美。

第二节 林牧副业与丘陵山地开发

一、山田的开发与利用

江汉平原平均海拔高度低于一百米，沿平原西北至东北、东南的外缘，分布着岗地和丘陵，地势逐渐升高，在荆门军、郢州、安州（德安府）、黄州、鄂州等地境内，分布着若干丘陵山地。

①（宋）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第141页。

②（宋）王炎：《双溪类稿》卷二三《又画一札子》。

③（宋）陆游：《入蜀记》卷三。

④（宋）王炎：《双溪类稿》卷二〇《上章岳州书》。

⑤（宋）蔡戡：《定斋集》卷三《乞免增采二十万石桩管米札子》。

⑥（宋）王炎：《双溪类稿》卷二三《又画一札子》。

宋代，江汉平原不仅开发了地势低洼的湖区，对于平原边缘的丘陵山地，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与利用。

荆门军的情况最为典型。军内丘陵山地较多，山泉丰富。^① 诸泉中以源出荆门军城西硤山的蒙、惠二泉和出自白崖麓南的南泉更为有名。^② 天然的灌溉水源为邻近山地的利用提供了便利，据称，惠泉“千古灌稻麦”^③，“岁常稔谷”^④；南泉亦“溉田千亩”^⑤。北宋仁宗时期，知荆门军彭乘即“为三沼，延其流至竹陂河入汉江，民引以灌田”^⑥。当地还逐渐发展起因地制宜的耕作制度。南宋光宗时期，知荆门军陆九渊在对比了江南东、西二路与荆门军的耕作制度后，有如下记载：

以江东、西田土，较之此间，相去甚远。江东、西无旷土，此间旷土甚多。江东、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种占早禾，晚田者种晚大禾；此间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陆。陆田者，只种麦豆麻粟，或蒔蔬栽桑，不复种禾；水田乃种禾。此间陆田若在江东、西，十八九为早田矣。水田者，大率仰泉，在两山之间谓之浴田，实谷字，俗书从水；江东、西谓之源田。潴水处曰堰，仰溪流者亦谓之浴，盖为多在低下。其港陂亦谓之堰。江东、西陂水，多及高平处，此间则不能，盖其为陂不能如江东、西之多且善也。惟南乡去山既远，且近江，高平之地多，又迩大府，居民差众，故多不仰泉。石之田，此田最下，岁入甚多。白杨一乡，此田居十五以上，梨陂、柘陂等乡不下十二，惟西北东乡分则无此田矣。然所谓水田者，不善治堰，则

①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荆门军》“蒙惠二泉”条。

② 《輿地纪胜》卷七八《荆湖北路·荆门军·景物（上）》“蒙泉”、“南泉”条。

③ （宋）苏轼：《苏轼全集》诗集卷二《荆门惠泉》，第14页。

④ （宋）刘摯：《忠肃集》卷一五《荆门军惠泉呈李使君舜卿》，第325页。

⑤ 《輿地纪胜》卷七八《荆湖北路·荆门军·景物（上）》“南泉”条。

⑥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荆门》“蒙惠二泉”条。

并高处亦与平田相类矣。大者不十一，多者不十二，通之不过十二。上泉，距郡城几三十里，迎泉之日，迂视其田，计其龟坼者十一二外，此皆尚有水。然堰中已干而不继，必大败。今得雨，可无害也。惟白杨乡等处，高平田全未种者，见施行令种晚谷及可助食者，今岁亦幸。有湖北平时水浸，有不可种禾者，民皆种禾；若复无水患，又得时雨，或者可补种未种之田耳……

……向曾龟坼者，今得水，茂畅过于不缺水者。高坡未插秧者，今插已过半，秧田甚多，尚往往成群插秧。问何以能备此秧，则曰年例如此。若其不修陂池，不事耘耨，则皆枯死……①

从引文可见，与江南东、西二路相比，荆门军的农田分水、陆两种，水田仅种稻，陆田不复种稻；南乡属临江平原地带，人口较多，无虑灌溉，山田中地势低下的部分多仰赖泉水或溪水灌溉，而且山田开发已有一定规模，故称高坡上“秧田甚多”。对于山田而言，修堰蓄水颇为重要。同时，陆九渊也指出，由于荆门的陂堰不如江东、西路修得那么多和完善，造成高处的水田灌溉水源不足，若遇天旱无雨，“必大败”。因此，在地势较高的山田用水方面，民间似有约定或章程，以共享泉水，关于此点，陆九渊的聊聊数语已透出一二。如上泉乡，以其名猜测，或在泉水之上游，在“迎泉之日”，该乡除十分之一二的田地干旱龟坼外，其余皆有水，然而，由于堰中无水，虽是少量田地等待灌溉，亦无法满足，幸而天降时雨，旱始得解。

两宋时，荆门军人口较少②，且如陆九渊所述，人口多集中于军南部的平原地带。但是人口的多寡并非当地采取水陆田分种的惟一因素，当地的地理条件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农作物的布局上，地貌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就是在地

①（宋）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卷一六《与章德茂》其三、其四。

② 参见前揭《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上篇《政区、人口篇》第二章“人口数量与分布”。

势平坦的江汉平原中，小范围的局部性地形起伏，对农作物分布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①。在江汉平原外缘，多为一些高度不大的岗地，这些岗地，自身难以潴留足够的水分，除非靠近山泉或溪水，否则缺乏灌溉水源，无法满足水稻的生长条件。而且，在地旷人稀的宋代，开发这些岗地进行水旱轮作，费工耗资，尤显不必。即使在今天的江汉平原，农业生产水平与宋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仍有水田与旱地之分，并不实行水旱复种。可见，水陆分种是从本地的地理条件出发，因地制宜的产物。

同时，荆门山的山田开发也并非因为平原地区的土地已利用完毕，而是由当地丰富的山水资源所致。

在其他地区，也或多或少对山田进行了开发，如鄂州，黄榦曾说：“鄂州诸邑，皆有山源之田。”^②

二、经济林特产开发

宋代，本区丘陵山地种植、分布最普遍的经济作物是茶叶、药材、果木林等。这种情况与唐代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元明以后品种有所增加，对照《新唐书》、《宋史》、《大明一统志》等所载可知，详见表 4-2。

表 4-2 宋元江汉平原茶、果木林、药材分布简表

| 资料名 府州名 | 《新唐书》 | 《太平寰宇记》 | 《元丰九域志》 | 《宋史》 | 《大明一统志》 |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 |
|------------|----------------------------|----------------------|---------|----------|-------------------------|----------------------|
| 江陵府 | 柑、橙、橘、枳、糖蟹、梔子、贝母、覆盆、乌梅、石龙芮 | 甘草、乌梅、贝母、柑子、橙子、橘、碧涧茶 | 碧涧茶芽 | 碧涧茶芽、柑、橘 | 柑、橙、橘、梔子、贝母、覆盆、箭竹、石龙芮、茶 | 柑、橙、橘、梔子、贝母、覆盆、石龙芮、茶 |

① 参见前揭《湖北农业地理》第一章“自然条件与农业资源”第一节“农业地貌”，第 6 页。

② （宋）黄榦：《勉斋集》卷二八《申制置司乞援鄂州给米》。

续表

| 资料名 府州名 | 《新唐书》 | 《太平 寰宇记》 | 《元丰 九域志》 | 《宋史》 | 《大明一 统志》 | 嘉靖《湖广 图经志书》 |
|-------------|----------------------|--|-------------|------|----------------------|---|
| 郢 州 | 葛、蕉、春 酒曲、枣、 节米 | 丹 参、贝 母 | | | | |
| 复 州 | 白苎 | 狼 毒、大 戟 | | | | |
| 德 安 府 | 青 苎、笋 瓜 | 茶 | | | 葛、覆 盆 子、根 子 菜 | 千 叶 莲、 千 叶 榴、 白 槿、木 瓜 |
| 鄂 州 | | 茶 | | | 茶、秀柑 | 茶、秀柑、 兰 菊、菱 蒿、半夏、 天南星 |
| 汉 阳 军 | | 落茹 | | | 竹、 橙、 橘、榧子、 银杏 | 榧子、橘、 橙、银杏、 麦 门 冬、 枳 壳、桔 梗、牵牛、 香 附 子、 青 木 香、 天南星 |
| 黄 州 | 连 翘、松 萝 | 连 翘、松 萝 | 连翘 | 连翘 | 连 翘、松 萝 | 连 翘、松 萝 |
| 荆 门 军 | | 甘 草、乌 梅、贝母、 柑 子、橙 子、橘、碧 涧茶 | | | | |

说明：表中一部分品种属于进贡的土特产，它们尽管数量有限，但可以反

映出本地经济作物的质量与特色以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状况。

茶叶是本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北宋时,平原内江陵府、鄂州和荆门军是官府买茶之处。茶分片茶、散茶两类,大拓枕是江陵府所产的一种片茶,岳麓、草子、杨树、雨前、雨后等散茶品种则在整个荆湖地区出产。^①江陵府出产的碧涧茶芽为贡品。^②另外,安州亦为产茶区^③,但南宋后不见其产茶记录。北宋本区的茶叶产量较高,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官府在鄂州年买茶五十万斤尚嫌不足,欲增至一百万三千余斤。^④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江陵府江陵、松滋、石首、枝江等县产茶三千二十五斤八两,鄂州蒲圻、江夏、通城(治今湖北通城县)、武昌(治今湖北鄂州市)、嘉鱼、咸宁(治今湖北咸宁市)、崇阳(治今湖北崇阳县)等县产茶一十七万七千七百一十斤一十二两。^⑤其中,除去鄂州境内丘陵低山较多的蒲圻、通城、咸宁、崇阳等县,平原区内的茶叶产量较低,与北宋相比,产量下降的趋势明显。至明代,本区茶叶的主产地仍是江陵与鄂州。^⑥

在药材方面,唐代江陵府的梔子、贝母、覆盆、乌梅、石龙芮为贡品。北宋时,江陵府的土产有甘草、乌梅、贝母等;郢州出产丹参、贝母;狼毒、大戟产于复州;汉阳军产露茹;连翘与松萝是黄州的主产药材。虽然元代的资料欠缺,但从《大明一统志》的记载中,可以大致了解元代各地的药材分布,据是书,江陵仍产梔子、贝母、覆盆、石龙芮;黄州一直出产连翘与松萝;葛出现在德安府的土产记载中;汉阳府则新见梔子与银杏。

果树种植方面,柑、橘、橙是本区的重要品种,其中以江陵府

①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征榷五》,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② 《宋史》卷八八《地理四》。

③ 《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二《淮南道十·安州》“土产”条。

④ (宋)刘敞:《公是集》卷五一《先考益州府君行状》,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三。

⑥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土产》,卷六《荆州府·土产》。

的柑、橘更为有名，诗称：“楚橘秋高千树黄。”^① 江陵府的柑、橘在宋朝时为贡品。^② 景陵县，橘树成熟后成了当地秋天的一道美景：“水边红橘与秋深。”^③ 江陵县的梨^④、复州的李子，亦为佳品，其中复州的李子种植已有一定规模，出现了专门的李子园。^⑤ 元时期，柑、橘、橙等果树的种植区域有所扩大，到了明代，柑、橘、橙依然是荆州府的土产，秀柑为武昌府各县的主要水果，汉阳府亦产橘、橙。^⑥ 武昌与汉阳两府在宋代少有柑、橘、橙种植记载的情况发生了改变。

第三节 手工业发展与植被资源利用

一、宋元江汉平原植被资源概况

除了粮食作物和茶叶、果木林、药材等经济作物外，宋元江汉平原的植被资源主要有竹、树等少量原生林，大量次生林和人工栽培林，以及丰富的水生和沼生植物。

该时期江汉平原植被资源的一大特点是竹多。此前，唐人已留下记载：“江村竹树多于草。”^⑦ 北宋时，平原内有“松竹相披靡”^⑧ 之景。石首县的竹林港（在县西六十里）与竹林湾（在县

① （宋）吴则礼：《北湖集》卷四《次韵道辅丈荆州吟四首》，涵芬楼秘笈本。

② 《宋史》卷八八《地理四》。

③ （宋）王安礼：《王魏公集》卷一《送吴殿中知景陵》，豫章丛书本。

④ （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一〇《自鄂渚至夔府途中记所见一百十韵》。

⑤ （宋）曹彦约：《昌谷集》卷二《登复州城诗》。

⑥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土产》，卷三《汉阳府·土产》，卷六《荆州府·土产》。

⑦ 《方輿胜览》卷二七《湖北路·江陵府·题咏》，第488页。

⑧ （宋）苏辙：《苏辙集·栾城集》卷一〇《将还江州子瞻相送至刘郎洑王生家饮别》，中华书局1990年校点本，第181页。

东北九十里)分别因“多竹”、“有竹林”而得名。^①前引刘挚在仁宗时所作诗句“大堤丛竹见霜钩”可见,监利往西至石首、公安方向的江堤边也是秀竹成林。汉川县的竹林更为茂密,有诗“汉川如渭川,千亩尽修竹”^②为证。南宋时,平原内竹林生长依然茂盛。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入蜀途经江汉平原,亲见了监利县东场“皆茂竹高林”,枝江县沱,“皆聚落,竹树郁然”。^③元代,郝经《云梦》诗中有“劲竹密如箐,绿粉封紫箐”^④之句,可见平原内竹林资源仍然充沛。

竹资源以外,其他的植被资源以柳、杨、松等树种为多。北宋时,荆门军松树茂密,“夹道十里”^⑤;仁宗时张景描述公安的景致:“两岸绿杨遮虎渡。”^⑥南宋前期江汉平原的植被情况,可通过《入蜀记》略见一斑。在陆游的笔下,鄂州杨罗湫“大堤高柳”;鹦鹉洲上“有茂林”;复州的白臼“皆古柳侵云”;归子保“多桑柘榆柳”;纲步“高柳中”掩映二十余家;监利的东场“皆茂竹高林,人往来林樾间”……^⑦入元以后,沙市是“十里沙律绿树凉”^⑧,荆门则“桑枝蔼蔼春暗,桃树霏霏昼晴”^⑨,桃树与桑枝争春。明代,汉阳府仍多柳^⑩,其他如杨、枣、松、柏、桑、槐、榿等,大体上与宋元时平原各地分布的一些树种相同。

清代本区修撰的地方志较多,通过其中物产部分的相关记载,有助于了解宋元时期的林业资源状况。如汉阳府,有松、槐、杨、

①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荊州府·山川·石首》“竹林港”条、“竹林湾”条。

② (宋)吕陶:《净德集》卷三八《筧笥谷》,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③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④ (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三。

⑤ (清)杨守敬:《湖北金石志·荆门军景德玉泉禅院唐贤留题诗序碑》,见《杨守敬集》,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⑥ 《方輿胜览》卷二七《湖北路·荊州·题咏》,第488页。

⑦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⑧ (元)宋褰:《燕石集》卷九《沙市道中二首》。

⑨ (宋)傅与励:《傅与砺诗集》卷八《荆门闸中三首》。

⑩ 参见本章表4-2所录《大明一统志》的记载。

柳、樟、榔、桐、栗等树种^①；松滋县生长着栗、松、杉、桐、桤、榔、杨、榆、槐、樟、楮、楸等^②；潜江县有松、桐、槐、栎等^③；石首县有桐、松、杨、樟、槐、栗等^④；监利县有槐、桐、杨、榔等^⑤；枝江县有松、槐、杨、杉、樟等^⑥；荆门州有松、桤、榆、槐、栗、樟、栎、桐等^⑦；钟祥县有松、桤、槐、榆、栎^⑧；孝感县有槐、桐、松、杨、榆、榔、栗^⑨，等等。上述记载可见，松、槐、杨、榆、桐、樟、桤、栗等树种在本区普遍分布，杉、楸、榔、楮等分布于部分地区。对比明、清两代的记载，以汉阳府为例，明代已有松、槐、杨、柳等树种，清代未变。宋元至明清时期，人类有意识地林木更新还不可能大范围、大规模地展开，而宋元时期江汉平原的经济开发也没有达到需要大量砍伐本地区林木的程度，在这种背景下，可以推知，尽管某些树种未见诸宋元志书，但可以认为它们在宋元时已有分布。

二、造船业与矿冶业

（一）造船业

关于造船用材，古人有着深刻的认识。《天工开物》记载：漕船用材以“巨木楠为上，栗次之”，“桅用端直杉木，长不足则接……梁与枋樯用楠木、楮木、樟木、榆木、槐木（樟木春夏伐

① 乾隆《汉阳府志》卷二八《食货·物产》，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乾隆十二年刻本。

② 同治《松滋县志》卷一《食货志·物产》。

③ 康熙《潜江县志》卷八《风土志·物产》。

④ 同治《石首县志》卷三《民政志·物产》。

⑤ 同治《监利县志》卷八《风土志·物产》。

⑥ 同治《枝江县志》卷七《赋役志（下）·物产》。

⑦ 乾隆《荆门州志》卷一五《物产》，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乾隆十九年刻本。

⑧ 乾隆《钟祥县志》卷五《物产》，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乾隆六十年刻本。

⑨ 光绪《孝感县志》卷五《风土志·土物》，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光绪八年刻本。

者，久则粉蛀)；栈板不拘何木；舵杆用榆木、榔木、楮木；关门棒用稠木、榔木；橹用杉木、桧木、楸木”。^① 研究者发现，古人认为“船身的用材要求强度大、弹性大，木理通直，不易变形，而且能耐水湿；桨橹的用材要求坚实，通直而少节。现有史料里所载的船舶用材有杉，松，圆柏，柏，石栎，杨（小船用）等。此外在华南地区有用樟、楠等珍贵树种的大材造船的，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关于桨材，特别提到了圆柏、楸、核桃等”^②。上述造船用材，多数可见于明清时期的江汉平原，部分见于宋元时期。从总体上看，宋元时期本区所拥有的林木资源足以支持造船业的发展。

唐代江汉平原的造船业比较兴旺^③，以此为基础，宋初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本区的造船业很快恢复了生产能力。江陵作为重要的转运中心，肩负着大量的转运任务，当转运物品要由水路分送时，荆南船场则要提供运输船舶。如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年），荆南造船场就承担着造船任务。^④ 天圣六年（1028年），荆南存放有十万匹布，于是“检会荆南先造船十只”，以备前往荆南搬布的州军使用。^⑤ 至北宋末年，仍有诏令荆湖北路造船：政和四年（1114年），令“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转运司各打造五百料（船）三百只”^⑥。荆南船场的船舶用材中，有相当数量来自荆门军。据《宋史·李参传》，景祐五年至宝元二年（1038—1039年）间，李参知荆门军^⑦，“岁以夏伐竹，并税簿输荆南造舟，积日久多蠹恶不可

①（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第九卷“舟车”之“漕舫”，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35、241、242页。

② 参见干铎主编《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第七章“森林利用”第二节“木材的性质和利用”，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第262页。

③ 参见章开沅等主编《湖北通史·隋唐五代卷》第七章“工商业与交通”第一节“天下知的手工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284页。

④（宋）张洎：《张乖崖集》卷一一《申堂自陈状》，中华书局2000年校点本，第122页。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之一三。

⑥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之六。

⑦ 参见前揭《宋两湖大郡守臣易替考》，第211页。

用，牙校破产不偿责。参请冬伐竹，度其费以给，余募商人与为市，遂除其害”^①。据此可知，北宋荆门军的竹林经年遭到采伐，伐下的竹材输往江陵造船，在保证造船用量后，余材任商人自由买卖。

南宋时期，由于长江沿线军事地位的提升，本地区的造船业不仅未在战火中遭到明显削弱，反而获得了促进。

与北宋相比，南宋本区的造船业在造船数量和所造船舶的规模上都有了明显进步。建炎二年（1128年）八月，发运副使吕源乞至明年六月间由“江湖四路打造粮船二千七百余只”^②，可见打造漕船是本地官府造船业的一大任务。在本地所见的运粮船中，有“载米一万二千石”的大船，其“形制圆短，如三间大屋，户出其背，中甚华饰。登降以梯级，非甚大风不行”^③。尽管此船的打造地不一定是本地区，但宋代造船业的发达可见一斑，而造船业的整体发展对本区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官府造船业的另一重要任务是打造各种规格的战舰。绍兴五年（1135年），荆湖地区打造的巨舰为人瞩目，当时造船技术较高的江东、浙西、浙东三路“仿其制为之”^④。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在鄂州看到七百艘大舰，“皆长二三十丈，上设城壁楼橹，旗帜精明，金鼓鞀鞀，破巨浪往来，捷如飞翔”^⑤。荆湖间还有车船，其形“乃唐嗣曹王皋遗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车者，挟以双轮鼓棹而进”^⑥。在车船制造方面，荆鄂地区具备了打造五车、六车至八车船的能力^⑦，鄂州与汉阳军的造船厂还分别建造载重量从七十料

① 《宋史》卷三三〇《李参传》。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之一〇。

③ （宋）张舜民：《画墁集》卷八《郴行录》，中华书局1985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六，绍兴五年闰二月条。

⑤ （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⑥ （宋）李纲：《梁溪先生全集》卷一〇三《与宰相论捍贼札子》。

⑦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之二八。

至三百料、一千料、一千五百料不等的大小马船和脚船。^①南宋末年，因战事需要常以“战舰万艘，分据要害”^②，有时一次战役即损失战船上万艘^③，为使敌舟“十不当一”^④，宋军常以大舰对阵，这些需求势必会带来造船量的激增。与唐代以中小型船只为主体的造船能力相比^⑤，宋代无疑前进了一大步。

除了大量的官造船舶之外，本区还有数量可观的民用船只。江汉平原的广阔水域上承载着“屋头一艇是生涯”^⑥的众多船户，如汉阳军，南宋时全城居民约三千四百户，其中“有船居四百只”^⑦。恃水而生使本地渔船的需求量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民间贸易的繁盛也促进了本地造船业的发展。南宋，以江陵、鄂州为中心的区域贸易的发展，不仅吸引了荆湖南北路的商人，还招徕了大量的“吴檣蜀船”，直至南宋末年，仍见“万檣拥舟楫”^⑧的情景。同时，本地商人亦很活跃，他们或驾船至各地采米，或载粮远漂下游。来往船舶的增多促进了本地造船量的提高，如西进或东下的行旅，往往在沙市换船，以适应峡江的变化；又如“川船，例有厚载之疑，又畏风雨，多濡滞”，这使得货主至鄂州后多更换更适用的船只。^⑨

南宋时期造船能力的增强意味着造船用材暨林木砍伐量的进一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之三四、三五。

② 《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

③ （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三五《故易州等处军民总管何侯神道碑铭》。

④ （元）刘敏中：《中庵集》卷一五《敕赐镇国上将军福建道宣慰使兼镇守建德万户赠荣禄大夫平章柱国温国公谥恭惠萨木丹过神道碑铭》，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参见前掲章开沅等主编《湖北通史·隋唐五代卷》第七章“工商业与交通”第一节，第284页。

⑥ （宋）孙应时：《烛湖集》卷一五《沌中即事》。

⑦ （宋）黄榦：《勉斋集》卷三四《申京湖制置司办汉阳军采米事》。

⑧ （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三《黄鹤楼》。

⑨ （宋）孙应时：《烛湖集》卷七《上邱文定公书》。

步增大。《入蜀记》卷三中，陆游在江陵转乘入川的小船，因峡中水势变化，“惟用橦及百丈，不复张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为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橦六枝，百丈两车”。从中可见，此类入川船只体积虽小，但对竹材的需求量较大。当时人对于造船对林木砍伐的影响，留下了一些直接的记载，薛季宣奏论：“当兵荒水旱之余，大治战船，治屯营于荆渚，林木尽伐，役且踰年，上溯江流将二千里，方幸少休。”^① 魏了翁感言：“其在江陵者，自枝江、宜都境上，伐竹木，毁室庐，斧斤之声日闻，直欲为渡江计。”“又在枝江者，伐竹运木，斤斧之声，昼夜不绝。”^② 这些说法反映出南宋战争对造船用材需求量的急切与庞大，与北宋时输往船场的造船用材有时会存量过多、无法用尽的情形相比，此时的竹木采伐量已大大增加。

（二）矿冶业

宋元时期，本区有较丰富的矿产资源，如金、银、铜、铁、铅、锡等。

铁矿的分布与开采最为普遍，仅《宋史》就记有十多处，是书《食货志》称，黄州（治今湖北同名市）产铁，设有齐安监^③；兴国军大冶县（今湖北黄石市境）有富民监及磁湖铁务^④；汉阳军的金口，荆门军的铁山均是产铁之地，从其地名即可得知^⑤，南宋时荆门军因此成为铁钱流通地区。^⑥《读史方輿纪要》则称南宋绍

①（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二〇《论民力》。

②（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二八《奏外患未靖二相不咸旷天工而违时几》、卷三〇《缴奏奉使复命十事》。

③《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

④《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⑤五代宋初人王周《金口步》诗自注：“在江北汉阳军，下必铁也。”见《全唐诗》卷七六五。《輿地纪胜》卷七八《荆湖北路·荆门军·景物上》“铁山”条，称铁山与远安县界相接，产铁。

⑥《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称，乾道初年，荆门军用铁钱。

熙二年（1191年），于汉阳县大别山^①下的静江营设置铁钱监。^②

铜、铅、锡等矿藏也得到开采利用。宋太宗时在鄂州等“产铜之地，大铸铜钱”，鄂州曾“有监，后废之”^③。熙宁七年（1074年），复于鄂州设置宝泉监，负责铜钱等铸造。^④南宋以后，鄂州仍司职铜钱铸造，使用铁钱的荆门军需要“将会子到鄂渚兑换铜钱”^⑤。兴国军大冶县有铜场^⑥，亦产铜。《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称：“湖北产金……荆南府枝江、江陵县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采之地。”直至元代，江陵等地仍为产金之所。^⑦其他如鄂州产银，是朝廷贡品。^⑧宋人曾言：“诸路出产坑冶之处，往往五金杂出，如铜坑有铅，铅坑有银，银坑有铁之类，盖是所产矿脉厚薄不等。”^⑨从宝泉监与汉阳监的情形来看，当时铸铜、铁钱所需数种矿产，当地及邻近地区皆可供给。

矿产资源的开采、冶炼与铸造，直接影响着林木资源的开发、利用。宋代的鄂州、汉阳军等矿产业较集中的地区，尚有较丰富的林木资源可资利用，汉阳军“据凤栖之峻峰，倚大别之巨麓”^⑩；鄂州境内有黄龙、凤凰、幕阜三山，“皆秀峰翠窠”。^⑪但是，开采、冶铸对于植被资源的消耗是相当大的。首先，开采矿山直接毁

① 《舆地纪胜》卷七九《荆湖北路·汉阳军·景物（下）》“大别山”条：“《元和郡县志》曰：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又，（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七《江南道三·沔州》称大别山一名“鲁山”，在县东北一百步，中华书局1983年校点本，第648页。

② 《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六《湖广二·汉阳府·汉阳县》“铁钱监”条，第3550页。

③ 《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

④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⑤ （宋）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卷一五《与薛象先》。

⑥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⑦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

⑧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⑨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六。

⑩ 《舆地纪胜》卷七九《荆湖北路·汉阳军·风俗形胜》。

⑪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风俗形胜》。

坏了林木植被；其次，冶炼需要大量的木炭做燃料。北宋铸钱，“每铸一贯省，用铜二斤八两，铅一斤一十五两，锡三两，炭五斤”^①。仅以鄂州宝泉监、汉阳铁钱监两处的情况来看，因铸钱所耗费的林木资源就不可小视。鄂州宝泉监年铸钱额十万贯^②，汉阳铸钱监“岁办铁钱一十万贯”^③，如此推算，两监每年至少需耗炭一百万斤。何况，汉阳监的铸钱量其实不止十万贯，据《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嘉定五年（1212年）以前，京西、湖北地区铁钱本取于汉阳监及兴国富民监，富民监后合并于汉阳监，年铸钱二十万。嘉定中（1215—1216年），黄榦知汉阳军时论及钱监利害，指出：朝廷每年从汉阳监所得铁钱不足三万缗，而该监每年“非二三十万缗不足以了监中之支遣，如此，则朝廷所得仅十分之一。所谓九分者，置之何地耶？则曰：‘买铁买炭。’”黄榦又说，汉阳监弊端之源在于“自铸自支而自用之也”，而荆襄地区虽“人烟萧索而铁钱太多，故其用也轻。数年之前铁钱二当铜钱一，今则以三当一矣”^④。由此可见，汉阳监在嘉定中期每年上交铁钱二三万缗，实际铸钱额却为上交额的十倍。钱监“自铸自支自用”属长期积弊，富民监合并于汉阳监时上交了二十万贯钱，据此不难想见，实际所铸是大大高于此数的。

大规模地采矿、铸钱，耗费了多少林木资源？“自古以来，大规模的冶铁作坊，凡是采用木炭做燃料的，都在附近山林中设有烧炭的窑。”^⑤汉阳铸钱不分冬夏，终年生产，由此给附近的山林植被带来很大影响，以至于黄榦说：“大别亦是童山，何薪之可采？”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三。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

③ 嘉靖《汉阳府志》卷二《方域志》“铸钱废监”条，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1963年版。

④ （宋）黄榦：《勉斋集》卷二八《与漕使赵监丞论钱监利害》。

⑤ 参见祝慈寿《中国工业技术史》第七章“中国矿冶工业技术史”第三节“中国冶金技术的历史发展”，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

当地人取薪都不得不“例是烧荻”^①。元代，汉阳监被裁废。^②

三、宋代江夏地区制瓷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探析

——以考古资料为中心

在宋代，江夏地区指行政区划上属于荆湖北路的鄂州江夏县，包括鄂州州治江夏城及所辖“一十八乡。有江夏山、大江、金水”^③，地当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和江夏区。

在宋代制瓷业的发展历史中，江夏地区名不见经传，有关文献资料十分缺乏。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考古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在江夏地区发现了一批唐末至明初的瓷窑遗址，从而证实了该地区制瓷业的存在与发展，并为两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

（一）宋代江夏制瓷业发展概况

经考古发掘，宋代江夏地区的窑址集中在今武汉市江夏区，主要有梁子湖、斧头湖两大窑址群。梁子湖窑址群共发现登记窑堆85处，分布在今武汉市江夏区湖泗、保福、土地堂、舒安、龙泉、贺站等六个乡的沿湖地带及湖汉周围^④，主要包括土地堂青山窑址、舒安乡王麻窑址、湖泗镇浮山窑址等^⑤（见表4-3）。斧头湖窑址群共发现窑堆60处，主要包括新窑村窑址群、杨家漈窑址、陈

①（宋）黄榦：《勉斋集》卷二八《申两司言筑城事》。

② 嘉靖《汉阳府志》卷二《方域志》“铸钱废监”条。

③ 《元丰九域志》卷六《荆湖路》，第268页。

④ 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梁子湖古瓷窑址调查》，载《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

⑤ 参见田海峰《武昌县发现两座北宋瓷窑址》，载《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昌青山瓷窑遗址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1991年第4期；武汉市博物馆等《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浮山窑址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1998年第3期；《湖北武汉江夏王麻窑址1988—1996年的发掘》，载《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熊跃泉等《湖泗窑初探》，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版。

表 4-3

梁子湖宋代瓷窑简表

| 窑 名 | 窑址今名 | 烧造年代 | 出土器物特征 |
|-----|--------|-------------|--------------|
| 青山窑 | 江夏区土地堂 | 五代末、北宋早期至晚期 | 以青白瓷和白瓷为主 |
| 王麻窑 | 江夏区舒安乡 | 北宋中期至晚期或更晚 | 粗制民用瓷器 |
| 浮山窑 | 江夏区湖泗镇 | 北宋晚期终烧废弃 | 青白瓷为主，少量青、白瓷 |

资料来源：田海峰《武昌县发现两座北宋瓷窑址》，载《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昌青山瓷窑遗址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1991年第4期；武汉市博物馆等《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浮山窑址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1998年第3期；《武汉市梁子湖古瓷窑址调查》，载《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湖北武汉江夏王麻窑址1988~1996年的发掘》，载《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熊跃泉等《湖泗窑初探》，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版。

家垅窑址、王家坟山窑址、天心埡窑址、彭家窑窑址等^①（见表4-4）。从诸瓷窑的占地范围看，斧头湖窑址群中，新窑村窑址群分布在约五平方公里的范围内^②，规模可观，其中王家海墩窑和八大坟窑墩占地最多，约为5000平方米；严家窑墩、大曹窑墩、窝屎山窑墩各占地约2000平方米，孙家窑墩面积约1000平方米，陈家窑墩面积约800平方米，艾家窑墩占地700平方米；德大窑墩和对门张窑墩所占面积相对较小，分别为200平方米和100平方米；杨家漈窑址目前总发掘面积400平方米^③，与周围的陈家垅、王家坟山、天心埡、彭家窑等七处窑址共同构成一个较大规模的窑场。^④梁子湖窑址群中，梁子湖西岸的青山瓷窑遗址，废弃物堆积面积达

① 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江夏区新窑村窑址群的调查与发掘》，载《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汉市江夏区杨家漈窑址发掘简报》、《武汉市江夏区陈家垅窑址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2001年第2期。

② 参见前揭《武汉市江夏区新窑村窑址群的调查与发掘》。

③ 参见前揭《武汉市江夏区杨家漈窑址发掘简报》。

④ 参见前揭《武汉市江夏区陈家垅窑址发掘简报》。

5000 平方米左右。^①

表 4-4 斧头湖宋代瓷窑简表

| 窑 名 | 窑址今名 | 烧造年代 | 出土器物特征 | 发掘面积 (平方米 m ²) |
|------|--------|-------------|-----------------------|--|
| 杨家漈窑 | 江夏区安山镇 | 北宋 | 青瓷为主 | 400 m ² |
| 陈家垅窑 | 江夏区安山镇 | 北宋 | 青瓷为主 | |
| 新窑村窑 | 江夏区安山镇 | 北宋至 元末明初 | 粗瓷或釉陶 的擂钵、平底 钵等 | 孙家窑墩 1000 m ² 严家窑墩 2000 m ² 艾家窑墩 700 m ² 大曹窑墩 2000 m ² 王家海窑墩 5000 m ² 窝屎山窑墩 2000 m ² 德大窑墩 200 m ² 对门张窑墩 100 m ² 八大坟窑墩 5000 m ² 陈家窑墩 800 m ² |

资料来源：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江夏区新窑村窑址群的调查与发掘》，载《江汉考古》2000 年第 4 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汉市江夏区陈家垅窑址发掘简报》、《武汉市江夏区杨家漈窑址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2001 年第 2 期。

说 明：陈家垅窑址附近还分布有王家坟山、天心埡、彭家窑等多处窑址，因无详细报告暂未收入本表。参见前揭《武汉市江夏区陈家垅窑址发掘简报》、《武汉市江夏区杨家漈窑址发掘简报》。

根据表 4-3 和表 4-4，梁子湖瓷窑群兴起于五代末年，北宋中叶后逐渐发展，臻于鼎盛；其余各窑均兴起于北宋，且多在北宋时期达到高峰。大量瓷窑在北宋鄂州东南的这片湖区聚集，不仅说明入宋以后该区得到有力的开发和利用，而且也表明以鄂州为中心的

^① 参见前揭《武昌青山瓷窑遗址发掘简报》。

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较快，人口的增长使得民间对日用瓷器的需求量旺盛，于是具备相当生产能力的瓷窑应运而生，多数瓷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期。

瓷器生产的数量较大。因窑数众多，有的窑还多次连续烧造，故产量较高。如浮山二窑，由于烧造不停，使得窑床不断加厚加高，从而被迫增高窑墙，加大窑室，以减少建窑周期，增加产量。^①王麻窑的状况与浮山窑相似，连续不断地烧造使得窑床逐渐加高，窑工们必须加高窑墙以节约生产成本。王麻窑先后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扩建，扩建工程是连续进行的，瓷器生产也是连续不断的^②，由此可以想见瓷窑的日常生产相当繁忙。为适应大量烧制的需要，烧造方法也做了相应改进，如青山瓷窑，“壶以单位匣钵装烧为主，碗、盘、碟以匣钵叠烧为主，一叠匣钵可装烧十多件至二十余件不等，按照这种装烧方法，一窑可装烧上万件产品”^③。

江夏瓷窑生产的大量产品不仅可供当地需要，而且销往周边各地，迄今考古发掘的大量资料足以证明这一点。例如，今武汉市北面黄陂区铁门坎宋墓出土的青瓷、白瓷、青白瓷、酱釉瓷等四大类瓷器，皆为湖泗镇瓷窑所产^④；铁门坎附近祁家湾镇宋王山宋墓群出土的瓷器，以影青瓷为主，有少量青瓷，影青瓷的日用品全部出自梁子湖窑系。^⑤武汉市武昌区放鹰台宋墓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是瓷器，据专家推测，多数青釉瓷器可能是江夏斧头湖沿岸宋代民间青瓷窑的产品。^⑥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北宋墓葬出土的青白瓷碗、壶

① 参见前揭《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浮山窑址发掘简报》。

② 参见前揭《湖北武汉江夏王麻窑址 1988—1996 年的发掘》。

③ 参见前揭《武昌县发现两座北宋瓷窑址》。

④ 参见武汉市博物馆《黄陂县祁家湾镇宋王山北宋时期墓葬群》，载《江汉考古》1998 年第 3 期。

⑤ 参见前揭《黄陂县祁家湾镇宋王山北宋时期墓葬群》。

⑥ 参见武汉市博物馆《洪山放鹰台遗址 97 年度发掘报告》，载《江汉考古》1998 年第 3 期。

等在胎、釉、造型和烧制方法上皆与湖泗窑的产品“基本相似”^①；该市青山区宋墓出土的黄绿釉印花陶碗，“其胎质、釉色、造型与烧造工艺等，均同于武汉附近的梁子湖、斧头湖等古窑的产品”^②。今武汉以外的湖北省其他地区也不难看到同类情形，如云梦县王家山宋墓出土的葵口高足碗与湖泗窑址出土的碗一致，出土的瓜棱形水注亦与武汉柏泉宋墓出土的壶一致。^③ 孝感市徐家坟宋墓出土的瓷碗在器型上与梁子湖青山窑出土的同类器具“作风完全相同”，应当也是青山瓷窑所出。^④

在制瓷技术与工艺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如梁子湖窑以产青白瓷为主，其中不乏细瓷精品。这些细瓷产品工艺精良，纹饰精美、多样，有精细的刻花纹饰，显眼的印花纹饰；釉色以青白釉为主，兼有白釉、灰青釉、乳白釉等多种变化。^⑤ 王麻窑址出土的一件瓷枕，则综合运用了刻、捏、雕、贴、塑等多种工艺。^⑥ 陈家垅窑生产的炉、香薰、瓶等陈设用器“造型优美”^⑦。黄陂铁门坎宋墓中，出土过一件湖泗窑瓷碗，“釉面平滑，青白二色结合完美，色泽光亮莹润，影青效果相当好，胎质细密近白，胎体薄而平整，映日几能透光”，体现了湖泗窑细瓷的上乘水平。^⑧ 有的细瓷产品釉色明亮匀净，甚至“有类玉的质感，胎质细腻致密，呈现纯白

① 参见武汉市文物管理处《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北宋墓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② 参见武汉市文物处《武汉市青山宋墓清理简报》，载《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③ 参见孝感市博物馆等《云梦王家山宋墓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2001年第4期。

④ 参见熊卜发、陈明芳《湖北孝感市徐家坟宋墓的清理》，载《考古》2001年第3期。

⑤ 参见前揭《武昌县发现两座北宋瓷窑址》。

⑥ 参见前揭《湖泗窑初探》。

⑦ 参见前揭《武汉市江夏区陈家垅窑址发掘简报》。

⑧ 参见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湖北黄陂县铁门坎遗址宋墓》，载《考古》1995年第11期。

色，其白度与现代瓷无异”^①。

从总体上看，宋代本地制瓷业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生产量大；二是产品以粗瓷居多，瓷器生产以讲求实用为主。尽管已有较高的制瓷技术与水平，但本地细瓷较少，制瓷业面向乡村、立足民间的意图非常明确，如以生产青瓷为主的斧头湖窑址群，其中的杨家澥窑专门烧造日常瓷器，其产品以平底器、实足器为主。^② 陈家垅窑的产品造型简朴，以普通的粗制碗、缸等实用器物为主，即便生产一些陈设器具，如炉、香薰、瓶等，但“同时也具有实用价值”^③。新窑村窑址群的出土物显示，该窑址群以民间实用器具为烧造对象，尤其是粗瓷或釉陶的擂钵、平底钵、平底盆、带流罐、炉、大缸等器皿，均表现了该窑“面向乡村民间的生产性质”^④。以生产青白瓷为主的梁子湖窑址群，其产品亦以日用瓷为主，前述浮山窑与王麻窑的产品即是如此。黄陂铁门坎与祁家湾镇宋墓出土的梁子湖窑产青白瓷器物也以日用品为多，其大宗是日常用量最大的碗，其次是壶、罐、盘、盏、坛、炉等，造型多普通、常见。^⑤

（二）宋代江夏制瓷业兴衰的自然与社会条件

宋代江夏制瓷业的发展变迁，既与宋代政治、经济发展变迁的总格局密切相关，又是当地自然、地理条件变迁的直接产物。

1. 促进江夏制瓷业发展的自然资源与社会条件。

自然资源主要指原料、燃料与地貌条件。

制瓷最基本的原料是瓷石与瓷土。瓷土包括高岭土与含 Al_2O_3 量较高的粘土^⑥，高岭土是一种典型的黏土，是生产瓷器的良好原

① 参见前揭《湖泗窑初探》。

② 参见前揭《武汉市江夏区杨家澥窑址发掘简报》。

③ 参见前揭《武汉市江夏区陈家垅窑址发掘简报》。

④ 参见前揭《武汉市江夏区新窑村窑址群的调查与发掘》。

⑤ 参见前揭《黄陂县祁家湾镇宋王山北宋时期墓葬群》。

⑥ 参见前揭《中国工业技术史》第五章“中国陶瓷工业技术史”第三节“中国制瓷三大要素剖析”，第454页。

料。^① 考古发掘表明,环绕梁子湖、斧头湖、团墩湖、鲁湖的山丘蕴藏着高岭土和其他多种制瓷原料。^② 烧窑所需的燃料,古代中国南方的瓷窑,一般就地取材,以树木为燃料。^③ 烧制陶器,“大抵陶器一百三十斤,费薪百斤”^④,制瓷所耗燃料比制陶还要超出50%以上。考古发掘可见,江夏境内的窑址群采用的是龙窑结构,这种结构的单位重量瓷器燃料消耗量为3—3.5公斤柴/公斤瓷器。^⑤ 宋时期的梁子湖、斧头湖周边地区,松柴资源比较丰富^⑥,提供了燃料上的支持。当地较丰富的制瓷原料和燃料,使大规模窑场的形成在原材料方面得以满足。

江夏地区的地理形貌也有利于瓷窑的兴起与发展。迄今已发掘的江夏窑址群位于江汉平原东部边缘,多沿今武汉市江夏区梁子湖、斧头湖、团墩湖、鲁湖分布,数量多,规模大。这一带地区河湖密布,大小河流交织于平原与山丘之间,加上邻近长江,具有天然的水上交通优势,便于原料的输入与成品的输出,为大规模窑场的出现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梁子湖窑群即利用濒湖之便,窑工们利用废弃堆积物铺设了一条从瓷窑直达湖边的小路,并在湖边构筑水运码头,用于产品装船外运。^⑦ 黄陂祁家湾镇宋王山宋墓群出土的多种影青瓷器全部来自梁子湖窑系,显然与其通达的水路有关:宋王山东侧有一条古老河道向南注入童家湖,连通府河并最终汇入长江^⑧,梁子湖窑系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线路抵达祁家湾

① 西北轻工业学院等编:《陶瓷工艺学》,轻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② 参见前揭《武汉市江夏区新窑村窑址群的调查与发掘》、《武汉市梁子湖古瓷窑址调查》。

③ 参见前揭《中国工业技术史》第五章“中国陶瓷工业技术史”第三节“中国制瓷三大要素剖析”,第453页。

④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第七卷“陶埏”,第193页。

⑤ 参见前揭《中国工业技术史》第五章“中国陶瓷工业技术史”第三节“中国制瓷三大要素剖析”,第475页。

⑥ 参见前揭《武汉市梁子湖古瓷窑址调查》。

⑦ 参见前揭《武汉市梁子湖古瓷窑址调查》。

⑧ 参见前揭《黄陂县祁家湾镇宋王山北宋时期墓葬群》。

镇的。

促成梁子湖、斧头湖一带民间制瓷业趋于活跃并发展至顶峰的根本原因，是北宋中叶以降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北宋中期，江汉平原的人口较宋初显著增长，不仅江夏所属的鄂州，平原其他州府如江陵府、郢州、德安府等地人口均明显增加。^①以鄂州为例，太平兴国时期户数为29203，元丰时已达125257。两宋之际因兵燹战乱，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至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鄂州又成为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虽钱塘、建康不能过”^②。人口的增加带动了本区农业的进步，促进市镇的增加，贸易的兴盛，加上水陆交通的繁荣，为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 江夏制瓷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上列表4-3和表4-4中的各窑烧造时间可见，两宋之际是江夏瓷窑群发展变迁的转折点，多数瓷窑进入南宋后趋于衰落，只有新窑村的瓷窑群持续到明朝初年。在北宋，江夏地区的陶瓷业经历了竞争并获得较为显著的发展，何以在南宋时期转向衰落？

从根本上说，两宋之际的剧烈动荡是造成本地制瓷业衰落的社会因素；另一方面，与南宋名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相比，江夏瓷窑在原料、燃料、窑炉形制、制作工艺等方面的不足是本区制瓷业退出竞争的内在原因。

在制瓷原料方面，考古发掘显示，江夏地区瓷土质量差异较大。虽然梁子湖周围地区有优质瓷土^③，但该窑址群中的青山窑址处，“土质较松，其厚薄差别较大”^④。斧头湖窑址群中的新窑村窑址所用高岭土的质地也较差。^⑤从出土的器具来看，无论是梁子湖窑址群还是斧头湖窑址群，其产品都是粗瓷多，细瓷少，粗瓷占全

① 笔者对此作过探讨，此处从略。参见前揭《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上篇《政区、人口篇》第二章“人口数量与分布”。

② （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③ 参见前揭《武汉市梁子湖古瓷窑址调查》。

④ 参见前揭《武昌青山瓷窑遗址发掘简报》。

⑤ 参见前揭《武汉市江夏区新窑村窑址群的调查与发掘》。

部数量的 80% 左右^①，新窑村窑址的“陶瓷器多为褐红胎，胎较厚”；王麻窑的产品胎质粗糙厚重。^② 这种状况，显然与瓷土质量差有直接关系。由于瓷土的含熔剂量低，以此制作的瓷胎便难以致密烧结。有关这一点，与宋代一些名窑相比，可以看得更清楚。如景德镇窑，采用的瓷石中含有绢云母成分，可起熔剂作用，易在高温下与石英和高岭石反应，生成较为均匀分散的玻璃态物质，增加瓷器的致密度和透明度，故景德镇的瓷器透明度高。^③

燃料和窑炉形制方面，江夏诸窑采用龙窑结构，多依山坡或土堆倾斜修筑，建窑成本较低，热效能较高。但比起景德镇窑这种“系从龙窑并参考北方馒头型窑，又根据松柴特性而修建和发展起来的”窑式，江夏龙窑所耗木材要多出近 30% 以上。景德镇窑的燃烧室空间较大，可使燃料燃烧得较为充分，而且“景德镇窑所使用的柴块较大，燃料层空隙较多”，更有利于减少热损。江夏龙窑与景德镇窑相比，窑炉形制的不同对瓷器质量也有影响。景德镇窑“仅以各种投柴方法，即可控制适当的气氛和烧成曲线，从而获得理想的多品种的产品”。而龙窑内某些部位气氛和温度的波动较大，“烧大型致密制品，有时容易发生变形”^④。浮山窑址出土的瓷器就存在“火候虽高但器物变形者较多”^⑤ 的现象。

据统计，除上述已发现、登记的 85 座窑堆外，江夏境内尚有约 40 座瓷窑遗址，其中部分应是宋窑。在环梁子湖、斧头湖这一不大的空间内聚集如此密集的瓷窑，经过一定时间的烧造后，不能不在制瓷原料的持续供给上发生问题。相比之下，南宋名窑龙泉窑所在的龙泉地区“盛产瓷石、原生硬质粘土、紫金土和石灰石”，

① 参见前揭《湖泗窑初探》。

② 参见前揭《武汉市江夏区新窑村窑址群的调查与发掘》、《湖北武汉江夏王麻窑址 1988 ~ 1996 年的发掘》。

③ 参见前揭《中国工业技术史》第五章“中国陶瓷工业技术史”第三节“中国制瓷三大要素剖析”，第 454 页。

④ 参见前揭《中国工业技术史》第五章第三节“中国制瓷三大要素剖析”，第 472 ~ 477 页。

⑤ 参见前揭《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浮山窑址发掘简报》。

是其“不断发展和历久不衰的重要条件”^①。同时，在宋代的江夏一带，不仅有大范围的窑址群在梁子湖、斧头湖一带兴起，附近还有冶铁、铸钱等其他手工业，都需要木材作为燃料，这就使得当地林木资源消耗较大，从而对制瓷业的持续发展在燃料供应上造成制约。

在瓷器的制作工艺方面，虽取得进步，但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在本地窑址群出土的瓷器中，数量占八成的粗瓷产品以日用瓷为主，类型单一，制作粗糙。由于片面追求产量，对技术精雕不足，造成了许多产品烧造质量不佳，存在着制作草率，器物多有变形，产品釉色虽是青白釉，却普遍不纯，或青白二色不能均匀融合等缺陷。^②如王麻窑的瓷器，釉色不稳定，成品率低^③；浮山窑产品“釉色虽是青白釉，但普遍不纯”^④；杨家澥窑的日用瓷器“胎、釉和制作工艺较为简单粗糙”^⑤。反观龙泉等窑，在原料和胎釉配方、成形、上釉、装饰、烧成诸方面，均用心精细，成就突出。^⑥精粗、高下之间，差距一目了然，最终导致江夏制瓷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多种因素导致了江夏地区制瓷业的渐趋衰落，南宋以后，不仅江夏地区、江汉平原，乃至荆湖地区广大的瓷器市场都逐渐被景德镇之类的名窑产品所占据。

从总体上看，在陶瓷业鼎盛发展的宋代，江夏梁子湖、斧头湖沿岸的制瓷业也达到了自己前所未有的高度，反映出宋代江汉平原乃至湖北地区的制瓷水平，是宋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实证。尽管

① 参见前揭《中国工业技术史》第五章第五节“南北瓷系及其制作比较”，第518页。

② 参见前揭《湖北黄陂县铁门坎遗址宋墓》、《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浮山窑址发掘简报》。

③ 参见前揭《湖北武汉江夏王麻窑址1988~1996年的发掘》。

④ 参见前揭《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浮山窑址发掘简报》。

⑤ 参见前揭《武汉市江夏区杨家澥窑址发掘简报》。

⑥ 参见前揭《中国工业技术史》第五章第五节“南北瓷系及其制作比较”，第519~523页。

江夏制瓷业在技术与质量上不能与众名窑相提并论，但它在本区拥有广大市场，在北宋时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面貌。南宋以后，江夏制瓷业渐趋衰落，这既是受制于当地资源的结果，也体现出宋代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

本章小结

在唐、五代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江汉平原得到进一步开发，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拓宽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渠道与方式。本章以河流、丘陵和林木植被这三类自然资源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它们在宋代得到的有效利用及其对江汉平原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河流资源的有效利用突出表现在此时期水路交通的发展。唐宋以前江汉平原的交通重心是南北向的荆襄陆路，宋代开始向东西向的江陵—鄂州水路转移，以长江干流为主，由汉水、夏水、环水等众多支流共同构建起密而不疏的水路交通网，大量商人、农民、渔民等借助便捷的水陆交通进入江汉平原，成为本区经济开发的活力。水路交通的发展，带动了本区多个经济门类尤其是渔业、造船业的进步，促进了江陵和鄂州城镇与商业的兴盛，并进而带来平原区内经济社会开发的全面扩展。

对丘陵山地的利用，集中在平原的边缘地区。在荆门军，因地制宜、水旱作物分种，并充分利用山泉资源开发山田。在其他多个地区，茶叶、果树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开发取得较明显的进步。

手工业方面，造船业、矿冶业与陶瓷业的发展与本区植被资源的更替相互作用。以江夏地区考古所见当地陶瓷业的兴衰为个案，本章重点分析了陶瓷业与植被资源的关系，强调植被资源的变迁既可带动陶瓷业的进步，亦可限制其发展。

对上述资源的利用成为宋代江汉平原经济开发的几处亮点，有力促进了本区的经济开发。

第五章

宋元江汉平原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包罗万象，本章有关宋元江汉平原社会生活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聚落的分布与变迁，自然灾害的种类、分布与影响，乡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以及水神信仰所反映的区域人地关系。贯穿诸问题的主线仍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

第一节 宋元江汉平原聚落的变迁及其环境因素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聚落”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很早，《史记·五帝本纪》：“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注曰：“聚……谓村落也。”《汉书·沟洫志》：“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逐成聚落。”其基本涵义皆指乡村居民点。近代以来，多个学科展

开了有关聚落的研究,聚落的定义因此有多种表述。^①具体到本章的研究,聚落是人类所有居住地的通称,包括乡村(基层聚落)和城镇(往往表现为各级行政机构治所,州、县治所与建制镇、市)两大基本类型。影响聚落变迁的因素有多种,政治、经济、人口、民族、宗教、自然,等等,本文所关注的环境,系指通常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它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包括人的叠加因素。

有关传统聚落与环境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丰富成果,但集中在史前时期(如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或现实阶段(如建筑学、景观学的研究)^②,着眼于历史时期的成果则比较有限,具体到江

① 不同学科、不同学者,甚至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聚落”(settlement)都有不同表述。如英国地理学家P. 哈吉特(Peter Haggett)认为:“聚落是人类占据地表的一种具体表现,是形成地形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引自张光直《谈聚落形态考古》,载氏著《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社会学家G. R. 威利界定“聚落”为:“人类将他们自己在他们所居住的地面上加以处理的方式。它包括房屋、房屋的安排方式,并且包括与共同体生活有关的其他建筑物的性质与处理方式。”(转引自张光直《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载《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文化人类学家C. 阿伦斯伯格和S. 金布尔认为,聚落“是将文化与社会联系起来的一个主要环节,也许还是决定性环节”(转引自谢吾同《聚落观》,载《华中建筑》第14卷第3期,1996年)。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考古学的“聚落所指的是一种处于稳定状态,据有一定地域并延续一定时间的史前文化单位”(张光直著,吴加安、唐际根译:《聚落》,载《当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我国一些中青年学者将“聚落”定义为:“一个由多种物质要素和自然要素构成的综合系统,它原本是指有别于都邑的农村居民点,现代含义上则是所有居民点的通称,即人类生活地域中的村寨城镇。”(杨大禹:《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或称:“聚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综合体。”(张驰:《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近年较重要的成果如张驰《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钱耀鹏《史前聚落的自然环境因素分析》,载《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4期;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文化中心的转移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载《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研究情况从略,可参见陈宗兴、陈晓健《乡村聚落地理研究的国外动态与国内趋势》,载《世界地理研究》1994年第1期。

汉平原的更为数不多^①，而以宋元时期江汉平原聚落与环境关系为主题的研究尚属空白。本章试图从文献与考古资料出发，宏观把握宋元江汉平原的地理环境特点，分析聚落的基本类型、空间分布和发展趋向，探讨聚落变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了本地区人地关系的基本特征。

二、聚落变迁的主要特征

与此前（主要是唐时期）相比较，宋元江汉平原聚落的变迁较为复杂。一方面，原有聚落的基本格局趋向稳定；另一方面，聚落在空间分布也出现了较明显的分化、聚合与转移。

（一）平原中腹出现较多小型聚落和散落型民居

以江汉平原中部腹地沌水两岸为例，见于南宋陆游记载的基层聚落自东向西依次有新潭、下郡、八叠洲口、归子保、纲步、毕家池、紫媚、东场、鸡鸣、湛江。^② 它们插花式地分布在平原的中腹，规模不大，但比较稳定并逐渐发展。如下郡“有二十余家”；归子保“有十余家”；纲步最初仅是“孤灯一点”^③，数年后发展为“有二十余家”^④。也有个别腹地聚落的规模较大，汉阳鹦鹉洲至沌口之间的金鸡洲即“如小县”^⑤。

（二）新增若干县级治所聚落

唐代天宝年间（742—756年），江汉平原共有18个县级治所，五代后期省并沔阳（今湖北仙桃市），共设17县。北宋时有较大

① 主要相关论著有：龚胜生《两湖平原城镇发展的空间过程》，载《地理学报》第51卷第6期，1996年11月；邓先瑞、吴宜进《长江流域住区的形成与发展》，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6期，2003年12月；周凤琴《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载《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庄林德《常德市域城镇体系发展的历史基础》，载《经济地理》第20卷第1期，2000年1月，等。

②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③ （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一一《宿纲步》。

④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⑤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变化,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在五代基础上新增了3县1监:潜江县(治今湖北同名市)、玉沙县(今湖北洪湖、监利之间)、建宁县(今湖北石首市境内)和宝泉监(今湖北武汉市境内),皆由原先等级较低的聚落升格而来:玉沙、建宁和潜江县的前身分别是原白沙院、白白巡和白伏巡。^①南宋以后,建宁县省为镇,其余县(监)不变,至整个元代,除元贞元年(1295年)升桃源县为州外,基本保持原有格局。其详参见图5-1《宋元江汉平原聚落分布示意图》^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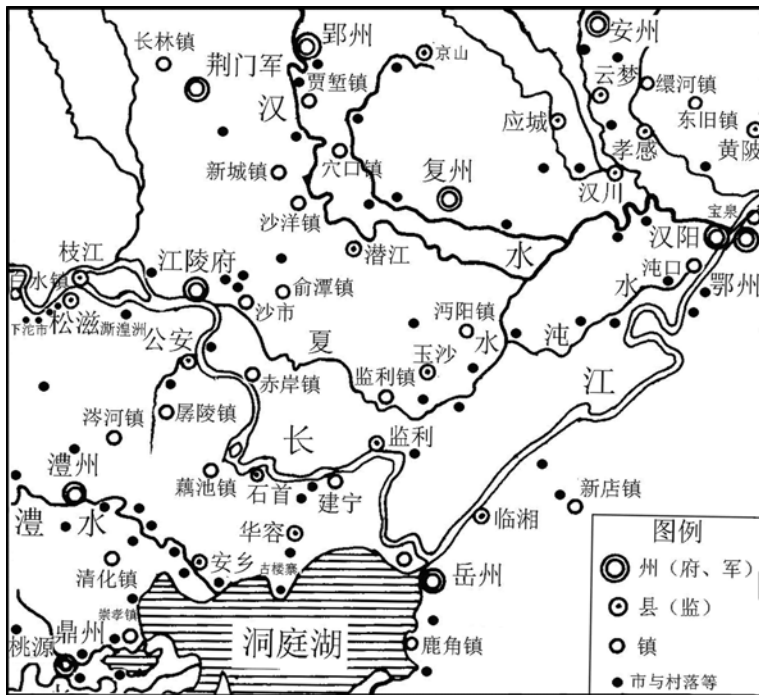


图 5-1 宋元江汉平原聚落分布示意图

① 参见《元丰九域志》卷六《荆湖北路·江陵府》，第266页；《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②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北宋)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图》改绘。

（三）大型聚落鄂州形成，并取代江陵，成为占据首要地位的区域性中心聚落

鄂州与江陵是江汉平原发育较早的两个聚落，但直到隋唐，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水平、人口规模，长期以来都是江陵在鄂州之上，江陵是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宋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鄂州城不断发展，江陵城则变得停滞。两宋之交，江陵遭受了严重的战乱，人口锐减，后来虽逐渐恢复，但始终未能达到北宋时的水平。与之相反，鄂州城在南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市邑雄富，列肆繁错”^①，加上州城附近延绵数里的南草市，构成一个“沿江数万家”^②的“一大都会”^③，成为“六道财计之所总，七萃营屯之所聚”^④的中心聚落。入元以后，鄂州持续发展，政治地位日趋而上，至元十一年（1274年）设置荆湖行省，治所定在武昌路，即宋时鄂州，自此以后，武昌便一直保持了江汉平原区最高行政中心的地位，江陵原有的地位则一去不返。整个明代，武昌是湖广布政司的治所。清朝分湖广布政司为湖北、湖南两省，长沙作为湖南省会与湖北省会武昌南北分治，但本区的中心聚落仍是武昌，统辖两省的湖广总督便以武昌为驻所。至于江陵，仅是武昌治下的一个中层聚落，规模、地位、影响皆不能与武昌相提并论。^⑤直至今日，这种格局仍大体如是。

（四）活动型船居是一种较重要的居住形式

在江汉平原广阔的水域，点缀着一种特殊形式的聚落——以船

①（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②（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第225页。

③（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④（宋）罗愿：《鄂州小集》卷五《鄂州到任五事札子》。

⑤ 关于武昌与江陵的地位变化问题，龚胜生作过研究，参氏著《两湖平原城镇发展的空间过程》，载《地理学报》1996年第6期。

居为标志的活动型聚落^①，居民多以水产捕捞为业，以舟船为居所，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面。如汉阳军“有船居四百只”^②；华容一带百姓“多以舟为居处，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十之四五，所至为市，谓之潭户”^③。南宋赵蕃的《渔父诗》有“泛宅浮家一叶间”^④之句，描写的就是这种游居式水上聚落。

河湖边还有一种居住形式值得注意：居民随水域的季节性变化或聚或散，搭建临时性住宅，开展生产、生活。这种形式，虽无固定性建筑，时间上也不连贯，但其居民构成、活动方式比较稳定，而且保持在基本固定的区域范围之内，所以也可视为聚落。

（五）部分聚落迁移或消亡

原有一些聚落从旧址迁移甚至消亡，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沿江傍湖地区。如公安城，据南宋陆游所见，因“沙虚岸摧，渐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⑤。有些聚落的名称，宋时见于文献记载，但其具体地望皆不可考，有的连南宋时人就已弄不清楚，有的则在南宋地志中被视为往昔的“景物”，可见这些聚落在当时兴衰不定或已湮废不存。

与宋代相比，元代的资料较少，尤其是县治以下基层聚落的资料更少，但是，元代前期，本地区长江沿线的多个分流水口被堵塞，俗称的“九穴十三口”只剩下荆北郝穴和荆南虎渡口，过去的河港湖汊被改造成农田。据此可知，元代本区聚落有较普遍的发展。

① 有研究者在对当代长江流域乡村聚落进行研究时注意到这类“以舟楫为家的水上船居”，提及两湖平原河湖地区历史上“有过漂泊民的船居情况”，称之为“移动型民居”。参见邓先瑞《长江流域乡村聚落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载《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5期。

② （宋）黄幹：《勉斋集》卷三四《申京湖制置司办汉阳军余米事》。

③ （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

④ （宋）赵蕃：《淳熙稿》卷一八《渔父诗四首》，中华书局1985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⑤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三、影响聚落变迁的环境因素

影响聚落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环境的因素十分重要。人类对居住空间的选择首先是对环境的选择，环境中的地缘形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等要素，在塑造聚落的地域特征和空间差异上起着重要作用。这里着重分析影响宋元时期江汉平原聚落变迁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地缘形貌，水文条件，自然资源及其经济效应。

（一）地形地貌

江汉平原地势低平，平均海拔在 35 米以下，监利县谭家渊附近地面高程为零。平原北、东、西边缘分布有海拔约 50 米的平缓岗地和百余米的低丘，南面与洞庭湖平原连成一片，合称“江汉—洞庭平原”。因整个地势四面高而中间低凹，故又称江汉—洞庭盆地，总地貌是从中部平原低地，渐次向外呈梯级上升为岗地、丘陵。这种地貌形势容易造成严重的内涝外洪，开发难度较大。

宋元时期，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不断提高，人口压力的逐渐加大，于是在低湿平原，尤其是在平原中部的低洼地带开始有聚落增加，数量和分布比过去扩展，规模与等级也比过去提高。但是，限于地理环境 and 经济水平，中部低地的聚落相对来说仍分布较稀，规模较小，变动性也较强，且有较多散居的情况。

较大聚落多分布在平原的周缘，平原向丘陵过渡或与丘陵交会的地带。如区域性中心聚落江陵、鄂州分别位于江汉平原的西缘、东缘；州县级聚落安州（治今湖北安陆）、郢州（治今湖北钟祥）、黄冈（治今湖北黄州）、荆门、枝江、松滋、云梦、孝感（皆治今湖北同名县市）等，也都分布在平原周缘，与平原中部洼地聚落既稀且小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二）水文条件

江汉平原河港纵横，湖泊密布，平原内水系发育大致以长江为界，分为北、南两大部分：北部江汉平原以长江、汉水为主干，组成复杂水系，区内有较大河流十余条，与众多湖泊构成河湖交错的水网。水资源丰富，航运条件优越，但也较易受到洪涝的威胁，这种水文条件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区聚落的面貌。

大多数聚落分布在江河沿岸，往往也是水运交通线旁，或是数条通航河流交汇之处，如汉阳军、鄂州城位于汉水与长江交汇处，黄州城位于岐亭河入长江口；或是河流梯级中转点，如沙市，宋代川盐大量沿长江东下，沙市是川盐出三峡后转输各地的重要口岸，中转运输与贸易繁荣，当地的居民结构也因此深受影响，“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则与蜀人为婚姻者也”^①。

水文条件的变迁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聚落的迁徙乃至湮废，这在傍水聚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研究，近五千年来，荆江洪水位上升量约为 13.6 米，其中宋代以来上升了约 10 米。^② 前述公安城，宋时的江流曾是昔日的市邑，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荆江洪水位上升，城址安全受到威胁而不得不搬迁的结果。

（三）自然资源状况

仅以水产资源和矿产资源为例，即可看到宋元时期本区的自然资源状况对江汉平原聚落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水产资源，包括水面资源和水域上繁殖、生长的水生动植物资源。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的水面资源丰富，除为数众多的天然河流、湖泊外，还有大大小小的陂堰、沟渠等人工水利工程，其中多数有灌溉、舟楫或捕捞、养殖的功用。各类水生动植物品种多，分布广，其中以食用鱼的利用最为广泛，一些以捕鱼为主的聚落应运而生。仅以陆游的《入蜀记》卷三为例，可以看到鄂州以东的杨罗洑，“居民稠众，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又皆巨鱼”；汉阳西南的金鸡洑，“得缩项鳊鱼，重十斤。洑中……出鲟鱼，居民率以卖鲙为业”；沌水边的下郡，“有二十余家，皆业渔钓”。至元代，陆游笔下的这片地区属于沔阳府，仍号称“网罟之利甲天下”^③。

河湖沿岸水域广泛生长的芦苇、菱、芡、荻等水生植物，对本

①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② 参见前揭周凤琴《荆江近 5000 年来洪水位变迁的初步探讨》。

③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二《元故奉元路总管致仕工部尚书韩公神道碑铭》，第 183 页。

区聚落的演变也有影响。葦子可建屋，菱、芡、荻等可食用，在饥荒之年更是人们的救命资源。^①因此，除天然生长外，也有人工种植^②，菱的产量较大，甚至有“乌菱不论价”^③之说。荻根也有“克饥”的作用，在荻林生长的地方，“寻常旱歉之岁，安、复、光、黄之民皆辐凑于此，旋结茅庵，采取以食，动数千人”^④。

矿藏资源，主要有铜矿与铁矿。宋代江汉平原有两个较为重要的专业性聚落：一是鄂州宝泉监；二是汉阳铁钱监。宝泉监在鄂州“东二里”^⑤，“熙宁七年置，铸铜钱”^⑥；铁钱监于绍熙二年（1191年）设在汉阳县大别山下的静江营^⑦，铸铁钱。两监的出现，分别依托于附近的矿藏——黄州与兴国军（治今湖北阳新县）之间的大冶铜矿^⑧，汉阳军的金口铁矿。^⑨

综上所述，地缘形貌、水文条件、自然资源及其经济效应影响着宋元时期江汉平原聚落的规模、分布和兴衰变迁。但是，必须看到：第一，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球表层，自然地理环境是一个多因素构成的自然综合体，各因素之间彼此联系、相互作用，

①（宋）黄榦：《勉斋集》卷三〇《申朝省乞候救荒结局别行措置筑城事》。

②（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第九“鄂州总领司蛇”条，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本，第864页。

③（宋）苏辙：《栞城集》卷一〇《将还江州子瞻送至刘郎洑王生家饮别》，第181页。

④（宋）黄榦：《勉斋集》卷三一《申省豁常平米》。

⑤《元丰九域志》卷六《荆湖北路·鄂州》，第268页。

⑥《宋史》卷八八《地理四》。

⑦《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六《湖广二·汉阳府·汉阳县》“铁钱监”条。

⑧大冶，从古至今都是我国一个重要的矿产地，大冶铜绿山矿藏资源丰富，早在春秋战国时已建立起大规模的铜矿产地，宋代大冶“有富民钱监及铜场、磁湖铁务”（《宋史》卷八八《地理四》），铜、铁及铸币三务并兴。我国近代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就是以大冶铁矿、汉阳炼铁厂以及萍乡煤矿组成的。参见许惠民《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兼对两宋煤炭开采的总结》，载《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⑨金口有铁，参见王周《金口步》诗，《全唐诗》卷七六五。

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影响，聚落的发展变迁是自然地理诸因素长时期、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影响聚落演变的因素是多元的，除了地缘形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等自然因素以外，其他因素如政治军事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移民、家族制度、社会交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人文因素，无不对聚落产生深刻影响。

同时，还应当看到，“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居住空间的影响是一个可变的量”^①，改变其影响的强度和方向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的活动。宋元时期，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提高，江汉平原的人类居住空间也逐渐扩展，过去不能居住的水乡洼地开始成为人类的家园，由此奠定了明清以降本区聚落发展的基本格局，影响直至当今。因此，考察聚落变迁的时候，既要看到人类对环境的依赖关系，又要看到人类对环境的选择甚至改造能力，而且生产力水平越高，人类对聚落的能动性影响就越大。

从聚落的变迁来看宋元时期江汉平原的人地关系，其基本特征是人适应着地理环境，遵循着地理环境的内在规律，对环境因势利导；人与自然之间能够和谐相处，良性互动。但是，正像北宋中期人郑獬在谈到家乡安陆时曾感叹的：“天下平治之久，生齿大繁，暴害天物亡休息。异时汉溪多鱼矣，不售则反弃诸河；今财充釜而已，是川泽不足以胜网罟。”^② 郑獬的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多少反映出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不利扰动的问题已开始出现。

四、个案分析：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自魏晋以来，鄂州城^③即是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之一，历经发展，至宋代成为长江中游的最大城市，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试图从城市内部平面布局的角度探讨宋代鄂州城的发展变迁，在对鄂州城市布局进行复原的基础上，分析其所体现出的特

① 管彦波：《论中国民族聚落的分类》，载《思想战线》2001年第2期。

② （宋）郑獬：《郾溪集》卷一七《虎说》，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时鄂州，明清以降皆称武昌，地当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老城区一带。

点，考察其形成的原因，尤其关注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从宋代城市史的角度为人地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实证性的个案。

（一）城池规模、城门布局

从三国到宋元，鄂州城的营建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总的趋势是城池规模逐渐增大，自西向东扩展。

第一个时期，“吴孙权赤乌二年修筑旧垒，谓之夏口城”^①。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②。城池“周围一十二里，高二丈一尺。后又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为重城，设二门，东曰口州门，西曰碧澜门。宋、齐、梁、陈皆因之”^③。唐宝历中（825—827年），牛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等使。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赋菁茆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苦板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砖，以当苦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④。牛僧孺筑城提高了城墙质量，但城池的规模没有大的变化。

第二个时期，宋朝，鄂州城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建。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知州李尧俞增修城池，此后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两倍，“周围二十四里，高二丈一尺，有门三，东曰清远，南曰望泽，西曰平湖。元因之”^⑤。限于地形，城池扩建向东展开，孙吴时的夏口城变为城内西头的子城。

除了清远、望泽、平湖三门之外，见于宋人记载的鄂州城门还有竹簾门、武昌门、汉阳门。

竹簾门，《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弥节亭”条：“在竹簾门外，临江。”

武昌门，《溪堂集》卷五《七言绝句》：“武昌门外柳如烟，想

①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七七《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

③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

④ 《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

⑤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

见潘侯枕曲眠。欲借一帆春水去，江边皆是楚州船。”^①《輿地纪胜》卷六六《鄂州·监司军帅沿革》：“湖广总领所……今置司在武昌门内。”

汉阳门，《入蜀记》卷三：“至鄂州……与（章）冠之出汉阳门，游仙洞……”《石屏诗集》卷一《鄂渚张唐卿周嘉仲送别》：“武昌江头人送别，杨柳秋来不敢折。汉阳门外望南楼，昨日不知今日愁。”

以上三门，竹籐门应是西门。鄂州城西面濒临长江，竹籐门既然“临江”，则应是西门。对照明清方志，可知竹籐门确是鄂州西门。《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府城”条：“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德兴增拓修筑……为门九，东曰大东，曰小东，西曰竹籐，曰汉阳，曰平湖……”

汉阳门也是西门。据陆游记载，他在鄂州与章冠之一道先“登石镜亭，访黄鹤楼故址”，然后“与冠之出汉阳门”。石镜亭在“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与汉阳相对，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数”^②。前引《石屏诗集》亦称“武昌江头人送别……汉阳门外望南楼”，由此可知，汉阳门在城西大江边，与西面的汉阳隔江相对，距离很近，这种地理位置只可能在鄂州城西。宋代以后，汉阳门屡见于史籍，如元朝曹伯启《曹文贞公诗集》卷九《良月既望忆仲通宰公兼寄君平察推》：“闲登黄鹤旧矶头，万顷烟波起暮愁。想象故人心似我，汉阳门外望南楼。”《湖广通志》卷二五《祀典志·武昌府江夏县》：“江汉神祠，在汉阳门楼，宋淳熙中通判刘靖以江汉宜为望祀，即灵竹寺西为坛祭之，后改祀今所。”《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武昌府城……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德兴增拓修筑……为门九……西曰竹籐，曰汉阳……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顾璘重修，门仍九……西易竹籐曰阙，曰汉阳……”直至今日，武汉市武昌区城西仍有汉阳门，是长江边的一个重要渡口。

①（宋）谢逸：《溪堂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陆游：《入蜀记》卷三。

从地理方位上看，武昌门应该也在鄂州城西。前引《溪堂集》诗称：“武昌门外柳如烟……江边皆是楚州船。”说明武昌门是临江的城门。明清人的诗文中有不少吟咏武昌门的句子，如明人张羽《静庵集》卷四《题画赠长兴杜典史浚》：“下若溪头山似戟，武昌门外柳如烟。何如肆射平其去，束带闲耕墓下田。”董纪《西郊笑端集》卷一《次韵沙允恭感怀二首》：“行乐有孤灵运屐，笑谈无复庾公楼。武昌门外多官柳，能有几株今尚留。”清人萧广昭《榴花塔》：“梅山远对武昌门，霜影迷离孝妇村。”^①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送吴二先辈还汉阳》：“汉南归思绕晴川，湓浦西风送客船。莫上武昌门外望，断肠杨柳似当年。”毛奇龄《西河集》卷一三九《送友之崇阳》：“武昌门外新栽柳，何处相思不断肠。”这些诗句，多与登船、送别有关，说明武昌门应是临江的西门。从南宋时湖广总领所的地位，也可大体推知武昌门的方位。“武昌屯兵数万，仰给六路之饷”^②，湖广总领所“总领湖南北、广东西、江西、京西六路财赋，应办鄂州、江陵、襄阳、江州驻扎大军四处，及十九州县分屯兵”^③，巨额的粮草经由江汉水道输入鄂州，中转各地，主管其事的总领所理应设在鄂州城西的大江边上较为方便。

如前所述，宋时鄂州城西已有平湖、汉阳、竹簪三门，武昌门是否城西第四门？笔者以为否。一个基本的依据在于明代武昌府城之西门仅为平湖、汉阳、竹簪，三者的相对方位，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江夏县图》可见，汉阳门在正西，平湖门在汉阳门以南，竹簪门又在平湖门东南。明代城西三门是洪武四年

① 榴花塔、孝妇村，在明代皆是武昌城附近的地名，《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古迹》：“石榴花塔，在郡城西北。宋时有妇事姑至孝，一日杀鸡为饌，姑食鸡而死。姑女诉于官，妇坐罪，无以自明，临刑乃折石榴花一枝，插地而祝曰：妾若毒姑，花即枯悴，若属诬枉，花可复生。其后，花果生。时人谓天彰其冤，遂立塔花侧，以表其事。”

②（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九《中散大夫广西转运判官赠直秘阁彭公（汉老）行状》，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监司军帅沿革》。

(1371年)周德兴“增拓修筑”、武昌城扩建为九门后的情形,九门的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朝后期,其间经历了“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顾璘重修”,“皇清总督祖泽远增修,雍正六年重修”。^①宋代鄂州城的规模不如明清时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城西设置四门。进而一步,将武昌门与黄鹤山、黄鹤楼的关系,对照汉阳门与同山、同楼的关系,不难看到《輿地纪胜》中的“武昌门”与《入蜀记》中的“汉阳门”基本一致,此二门很可能是一门二名,换言之,明代初年的武昌城西门有三,很可能是沿用的宋代布局。

宋代鄂州城北面的城门设置如何?据现有资料,情况不明。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中,明代的鄂州城北开设一至二门^②,宋代或许即是如此,但因无佐证材料,亦不详其门名称,故图5-2《宋代鄂州城平面布局示意图》^③只能暂且将城墙北面处理为无门。

鄂州城依山傍江建筑城垣,形成一个不甚规整的圆形。

城内有子城,由原夏口城而来。《輿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子城本名夏口城……张舜民《南迁录》云:鄂城子城,与润州子城、金城、覆舟山城、武昌吴王城,制作皆一体。皆依山附险,周回不过三二里。乃知古人筑城,欲牢不欲广也。”宋时期,鄂州子城的城垣已“缺坏”^④,但名称一直保留下来,至明代仍有,《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山川》:“黄鹤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山,旧因山为城,即今万人敌及子城也。”

城垣、城门、子城,它们的形制和方位,无一不是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的产物。

(二) 衙署、楼台亭阁布局

鄂州城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

① 雍正《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武昌府城》。同卷所绘1794年《江夏县图》,九门情形清楚可见。

② 明代湖广布政使司与江夏县同治,其城池北门的设置,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中,卷一《司志总图》为一门,卷二《江夏县图》为二门。

③ 据本目参引诸资料综合绘制。

④ (宋)陆游:《入蜀记》卷三。

带汉沔”^①，“通接雍、梁，实为津要”^②，“历代常为重镇”^③。入宋以后，随着统治中心的南迁东移，鄂州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南宋时期，由于宋金战争的需要，鄂州更加重要，州城不仅是鄂州与江夏县的治所，也成为路级机构所在。绍兴年间（1131—1162年），荆湖北路转运司从北宋时的江陵移治鄂州；绍兴五年（1135年），在鄂州设立都统制司，不久又增设湖广总领所。三大机构皆置司于鄂州城内。

鄂州城地形特殊，城西以长江为限，城中山丘连绵。从西面长江边向东延伸，依次有黄鹄山（今名蛇山）和今凤凰山、洪山、珞珈山、桂子山、伏虎山、南望山、磨山、喻家山等，形成一条绵延起伏的山脉。黄鹄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山”^④，“俗呼蛇山”^⑤。两宋时期，黄鹄山“起东九里，至县西北”，横贯全城，“林间甚美”^⑥；山之最高处有矶，“上则回眺山川，下则激浪崎岖，是曰黄鹄矶”^⑦，是一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就建在矶头。^⑧

城中之山黄鹄山具有控扼全城的优势，各级官府衙署环布山麓，集中于山的西麓、东麓与南麓。转运使司“在州之清远门内，即旧江夏县及县丞厅也”；湖广总领所“置司在武昌门内”；都统制司先“置司于州治”，绍兴十一年（1141年）“移司于城东黄鹄山之麓，即冯文简公之旧宅也”^⑨。基本上都分布在地势高险的子城之内。

① 《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

② 《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③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风俗形胜》。

④ 《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山川》。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三《武昌十景图诗序·武昌郡》：“起武昌城西，临江有山，屹然而高者为黄鹤山，郡志称黄鹤山。”中华书局1998年校点本。

⑤ 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山川志·武昌府江夏县》。

⑥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黄鹤山”条。

⑦ 雍正《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夏口城”条。

⑧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七《江南道三·鄂州》：“鄂州州城，本夏口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第644页。

⑨ 以上皆出自《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监司军帅沿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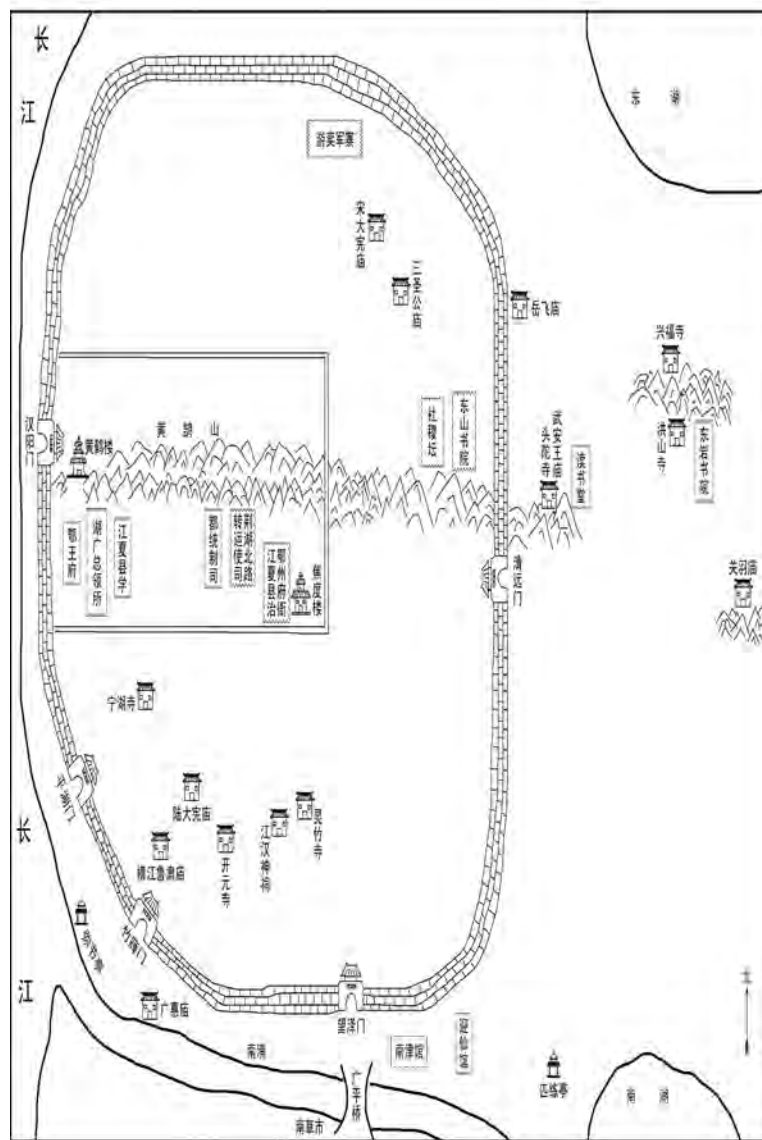


图 5-2 宋代鄂州城平面布局示意图

路级衙署之外，江夏县与鄂州同治，衙署坐落在州治东南子城的一座角楼——焦度楼下。^①

与各级衙署错落交织的是众多的楼台亭阁。

山川形胜历来是士大夫登临吟咏的最爱，黄鹤山间建有众多的楼台亭阁，子城路府（州）衙署一带尤为集中。

最有名者为黄鹤楼。“在子城西南隅，黄鹤矶山上”。黄鹤楼“因山得名”，“自南朝已著”，最初是用作战守的瞭望楼，后来引出许多相关的神话传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抒怀的对象。唐代是黄鹤楼的极盛时期，“观其耸构巍峨，高标——，上倚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②。李白、王维、贾岛、白居易等名家都有佳作传世，崔颢的《黄鹤楼》诗更是千古绝唱。入宋以后，有关黄鹤楼的诗文、碑记仍然不少，并有一幅界画，至今尚存。画面可见，黄鹤楼已成建筑群体，主楼周围有小轩、曲廊、重檐华亭环绕；楼群雄峙在紧连城墙的高地上，俯瞰大江，江面波涛相逐，船桅耸立。^③但南宋以后，黄鹤楼“楼已废，故址亦不复存”^④。

宋代鄂州城为数众多的楼阁中，声名最高的是南楼。“南楼，在郡治正南黄鹤山顶，中间尝改为白云阁。元祐间知州方泽重建，复旧名。”^⑤南楼“制度闳伟，登望尤胜，鄂州楼观为多，而此独得江山之要会”^⑥。宋代文人在鄂州的登楼咏唱之作更多的是有关

①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县沿革》“江夏”条，同书同卷《荆湖北路·鄂州·古迹》“焦度楼”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七《江南道三·鄂州》。

②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八一〇阎伯里《黄鹤楼记》，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

③ 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文物志》“古建筑·亭台楼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43页。

④ （宋）陆游：《入蜀记》卷三。

⑤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南楼”条。

⑥ （宋）陆游：《入蜀记》卷三。

南楼而不是黄鹤楼的，其中不乏名人名作，如黄庭坚诗《长句久欲寄远因循至今书呈公悦》：“江东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高明广深势抱合，表里江山来画阁……”^①将南楼的恢宏气势描写得淋漓尽致；范成大诗《鄂州南楼》：“谁将玉笛弄中秋？黄鹤飞来识旧游。汉树有情横北渚，蜀江无语抱南楼。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却笑鲈乡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②俨然一幅江山市井风俗画。南楼在黄鹤楼之东偏南，二楼之间有涌月堂，涌月楼以北有西爽亭，“下临岩壁，有唐时及庆历间磨崖题字”^③。南楼之西是仙枣亭，传说中仙人为太宗采摘大枣之处。

黄鹤楼的西边有石照亭，一名石镜亭，因“临崖有石，如镜……每为西日所照，则炯然发光”^④而得名。

楼台亭阁多在官衙附近，隶属于官府。例如：

总领所，“有清景堂^⑤、正己亭、应轩、憩轩、跨碧、梅阁等处”，有楚观楼^⑥、生春楼^⑦、清美楼、曲水亭、乔木亭。又有北榭，“在设厅后，因山为之，与南楼对”；烟波亭“在设厅后、北榭西，外瞰长江”。总领所东北的楚望，黄鹄山顶的楚观，“亦隶

①（宋）黄庭坚著，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卷一八，中华书局2003年校点本，第632页。

②（宋）范成大：《范石湖集·诗集》卷一九，第274页。

③《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西爽亭”条。

④《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石照亭”条。

⑤《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清景堂又作“景清堂”，同书同卷：“景清堂，在总领所。”

⑥《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楚观，在总所，即奇章亭旧址。”同书同卷“奇章亭”条称：“在州治东南一里子城上。”奇章亭在北宋时尚是一处佳景，（宋）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八《五言绝句》“江夏八咏”之一即咏奇章亭，诗称：“亭揭奇章榜，斯民孰去思。多惭羊叔子，涕泗岷山碑。”（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南宋时亭废，（宋）陆游《入蜀记》卷三：“与统舒同游头陀寺……自方丈西北，蹶支径至绝顶，旧有奇章亭，今已废，四顾江山井邑，靡有遗者。”

⑦《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生春楼”条“在总领所，即上酒库也。”

本所”^①。

转运司“有副使，判官”，设东、西二衙。东衙有一览亭、跨鹄亭、乖崖亭。^② 转运司又称漕司，其所在也就称为漕园，据陆游所见，漕园有“依山亭馆十余”，但“不甚葺”^③。东衙有东圃，“旁有细履亭”，“又有四景亭”。转运司西衙，有广永亭，“在西漕衙黄鹄山之绝顶，西近楚观，下视江汉，故取其义云”；有春阴亭，“旧名绿阴”；又有凝香亭和皆被称作“横舟”的西南二亭。^④

转运副使的衙署，有江汉亭，“因古城作亭榭，俯瞰江汉，景物最嘉”^⑤。张栻曾为此亭作记。^⑥ 又有半山亭、静春台。

属都统制司的楼阁，有压云亭、卷雪楼、卷雨楼及会景楼、赏心楼、楚江楼、清风楼等。

楼阁以外，鄂州城内还辟有若干园林，如城北的北园，城东的东圃。北园“在总领所”^⑦，东圃“在漕使东衙，旧名老圃，延袤百七十丈”，是一处占地规模较大的园林。^⑧

城区之外的楼阁，主要有楚楼，“在南草市”；压江亭，在城西南隅的长堤之外、万金堤上。城南望泽门外有南湖，“周二十里，旧名赤栏湖，外与江通”^⑨，登高下瞰，湖面“荷叶弥望，中

①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楚望”条：“在总领所东北。又黄鹄山顶有楚观，亦隶本所。”以下有关楼阁的资料，除特别作注的以外，皆出自《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

② 乖崖亭是用来纪念荆湖北路转运使张栻（自号乖崖）的。《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古迹》“乖崖亭”条：“在漕东衙之后。李焘设张忠定公像于其上，有文记之。”

③ （宋）陆游：《入蜀记》卷三。

④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

⑤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江汉亭”条。

⑥ （宋）张栻：《南轩集》卷一八《江汉亭说》，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北园”条。

⑧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东圃”条。

⑨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南湖”条。

为桥，曰广平，其上皆列肆，两旁有水阁极佳，但以卖酒不可住”^①，这些水阁属于兼有游览观光与商业贩卖性质的亭阁。

城外东边另有东湖，“在城东四里，湖上有东园，为近城登览之胜”^②。

（三）祠庙寺观与书院、军营

祭祀的最重要内容莫过于祀天地、山川、社稷。鄂州有社稷坛，位于城东偏北处，“始在中军寨”，“其地褊迫洿下，燎瘞无所”，淳熙九年（1182年）“度地更置”，“得城东黄鹤山下废营地一区，东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礼画为四坛”。^③

其他各种祠庙寺观不少。城中有开元寺，“在城南一里”，“本梁邵陵王纶舍宅为寺”，南宋时，开元寺中有唐大历八年（773年）所铸铜钟，重达一万三千斤，并有天宝三载所铸铁佛。明清以后，寺名改作铁佛寺。^④城南一里还有灵竹寺，是传说中孝子孟宗哭母泣竹之地，绍兴间建孟孝感王庙。^⑤

多数寺庙建在城东门以外，其中最著盛名的两座：一是头陀寺；一是洪山寺。

头陀寺，“在清远门外黄鹤山上，宋大明五年建，自南齐王中

① （宋）陆游：《入蜀记》卷三。

②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东湖”条。

③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鄂州社稷坛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④ 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铁佛寺”条。

⑤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古迹》“孟宗宅”条。（宋）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八《江夏八咏》：“灵竹寺，相传孟宗故居也。”（宋）罗愿《鄂州小集》附曹宏斋《鄂州太守存斋罗公愿传》：“淳熙十一年……鄂人绘像灵竹寺，孟宗泣竹处。”《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孟孝感庙，在府城东二里，祀吴孝子孟宗，宋绍兴间建，本朝迁武昌卫前。”孟孝感庙或称“孟宗庙”，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孟宗庙，在县东二里，祀口孝子孟宗也。宋绍兴间建。本朝迁武昌卫堂北。弘治初，知府冒政改建于大东门外白鹤山颠。”

作寺碑，遂为古今名刹”^①，吸引了历代文人士子吟咏唱和，如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诗称：“头陀云月多僧气。”^②黄庭坚《头陀寺》诗云：“头陀全盛时，宫殿梯空级。城中望金碧，云外僧澌澌。”^③南宋初年，“寺毁于兵火”^④，“人亡经禅尽，屋破龙象泣”^⑤。战争结束后，“汴僧舜广住持三十年，兴葺畧备”，唐开元六年（718年）所建著名的南齐王简栖碑，仍置“藏殿后”。^⑥头陀寺山顶有磨剑池，寺旁有读书堂。^⑦

洪山寺，在城外东面的洪山南麓。“洪山，在江夏县东十里，旧名东山，唐大观中改今名。”^⑧洪山寺因而又名“东山寺”。该寺由“唐宝历中善信禅师开山，宋制置使孟珙、都统张顺重修”^⑨。岳飞曾长期驻兵鄂州，传说洪山寺的第一株松树便是岳飞亲手植下的，故得名“岳松”。洪山寺后来屡毁屡建，今日仍存，名“宝通禅寺”。

与洪山寺南北对峙的，有兴福寺，“隋文帝建，咸淳六年，僧人净聚重修”^⑩。

崇佛、道之外，宋代鄂州民间建有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寺庙。

如祭祀各种与民间生活相关的神灵。广惠庙，“在竹簾门外护

①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头陀寺”条。

②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84页。

③ （宋）黄庭坚著，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卷一八《头陀寺》。

④ （宋）陆游：《入蜀记》卷三。

⑤ （宋）黄庭坚著，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卷一八《头陀寺》。

⑥ （宋）陆游：《入蜀记》卷三。

⑦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磨剑池”条，同卷《荆湖北路·鄂州·古迹》“读书堂”条。

⑧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五八《武昌府》。

⑨ 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宝通寺”条。

⑩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寺庙·江夏》“兴福寺”条。

城矶上，旧名顺济龙王庙，宋淳熙间祷雨灵应，扁今额”^①。宋大宪庙，在城东七里，祀“火精”宋无忌，“以禳火灾”，唐朝牛僧儒立庙时“本为大夫”庙，五代“避杨行密父讳，改作大宪”。^②后有毁坏，“宋绍兴中知州王信复立，俗云火星堂”^③。

最常见的是祭祀水神（江神）。除常见的龙王庙以外，有宁湖寺，在平湖门内，传说“湖有水怪，唐广德中建寺镇之”^④；横江鲁肃庙，在城西南二里，因“肃尝为横江将军，故庙以为名”^⑤；三圣公庙（简称“三公庙”，又名“普应庙”^⑥），在城东五里，“鄂人中秋日阖郡迎神”，十分虔诚，所迎三神之一即为伏波^⑦；江汉神祠，始建于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通判刘靖以江汉在境内，宜为望祀，乃为坎以祭之”^⑧，初在灵竹寺西，后改祀汉阳门楼上。^⑨

另一些祠庙奉祀与本地区有关的人物。陆大宪庙，在城西南三里，祀汉陆贾^⑩；武安王庙，在头陀寺，祀关羽^⑪；卓刀泉关羽

①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广惠庙”条。

②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古迹》“宋大宪庙”条。

③ 《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忠义祠”条。

④ 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寺观·武昌府江夏县》。

⑤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古迹》“横江鲁肃庙”条。

⑥ 《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普应庙，在府城东五里，旧云三公庙，自唐有之，宋始赐今额。”

⑦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古迹》：“三圣公庙，在城东五里，鄂人中秋日阖郡迎神，庄绰辨疑，则以为萧丹、赤山神、葛元也。郭祥正诗云：‘三神鼎峙名何谓，子胥范蠡马伏波。’是祥正指伏波为马伏波，而庄绰谓葛仙，亦拜伏波将军故也。绰以为按唐祠记，而祥正亦必有据。当考。”

⑧ 《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江汉神祠”条略同。

⑨ 雍正《湖广通志》卷二五《祀典志·武昌府江夏县》。

⑩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古迹》“陆大宪庙”条。《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按《汉史》，贾非道死，或因楚产，郡人为立庙尔。”

⑪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古迹》“武安王庙”条。

庙，亦祀关羽，在江夏东十里，“世传关羽尝卓刀于此”，遂立庙于泉上。^① 忠义祠，“在府治”，“建炎间，金骑渡江，郡守李宜婴城固守，民赖以安。后为贼所虏，遁投僧寺，僧疑而杀之，百姓伤感，为建祠祀焉。太守马去疾以闻，赐额忠义”^②。鄂州城西南有鹦鹉洲，传说中黄祖在此杀害祢衡，洲上遂有祢衡墓、黄祖墓^③，后来成为鹦鹉寺。鹦鹉寺南又有岩头寺，系“唐全太岁禅师驻锡处”^④，陆游乘舟经行此地时，曾远望鹦鹉洲“有茂林神祠”^⑤，很可能就是这些祠庙。另外，城东北七里有大圣庵，应该也是祭祀某类人物的。^⑥

最值得重视的是南宋前期鄂州民间建造的岳飞庙，初名忠烈庙，《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忠烈庙，在旌忠坊，州民乾道六年请于朝，岳飞保护上游，有功于国，请立庙，诏赐今额。”后称“忠孝祠”或“岳武穆祠”，地址也从旌忠坊迁移到小东门外将台驿旧址。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岳武穆祠，在县东十里，即将台驿故址。旧名忠烈庙，在旌忠坊。宋岳飞保护上游有功，乾道中建庙于鄂，赐今额。嘉定中，又追封鄂王。”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巡按御史王恩以岳武穆王祠祀之扁为忠孝祠，知府陈晦立石”^⑦。“正德十四年，都御史吴廷举奏迁驿于小东门外，布政周季风、知府沉栋即驿址建为今祠”。旌忠坊的具体位置不详，明正德“武穆另祀”后，“其祠仍旧”^⑧，约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司门口一带，这里至

①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卓刀泉”条。

② 《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庙》。

③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古迹》“祢衡墓”、“黄祖墓”条。

④ 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寺观·武昌府江夏县》。

⑤ （宋）陆游：《入蜀记》卷三。

⑥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八叠院”条。

⑦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

⑧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祠庙·江夏》。

今还有鄂王府的遗址可考。

明清时迁至东门外的岳王庙旁边植有松柏，称“岳柏”。出于对英雄的崇敬，民间生发出一些有关岳柏的神话。《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寺观·武昌府江夏县》：“岳柏，在大东门外鄂王庙墀左，围可三尺，枝干疏老不繁，人号为独柏。每值辰戌丑未年，楚土有掇巍科者，柏预吐一奇枝。”

寺观庙宇多讲求清静、优雅，因而正是读书的好地方，有的书院和寺院其实就是一体的，如头陀寺有读书堂。^①洪山东岩寺，“唐大观中建，又额曰正心书院，鄂国公尉迟读书处”，这里环境幽静，景色宜人，“山后石刻有‘几处稻梁喧鸟雀，数声钟磬起渔樵’句”^②。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年），“河阳赵淳清老架阁其上，榜曰东岩书院”^③。

城中的黄鹄山丘陵起伏，林深叶茂，是立书院、建学校之佳处。黄鹄山东麓有东山书院^④；山中有学宫；直至南宋末年，仍有文士张君寿与诸生“植屋数间于黄鹄山中学宫之后”，聚众读书，因地当“东面日出，君寿于是榜之曰‘朝阳书堂’”^⑤。

鄂州州学，“在府治南半里，宋康定中知州王素徙郡城西”^⑥，立于黄鹄山前。仁宗庆历年间（1041—1054年），开展全国规模的兴学运动，鄂州也“大增学舍”^⑦，形成一个占地“甚广”的州学，内有“聪明池”等设施。^⑧由于战争的影响，鄂州州学几度兴废。两宋之交时曾被“夺为营垒”，好在为时不久，“绍兴中，都

①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古迹》“读书堂”条。

② 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

③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寺庙》“东岩寺”条。

④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东山书院”条。

⑤ （宋）刘辰翁：《须溪集》卷二《朝阳书堂记》，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

⑦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

⑧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聪明池”条。

帅田师中以教官朱棣之请，撤营修学。即而，教授商飞卿请于州重建”^①。重建后的州学比较规整，先后修建了稽古阁、四贤堂等。修建稽古阁的工程由鄂州州学教授许中应主持，许氏“既新其学之大门，而因建阁于其上，棣藏绍兴石经、两朝宸翰，以为宝镇，又取板本九经、诸史，百氏之书，列置其旁”，这项工程“始于绍熙辛亥之冬，而讫于明年之夏，其费亡虑三百万”，得到就学诸生与当地官员的积极支持。^②四贤堂，“宋嘉定中教授石继谕建，以祀周、程、朱子”^③，黄榦为之作《鄂州州学四贤堂记》^④。南宋末年，鄂州州学再次遭受“兵燹”，至元朝“延祐中重建”^⑤。

江夏县学，宋朝初年附属子鄂州州学，但在州学中“别为一斋，名务本”，南宋绍兴以后，务本斋也一并“悉附州学”。元朝沿用这种体制，至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独立建学。^⑥

军营与州县儒学本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在边事多兴的宋朝，二者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前述鄂州州学曾“废为营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南宋时，鄂州是宋朝抗金的重镇，屯驻大批军队，营寨占地甚广，仅城东黄鹤山下一区，便达“东西十丈，南北倍差”^⑦。在城东北七里，有游奕军寨。^⑧北宋时，鄂州东北有一名白杨夹口的江边港口，南宋时成为一个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集镇，当地“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军人也”^⑨。这种情形与鄂州城驻有大量军队正可互相应证。

（四）民居、街市、港口及其他

由于地形的限制和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格局，鄂州城的西头主要

①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

②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〇《鄂州州学稽古阁记》。

③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宫室》。

④ （宋）黄榦：《勉斋集》卷二〇。

⑤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

⑥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

⑦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鄂州社稷坛记》。

⑧ 《輿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八叠院”条。

⑨ （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是各级官署；沿着黄鹄山、自西向东展开的一线，除了官署，主要有学校、寺庙等文化、宗教类建筑；民居、街市等主要分布在城东、城北和城南的一些较为低平的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老城区难以容纳，民居与街市向城区以外东、南两个方向扩展的态势表现得较为突出；城西的沿江一带也成为交通、贸易繁盛，船只、人口密集的地区。

有关宋代鄂州民居的资料有限，迄今可知的是城内有旌忠坊、太平坊^①，具体方位不详。随着坊市制的瓦解，这些坊名只是普通的地名，明清以后，更常见的名称是“里”、“巷”。

南宋时，鄂州号称“今之巨镇”^②，城内商业繁盛，出现了富商大贾，乾道年间（1165—1173年）“鄂州富商武邦宁，启大肆，货兼帛，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③。开设了热闹的夜市，号称“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④。四方商贾云集，市容相当繁荣，“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盖”^⑤。鄂州城中人口众多，到宁宗嘉定以前即达到了十万户。姜夔诗称“武昌十万家”^⑥，戴复古诗说鄂州“江渚鳞差十万家”^⑦，虽非确指，但与实际情况相近。汉阳知军黄榦也说“鄂州人口繁夥，为汉阳三十余倍”^⑧，即约十万家。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十二月甲辰，鄂州火，至于乙巳，燔民居八百家，市井楼阁无存者”^⑨。人口众多，建筑密集，以至空地难寻，近城之处甚至找不到安葬死

① 旌忠坊已如前述，太平坊见（宋）郑獬《郤溪集》卷二二《朱夫人墓志铭》：“夫人朱氏……皇祐辛卯二月，以病卒于鄂州太平坊里第。”

② （宋）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第141页。

③ （宋）洪迈：《夷坚志》支庚卷第五“武女异疾”条，第1174页。

④ （宋）范成大：《范石湖集·诗集》卷一九《鄂州南楼》，第274页。

⑤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⑥ （宋）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上《春日书怀四首》，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宋）戴复古：《石屏诗集》卷一《鄂州南楼》。

⑧ （宋）黄榦：《勉斋集》卷三〇《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余米事》。

⑨ 《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火灾》。

者的地方。《夷坚志》支乙卷第九“鄂州遗骸”条称：“鄂州地狭而人众，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积骸重叠，多與棺置其上，负土他处以掩之。贫无力者，或稍经时月，濒于暴露，过者悯恻焉。乾道八年，有以其事言于诸司，于是相率捐库钱付胜缘寺僧，治具焚瘞。先揭榜衢路，许血肉自陈，为启圻甃甃，举而藏之，具书姓字于外。如无主名者，则为归依佛宝，一切火化，投余骨于江。其数不可胜计。”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民居与街市不断地向城外扩展。

城南望泽门外的“长街”，成为一个重要的居民区。《輿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南湖，在望泽门外，周二十里……外与江通。长堤为限，长街贯其中，四旁居民蚁附。”

长堤与长街相伴，或者长堤即是长街，这种情形在沿江城市并不罕见。鄂州城面临大江，经常受到江水泛滥的威胁，修筑江堤是最主要的防灾措施。北宋后期，在鄂州城西的平湖门外，修筑了一道拦江长堤，明清以后的多种志书中，屡次提到过这道江堤。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江夏》“长堤”条：“在平湖门内。《旧志》云，政和年间，江水泛滥，漂损城垣，知州陈邦光、县令李基筑堤以障水患，至今赖之。”^①长堤又名“花堤”，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尚有花堤街，位于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南，上起紫阳路，下至彭刘杨路，街名即因地当花堤故址而得。花堤街可以说是今天的武昌现存的最古老街道之一，至今仍是店铺与民居密集的道路。

南宋时，在鄂州城西南，长堤之外加筑了一道外堤，名曰“万金堤”。该堤在明代仍继续发挥作用，《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六《湖广二·武昌府·江夏县》“鹦鹉洲”条称：“城西南平湖门内有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三《水利·武昌府江夏县》，雍正《湖广通志》卷二〇《水利志·武昌府江夏县》“花堤”条，《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六《湖广二·武昌府江夏县》，《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卷一一一八《武昌府部·关梁考》“花堤”条，民国《湖北通志》卷三九《建置志十五·堤防一》“各县古堤”，《续行水金鉴》卷一五三《江水·章腴二》，《续行水金鉴》卷一五五《江水·工程一》等，有关文字略同。

长堤，外有万金堤……至今赖之。”

沿江沿湖的堤防，交通方便，地势高爽，随着堤防的增高、加宽以及质量的提高，堤防不仅成为交通要道，甚至是民居所在，沿线聚居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淳熙十二年十月，鄂州城火灾，加上“江风暴作”，结果是“燔民居万余家”，那些“结庐于堤、泊舰于岸者，焚溺无遗”。^①

“泊舰于岸”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流动型民居，居民多以水产捕捞为业，以舟船为居所，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面。鄂州沿江这样的民居不在少数，汉阳知军黄榦就说过，“军城内外户口不下三千人家，又有船居四百只”^②。

鄂州城外江面宽阔，港口繁忙，既供商船来往停泊，也供战船出江演练。陆游初至鄂州时，泊舟于江边税务亭，只见“贾船客舫，不可胜计，御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数日后，他在江边“观大军教习水战，大舰七百艘，皆长二三十丈，上设城壁楼橹，旗帜精明，金鼓鞀鞀，破巨浪，往来捷如飞翔，观者数万人，实天下之壮观也”^③。

城南三里有南浦，“其源出京首山，西入江，春冬涸歇，秋夏泛涨，商旅往来，皆于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曰南浦”^④，南宋时“谓之新开港”^⑤。

在城西、城南方向与外界交通频繁的地方，有迎来送往的馆舍。城西竹籐门外临江处有弥节亭，“又有皇华馆，在州治东南；又南津馆，在望泽门外；迎仙馆，在城南；匹练亭，在城东南五里。以上皆舍也”^⑥。

（五）南草市的繁荣

宋代鄂州城在布局上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商业区与相应的居

① 《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火灾》。

② （宋）黄榦：《勉斋集》卷三〇《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余米事》。

③ （宋）陆游：《入蜀记》卷三。

④ 《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南浦”条。

⑤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南浦”条。

⑥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弥节亭”条。

民区发生了空间转移，从城区以内转移到城外的南草市。

南草市在城南望泽门外，经广平桥与望泽门相连^①，地当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鲇鱼套一带，东南通汤孙湖、清宁湖、纸房湖，水盛时，由三眼桥、孟家河、东湖坝通梁子湖，达樊口，水上交通十分方便。

最能说明南宋前期南草市之繁荣的典型资料有两种：一是陆游的《入蜀记》；二是范成大的《吴船录》。孝宗时，陆、范二人先后经过鄂州时分别在城中停留一周左右，对南草市的繁荣有生动的描述。《入蜀记》卷四：鄂州“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吴船录》卷下：“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闹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同书同卷：“集南楼……下临南市，邑屋鳞差。”《夷坚志》的记载也值得注意。《志补》卷二五“李二婆”条称：淳熙十二年（1185年），“市中大火，自北而南凡五里，延烧屋庐数千间，虽楼居土库亦不免”。

根据以上文字及前述有关记载，可以对南宋前、中期的鄂州南草市作如下的复原：

（1）南草市位于鄂州城南门外的鹦鹉洲前，上方是南楼，市街沿长堤向西偏南伸展，延袤达数里之长，南北向的跨度至少五里以上。（2）南草市是重要的商贸港口，河运发达，商舶云集。（3）南市民居稠密，人口密度很大，居民以经商贸易者为主。（4）南草市与鄂州城合起来构成一个大规模的城市，成为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交通与商业中心。

南市商业兴盛，人口密集，又因中转商贸繁荣，露天堆积大量竹木类货物，易发火灾。淳熙“四年十一月辛酉，鄂州南市火，暴风通夕，燔民舍千余家”；嘉泰四年（1204年）“八月壬辰，鄂州

①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广平桥”条。

外南市火，燔五百余家”^①。在另一场大火中，南市“焚万室，客舟皆烬，溺死千计”^②。南市聚居人口之多，由此可见一斑。接连几场大火引起了官府的警惕，知鄂州赵善俊“驰往视事，辟官舍，出仓粟，以待无所于归之人，弛竹木税，开古沟，创火巷，以绝后患”^③。这里的火巷由此开通并得名。

商业之外，其他各行各业、娱乐消遣以及城市病态行业也都兴盛。屠者朱四、鄂渚王媪等都在南草市经商营业，其中王氏是“三世以卖饭为业”^④。鄂州都统司医官滑世昌，大约是因为医术比较高明，又敢于收受钱财，因而“居于南草市，家货积万”^⑤。南草市建有楚楼等休闲观光的场所。^⑥不仅“酒垆楼栏尤壮丽”^⑦，而且娼妓也在集市占有一定的位置和分量。刘过诗称：“黄鹤山前雨乍过，城南草市乐如何。千金估客倡楼醉，一笛牧童牛背歌……”^⑧甚至有“赃败失官人王训”，“居于鄂州南草市，卖私酒起家，妻女婢妾皆娼妓……鄂州人呼训家为淫窟，又呼为关节塌坊”^⑨。

总地来看，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宋代鄂州城的平面布局蕴涵着自然、社会与人文等多重意义，它的形成与演变，受地理环境、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经济发展、时局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是多种

① 《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火灾》。

② （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

③ （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宋史》卷二四七《赵善俊传》略同。

④ （宋）洪迈：《夷坚志》支甲卷第八“鄂渚王媪”条，第775页。

⑤ 雍正《湖广通志》卷一二〇《杂纪》。

⑥ 《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楚楼”条。

⑦ （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第226页。

⑧ （宋）刘过：《龙洲集》卷四《喜雨呈吴按察》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校点本，第27页。

⑨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卷一三六，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台湾大化书局1979年版。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江汉交汇、倚山面江的独特地貌,对鄂州城市布局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其最重要的环境基础。另外,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突出官衙的地位,重视秩序、形胜、阴阳等复杂的制度、思想与理念,对城市布局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两宋的政治、军事局势和经济的发展,则为鄂州城市的布局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第二节 宋元江汉平原自然灾害探析: 种类、分布、影响

区域性自然灾害是制约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而不同区域的自然灾害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发生规律,本节试以江汉平原为例,对宋元四百年间江汉平原所发生的主要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影响进行简要分析,探讨自然灾害的种类、时空分布特点与规律,借此进一步加深对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理解,并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个案。

一、自然灾害的种类与时空分布特征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形气候,江汉平原自然灾害的种类较多,有洪、涝、旱、蝗、农林作物病虫害、地方病、风、雹、滑坡、地震等多种涉及水圈、大气圈、岩石圈、生物圈等系的灾害,其中发生频率最高、破坏性最严重的是洪涝灾害和旱灾。

(一) 洪涝灾害

如上所述,江汉平原属于典型的湖积沉积平原,境内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加上地势低洼,洪涝灾害极易发生,是对当地经济开发最具破坏力的灾种。

笔者依据《宋史》、《元史》和相关政书、志书,对宋元时期江汉平原洪涝灾害的发生次数、频率作过统计,得出表5-1。

表 5-1 宋元江汉平原洪涝灾害简表

| 时 间 | 灾 区 | 灾 情 | 资料来源 |
|----------|------------|-----------------------|-------------|
| 太平兴国二年七月 | 复州 | 蜀、汉江涨，坏城及民田、庐舍。 | 《宋史》卷六一 |
| 太平兴国四年九月 | 沔阳县 | 湖晶涨，坏民舍、田稼。 | 《宋史》卷六一 |
| 太平兴国五年七月 | 复州 | 江水涨，毁民舍，堤塘皆坏。 | 《宋史》卷六一 |
| 太平兴国七年六月 | 汉阳军 | 江水涨五丈 | 《宋史》卷六一 |
| 太平兴国八年七月 | 长林县 | 山水暴涨，坏民居舍五十一区，五十六人溺死。 | 《文献通考》卷二九六 |
| 淳化二年七月 | 复州 | 蜀、汉二江水涨，江水注溢，坏民田、庐舍。 | 《文献通考》卷二九六 |
| 淳化二年秋 | 荆湖北路 | 江水注溢，浸田亩甚众。 | 《文献通考》卷二九六 |
| 嘉祐元年七月 | 荆湖北路 | 水灾 | 《文献通考》卷二九七 |
| 治平元年 | 鄂州 | 水灾 | 《文献通考》卷二九七 |
| 崇宁元年十月 | 复州 | 水 | 万历《湖广总志》卷四六 |
| 绍兴三年七月 | 江陵府、荆门军、复州 | 水 | 万历《湖广总志》卷四六 |
| 绍兴四年 | 江陵府 | 水 | 万历《湖广总志》卷四六 |
| 绍兴二十七年 | 鄂州、汉阳军 | 大水 | 《宋史》卷六一 |
| 乾道九年六月 | 湖北郡县 | 水 | 《宋史》卷六一 |
| 淳熙十二年 | 鄂州 | 自夏徂冬，水浸民庐。 | 《宋史》卷六一 |

续表

| 时 间 | 灾 区 | 灾 情 | 资料来源 |
|-----------|-------------------|--------------------------------------|-------------|
| 淳熙十五年五月 | 鄂州、江陵府、德安府、复州、汉阳军 | 鄂州大水，漂军民垒舍三千余。 | 《宋史》卷六一 |
| 绍熙三年七月 | 江陵府、复州、荆门军 | 江陵府大雨水，汉江溢，败堤防，圯民庐、没田稼者逾旬；复州、荆门军亦如之。 | 《宋史》卷六一 |
| 绍熙四年夏 | 江陵府 | 水 | 《宋史》卷六一 |
| 开禧元年九月 | 荆襄 | 汉水溢 | 《宋史》卷六一 |
| 开禧三年 | 鄂州、汉阳军 | 水尤甚 | 《宋史》卷六一 |
| 嘉定十六年五月 | 鄂州 | 荆郡县水，鄂州为甚，江湖合涨，城市沉没，累月不泄。 | 《宋史》卷六一 |
| 端平二年三月 | 汉阳军 | 水 | 万历《湖广总志》卷四六 |
| 淳祐十一年九月 | 江陵府 | 水 | 《宋史》卷六一 |
| 咸淳二年六月 | 黄州 | 大水 | 《元史》卷五一 |
| 咸淳七年七月 | 公安、石首县 | 大水 | 万历《湖广总志》卷四六 |
| 至元二十七年七月 | 江夏县 | 水溢，害稼六千四百七十余亩。 | 《元史》卷一六 |
| 至元三十一年十二月 | 鄂州、汉阳军 | 水，免其田租。 | 《元史》卷一八 |
| 元贞二年十二月 | 潜江、沔阳县 | 水 | 《元史》卷五〇 |
| 大德二年二月 | 汉阳、汉川县 | 水，免其田租。 | 《元史》卷一九 |
| 大德七年 | 公安、石首等县 | 大水，堤决。 |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 |
| 大德九年七月 | 玉沙县 | 江溢，赈米。 | 《元史》卷五〇 |

续表

| 时 间 | 灾 区 | 灾 情 | 资料来源 |
|---------|--------|---------------------------------|-------------|
| 至大三年六月 | 荆门州 | 大水，坏官廨民居二万一千八百二十九间，死者三千四百六十六人。 | 《元史》卷二三 |
| 至大三年七月 | 长林县 | 水 | 《元史》卷二三 |
| 至大四年七月 | 松滋县 | 水，民死者众。 | 《元史》卷二四，卷五〇 |
| 至大四年九月 | 江陵路 | 水漂民居，溺死十八人。 | 《元史》卷二四 |
| 延祐元年九月 | 武昌路 | 水，发廩减价赈粜。 | 《元史》卷二五 |
| 延祐七年五月 | 江陵县 | 水 | 《元史》卷五〇 |
| 至治元年八月 | 安陆府 | 雨七日，江水大溢，被灾者三千五百户。 | 《元史》卷五〇 |
| 至治元年九月 | 安陆府 | 汉水溢，坏民田，赈之。 | 《元史》卷二七 |
| 泰定二年五月 | 江陵、公安县 | 水 | 《元史》卷五〇 |
| 至顺元年闰七月 | 长林县 | 水没民田 | 《元史》卷五〇 |
| 至顺二年五月 | 德安府 | 水 | 《元史》卷五〇 |
| 至顺二年七月 | 汉阳属县 | 水，免当年田租。 | 《元史》卷三五 |
| 至顺三年五月 | 云梦、应城县 | 水 | 《元史》卷五〇 |
| 至顺三年九月 | 江陵县 | 大水 | 《元史》卷三七 |
| 至正七年五月 | 黄州 | 大水 | 《元史》卷五一 |
| 至正八年六月 | 松滋县 | 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 | 《元史》卷五一 |
| 至正九年五月 | 汉阳县 | 蜀江大溢，浸汉阳城，民大饥。 | 《元史》卷四二 |

续表

| 时 间 | 灾 区 | 灾 情 | 资料来源 |
|---------|-----------------|----------------------|---------|
| 至正九年七月 | 公安、石首、潜江、监利、沔阳县 | 大水 | 《元史》卷五一 |
| 至正十二年六月 | 松滋县 | 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 | 《元史》卷五一 |
| 至正十五年六月 | 荆州 | 大水 | 《元史》卷五一 |

根据表 5-1，宋元江汉平原洪涝灾害在发生时间上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月份集中；二是愈到后来洪涝灾害愈加频繁。

宋元四百年间，江汉平原共发生洪涝灾害 51 次，其中发生率最高的是 7 月，为 15 次，以下依次递减为 5 月 8 次，6 月、9 月各 7 次，12 月 2 次，2 月、3 月、8 月、10 月各 1 次，另有夏、秋季月份不详者各 1 次，未载月份 6 次。从中不难看出，水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多发生于 5—9 月，以 7 月为最高，占总数的近 30%。具体到两宋及元代，各个时段又有差别。北宋时水灾 10 次，集中发生于 7 月的有 5 次，占了发生总数的 50%，其余 5 次分别在 6 月、9 月、10 月、月份不详的秋季和仅记录年份的 1 次。南宋发生水灾 15 次，水灾的多发月份较为平均，7 月最多，为 3 次；5 月、6 月、9 月各 2 次；3 月、夏季 1 次，仅记录年份 4 次。元代发生水灾 26 次，仍是 7 月发生次数最多，达 7 次；5 月仅次于 7 月，增加到 6 次；6 月、9 月各 4 次，皆较两宋同月份发生率高；同时，12 月发生水灾 2 次，是两宋时没有的情况；另为 2 月、8 月和仅记录年份者各 1 次。

在地域分布方面，宋元江汉平原的洪涝灾害以平原腹地最为多发。北宋时集中在复州（治今湖北天门市）一带；南宋时受灾区域扩大，在有具体受灾地区的记录中，长江北岸和汉水沿岸的府州受灾 10 次，长江南岸州县受灾 6 次，少于江北。江北水灾较多，与当地留存较多穴口有关。元代的水灾分布区域较两宋时分散，以

江陵府（治今湖北荆州市）属县受灾略多，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长江南岸松滋、公安、石首（皆治今湖北同名县市）三县的水灾激增，在有明确受灾地点的记录中，仅公安、石首在南宋末年出现过一次，但元代上述三县却出现了六次，考虑到有元一代立国的时间仅是两宋的三分之一不到，上述长江南岸三县的变化显得更为突出。这意味着长江北岸的堤防建设在两宋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南岸的堤防修筑落后于北岸，南宋末年孟珙在江北大兴屯田，“筑江堤以防水，塞南北诸古穴”^①，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长江南岸的水患。

（二）旱灾

旱灾属于偶发性的自然灾害，总体上水量丰富的江汉平原也会因一时的气候异常而导致旱灾。宋元时期本区旱灾较为多发，有时还相当严重。详参表 5-2。

表 5-2 宋元江汉平原旱灾一览表

| 时 间 | 灾 区 | 灾 情 | 资料来源 |
|---------|-----|--------|-------------|
| 乾德四年春至夏 | 江陵府 | 旱 | 《文献通考》卷三〇四 |
| 咸平元年春夏 | 荆湖路 | 旱 | 《宋史》卷六六 |
| 咸平二年春 | 荆湖路 | 旱 | 《宋史》卷六六 |
| 熙宁八年八月 | 荆湖路 | 旱 | 《宋史》卷六六 |
| 乾道七年春 | 湖北 | 旱 | 《宋史》卷六六 |
| 乾道九年 | 江陵府 | 久旱，无麦苗 | 《宋史》卷六六 |
| 淳熙元年 | 德安府 | 旱 | 万历《湖广总志》卷四六 |

^① （元）王廷端：《石首重开古穴记》，转引自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荊州府·文》。

续表

| 时 间 | 灾 区 | 灾 情 | 资料来源 |
|------------|-----------------------------|------------|-------------|
| 淳熙三年夏 | 复州、郢州， 江陵、德安府， 荆门、汉阳军 | 旱 | 《宋史》卷六六 |
| 淳熙七年 | 江陵府、黄州 | 大旱 | 《宋史》卷六六 |
| 淳熙八年七月至十一月 | 江陵、德安府， 鄂州、复州， 汉阳、荆门军 | 旱 | 《宋史》卷六六 |
| 淳熙九年五月至七月 | 江陵、德安府， 鄂州、复州， 汉阳、荆门军 | 旱 | 《宋史》卷六六 |
| 绍熙三年夏 | 郢州 | 大旱 | 《宋史》卷六六 |
| 绍熙四年 | 江陵府 | 旱 | 《宋史》卷六六 |
| 开禧二年 | 湖北郡县 | 旱 | 《宋史》卷六六 |
| 嘉定二年 | 湖北 | 旱 | 《宋史》卷六六 |
| 嘉定六年五月至七月 | 江陵府、德安、 汉阳军 | 旱 | 《宋史》卷六六 |
| 嘉定八年春 | 江陵府、德安军 | 旱 | 万历《湖广总志》卷四六 |
| 大德元年七月、九月 | 江陵路 | 旱 | 万历《湖广总志》卷四六 |
| 大德三年五月 | 鄂州、汉阳县、 江陵路 | 旱。江陵路旱、蝗 | 《元史》卷二〇 |
| 大德三年十月 | 江陵路、沔阳府、 黄州 | 旱，免其田租 | 《元史》卷二〇 |
| 大德五年九月 | 江陵路是岁荆门亦旱 | 旱，免其门摊、酒醋课 | 《元史》卷二〇 |
| 大德九年七月 | 汉川县 | 旱 | 《元史》卷五〇 |

续表

| 时 间 | 灾 区 | 灾 情 | 资料来源 |
|---------|--------|--------|---------|
| 延祐四年四月 | 德安府 | 旱，免屯田租 | 《元史》卷二六 |
| 延祐七年六月 | 黄州、荆门州 | 旱 | 《元史》卷五〇 |
| 泰定二年三月 | 荆门州 | 旱，赈粮。 | 《元史》卷二九 |
| 泰定三年十一月 | 沔阳府 | 旱，免其租。 | 《元史》卷三〇 |
| 致和元年六月 | 江陵路属县 | 旱 | 《元史》卷三〇 |
| 至顺三年八月 | 荆门州 | 旱 | 《元史》卷三七 |
| 至正十二年 | 黄州 | 大旱，人相食 | 《元史》卷五一 |
| 至正十三年 | 黄州 | 大旱 | 《元史》卷五一 |

（三）其他灾种

见于资料的其他灾种主要有地震和风灾。

江汉平原位于江汉沉降区，“盆地边缘及内部次级坳地带，如钟祥、枝江、公安、天门、沔阳等地为中强震易发地带”^①。宋元时期见于记载的本区地震不下于五次。风灾的记录见于南宋时期，虽然风灾的影响范围较小，但损失较大，尤其是与火灾并发时。其详参见表 5-3。

表 5-3 宋元江汉平原地震、风灾一览表

| 时 间 | 灾 区 | 灾 情 | 资料来源 |
|----------|-----|-------------------|---------|
| 庆历五年八月庚午 | 荆南府 | 地震 | 《宋史》卷一一 |
| 淳熙六年十一月 | 鄂州 | 大风，覆舟，溺人甚众 | 《宋史》卷六七 |
| 淳熙七年二月 | 江陵府 | 大风，火及舟， 焚溺死者尤众 | 《宋史》卷六七 |

^① 参见梁淑芬等《湖北省自然灾害及防御对策》第四章“岩石圈灾害系”第二节“岩石圈灾害的发展趋势与预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0 页。

续表

| 时 间 | 灾 区 | 灾 情 | 资料来源 |
|-----------|-----------------------|-----------|---------|
| 嘉定十七年 | 鄂州 | 暴风，坏战舰二百余 | 《宋史》卷六七 |
| 泰定四年八月 | 江陵路 | 地震 | 《元史》卷五〇 |
| 至元元年十二月丙子 | 黄州 | 地震 | 《元史》卷四一 |
| 至正四年十二月癸亥 | 汉阳府 | 地震 | 《元史》卷四一 |
| 至正十一年八月丁丑 | 公安、松滋、 枝江县， 荆门州 | 地震 | 《元史》卷五一 |

综上所述，宋元江汉平原自然灾害的总体特征是以水旱灾害为主，水灾又重于旱灾。水旱灾害在时空分布上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水旱灾害发生频率高。四百年间见于记载的各类自然灾害 89 次，其中洪涝灾害 51 次、旱灾 30 次，分别占总年数的 57% 和 34%。而且，愈到后来发生频率愈高。其中固然存在资料记载的详略差别，但所反映的洪涝灾害随着人类活动对水循环干扰的加剧而加剧的总趋势是可以相信的。二是旱涝交替、时空分布复杂。总体上看，中部腹地多涝，周缘地区多旱；夏季多灾，七月是旱涝发生的高峰时间。四百年中，洪涝旱灾插花分布或交替出现的有 73 年，约占总年数的 18%，包括洪灾 44 年，旱灾 29 年；其中乾道九年（1173 年）、绍熙三年（1192 年）、绍熙四年（1193 年）、大德九年（1305 年）、延祐七年（1320 年）、泰定二年（1325 年）和至正十二年（1352 年）七个年份是洪涝与旱灾并举。各级水旱灾害的频率变化规律和地域分布特征，与宋元时期江汉平原的自然地理环境、水系特征、气候条件及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有关。

二、自然灾害对区域社会的影响

自然灾害对江汉平原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特别是重大的水旱灾害导致社会生产萎缩，人民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甚至因饥谨造成人口死亡、社会动乱。

灾害对江汉平原区域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表现在环境景观的变迁上。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地势低洼、易发洪涝的地理环境，使本区的环境景观常因频繁的洪水而变迁。宋代公安县（今湖北同名县）治所的迁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史时期的公安县治一直位于长江南岸，长期以来，由于江水的冲噬，县治不断缓慢南移。南宋时县治在今治略西北，宋以前的县治更在宋治以北。据陆游记载，乾道六年（1170年）他路过公安时，县令周谦孙告诉他：“县本在近，北枕汉水^①，沙虚岸摧，渐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也。”^②反映的就是由江河洪水所引起的城镇变迁。石首（今湖北同名市）附近建宁地区建制的变动，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建宁北濒长江，南临洞庭湖，地势低平，乾德时（963—968年）由巡升为县，熙宁间（1068—1077年）由县降为镇，元祐时（1086—1094年）复升为县，南渡后又降为镇。作为滨江傍湖的低洼地区，建宁建制的数度升降与其水文条件的变化有关，因水文条件的变化使当地的农田垦辟、人口增长等受到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又影响到其建制的不稳定。

由于季节性湖泊较多，多数地方的地面高程处于平枯水位之间，使得平原大部呈现出汛期汪洋一片的情景。如复州马骨湖，“夏秋泛涨，淼漫若海，春冬遂涸，即为平田”^③。易洪易涝，亦湖亦田，这种格局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有很大影响。如复州，是南宋重要的产米区，但因“旁枕襄沔，地卑水汇，间三四岁仅一熟，富商岁首以鹺茗贷民，秋取民米，大舩捆载而去”^④。可见，复州的土壤、气候等适于水稻种植，在不发生水患的年份，能够获得丰

① 公安县治在长江南岸，远离汉水，此称“北枕汉水”，“汉”疑是“江”之误。

②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③ 《舆地纪胜》卷七六《荆湖北路·复州·景物（下）》“马骨湖”条。

④ （宋）楼钥：《攻媿集》卷一〇四《知复州张公墓志铭》。

收；但又因地势低洼，水域广阔，容易遭受水灾，三四年中仅有一年能有收成。^①“高产不稳产”，成为江汉平原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

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危害不在洪涝之下。由于旱灾发生的月份比洪涝更为分散，因而不仅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播种，严重时还导致“种不入土，米价翔贵”^②，尤其是旱灾往往伴随有蝗灾，当是时，“有禾之田尽如茅苇，无禾之田尽如白地”^③，造成粮食减产甚至绝收，使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难以为继。

自然灾害最大的威胁是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破坏。

地震、风灾等偶发性重大灾难必然造成人口死亡，如淳熙六年鄂州大风，“覆舟，溺人甚众”；淳熙七年江陵府“大风，火及舟，焚溺死者尤众”。^④

水旱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更为常见。前列表 5-1 至表 5-3 “灾情”大致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其中，仅元朝至大三年（1310 年）六月荆门州一次大水，便“坏官廨民居二万一千八百二十九间，死者三千四百六十六人”^⑤。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 年），江汉地区“连年旱荒”^⑥，“一年之中，得雨不过十数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接着“又蝗虫满野，黑虫复生，田野秋种，为之一空，乡村小民，皆掘草根而食”。^⑦下面根据《宋史》卷六七《五行志（五）》将南宋江汉平原饥荒发生情况制成表 5-4。

① 这种情景与明清以后这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所颂十分相似：“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得一年收，狗子不吃糯米粥。”直至今日，它仍是湖北人常用的俗语。

② （宋）黄榦：《勉斋集》卷一六《与李贯之兵部书》。

③ （宋）曹彦约：《昌谷集》卷九《湖北提举司申乞赈济资格状》。

④ 《宋史》卷六七《五行志》。

⑤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⑥ （宋）黄榦：《勉斋集》卷一八《又画一六事》。

⑦ （宋）黄榦：《勉斋集》卷三〇《申朝省罢筑城事》。

表 5-4

南宋江汉平原饥荒情况简表

| 时 间 | 灾 区 | 灾 情 |
|--------|----------------------|---------------|
| 乾道七年秋 | 荆南 | 饥 |
| 淳熙三年冬 | 复州、郢州、 荆门军、江陵、德安府 | 大饥 |
| 淳熙七年 | 荆郡 | 饥 |
| 淳熙九年 | 湖北七郡 | 饥 |
| 开禧二年 | 湖北 | 饥，民聚为剽盗 |
| 嘉定二年 | 荆郡 | 大饥，米斗钱数千，人食草木 |
| 嘉定十七年春 | 鄂州 | 乏食 |

将表 5-4 与表 5-1、表 5-2 相对照，可见南宋时期的饥谨都与当年或前一年的旱涝灾害相随，而且除鄂州嘉定十七年（1224 年）春荒与前一年的严重水灾相关外，其他年份的饥荒皆与旱灾相连。江汉平原的洪涝灾害明显多于旱灾，却未如后者引发的饥荒多，这与麦类的种植期可避开水灾的高发期，以及洪涝发生时本区尚有丰富的鱼类产品和菱、芡、荻等具有克饥作用的水生植物有关。比如荻林在江汉平原的沿河、沿湖地带分布面积大，荻根与鱼虾一样，具有“克饥”之效，荻林所在，“寻常早歉之岁，安、复、光、黄之民皆辐凑于此，旋结茅庵，采取以食，动数千人”^①。菱、芡的分布亦很广，宋元时期菱、芡在本区既有天然生长，也有人工种植^②，且数量很大。菱、芡平时可供食用，灾荒之年尤可充饥。^③但是，一旦旱灾来临，上述丰富的水生资源都将失去良好的生长条件，旱情严重时，河湖干涸，“土坚如石”^④，难觅充饥之食，因此旱灾之后易出现饥荒，甚至有像淳熙七年（1180 年）那样，“江陵

① （宋）黄榦：《勉斋集》卷三一《申省豁常平米》。

② （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第九“鄂州总领司蛇”条，第 864 页。

③ （宋）黄榦：《勉斋集》卷三〇《申朝省乞候救荒结局别行措置筑城事》。

④ （宋）黄榦：《勉斋集》卷二八《申两司言筑城事》。

府岁旱……邻路忠、万二州易子而食”者；^①或像至正十二年（1352年）那样，“蕲州、黄州大旱，人相食”^②。

自然灾害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习俗。宋元时江汉平原的民俗有一个重要特点——不事积蓄，这种特点与洪涝灾害有着直接的联系。

江汉平原水产资源丰富，正常年景生存较为容易，“人食鱼稻，以渔猎山水为业，羸蛤食物常足”^③；但因洪涝灾害多发，高产不稳产，深度开发难度大。一旦水患来临，“则庐舍田亩，皆为鱼鳖居”^④，甚或一县“推荡”^⑤。洪涝灾害频繁多发，使得“室庐不能深奥”^⑥，以至居无定所，带来了一种重要的社会风俗——“乡民素无盖藏”^⑦，“百姓无甚蓄积”^⑧，“人偷生朝夕，取给而无积聚，重巫鬼之祀”^⑨。宋人已注意到，此风俗在当地“所来自非一日”^⑩。而且到了明清以后，随着洪涝灾害的愈演愈烈，由此还衍生出地籍混乱、粮渔混淆严重等一系列深刻影响江汉平原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问题。像清代的潜江，“濒汉江下游，地势洼渚，土田崩淤不常，故民无百年恒产，而家无屡世素封。每水涨堤溃，陵谷倏更，所谓吾疆吾理者已不可考”^⑪。类似情形在江汉平原比比皆是。

总体上看，宋元时期江汉平原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种类上，既

①（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五《淮西帅高君夔神道碑》。

②《元史》卷五一《五行志二》。

③《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

④（宋）刘攽：《彭城集》卷三八《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铭》。

⑤（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九八《王顺伯》。

⑥（宋）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卷一六《与章德茂》。

⑦（宋）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卷一六《与章德茂》。

⑧（宋）曹彦约：《昌谷集》卷九《条具賑济申提举司状》。

⑨《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风俗”条。

⑩（宋）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卷一六《与章德茂》。

⑪ 参见张建民《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有地质灾害（如地震）、气象灾害（如洪、涝、渍、旱、风等），也有生物灾害（如蝗灾等）；发生机制上，以本地和周边地区的地形、气候、水文、土壤、地质、植被等自然环境各要素相互作用为主，也有人类活动的干扰加剧环境变迁的影响。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与旱灾的发生频率最高、产生影响最大，并具有水旱灾害的连续性、群发性以及旱灾引起蝗灾、疫灾这类灾害链现象。在灾害发生的时间规律与地域分布上，夏季是灾害高发期，平原中腹是灾害的集中地。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对江汉平原区域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不仅带来环境景观的变迁，而且对江汉平原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严重破坏，特别是重大的水旱灾害导致经济衰退，饥谨不断，造成人口流离甚至死亡，成为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第三节 宋诗所见江汉平原农村日常生活

宋诗是宋代历史研究的资料宝库，自宋代开始得到逐步开发的江汉平原，较多地成为宋诗吟咏的对象，这些诗咏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当地富有特色的乡村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日常生活”在当代学术话语中是一个宏大的论题，但在本研究中，则仅限于古代生民的衣食住行。本研究试图以宋诗为主体史料，结合宋代的其他文献，还原宋代江汉平原农村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探讨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农耕品种及耕作技术

江汉平原地势低洼、排水困难，雨量充沛但季节性分配不均，且地表“大平小不平”，低地排涝、高地灌溉的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结果是低地患涝，高地患旱，因此，当地农业发展的最主要特色是田分水陆、水旱分作。

在地面高程变化较大的荆门军，“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陆。陆

亩者只种麦豆麻粟，或蒔蔬栽菜，不复种禾，水田乃种禾”^①。陆田因地势较高，亦称“高田”；水田或称“湖田”。项安世诗写久旱后的江陵：“高田已逐黄埃化，湖田五月种未投。”^②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懂得根据地势高低而分别种植不同作物，苏轼《东坡八首》写其在黄州的躬耕生活，其二称：“荒田虽浪莽，高廩各有适。下隰种粳稌，东原蒔枣栗。”^③低湿地区适于水稻生长，用来种植粳稻和糯稻，高亢之地则种植耐旱的果树。官府赋税也按照当地实情，水田与旱地分别征收。绍兴初年，德安府、复州、汉阳军征税，“水田每亩秋纳粳米一斗，陆田每亩夏纳小麦五升，秋纳豆五升”^④。

田分水陆之外，出现了一种特别的人造农田。陆游曾行舟于江汉平原以东的蕲州附近，“抛大江，遇一木筏，广十余丈，长五十余丈，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于筏上铺土作蔬圃”^⑤。这种漂浮于水面的较大规模人造农田虽较罕见，但却是当地人民为应对涨落不已的水文变化的一种创举。

在农作物种植方面，稻作是首要选择。

依下种、收获时间的先后，稻作品种分为早、晚，但二者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构成复种关系。^⑥为适应当地气候条件，本区以种植一季晚稻为主要选择。宋人描写江汉平原晚稻种植的诗句较多，如王十朋《朝离华容》：“晓发华容寺，云开鄂渚天。秋深余晚稻，地旷辟闲田。”^⑦项安世的《田间观雨》：“风中晚稻离离

①（宋）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卷一六《与章德茂书》之三。

②（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久旱得雨》，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

③（宋）苏轼：《苏轼全集·诗集》卷二一《东坡八首》，第253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一〇。

⑤（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⑥ 参见曾雄生《宋代的早稻和晚稻》，载《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

⑦（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一〇《朝离华容，暮宿孟桥》。

长，雨后高田 流。”^① 《观获》：“晚艇村村载，秋原处处收。”^② 张耒写竟陵“秋风发齐安，稻穗如植旗”^③；“竟陵南望稻新熟，梦泽悠悠伤远目。春风岭上望齐安，太昊城边揽秋菊。那知岁暮东州客，大山苍寒晓霜白”^④。晚稻在霜降后才成熟。苏轼《东坡八首》其四详细介绍了黄州水稻生产的时间安排：“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⑤ 清明节前（农历三月上旬）下种，初夏（四月初）插秧，霜降后（九月下旬）收获，显然是一季晚稻。

早稻成熟早，可以避开秋旱、秋汛及霜冻等晚稻经常遭遇的灾害，且所需肥水较少，因而被当地人民用来在台地高田种植。项安世的《久旱得雨》诗：“高田已逐黄埃化……早禾已死不可救。”^⑥ “下乡掘地贩菱藕，上乡种禾生稗穉。”^⑦ 写的就是高田种植早禾。诗句也反映出江汉平原早稻的推广与江东西路相同，都是稻作向高地发展的结果。^⑧

但是，早稻的品质和产量都不如晚稻，种植早稻更多的是为救饥所需^⑨，用作晚稻的补充，因此，宋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仍以传统的一季晚稻为主。税收制度上亦可证明这一点，《宋史·食货志》称：“江南、两浙、荆湖、广南、福建土多粳稻，须霜降成实，自十月一日始收租。”^⑩

① （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田间观雨忆叶正则旧话》。

② （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观获》。

③ （宋）张耒：《张耒集》卷九《发岐亭宿故镇三首》，第137页。

④ （宋）张耒：《张耒集》卷一三《将至都下》，第223页。

⑤ （宋）苏轼：《苏轼全集·诗集》卷二一，第253页。

⑥ （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久旱得雨》。

⑦ （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上安抚高大卿》。

⑧ 参见曾雄生《析宋代“稻麦二熟”说》，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⑨ （宋）黄幹：《勉斋集》卷三一《申省赈糶日月及米价》。

⑩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宋代本区也偶见双季稻,《宋史·五行志》载:“景祐元年十月,孝感、应城二县稻再熟。”^①但这种“再熟”仅属再生稻,由早稻或中稻收获(或败收)后,其茎基部的休眠芽萌发抽穗结实而来,而非人为的连作、间作或混作^②,没有成为种植制度。^③

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麦作在江汉平原得到较广泛的种植,主要集中在江陵地区以及汉水流域。诗称江陵“柔柔细麦绿油油”^④,“梅风吹缆麦天凉”^⑤;郢州“已涨麦田千里碧”^⑥;荆门“千古灌稻麦”^⑦。

麦分大、小。大麦早熟,一般于三月下旬收获,项安世的《寿王尚书·三月二十七日》之一云:“田家有喜新收麦。”^⑧收的是大麦。小麦通常在四月下旬、五月初成熟,同氏《六叔父生朝·四月三十日》之一:“筵开汤饼麦初熟,彩结茶花丝正香。”^⑨熟的是小麦。罗愿的《鄂州劝农》说的很明白:“蚕沙麦种,四月收贮。”大、小麦的播种期都在“上戊社前”^⑩。

① 《宋史》卷六四《五行志二下》。

② 中国历史上的双季稻栽培,大致有再生、连作、间作、混作四种类型。参见郭文韬《略论中国再生稻的历史发展》,载《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曾雄生《宋代的双季稻》,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笔者曾在江汉平原北沿的京山县仁和乡插队,当地曾响应政府号召种植双季稻,但因产量反不如仅一季中稻时高,尝试一年后即放弃。张家炎的研究也表明,清代江汉平原以一季(中、晚)稻为主,双季稻分布广但比例甚微,参氏著《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详析》,载《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

④ (宋)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一二《题断堤寺》,第118页。

⑤ (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梅稿·送郑子仁往岳阳兼以为寿》。

⑥ (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一四《郢州二首》之二。

⑦ (宋)苏轼:《苏轼全集·诗集》卷二《荆门惠泉》,第14页。

⑧ (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梅稿·寿王尚书二首》之一。

⑨ (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梅稿·六叔父生朝》之一。

⑩ (宋)罗愿:《鄂州小集》卷一《鄂州劝农》。

宋诗中可见稻、麦并咏，苏轼称荆门惠泉“千古灌稻麦”^①即为一例，但实际上稻与麦在本地绝大多数地区是异地而种的，二者之间不存在土地利用的衔接。^②项安世诗中“麦田五月献龟纹”^③的句子，清楚地表明五月的土地上麦子还没有收割，而当地的水稻在四月初已经插秧。实行稻或麦的一熟制，这是因为：尽管在技术条件上，水旱轮作复种已不成问题，但与长江下游地区相比，本地区远离出海口，排水更为困难，实行水旱复种的难度大得多；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没有由于人口压力而引发的稻麦二熟制的需求。

除以稻、麦为主要粮食作物外，本地区也种植其他杂粮。

杂粮的种植随地势、时令而有不同的选择，品种包括荞麦、粟、菽、黍、秫、雕胡等，在本区各地均有分布。通常，粟、菽（豆）等旱地作物种在不适宜水稻生长的高地，秫（高粱）、荞麦等耐水作物植于低地，水生植物雕胡（菰米）等则长在湖区，均主要用作稻、麦的补充或救灾充饥。^④项安世诗中多处提到江陵地区的各种杂粮，有粟，“蒔粟长苦饥”^⑤，“数亩亦桑亦宜粟”^⑥；秫，“短镰朝刈秫”^⑦，“有田二顷多种秫”^⑧；菽，“忍饥死待一啜菽”^⑨；荞麦，“一夜梦魂秋坂里，白花朱秆映栽门”^⑩；菰米，“菰饭沾花蜜”^⑪。在王十朋、陆游等人的笔下，也不止一处出现杂粮

①（宋）苏轼：《苏轼全集·诗集》卷二《荆门惠泉》，第14页。

② 参见前揭曾雄生《析宋代“稻麦二熟”说》。

③（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天旱小雨》之一。

④ 参见张家炎《清代湖北的杂粮作物》，载《古今农业》1996年第1期。

⑤（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隐求斋》。

⑥（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别周季隐东湖隐居》。

⑦（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后编·次韵王少清告归》之三。

⑧（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次老沈秀才韵》。

⑨（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后编·次韵江陵曹令祈雨》。

⑩（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周子问作荞麦面冷淘二首》。

⑪（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重午记俗八韵》。

的种植。如王十朋的《自鄂渚至夔府途中记所见》云：“雨后禾收晚，霜前麦见莠。”^① 陆游的《入蜀记》称其行于鄂州杨罗洑附近，但见“地形渐高，多种菽粟荞麦之属”^②。宋人常将黍与禾并称，所谓“茫茫梦泽连禾黍，断垄横冈散平楚”^③；“黍熟稻香俱可饭，橙黄橘绿最宜诗”^④。

有一种可与杂粮作物复种的重要经济作物——油菜，又称芸苔、胡菜，很早就有种植，但在很长时间里，只是被当作叶用菜。宋代，江汉平原有了用油菜籽榨油的明确记载，项安世云：“自过汉水，菜花弥望不绝，土人以其子为油。”其诗称：“汉南汉北满平田，三月黄花也可怜。”^⑤ 油菜种植面积可观。直至今日，油菜花黄、一望无涯仍是江汉平原春日的一道壮美景观。宋代以前，油料作物一直以芝麻为主，由于油菜有比芝麻易种多收的优点，宋以后油菜在江汉平原油料作物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成为继芝麻以后的又一种重要油料作物。

农业技术方面，宋代江汉平原进步最显著的是新型拔秧工具“秧马”的发明与使用，反映出水稻移栽方式的普及。水稻育秧移栽有利于提高除草、施肥效率，可充分利用水源，促进水稻分蘖和品种改良，但由于增加了拔秧和插秧等工序，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大。两宋时期江汉平原地广人稀，为节省劳动，当地人民发明了秧马。苏轼称：“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⑥他特地写了一首《秧马歌》，加以称颂。诗云：

①（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一一《自鄂渚至夔府途中记所见》。

②（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③（宋）张耒：《张耒集》卷一二《将至官坡登一土冈望复州作》，第216页。

④（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一〇《过毕家池》。

⑤（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梅稿·再和病起韵答曹仲明》。

⑥（宋）苏轼：《苏轼全集·诗集》卷三八《秧马歌》，第466页。

春云濛濛雨凄凄，春秧欲老翠剡齐。
 嗟我妇子行水泥，朝分一垄暮千畦。
 腰如箠篲首啄鸡，筋烦骨殆声酸嘶。
 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
 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
 耸踊滑汰如凫鹭，纤纤束藁亦可赍。
 何用繁缨与月题，却从畦东走畦西。
 山城欲闭闻鼓鼙，忽作的卢跃檀溪。
 归来挂壁从高栖，了无刍秣饥不啼。
 少壮骑汝逮老鰥，何曾蹶辄防颠 。
 锦鞢公子朝金闺，笑我一生蹋牛犁，不知自有木𪚩𪚩。①

“秧马”形似马，名为马，有马之迅捷，却又不像马儿那般难以驾驭，且不需花费粮草，它轻便灵巧地在水田中滑行，减轻了农民弯腰的辛苦，提高了劳动效率，难怪诗人见后兴奋不已。

在水稻栽培实行育种移秧的同时，传统的直播方式仍然保留。直播的缺点主要是费种、不利于除草，影响田间的通风透光，但直播节省劳力与耕牛，并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时间，适合地广人稀且易遭受水灾威胁的江汉平原的需要，因此，水稻直播与移栽方式在本区较长时期内并行不废。当地将水稻直播形象地称为“漫撒”。南宋光宗时出任江陵知府的彭龟年称：“湖北地广人稀，耕种灭裂，种而不蒔，俗名漫撒，纵使收成，亦甚微薄。”② 苏轼描写荆州地区“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耕牛未尝汗，投种去如捐”③；项安世诗称“湖田五月种未投”④。两处“投”字，形象地说明了水稻生产采用的是直播方式。

①（宋）苏轼：《苏轼全集·诗集》卷三八《秧马歌》，第466页。

②（宋）彭龟年：《止堂集》卷六《乞权住湖北和余疏》。

③（宋）苏轼：《苏轼全集·诗集》卷二《荆州十首》之三，第13页。

④（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久旱得雨》。

本区耕牛较为缺乏^①，所谓“耕田无牛种无水”^②。加上地广人稀、易涝多旱，使得宋代本区的农业生产方式从总体上看较为粗放。项安项的诗曾感叹“上乡种禾生稗穉”^③，表明除草不力。王炎曾将鄂州与江浙、闽中相比较，得出结论说：“大抵湖右之田与江浙、闽中不同，虽有陆地，不桑不蚕，不麻不绩，而卒岁之计惟仰给于田。缘其地广人稀，故耕之不力，种之不时，已种而不耘，已耘而不粪，稗穉苗稼杂然而生，故所艺者广而所收者薄。丰年乐岁仅可以给，一或不登，民且狼顾，非江浙闽中之比也。”^④王炎的话说得夸张了些，但多少反映出鄂州一带农业生产不注重田间管理的实情。

二、捕捞渔业及相应的生产方式

江汉平原渔业资源得天独厚，捕捞渔业源远流长。《诗经》已有“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⑤之句，称江汉之间有肉质鲜美的鱼类，当地人民已懂得使用竹编工具捕鱼待客。本地区的渔业资源主要分布于长江、汉水和天然湖泊三大水域。长江的江汉平原段“水质肥沃，饵料充足，最宜鱼类生活……是我省重要的天然捕捞渔区”；汉水“因受长江回水顶托影响……具有长江干流鱼类组成的特色”；而天然湖泊“水质良好，水草丰富，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众多，加上江河每年带来的各种有机物质的营养盐类，为鱼类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⑥。渔业资源之丰富，据陆游所见是“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又皆巨鱼，欲觅小鱼饲猫

① 参见前揭《湖北农业开发史》。耕牛缺乏，南宋时尤甚，制约着当地农业的发展。

② （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上安抚高大卿》。

③ （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上安抚高大卿》。

④ （宋）王炎：《双溪类稿》卷一一《上林鄂州书》。

⑤ （宋）朱熹：《诗经集传》卷四，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参见前揭《湖北农业地理》第一章“自然条件与农业资源”第六节“生物资源”，第49页。

不可得”^①；王十朋则目睹了“举网得鳊鱼二百余头”^②的情景。

宋人对本地区的地域优势已有充分认识：“地滨江汉之洳，民足鱼蜃之饶。”^③渔业在本地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当地百姓除稻作农业以外最重要的谋生手段。诗称“谁言百口活，仰给一湖水”^④，即是此意。

平原中腹的沌水流域盛产多种鱼类，居民多以捕鱼为生，如下郡“有二十余家，皆业渔钓”^⑤；毕家池附近的沙滩，“渔人生计占沙洲，一网鳊鱼二百头”^⑥。捕鱼工具是传统的罾网钓竿，“我来涨潦渔者稀，罾网高悬钓竿掷”^⑦；“短篙晒罾，小艇往来”^⑧可证。因资源丰富，捕捞比较容易，鱼产量高。与其他地区相似，本地渔业也“越来越纳诸商品经济的轨道”^⑨，但价格相当低廉，诗称：“平生闻说沌鱼美，满篮不受百钱直。”^⑩沌水以外的其他地方也大体如是。

在以自然捕捞为主的同时，对鱼类的人工养殖在扩大。鱼苗业孕育而生，有条件的地区开始捕捞鱼苗、培育鱼种并运销各地。陆游有“雨余山客买鱼苗”^⑪的诗句。《癸辛杂识》称：“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至于夏皆取之出售，以此为利。贩子臻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⑫说明宋代今武昌至九江一带盛产鱼

①（宋）陆游：《入蜀记》卷三。

②（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一一《晚过沙滩》。

③《舆地纪胜》卷七六《荆湖北路·复州·风俗形胜》。

④（宋）苏辙：《栾城集》卷一〇《将还江州子瞻相送至刘郎洑王生家饮别》，第181页。

⑤（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⑥（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一一《晚过沙滩》。

⑦（宋）孙应时：《烛湖集》卷一五《沌中即事》。

⑧（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⑨ 参见前揭《宋代经济史》上册，第169页。

⑩（宋）孙应时：《烛湖集》卷一五《沌中即事》。

⑪（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一《初夏道中》。

⑫（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鱼苗”条，中华书局1991年校点本，第221页。

苗，鱼苗交易已相当活跃，范围包括江西、湖北、福建、浙江等地。

渔业资源丰富、渔业兴盛，渔利自然丰厚，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府收取渔利，用以支持地方财政。江陵府有“鱼湖之输”^①；荆门军“产鱼甚多，旧以鱼利添助支费”^②；汉阳军更是“常赋所入甚薄，全藉湖池鱼利支遣”^③。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丰厚的渔利刺激了渔业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

首先，推动了湖池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宋政府采取措施，支持捕捞业的扩大以多获渔利。太宗时认为“诸处鱼池旧皆省司管，系与民争利”^④，遂于淳化元年（990年）下诏：“自今应池塘、河湖、鱼鸭之类，任民采取，如经市货卖，即准旧例收税。”^⑤元丰年间（1078—1085年）有法，弛陂湖塘冻之禁。政和元年（1111年）重申元丰之法，“许濒水之民渔采以资生计……今后更不许人陈乞断佃请射”^⑥。湖池可以请佃，意味着经营权发生了转移。南宋时，湖北诸州湖地的产权进一步变化。黄榦与上司商议减免汉阳等地鱼利事宜时曾说：

湖北诸州湖地，有系民户祖业者，有系官地、民户请佃多年者。有产业之家，或自为主，或立年限租徭与人。而租徭之人为主者，每岁冬月采鱼，湖主不得自采，皆是荆襄、淮西、江东、湖南诸处客人，驾船载网前来湖主家，结立文约，采取鱼利，而与湖主均分之。^⑦

①（宋）楼钥：《攻媿集》卷九六《宝谟阁待制致仕特赠龙图阁学士忠肃彭公神道碑》。

②（宋）洪适：《盘洲文集》卷四九《荆门应诏奏宽恤四事状》。

③（宋）黄榦：《勉斋集》卷三四《放免渔人纲钓鱼利钱榜文》。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三三、三四。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一一。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三三、三四。

⑦（宋）黄榦：《勉斋集》卷二八《与漕司论放鱼利事》。

此时的湖地，有的已成为“祖业”，有的虽为官地，但由民户请佃，有的请佃民户还将捕捞权以契约方式转让租赁给他人。可见，南宋以后不仅湖池的经营权在变化，所有权也发生了转移。

其次，促进了渔民作业方式从分散走向集体。最典型的材料仍出自黄榦所说：

采鱼之人多是亡命不逞之徒，每遇采鱼，或其徒中自相攘夺，或主客之间互相争竞，大则贼杀，小则斗伤。今乃欲听从民户采取，则诸州取鱼客人，皆不肯复与湖主均分，湖旁强横之民又群起而争之，湖主亦不得而问也。湖主岁收湖鱼之利，多或数千缗，少亦数百缗，又岂肯坐视而不问乎？其势必至于争斗。诸州之客并湖旁之民，既与湖主为斗，客之与民徒党之中，又自相为斗，则贼杀斗伤，纷然而起矣。设或结为徒党，便相抗拒，意外之变，岂能无之。今以十金投之地，而听人之争取，犹有不平而争斗者，况湖鱼之利，动数千缗，又岂可不辨主客，而听人之攘夺乎？^①

为夺取鱼利，捕捞已不限于个体劳动而成为群体活动，当地渔民和外来采鱼者还进一步结为主、客不同群体，相互之间展开争斗；地方官也卷入进来，出面维护地方利益。

结果是，丰厚的鱼利并没有给贫苦渔民带来美好生活，不过是更多地成为湖主与官府掠夺的对象。官府为收取鱼利，甚至不择手段。在荆门军，原“有独石潭，在江汉之旁，产鱼甚多，旧以鱼利添助支费”，南宋初年，独石潭“改作放生池”，不得捕捞，渔民本已失业，官府竟然还“将江潭下流，强立地名，谓之车湘滩、上下堤、杨子滩、青术塌，每户虽不施网罟，至冬月，令县尉追集沿江人户，将已前鱼利之数，均勒认纳，每岁得钱二百余贯，入公

①（宋）黄榦：《勉斋集》卷二八《与漕司论放鱼利事》。

使庖”^①。

三、饭稻羹鱼

民间饮食的选择，首要原则是方便易得。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气候温暖湿润、水产资源丰富，这些特征使得江汉平原“人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羸蛤食物常足”^②，饭稻羹鱼，由来已久。

稻分粳稻和糯稻，以粳稻为主。粳稻是一季晚稻，从上引苏轼《东坡八首》可知，从播种育秧到成熟收割，前后六个月，因生长期长，质地很好，舂碾成米，晶莹剔透，形同“玉粒”^③，且香气扑鼻，有“香粳”^④之称。王十朋一行曾为“余得香粳一斗余”^⑤而竞相欢呼。苏轼诗曰：“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⑥对粳米新饭由衷地称赞。

面食也是重要的主食，项安世诗“筵开汤饼麦初熟”^⑦中的“汤饼”就是面条，用新登场的小麦磨面制成。

米、面之外，各种杂粮如荞麦、粟、豆、黍、高粱、菰米等，均用作主粮的补充。前引项安世、王十朋、陆游等人的诗句已证。^⑧当地已习惯食用杂粮制成的食品，并设法把杂粮食品制作得尽量可口一些，如制作角黍粽子，项安世有诗：“经年不食三间

①（宋）洪适：《盘洲文集》卷四九《荆门应诏奏宽恤四事状》。

②《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鄂州》“风俗”条。

③（宋）苏轼：《苏轼全集·诗集》卷二一《东坡八首》其四，第253页。

④（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一〇《晚过沙滩》。

⑤（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一〇《晚过沙滩》。

⑥（宋）苏轼：《苏轼全集·诗集》卷二一《东坡八首》其四，第253页。

⑦（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六叔父生朝》之一。

⑧ 参见前引《平庵悔稿·隐求斋》、《平庵悔稿·后编·次韵江陵曹令祈雨》、《平庵悔稿·重午记俗八韵》，以及《梅溪先生后集》卷一〇《自鄂渚至夔府途中记所见》、《入蜀记》卷四等。

饵，一日相逢似故人。旋剥青菰香满手，试餐黄颡软粘唇。”^①诗中的“三间饵”，即以菰芦叶包裹黍米制成的粽子。或是食用杂粮时加上一些佐餐配料，“菰饭沾花蜜”^②就是其中一种。

鱼类在当时的江汉平原既是副食，也是主食，黄榦《与漕司论放鱼利事》便提到蠲免鱼湖所收课利，“使贫民得采鱼为食，以度饥荒”^③。鱼类是湖区人民最主要的生存资源。除现捕鲜鱼食用之外，人们还普遍采用腌制方法，将鱼保存起来，以供不时之需。腌鱼即鲊，是一种常见的食品，如鄂州附近的金鸡洲，“洲中有聚落，如小县，出鲊鱼，居民率以卖鲊为业”^④。在今天的江汉平原，鲊的制作和食用仍很普遍。其他的肉类副食，除常见的猪、羊、鸡、鸭之类外^⑤，另有一种食用水禽，“色白，类鹅而大，楚人谓之天鹅。飞骞绝高，有弋得者，味甚美，或曰即鹄也”^⑥。

莲藕、菱角也和鱼相似，既用作菜肴，也充作主食。除天然生长外，菱、藕都有人工种植者^⑦，产量较高，至有“乌菱不论价”^⑧之说。其他蔬菜，有油菜、白菜、萝卜等，花卉也可食用。陆九渊称荆门军陆亩“或蒔蔬栽菜”^⑨。项安世诗称“栽兰九畹当餐英”^⑩，又有“蔬畦行溉泽，花径分泛酺”^⑪句。陆游在沌水中

①（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后编·食角黍怀江陵》。

②（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重午记俗八韵》。

③（宋）黄榦：《勉斋集》卷二八《与漕司论放鱼利事》。

④（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⑤如陆游一行“泊塔子矶……买羊置酒，盖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诸舟买之，俄顷而尽”。“遣小舟横绝江面，至对岸买肉食，得大鱼之半，又得一乌牡鸡……”参见《入蜀记》卷五。

⑥（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⑦（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第九“鄂州总领司蛇”条，第864页。

⑧（宋）苏辙：《栞城集》卷一〇《将还江州子瞻送至刘郎洲王生家饮别》，第181页。

⑨（宋）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卷一六《与章德茂书》之三。

⑩（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次老沈秀才韵》。

⑪（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水图诗寿王丞相》。

旅行，“得菘（白菜）及芦服（萝卜），然不肯斫根，皆刈叶而已”^①。

在诗人笔下，“黍熟稻香俱可饭，橙黄橘绿最宜诗”^②。但事实上，普通百姓的日常饮食并不像诗人描写的那么富有诗意。

由于“江陵虽有大江，不足以救旱，夏秋间堤外常苦水，堤内常苦旱”^③，水旱灾害严重破坏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或是“秋原绝粒真成旱”^④，或是“谷穗泥生耳，田家痛切心”^⑤，本地区人民的生存时时遭受灾害的威胁。每逢灾害来袭，人们甚至靠挖草实、藕根救饥。项安世感叹，因久旱无雨，人们“忍饥死待一啜菽，又见赤日悬青天……掘残草实到黄壤，踏尽藕根倾碧园。得钱买饭不及夕，岂复一饱期安眠”^⑥。孙应时写诗，描绘汛期的沌水流域，“我来涨潦渔者稀……剥菱炊菰自朝夕。”^⑦藕、菱之外，河湖沿岸的水域上广泛生长的各种水生植物如茭、芡、荻等也都用以裹腹，在饥荒之年成为人们的救命资源。^⑧正如汉阳知军黄榦所看到的：“本军管内多湖泽、荻林，湖泽有鱼虾，荻林有藤根，皆可充饥，寻常早歉之岁，安、复、光、黄之民皆辐凑于此，旋结茅庵，采取以食，动数千人。”^⑨

①（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②（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一一《过毕家池》。

③（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天旱小雨》。

④（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又中秋》。

⑤（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秋潦》。

⑥（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后编·次韵江陵曹令祈雨》。

⑦（宋）孙应时：《烛湖集》卷一五《沌中即事》。

⑧（宋）黄榦：《勉斋集》卷三〇《申朝省乞候救荒结局别行措置筑城事》。

⑨（宋）黄榦：《勉斋集》卷三一《申省豁常平米》。安、复、光、黄分别指安州，治今湖北安陆；复州，治今湖北天门；光州，治今河南光山；黄州，治今湖北同名市。

四、稳定或多变的民居

乡间民居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定居型民宅、流动型民居和水患时的临时性居所。

定居型民居通常选址在河湖附近的台地与堤岸，“背堤临水小人家”^①是常见的景观。在沌水流域，毕家池“地势爽垲，居民颇众”；东场“并水皆茂竹高林，堤净如扫，鸡犬闲暇，凫鸭浮没。人往来林樾间，亦有临渡唤船者”。诗人至此，“恍然如造异境”。^②生活用水取自住所附近的河湖陂堰，或在住所边打井，所谓“掘井资釜鬻，渔溪得鲂鲤”^③。房前屋后，往往植桑栽花种蔬菜，“小园种花复种竹，数亩亦桑亦宜粟”^④。房屋周围则建有竹木编制的篱篱，如江陵“总在疏篱断垣里”^⑤，“傍篱开竹径，插竹护蔬畴”^⑥，“晚饭下前墀，徐行出短篱”^⑦；复州“短篱晒罨”、“藩篱坚壮”^⑧，“人语竹篱深”^⑨；荆门“居人篱壁皆编木为之”^⑩。民居附近多种植桑柘榆柳，有条件的栽种果树。据陆游所见，沌水深处的白白“有庄居数家，门外皆古柳侵云”；归子保“亦有十余家，多桑柘榆柳”；“沌中之最佳处”纲步，“有二十余家，在夕阳高柳中”；毕家池“舍旁有果园甚盛”。^⑪枝江县的沱“皆聚落，

①（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补遗·春日堤上》。

②（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③（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水图诗寿王丞相》。

④（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别周季隐东湖隐居》。

⑤（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补遗·春日堤上》。

⑥（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后编·次韵王少清告归》之三。

⑦（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晚步》。

⑧（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⑨（宋）陈杰：《自堂存稿》卷二《景陵湖中宿人村》。

⑩（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三十日过班竹赋玉州之木一首》。

⑪（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竹树郁然”^①。

规模较大的聚落建有祠寺、学校。在毕家池，有广福永固寺，寺东另建有白云轩，轩前有橙树，“橙方结实，虽小而极香”，诗人一行在此“相与烹茶破橙”^②。在沱， “民居相望，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③。

一些人户选择简易的流动型居所。陆游在蕲州附近江面旅行时，曾“遇一木筏，广十余丈，长五十余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素所未睹也。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于筏上铺土作蔬圃，或作酒肆”^④。这种情景比较少见。较多的是像汉阳军，“郭外沿江之民几二千家，皆浮居草屋，视水之进退以为去住，夏则迁于城之南，冬则移于城之北，若鸿雁之去来”^⑤。流动性居住方式是当地变化不定的水环境的产物，属当地百姓采取的一种既灵活而又无奈的应对措施。

一旦遭遇较严重水灾，更为贫困的民户甚至只能选择“半巢居”方式，孙应时《沌中即事》云：“我来涨潦渔者稀，罾网高悬钓竿掷。苇屋人家绝可怜，欲没未没三四尺。倚树为巢葑作床，剥菱炊菰自朝夕。”^⑥ 刘敞《石首县》诗称：“仰观积水痕，仍在高树巅。里人半巢居，出入随鸟鸢。”^⑦ 穷苦百姓的生活是何等艰辛。

民居的建筑材料就地选取。本区竹木资源丰富，诗称“汉川如渭川，千亩尽修竹”^⑧，修竹与芦苇茅荻是常用的建筑材料。民居普遍架竹苫茅，公安“民居多茅竹”^⑨，沙市“十里人烟半竹

①（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②（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③（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④（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⑤（宋）黄榦：《勉斋集》卷一〇《与李侍郎梦闻书》。

⑥（宋）孙应时：《烛湖集》卷一五《沌中即事》。

⑦（宋）刘敞：《公是集》卷七《石首县》。

⑧（宋）吕陶：《净德集》卷三八《筴笥谷》。

⑨（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庐”^①，郢城“几家茅竹散平川”^②，荆州则是遇大雪“竹屋夜倒不知数”^③。荆门一带“人家多茅茨”^④，沌水流域的下郡“芦簷茅屋”，毕家池“茅茨结庐”。^⑤

个别地区筑土为室。项安世在荆门看到这种情形，诗人写道：“自四望至荆门百里间，草木不生，道旁皆以土筑室。予既作二屋诗记其异。”诗称：“玉州之南土当木，玉州之北木为竹。以土筑室土则荣，以木编篱木应辱。”^⑥

以竹、茅、苇、荻为建材的居屋，与砖瓦建筑物相比，显得简陋易损，因此自唐代以来便被人批评为“楚俗不理居”。唐诗称：“楚俗不理居，居人尽茅舍。茅苫竹梁栋，茅疏竹仍罅。边缘堤岸斜，诘屈檐楹亚……”^⑦到了宋代，竹屋茅舍仍是江汉平原乡村民居的主要形式。之所以如此，除了开发程度不高、经济较为窘困外，从根本上说这种形式是适应本区自然环境的产物。这种形式既与当地充沛的竹茅资源相关，又受到当地洪涝灾害的影响。一方面，竹茅资源丰富，成本低廉；另一方面，洪涝灾害频繁，因此，建造“价廉工省”的竹屋自然而然地成为当地民居的首要选择。王禹偁说：“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⑧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当地百姓在生活方式上理性选择的结果。利用芦苇建造房屋，对于这些经常遭受洪涝灾害的地区显然更加经济实惠。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江汉平原乡村的竹屋茅舍，也透射出生活

①（宋）袁说友：《东塘集》卷四《泊沙市》。

②（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还过郢城》。

③（宋）郑獬：《郾溪集》卷二五《荆江大雪》。

④（宋）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卷一六《与章德茂》之五。

⑤（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⑥（宋）项安世撰，（清）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后编·还过郢城》。

⑦（唐）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三《茅舍》，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

⑧（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七《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情趣,如公安“兵火之后,民居多茅竹,然茅屋尤精致可爱”^①;下郡“芦簪茅屋,宛有幽致”;毕家池“虽茅荻结庐,而窗户整洁,藩篱坚壮”^②;石首“道旁民屋,苫芦厚尺余,整洁无一枝乱”^③。

五、日常生活的环境特色

日常生活入诗使宋诗对于生活史的研究有了价值,但宋诗的吟咏对象仍有明显的局限,最突出的一点:南宋后期,江汉平原农业生产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型水利田——垸田开始出现,但这一崭新的景观却未在宋诗中留下痕迹,其他如衣饰这类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也很少在宋诗中露面,而且诗歌受作者个体感受的影响很深,在诗人的感受与客观的存在之间明显存在着差距,无论是浪漫的颂扬还是悲情的感叹,都未必反映完整的事实。不过,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与晋唐诗相比,宋诗更注重实用性,宋代诗人的平民心态、两宋务实的审美风尚,使得宋诗的一大特点就是努力发掘农民生活题材,反映宋代乡村的真实风貌。^④ 有关这些,在以上的引诗中已有较充分的表现。

宋诗所反映的江汉平原农村日常生活最值得重视的,是其富有地域特色的环境特征,它是理解当地农村生活的一把钥匙。

在宋人的诗作中,江汉平原农村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日常生活场景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片充满生机的大地,河湖密布,地势低洼,气候温湿,水量充沛,使得这里长期存在着治水问题,频繁多发的洪涝灾害影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应对地理环境,是当地人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筑堤围堰、水旱分作,这是人们做出的技术选择;农渔并举、商贾兼行,这是人们做出的产业选择。在生

① (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② (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③ (宋)陆游:《入蜀记》卷四。

④ 参见漆侠《关于南宋农事诗——读〈南宋六十家集〉兼论江湖派》,载《河北学刊》1988年第5期;刘文刚《繁荣美奂的宋代田园诗》,载《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刘蔚《宋代田园诗审美取象的三大特点——以动植物为中心》,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3卷第6期,2004年11月。

产方式上,农作中水稻直播与移栽并存,捕捞渔业从分散的个体劳动走向群体合作。农作物品种的选择,以稻、麦为主,加上各类水旱杂粮;为克服对本区主要农作物——晚稻造成危害的秋旱、秋汛及霜冻等,又以补种早稻作为救灾措施。食物的选择,除了饭稻羹鱼,另有多种水生动植物。居住方式则随水进退,房屋以价廉工省的茅竹建筑为主。凡此种种,足以说明,从被动的适应到主动的选择与积极的利用,人类以多种方式对其与所在环境的关系进行着不断地调适。

从农村日常生活的角度看环境变迁,不难发现,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农业景观乃至中国内陆的几乎每一公顷,都完全是人为的”,“人们主导水流的路径,甚至土壤也是人为的构造”^①,但在宋代的江汉平原,仍是土地、水和其他资源在人类社会起着某种程度的主导作用。从总体上看,宋代江汉平原的农业类型尚属于复杂自然环境特别是不稳定的自然水分条件下的粗放型农业;而彼时彼地的农村生活,可称为易获取生存资源条件下的散漫型生活。这一结论并不蕴涵任何有关“进步”或“落后”的价值评判,正如笔者上文所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当地人民顺应环境、理性选择的结果。

第四节 从水神信仰看荆江两岸人地关系的演变

——以水神庙址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为例

在水乡泽国世代繁衍生息、生产生活,荆江两岸地区的民间信仰由此打上了深刻的水神崇拜烙印。宋元明清时期,伴随着荆江两岸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人类活动的扩展,本区水神崇拜的对象不断丰富,水神庙的数量增加、空间扩散。本章将宋元明清时期荆江两岸

^① 约翰·麦克尼尔:《由世界透视中国环境史》,载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

水神崇拜的对象概要分为自然神与人格神两大类型^①，依次梳理相应之水神庙址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探讨其所反映的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

一、自然神类

主要有江渚、江神祠庙，沮漳神祠，龙王、龙神祠庙，息壤祠，石牛与铁牛，天井与海眼，以及穀神、黑神庙等。

（一）江渚庙、江渚宫与江神祠、江神庙

对河流的崇拜源远流长，自汉代专设对江、河、淮、济四渚的祭祀制度后，江渚作为江神在历代得到尊崇。^②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诏封江渚为广源王^③，宋人视其“最为祀典之正者”^④。

宋代以降，荆江两岸地区的江渚庙、江渚宫、江神祠或江神庙主要分布在江陵县内。^⑤

至迟在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江陵县沙市以东三里已建有江渚庙。^⑥嘉定年间（1208—1224年），江渚庙附近有江渚宫，位于江陵县东十五里。^⑦

① 在我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中，崇拜的对象复杂多样，从日、月、星辰、风、雨、电、水等自然物和自然力到龙、蛇、牛等自然界动物再到大禹、屈原、李冰、关公、天后等人鬼神等，不胜枚举，即使是自然崇拜亦多有人格化的倾向。本文的关注点在荆江地区水神崇拜所反映的人地关系，有关自然神、人格神的划分仅具有相对意义。

② 参见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丁篇“四渚”，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③ 《宋史》卷一〇二《礼志五》。

④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⑤ 从现有资料来看，除江陵县外，荆江两岸各县较少有江渚庙、江神祠或江神庙。同治《公安县志》卷二《营建志·祠宇》记载，位于虎渡河与黄金支河之间的鲁陂里有江渚庙。

⑥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⑦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寺观·江陵》“江渚宫”条。

沙市附近既有江渚庙，又建江渚宫，与当地水文、地势条件密切相关。一方面，沙市以西开始进入湍急险恶的峡江段，南宋时沙市是西进行旅的换船之地，人们在此换乘体积较小的船只，以适应峡江的狭窄河道，江渚庙、宫用以祈求峡神保护得以顺利入峡^①；另一方面，沙市河弯迎流顶冲，常年经受江水冲刷，御江形势险要，南宋初年该河段有黄潭古堤，夏潦堤溃时“荆南、复州千余里，皆被其害”^②。决口筑塞后，后人始终视此地为捍江要地，江渚庙、宫又用以祈求江神佑护沙市一带的平安。

明清时期，沙市的江渚宫继续发挥着作用，据史籍明文记载，至少在永乐年间（1403—1424年）和雍正八年（1730年）两次得到重建。^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献中有关沙市江渚宫的记载也增添了新内容。如乾隆《江陵县志》卷五《建置二·坛庙》称：江渚宫，“宫前龙井，万历中龙起于此”。此说的添加，即是明中叶以后荆江水患日益严重、沙市一带经历了较大冲击的结果。

明嘉靖以来的数十年间，荆江“水患无岁无之，一遭冲决，则湖河淤浅，水道闭塞，垵塍倒塌，田亩莱芜。民内顾则虞赋，外顾则虞力，今日之民害，莫此为甚”^④。万历《湖广总志》称：“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岁），三江水汜异常，沿江诸郡县荡没殆尽，旧堤防存者十无二三。”^⑤沙市河弯的重要堤段黄潭堤亦未能幸免：“（嘉靖）四十五年，黄潭决，民溺死无算；万历十九年辛卯，黄潭又决，溺死者数万人。”^⑥明清时期的黄潭堤，已被视为“要

①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② 《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荆襄诸水”条。

③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寺观·江陵》，乾隆《江陵县志》卷五《建置二·坛庙》“江渚宫”条。

④ 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志》。

⑤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三江总会堤防考略》。

⑥ 乾隆《江陵县志》卷八《建置五·江防》“水患纪略”。

害”①、“至险至要”②之地。

江渚庙、江渚宫之外，江陵县在玉路口和杨林（洲）矾箭堤复建有江神祠与江神庙，二者的修建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江陵县特大洪水的直接产物。是时，大水将万城堤至玉路口一线冲出二十余处溃口，使江陵城遭受巨大损失。玉路口至杨林矾一带正当江陵城南之门户，大灾后的第二年即在玉路口和杨林矾修建江神祠与江神庙，意在祈盼水神之功能立竿见影。庙成之后，乾隆皇帝特赐额“恬流普卫”，道光、同治时又分别赐额“岷流永靖”与“安流福佑”。③

（二）沮漳神祠

沮漳神是本区的另一河神，至迟在宋代就受到崇祀。南宋《舆地纪胜》卷六四称：“楚望在寸金堤首，祀江、汉、沮、漳之地，帅张栻建。”对沮、漳河神加以祠祀，反映出沮漳河的水患已对江陵城产生了影响。是时，寸金堤在江陵城西一带，此为荆江、沮漳河与汉水分流的共同侵害之地，隐患颇多；加上当时沮漳河的入江口在枝江县④，但南宋为修筑护城工程，不时从沮漳河引水灌注“三海”。人为的改道改变了江陵城西的河湖水系，而且将汛期的沮漳来水引向了江陵城。

清代的沮漳神祠从城西迁到江神庙邻近，二者皆在江陵城南的中斗篷堤外（即杨林矾处）。⑤ 庙址的迁移，反映的是沮漳河入江口的逐渐迁移、江陵城南的河道变化以及沮漳河下游的堤垸开发。

①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二《水利·荆州府·江陵县》“黄滩堤”条。“滩”即“潭”。

② 清代方志记载的“黄潭堤”条均转引了《宋史·河渠志》“荆襄诸水”条关于黄潭堤决口导致荆南、复州千余里范围皆被其害的内容。

③ 乾隆《江陵县志》卷五《建置二·坛庙》“江神祠”条，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江陵县·典祀》“江神庙”条。

④ 《舆地纪胜》卷六四《荆湖北路·江陵府·景物》“沮水”条。宋代以前，沮漳河的入江口常有变化，具体参见前揭《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二章“汉水下游支流与分流河道的历史演变”，第104页。

⑤ 《荆州万城堤志》卷三《建置·祠宇》“江神庙”、“沮漳神祠”条。

明代，沮漳河分别从枝江与江陵入江，沮漳水患对江陵县的影响还不算突出；至明末，沮漳河入江口径移江陵；乾隆以后，江陵城南的河道受江心洲发展的影响，“江流洄漩攻激，最为险要”^①，而且江心洲淤长，逐渐堵塞了沮漳河原入江之口，光绪时入江口迁移至城南六里的御路口（详见第一章）。其结果是一旦汛期来临，不仅沮漳河盛涨，而且与江水合流，给江陵城西与城南的堤防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在沮漳河下游沿岸的枝江与江陵县均围有规模较大的堤垸，导致行洪困难，溃堤屡屡发生。正是由于上述变化，使得清代对沮漳神的祠祀最为隆重。如同治九年（1870年），荆州府遭遇伏汛盛涨，江水与沮漳河合力，几致万城堤溃决，情形十分危险，“该道府等亲诣各庙虔申祈祷，仰赖神灵默佑”，“化险为平”后，朝廷特赐额予江神庙及沮漳神祠，“用答神庥”^②，其中给沮漳神祠的赐额曰“金堤保障”^③，寄希望它能辅助江神与金堤共同护卫江陵城。

（三）龙神祠、龙王庙

江陵县龙神祠在县治以西，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知县汤廷芳修建。^④ 神祠所在的县治以西已有多位水神聚集，乾隆时又在此建龙神祠，可见江陵县西的御江形势相当严峻。

监利县的龙神祠在县治小东门外，为道光时知县劳光泰修建。^⑤ 道光年间（1821—1850年）正是荆江河势变化剧烈的时期，龙神祠的修建与这种变化有关。据记载，咸丰九年（1859年）夏秋大水，先是夏汛，螺山江堤溃决，九月江水复涨，堤外二洲“忽然中裂，延及岸趾，圻为深潭，长且里许，阔符百丈，漂没庐墓不可胜

① 《荆州万城堤志》卷一《图说·说略》“中斗篷堤”条。

② 《荆州万城堤志》卷首《谕旨》“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五日”条。

③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江陵县·典祀》“沮漳神祠”条。

④ 乾隆《江陵县志》卷五《建置二·坛庙》“龙神祠”条。

⑤ 同治《监利县志》卷二《营建志》“龙神祠”条仅称祠由邑侯劳光泰修建，又据同书同卷“周支关”条，劳光泰为道光时邑侯，据此推断龙神祠建于道光时。

计,金以为风浪虽猛,非神力不至是,遂谓渊中有龙神处此”^①。

在明代公安县建有龙王庙,在莱公祠东北。^② 莱公祠又称竹林道院,在县北油河堤街,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年),祀宋名臣寇准,宋元明时期多次重建。^③ 竹林道院在油河口之南,大江右岸,靠近斗湖堤河弯;江水之外,油河口分流对县治亦有一定影响^④,将莱公祠置于此江、河险境,意在以寇准为神,保护公安县治。龙王庙既在竹林道院东北,则比道院更靠近江岸,位于江防险要之处。

龙王庙之外,清代公安县在县治东南建有龙神祠。^⑤

(四) 息壤祠

传说中的“息壤”可无穷生长,“以湮洪水”,此事《山海经》早有记载,但中唐时将其附于江陵。《舆地纪胜》卷六四《荆湖北路·江陵府·景物》称:

《山海经》云:“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溟洪录》云:“江陵府南门有息壤焉。”唐元和中,裴字牧荆州,掘之,得石城,与江陵城同,中径六尺八寸,徙弃之。是年,霖雨不止,遂埋之。^⑥

息壤所在之地,建有息壤祠。宋人张世南称:“江陵城内有法

①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典祀·监利县》“龙神祠”条。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祠庙·公安》“龙王庙”条。

③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祠庙·公安》“寇莱公祠”条,万历《湖广总志》卷四二《坛庙·荆州府·公安县》“莱公祠”条。

④ 见成化《重刊公安县志》之《公安县治图》,载王自强主编《中国古地图辑录·湖北省辑》,星球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

⑤ 同治《公安县志》卷二《营建志·祠宇》“龙神祠”条。

⑥ (宋)罗泌《路史》卷四七《余论十·息壤》所记略同:“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息生之土,长而不穷,故有息石……江陵之壤,锁镇水旱。昔高从海镇渚宫,出经其处,问书记孙光宪。对以‘伯禹治水,自岷至荆,定彼泉原之穴,虑万世下有或泛溢,爰以石屋镇之。’盖本之《冥洪录》,裴相、欧献之事也。”四部备要本。

济院，今俗称为地角寺，乃昔息壤祠。”^①此后，息壤“失其处”^②。

嘉靖至万历间，荆江沿岸地区遭遇了前所未遇的洪水，堤防时被冲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江陵县江堤更是被“荡洗殆尽”^③。在此背景下，万历十年（1582年），息壤被重新“发现”，据称复得于江陵南门外，“瘞以土，而祠其上”^④。与此前相比，息壤祠从城内移到了南门外，更接近于江堤。

清人亦以明代息壤祠为“古息壤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江陵又遇百年洪灾，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知县杨玠在“古息壤地”监修禹王宫，希望以大禹治水之术震慑息壤，消弭水患。道光至同治间荆江地区水患不减，光绪元年（1875年）倪文蔚又捐建享殿并接砌了石台。^⑤

（五）石牛与铁牛

石牛即石犀。《水经注》卷三三《江水》载：“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后转犀牛二头，一头在府市市桥门，一头沈之于渊也。”石犀之能厌水怪，是因为“牛为土性，土能克水”^⑥。

从南北朝至宋代，荆江的石牛传说始终与龙、宠二两个江心洲相伴。龙、宠二洲，约在江陵县西六十里至县西二十里的河道中^⑦，从南朝盛弘之的《荆州记》到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石牛传说的绵延不绝，一直在龙、宠二洲之间的水域阻碍渔者。清代志书中，石牛与龙、宠二洲的传说继续存在，所不同者是石牛为

①（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六，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本，第52页。

②（明）雷思霈：《荆州方輿书》，见康熙《荆州府志》卷三六《艺文》。

③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江陵县堤考略》。

④（明）雷思霈：《荆州方輿书》，见康熙《荆州府志》卷三六《艺文》。

⑤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江陵县·典祀》“禹王宫”条。

⑥ 参见黄芝岗《中国的水神》第三章“蜀守李冰和石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24~27页。

⑦ 第一章已述，龙、宠二洲位于枚回洲与郢里洲之间，枚回洲在县西南六十里，郢里洲未详所在，但《水经注·江水篇》称其上有高沙湖，《渚宫故事》则云高沙湖在江陵城西二十里。

铁牛所取代，并从水下“走上”岸边，设置的范围也逐渐扩大。

《水经注》时代的石牛只需沉于水下便能镇锁水怪，反映出当时的水患较少、程度较轻，当时的江堤也还很少，因此石牛无需“上岸”。当江堤需要保护的生命和财产越来越多、溃堤的危害越来越大时，石牛便演化成铁牛，人们认为“水怪”多为龙，“龙为木类，金能克木”^①。而且铁牛由水中上至堤岸，镇守堤防。《荆州万城堤志》卷首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大水之后，“于荆州万城堤及沙市等处形势扼要处所，相度紧要顶冲，酌量铸置铁牛，以镇堤坝，亦预弭水患之一法”。同书卷三《建置》附载了万城、中方城、上渔埠头、李家埠、中独阳、杨林矶、玉路口、黑窑厂、观音矶等堤段及郝穴镇安寺建置铁牛的记载。自明代以来，万城堤至观音矶一线多次发生严重的溃堤，江陵城之安危实悬于此，因此，在大力修筑堤防的同时，人们置铁牛于江防要处，寄希望于它们能“预弭水患”。

监利县至迟在明代就有铁牛庙。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祠庙·监利》称：铁牛庙“在县西八十里。故老云：江陵有九牛三镬，镇遏水灾。今《史》曰：港小铁牛，即其一也。后人立庙于侧，因名”。清代，这里属上乡堤的防护范围^②，“嘉庆年间堤溃寺圯，铁牛陷入渊潭”，铁牛寺改在县西六十里处复建。^③

监利县西八十里的河段，属于清代上乡堤的防护范围，康熙时铁牛寺堤即在上乡堤之列。^④铁牛在明嘉靖年间从江陵扩展到监利，这似乎意味着该河段已进入了河曲发展周期^⑤；监利县又直接移植了江陵铁牛的传说，反映出当时水患已较为严重。铁牛寺在清嘉庆时移至县西六十里，与明时铁牛庙相距二十里，这很可能就是河道摆动之后自然裁弯的长度。

① 参见前揭《中国的水神》第三章“蜀守李冰和石犀”，第25页。

② 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堤》。

③ 同治《监利县志》卷二《营建志》“铁牛寺”条。

④ 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堤》。

⑤ 据林承坤先生的研究，明中叶至明末为河曲发展的第一个周期，参见第二章。

值得注意的是，同治《监利县志》将铁牛寺追溯为宋人所建，“以寺前有护堤铁牛，故名”^①，其由来应与前述北宋仁宗时期监利县的堤防修筑相关。

（六）天井与海眼

关于江陵城北的天井，《水经注》卷二八《沔水》曾有记载：

江陵西北有纪南城……城西南有赤坂冈，冈下有渚水，东北流入城，名曰子胥渚，盖吴师入郢所开也，谓之西京湖。又东北出城西南，注于龙陂。陂，古天井水也，广圆二百余步，在灵溪东，江堤内……陂水又逕郢城南，东北流谓之扬水。又东北，路白湖水注之。湖在大港北，港南曰中湖，南堤下曰昏官湖，三湖合为一水。东通荒谷，荒谷东岸有冶父城……春夏水盛，则南通大江，否则南迄江堤，北逕方城西，方城即南蛮府也。又北与三湖会。故盛弘之曰：南蛮府东有三湖，源同一水，盖徙治西府也。宋元嘉中，通路白湖，下注扬水，以广运漕。扬水又东历天井北，井在方城北里余，广圆二里……西岸有天井台，因基旧堤，临际水湄，游憩之佳处也。扬水又东北流，东得赤湖水口，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来会同……扬水又东入华容县，有灵溪水^②，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扬水又东北，与柞溪水合，水出江陵县北。盖诸池散流，咸所会合，积以成川……柞溪又东注船官湖，湖水又东北入女观湖，湖水又东入于扬水。扬水又北逕竟陵县西……

文中数次提及“天井”，而且距天井不远处多有堤防。这种临于堤边的“天井”在成因上与河堤决口湖类似，由于堤防溃口冲

^① 同治《监利县志》卷二《营建志》“铁牛寺”条。

^② 清代方志将监利县境内与古“灵溪”方位相当的一条河流称为“灵港”，但与江陵县“灵溪”无涉。见顺治《江陵志余·志水泉》“赤湖口”条，康熙《荆州府志》卷四《山川》“赤湖口”条，同治《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山川》“灵港水”条等。

刷而成，一般面积不大，积水却很深^①，且多与蛟龙的传说相伴。

引文还可见，江陵城西北、北、东至东南一带众水汇聚，如子胥渚、扬水、龙陂、路白湖、中湖、昏官湖、荒谷水、赤湖、柞溪、船官湖、女观湖等。春夏水盛时，与三湖连通的荒谷水可南通大江。据此情形看，江陵城东在春夏时节面临着较大的水患威胁，因此，昏官湖外有南堤屏障，荒谷水以南则有江堤阻挡。不过，南北朝时期关于“天井”的传说尚未与水神相联系，而是与兵寇有关，盛弘之《荆州记》称：“江陵县东北十里有天井台，东临天井。井周回二里许，中有潜室，人时见之，辄有兵寇。”^②

北宋的《太平寰宇记》与南宋的《舆地纪胜》均转引了盛弘之《荆州记》有关天井的记载^③，但前书在转引《荆州记》后，又添加了唐代《渚宫故事》的内容：“《渚宫故事》云：江陵城东二十里有天井，周回二里，其深不可测，旱而祷之，即大雨时至。”从南北朝至唐代，天井的传说经历了从事关兵寇到祈雨止旱的转变，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困扰江陵地区的主要问题是战乱与干旱；而《太平寰宇记》增加《渚宫故事》的相关记载，折射出北宋初年本区的气候与唐代大体相当，偏于干旱。

与宋代的记载相比，明代以后江陵县天井的传说发生了变化：天井有了“海眼”，且与大江相通。如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称：“八角井在县东，相传井底有海眼通江。”到了清代，记载进一步发生变化：时人已认识到“海眼”通江的现象，多以石封住“海眼”，以期隔绝天井的通江之路，减轻水患。如顺治《江陵志余·志水泉》“八角井”条称：“八角井在城东，下有海眼通江，观泉水之增减识江流之消长，后人作石塔镇之。”光绪《续修江陵

① 参见前揭《湖北水利志》第四章“湖泊”，第135页。

② 转引自前揭《汉唐方志辑佚》，第208页。

③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东天井”条载：“盛弘之《荆州记》云：在天井台之东，井周回二里许，深不可测。中有潜室，人时见之，则见兵寇，祈之多验。”《舆地纪胜》卷六四“天井澆”条称：“《江陵志》云：在府东二十里。盛洪之《荆州记》云：在天井台之东，周回三里，其深不可测。”

县志》卷三《方輿三·山川》“双井”条亦称：“双井在鹤穴^①彭家城南里许，两井相距仅数尺，旧传泉与江通，江涨时滫然涌腾，土人惧浸溢田禾，用二大石封之。”

上述有“海眼通江”的“井”，或在郝穴，或在江陵城东。

郝穴曾是荆江北岸重要的分流穴口之一，元代以前淤塞，元明两朝或开或塞。随着明中叶以后农田垦殖的扩展，郝穴在明后期终塞不开（详见本书第三章）。郝穴堵塞以后，新垵堤、龙二渊堤等为该河段的重要堤防，由于郝穴河弯为迎流顶冲河段，且河道中洲滩发展较快，受到江水冲刷剧烈，堤岸时有崩坍。

江陵城东地区，自古以来受到汉水水患的影响。学者多征引《唐会要》卷八九“凿疏利人”的相关记载说明这一点：“（贞元）八年三月，嗣曹王皋为荆南节度使观察。先是，江陵东北七十里废田旁汉古堤坏决，凡二处，每夏则为浸溢。皋使命塞之，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钟。”^② 根据研究，“每夏”给江陵东北带来“浸溢”的这一旁汉古堤决口可能在今荆门市沙洋一带。^③ 明中叶以后，随着江陵东北地区垸田的大量开发，汉水分流的影响更为突出。^④ 同时，县东一带汇聚了众多湖泊，明中叶以后，湖群呈逐渐扩大之势，至迟在乾隆时达到顶峰，一旦汉水泛涨，这些湖泊则相助为害，影响较大。

正因为明代以来郝穴与江陵以东地区的水患之忧愈来愈重，才出现了井底有海眼通江、以石封锁海眼等传说。在古人的想象中，“以为大地沦陷是地面上有很多的漏眼；地不但像冰块，却也像破船，有时在漏眼里会渗进洪水使全船覆没。于是，便得用许多的东西像塞漏眼似地来‘镇海眼’”^⑤。

“镇海眼”传说的出现也与古人担忧陆地会因洪水来袭而沦陷

① 即郝穴，详参本书第三章。

② 《唐会要》卷八九“凿疏利人”条，第1922~1923页。

③ 参见前揭《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三章“汉水中下游古代堤防考”，第185页。

④ 上章已述，此略。

⑤ 参见前揭《中国的水神》第十三章“浮山与海眼”，第148页。

为湖泽有关，即所谓“沧海桑田”。^①就明清时期的堤防记载而言，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详细程度上，江陵城东地区的堤防都无法与荆江堤防相提并论，全县的堤防建设重点尽在沿江一线。在堤防未能完善时，每一次洪水都有使田亩沦为湖泽的危险，尤其在明中叶以后，沿江堤防连成一线，人们担心江堤溃决的忧虑更是与日俱增，清人在方志中添加石锁海眼的内容，便是这种忧虑的反映。如八角井，嘉靖时只是“海眼通江”，顺治时则已“作石塔镇之”。又如郝穴，清代虽然不再分流，但其河弯变化较大，当地人惧怕江涨时洪水“浸溢田禾”，故以大石封堵双井，锁住这两个“海眼”。^②

同时，从明代方志仅称井底有海眼通江，到清代方志进而描述时人以大石镇锁海眼、保护农田，也反映出清代江陵县的农田垦殖面积较明中叶时已有较大的增长。

（七）穀神庙

穀神，或可称“雷穀神”，仅见于监利县。

穀神的传说初见于明代，内容却可溯及宋代。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监利》“车水湾”条称：“车水湾，在县东三十里，宋时江水泛涨，堤岸冲决，忽夜雷雨大作，明日有司往视之，得雷车穀木于堤上，水势籍卫，堤不颓坏。又名车水堤。”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车木堤”条复称：“宋末大水决堤，夜大雨，明日得雷车穀于堤上，邑人循穀迹为堤，至今赖之……堤傍有龙渊、鱗穴。正德中，布政使周季风筑堤于渊外，长百余丈。”对比两条记载，可见穀神传说循着“穀迹”在发展。明代的传说中，堤防凭借雷车穀木防护得以不坏；清代的传说发展为循穀迹筑堤，扩展堤防，而不仅仅是凭借雷车穀木就足以护堤，而且清人已经认识到该段堤防的隐患所在：“堤傍有龙渊、鱗穴。”清人记载的变化清晰地反映出当时车木堤的扩展以及监利县东江堤的发展轨迹。

^① 参见前揭《中国的水神》第十三章“浮山与海眼”，第142、146页。

^②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三《方輿三·山川》“双井”条。

明清时期，监利河段所在的下荆江处于河曲发展阶段。河曲发展对堤防修筑的影响很大，堤防不得不面对河道频繁摆动带来的冲击，陷入累遭冲刷、屡溃屡筑的困境。清代，车木堤所在的上车湾时常崩坍^①，甚至出现裁弯，直至20世纪后期，这种状况仍然出现。^②“雷车穀木”的护堤之功在堤防不断发展的清代得到神化，正是明清时期河势变化的反映。

（八）黑神庙

黑神庙在监利县西门外，“相沿日久”，却因祀典不载而不知其来由。或推测其为《大荒东经》暨《海外经》所注之北海神禺强。“长江自蜀岷而来，澎湃浩衍，腾牵奔注，至邑城南渚，忽折而西，与汉合流，绕城北迤邐而东。当未筑堤防以前，邑之西门外，固江汉会合处，神之祠实临其冲，稽诸形貌，相厥事势，则神为禺强氏无疑也。土人承袭祀事，岁久迹湮，习其称而忘其名耳。”^③

黑神庙所在，与监利县西二里之庞公渡相近。^④庞公渡分流江水，下注汉水^⑤，庞公渡分流时，黑神庙正当其冲，以镇水患；庞公渡堵塞后，原先因分流造成的水患逐渐减轻，黑神因此告退，岁久渐被人淡忘。

二、人格神类

此类崇拜对象广泛，从被神化的关公，到治水有政绩的地方官。主要祠庙有关帝庙、萧公庙、晏公庙，清源真君祠和许仙观，杨泗庙、高季兴祠、倪福可庙、谢公庙、何了公庙，以及二圣寺、普济寺、定江寺等。

① 同治《监利县志》卷三《江防志》“车木堤”条称车木堤即“今上车湾”。

② 参见前揭单剑武等《长江中游监利河段河床演变分析》。

③ 本段参见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监利县·民祀》“黑神庙”条。

④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关梁·监利》“庞公渡”条。

⑤ 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山川》“夏水”条。

（一）关帝庙

关帝信仰由来已久。宋代以降，关帝屡受官府封赐，地位崇圣。关羽又因曾长期驰骋于本区、无敌于天下而倍受本区崇祀。明清时期，关帝庙、关帝行宫、关公庙、关王庙或关王祠等普遍建于荆江两岸地区。关帝职掌范围甚广，此仅考察其水神司职。^①

1. 江陵县

作为府治的江陵县，明代建有三座关帝庙：一在公安门内，成化间（1465—1487年）指挥谭瓚修建，弘治间（1488—1505年）指挥张重修；一在掷甲山，都指挥李英重修；一在石马头。^②按：公安门在江陵城东南（见图5-3《清乾隆年间江陵县捕厅图》^③）；掷甲山，在龙山门之西北隅，接江陵府城^④；石马头，即马头，明代在县西南七里^⑤，清乾隆时已成为古迹。乾隆《江陵县志》卷二三《名胜一·古迹》称，马头在城西南，“江水由此灌入白河，亦古大市也，因洲淤河隔，估客难通，故废”。可见，马头距江不远。明清时期，洪水时常从城西北侵袭江陵城，掷甲山一带正为拱卫县城之要地；城西南的堤防素为护城要堤，明代荆州府谣谚“水来打破李家堤，荆州便是养鱼池”^⑥即可证之；城东南的公安门亦属护城重地。于此三地建关帝庙，当然是祈求关帝显灵护卫城池。

① 关于关公信仰与两湖平原自然灾害的关系，王蕾曾有探讨，参见其硕士学位论文《明清时期两湖平原的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第三章“人物神信仰及其它”，武汉大学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祠庙·江陵》“关帝庙”条。

③ 据乾隆五十九年《江陵县志·江陵县捕厅图》绘制。

④ 万历《湖广总志》卷四《方輿三·山水考·江陵县》“掷甲山”条。又，顺治《江陵志余·志陵陆》“掷甲山”条称，山在城西北隅。

⑤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关梁·江陵》“马头市”条。

⑥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江陵》“李家埠堤”条，湖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元年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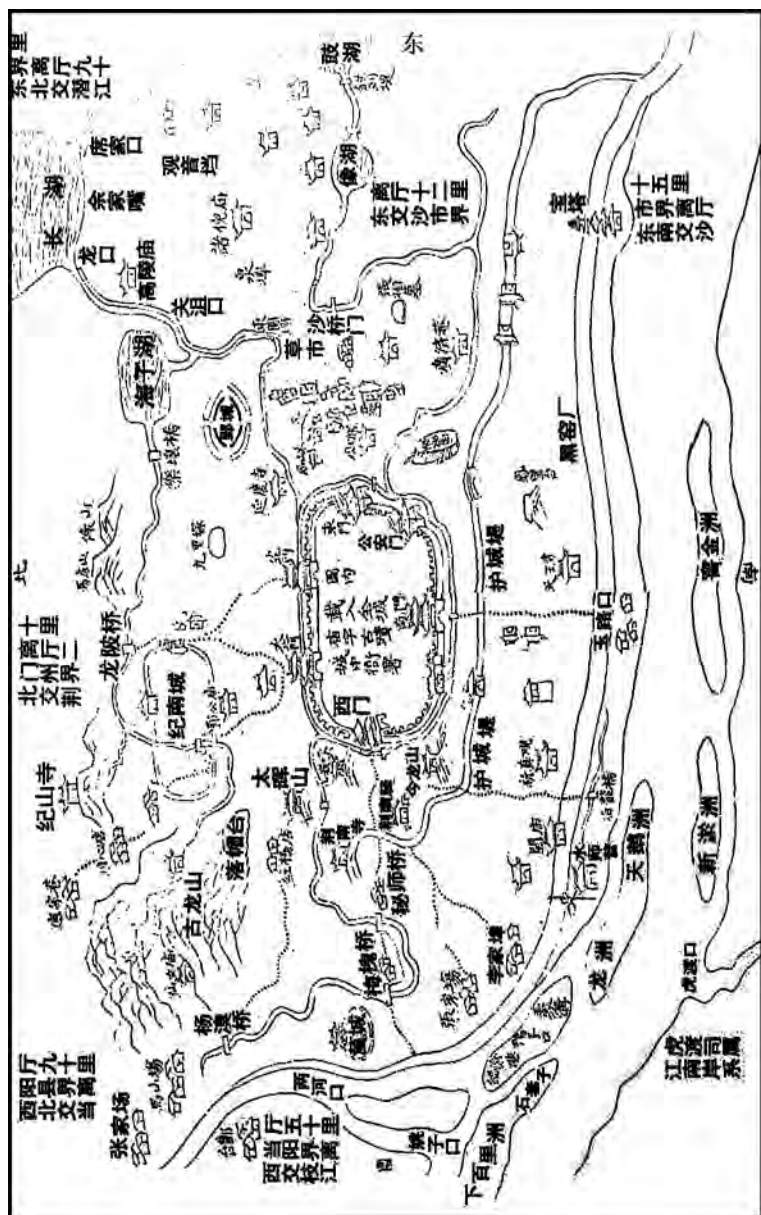


图5-3 清乾隆年间江陵县抽厅图

清代，荆州地区的关帝信仰进一步上升，主要体现为官府对关帝的封赐增多与关庙的不断修建。

首先是封赐次数明显超过前朝。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典祀》“关帝庙”条可见，汉代关公仅享“汉寿亭侯”的封号，而清代顺治、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同治等朝，关公不断得到赐封，封号超过二十字，并在咸丰四年（1854年）升入中祀，地位日隆。

同时，本府各县关帝庙的修建亦较前显著增加。在府治江陵县，雍正时于草市和南门内各增一座关帝庙。^①草市，在城东四里，“东连漕河，南通沙市”，乾隆时这里“舟楫往来，居民辐辏”，与沙市并为江陵诸市之“最大者”。^②草市还是江陵县东北的重要堤防——襄河堤的起点，乾隆时襄河堤沿线分布着一百多座垸堤，是江陵县的重要产粮区。关帝庙建于草市，既可守卫府治，又可守护垸田。此外，选择与大江对峙的南门内重建关帝庙，还因为庙址即“帝督荆州时府基”^③，希望以此更增添关帝的震慑力。

乾隆以后，江陵县又新修了多处关帝庙，光绪《荆州府志》称：“诸县境城市、乡镇，庙祀殆遍，不尽载。”^④其中，嘉庆元年（1796年）在府城北门内和东门内将军署前即万古楼分别新建了两座关庙。^⑤而在荆州堤防的重中之重——万城堤沿线，分别于万城内堤脚、上方城堤内江面与文村堤内江面修建了三座关庙，万城内堤脚的一座称为“镇堤关庙”。^⑥

通过上述有明确记载的关帝庙资料可以看到，明代仅公安门内有一座关帝庙；清代，新建关帝庙多座，或分布于江、汉的堤防要

① 雍正《湖广通志》卷二五《祀典志·荆州府》“关帝庙”条。

② 乾隆《荆州府志》卷一九《乡镇·江陵县》“草市”、“沙市”条。

③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典祀》“关帝庙”条。又，该条记载并不以南门内之关帝庙为新建庙，而称其为明初修建，清代重修。

④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典祀》“关帝庙”条。

⑤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典祀》“新关庙”、“关帝庙”条。又据乾隆《江陵县志》卷首《府城全图》，将军府在东门内。

⑥ 《荆州万城堤志》卷三《建置·祠宇》。

地，或分布于府城各城门内，其中，公安门、南门、北门、东门内均有关帝庙，西门内虽无新庙，但西门外除了掷甲山老庙外，万城堤沿线的三座新庙中就有两座（万城内堤脚与上方城内江面）“镇守”城西，直接在城外祈神佑城。另一座建于草市的新庙距东门很近，则可“兼顾”城东及草市一带地区。

从上述记载中还可见，清代荆州府更重视在府治各城门内修建关帝庙。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清代以来荆江的水患日趋严重，江陵城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洪水冲击，洪水多次冲毁堤防，侵入城内，尤以城西北至城西南的堤防最为吃紧。上文多次提及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大水冲决万城堤至玉路口堤二十余处，冲开江陵城西、北两门，造成全城巨浸。这次的惨痛水灾，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嘉庆元年（1796年）北门内修建新关庙即与此次大水直接相关。新关庙落成时，巡抚汪新撰写碑文道：“往者岁戊申（按：即乾隆五十三年），岷江涨，郡城六门闭，水入，不能出，阨积弥高，万姓累累且待毙。仿佛见神光扶东门，城裂若刀划，数十万生灵得免为鱼。”^①极力渲染关帝守卫东门之神威。

但明伦亦撰关庙碑记，描述关帝的佑城之功：

万城堤者，荆州全郡之屏蔽也，俯翼郡城，尤为唇齿。堤绵亘二百余里，大抵鳞次栉比，皆扼江之冲……六月中旬，江流骤涨，逼万城堤下，官民各工以险告，城中文武诸君分驰保护，余则择险要者任之，仍往来董率。二十日，中方城堤报险。驰视之，则内堤已坍丈许，下有漏孔，大可二三寸，疾加填筑。子堤忽横裂成缝者数处，表里洞彻，江水入，啮之，已舂撞有声矣。内堤漏孔益刷，宽至二三丈，水喷激如箭，色浑而挟沙，势横逆不可遏。俄而老子堤相继颓圯者二十余丈，与江水平，急率徒役以土益之，增筑其外，凡两昼夜，始高出水面。方惶遽间，内海面同时倏陷数坑，浑水突射如前孔，此塞

^①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典祀》“新关庙”条。

则彼涌，此筑则彼陷。或曰：“殆蛟龙异物凭焉？”或曰：“此泉脉也。”霖雨又继之，积旬不止，皆相视失色，村民狂走，号哭欲去。唯幸此日无风，新筑处俄陷一坑，始知内渗所由。募人探之，得其实，急下絮、豆塞之，内渗始绝。外筑者亦坚实，堤卒以全。皆称为万城堤数十年无此险者。事平，吏民议曰：“堤之全，非独人力，盖亦有神助焉。”按：万城来福寺，旧祀真武帝，基宇甚隘，曷建中方城？又兹郡者，圣帝昔尝治焉，灵爽凭依，最为赫濯，御灾捍患，屡著奇迹，曷并崇祀、用昭呵护？众咸以为然。自官吏至居民，相与捐镪成之，以壮庙貌，答灵贶焉……①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但明伦将守堤之功尽归关帝，却忽略了自己多处提及的堤防建设以及全民的积极抗洪。而设庙于要堤之处也是清代本府关帝祠祀的一大特点。

2. 枝江县

关帝是枝江县最主要的水神。明代时，枝江县有三座关王祠：一在县西，知县李智建，正德间（1506—1521年）知县成斐重建；一在城外沙陀之滨；一在城西隅。②

乾隆时，县境内的关帝庙增至七座：一在沙陀，“即今春秋祭祀之所也”；一在距城八里的涘洲；其余五座分别在距城十五里的关洲，距城五十里的董市，距城六十里的王大人河，距城七十里的上百里洲曹家河，距城一百一十里的垛子堰。③与明代比较，此时期关帝庙分布的一大特点是向江心洲扩散。

乾隆以后，除了沙陀、董市两处关帝庙外，其余皆称关帝庙乡祠，共九处，其中涘洲、关洲、縊洲各有一座，上百里洲宁白总和萧罐总各一座。光绪时，九座关帝庙乡祠“惟董市、射垛堰数处

①（清）但明伦：《中方城新建祖师真武大帝庙暨崇祀关圣帝君碑记》，见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五二《艺文·碑记》。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祠庙·枝江》“关王祠”条。

③ 乾隆《枝江县志》卷二《建置志·寺庙庵观》“关帝庙”条。

存，余多圯”^①。

3. 松滋县

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松滋县南六十里建有关王庙，雍正十一年（1733年）邑人赵正学重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邑人赵全瑚增修。^②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知县陈麟在县治东修建了关帝庙，雍正五年（1727年）知县李鼎重修，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时任知县王潮和张统绪再度重修。^③

4. 公安县

明代，公安县有两座关王庙：一在西辛村井子铺街，洪武间（1368—1398年）湘献王重修；一在县治西关外，正统八年（1443年）知县俞雍重建。据前引成化《重刊公安县志》之《公安县治图》，西辛村在县治西南、虎渡河左岸，可见二庙均在县治以西。西辛村关王庙建于元朝或更早，洪武时重修，很可能是元明之际的虎渡分流对县治造成了威胁。

明末崇祯时，举人戴名世在斗湖堤修建了关帝庙，清乾隆和道光时两次重修。^④

5. 石首县

县治以南建有关帝庙，雍正十年（1732年）知县张坦重建，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县柯瑗再增建崇圣祠。^⑤此外，乾隆时，在米市、大南门外、龙盖山峡、鸟宿洲等处均建有关帝庙。^⑥其中，米市之关帝庙由县人张允缉修建。米市靠近江堤，后为水冲决，市渐废^⑦，而关帝庙则历险而存。据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

①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枝江县·民祀》“关帝庙乡祠”、“关帝庙”条。

②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松滋县·民祀》“关王庙”条。

③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松滋县·典祀》“关帝庙”条。

④ 同治《公安县志》卷二《营建志·祠宇》“古关帝庙”条。

⑤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石首县·典祀》“关帝庙”条。

⑥ 乾隆《石首县志》卷三《建置志·寺庙》。

⑦ 乾隆《石首县志》卷三《建置志·东门市》。

年)“北堤溃,诸神祠悉圯,惟关庙归然独存”。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六月,“江涨,堤复险”,传说“居人见帝驰骤江滨,水即定,堤得复完,随倡议重修”^①。受米市旧街崩坍入江的影响,乾隆时的商人迁入县南五里的黄金堤进行贸易,黄金堤市兴盛起来,号称“山陕川广贾客鳞集”^②。同治时,黄金堤市北堤上新建起关帝庙。

同治时的石首县在调弦口以西建有新关庙;另一座关帝庙距县治五里;前述乾隆时原有的四座关帝庙则仅见大南门外和龙盖山峡的两座。^③

本地的关帝庙有一个特点,它们驻守在水路交通的要道,保护着当地的贸易。

6. 监利县

监利县有两座关帝庙:一在保和门外;一在北关外。^④保和门,县治北门之一^⑤,可见二庙均建于县治以北。二庙当建于康熙之前,康熙年间(1662—1722年)知县郭徽祚曾重修保和门关帝庙。^⑥

监利县的两座关帝庙皆建于县治之北,与太马河南岸的太马垸有关。

太马河,由县西二里的庞公渡分江流,绕县治西、北转鸡鸣渡东注沔阳。太马垸在县治以北、太马河南岸^⑦,太马垸,康熙时其垸产“民粮万石余,屯粮称是”^⑧,同治时更是“居邑赋半”^⑨。两座关帝庙修建于此,用意显而易见。

① 乾隆《石首县志》卷三《建置志·寺庙》“关帝庙”条。

② 同治《石首县志》卷二《营建志·市集》“黄金堤市”、“米市”条。

③ 同治《石首县志》卷二《营建志·寺庙》。

④ 康熙《监利县志》卷三《学校志·附载诸祀》“关帝庙”条。

⑤ 见同治《监利县志·监利县舆图》。

⑥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典祀·监利县》“关帝庙”条。

⑦ 见同治《监利县志·监利县舆图》。

⑧ 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舆志·堤》。

⑨ 《重筑吴家剅堤记》,见同治《监利县志》卷一一《艺文志·记》。

关帝庙外复建关帝行宫，这是监利县独有的。关帝行宫在县西四十里的堤头，建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行宫的修建与其所在堤防的隐患直接相关：“天启三年，堤决成潭，周穴七里，深十数丈，传有异物，虑为堤患。康熙乙卯岁（按：即康熙十四年），贝勒王总督蔡驻营兹土，捐修大关庙于潭前，已圯。庚申（按：即康熙十九年），知县程藻重修。”^①

其实，县西四十里的堤防，便是监利县的要堤黄师堤。上文已述，明嘉靖以来黄师堤一直是本县的重点修防对象，对监利举足轻重，全县为此长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清代，随着防洪形势的日益严峻，人们更筑“行宫”，自是希望关帝能常常出行至此，以镇水害。

（二）萧公庙与晏公庙

萧公是来自江西的水神，清代在荆江地区落户。

关于萧公，清代志书多称：神姓萧，名伯轩，宋末新淦人；其子祥叔，元朝人；其孙天任，明永乐时人。三人皆有灵异，并为神，敕封为水府通灵广济显应英佑侯。^②

枝江县萧公庙，乾隆时有三处：一在北门外，建于明初，清雍正二年（1724年）县令陈德荣重修；一在董市港口，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重建；一在距城十五里的洋溪上街。^③

萧公庙又名“水府庙”。

光绪四年（1878年），枝江张志绪等重修董滩口水府庙。^④董滩口位于百里洲的上游^⑤，其安危直接影响到百里洲。当地水府庙

① 康熙《监利县志》卷三《学校志·附载诸祀》“关帝行宫”条。

② 顺治《江陵县志·志裡祀》，乾隆《江陵县志》卷五《建置二·坛庙》，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江陵县·民祀》等“萧公庙”条。

③ 乾隆《枝江县志》卷二《建置志·寺庙庵观》，同治《枝江县志》卷五《秩祀志·民间丛祠》“水府庙”条。

④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枝江县·民祀》“水府庙”条。又，据乾隆《枝江县志》卷首之《枝江县上下百里洲图》，董市与董滩口相邻，故董市水府庙与董滩口水府庙当为一庙。

⑤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三《水利二·枝江县堤考略》。

曾两次重修，都与当时的环境变化有关。前一次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荆江洪水之后，后一次则距道光十年（1830年）的由“南江北沱”向“沱胜于江”的河势巨变不远，尤其是道光时的江沱易道^①，给当地的影响较为长久。

石首县的水府庙在摇铃岗下^②，即县治小南门外（见图5-4《清乾隆年间石首县西乡图》^③），由于县治紧邻荆江由西转而东流的大河弯，故此庙所在对县治非常重要。同治前后，商人参与修建了石首另一座水府庙，庙址选在招商河。^④招商河即焦山河，在县东六十里，调弦分流经焦山注入华容县，至迟在乾隆时焦山河已更名为招商河。^⑤招商河名的出现，表明当时县东一带的贸易相当活跃，商人们于此建水府庙，显然是希望华容河能安流，但也反映出当时的华容河并不安流。与本县的关帝庙分布类似，水府庙亦置于水路交通的要道，保护着商人与贸易。

监利县，萧公庙建于江上。^⑥

江陵县亦有萧公庙。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他县简单移植外来萧公神的做法不同，江陵县试图将江西萧公与本地“萧王”相结合。顺治《江陵志余·志裡祀》“萧公庙”条在讲述萧公神的来历后，刻意强调“西江萧姓者”多以新淦萧公为宗，而本地萧公庙应祀南朝梁萧憺：“憺于天监中刺史荆州，旱祷天井而龙见雨注，水效王尊而江退堤立，一茎六穗，瑞应嘉禾，即以为神也，而祷祀焉，其谁曰不宜？”此说主导了其后修撰的本地志书对萧公庙的认识。

萧憺事，《南史》卷五二《始兴忠武王憺传》有详细记载：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

② 乾隆《石首县志》卷三《建置志·寺庙》“水府庙”条。

③ 据乾隆元年（1736年）《石首县志·石首县西乡图》绘制。

④ 同治《石首县志》卷二《营建志·寺庙》“水府庙”条。

⑤ 乾隆《石首县志》卷二《方輿·山川》“焦山河”条。

⑥ 康熙《监利县志》卷三《学校志·附载诸祀》“萧公庙”条。

天监元年，加安西将军，封始兴郡王。时军旅之后，公私匮乏，憺厉精为政，广辟屯田，减省力役，存问兵死之家，供其穷困，人甚安之。是岁嘉禾生，一茎六穗，甘露降于黄阁。四年，荆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长二丈出绕祠坛，俄而注雨，岁大丰……

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坏，憺亲率将吏，冒雨赋丈尺筑之，而雨甚水壮，众皆恐，或请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独何心以免。”乃登堤叹息，终日辍膳，刑白马祭江神。酹酒于流，以身为百姓请命，言终而水退堤立。邠洲在南岸，数百家见水长惊走，登屋缘树。憺募人救之，一口赏一万。估客数十人应募，洲人皆以免，吏人叹服，咸称神勇。又分遗诸郡遭水死者给棺槨，失田者与粮种。是岁嘉禾生于州界，吏人归美焉。^①

萧憺在荆州的确惠政颇多，其效王尊“以身为百姓请命”的气概令后人景仰，而“水退堤立”的成效更为后人赞叹，所以顺治《江陵志余》感慨，以萧憺为神，“其谁曰不宜”？在这感慨的背后，是当地千年以来付诸堤防建设的艰辛。萧憺之后，无数的地方官员与当地民众长期致力于堤防建设，但日益汹涌的洪水使得他们的努力时常付之一溃，人们是多么祈盼“水退堤立”、“嘉禾生于州界”与“岁大丰”的景象常现，即便是“欲身塞河堤”亦在所不辞。

晏公是又一位来自江西的水神。神名戍仔，江西临江府清江镇人^②，“为元文锦堂局长，登舟尸解，立庙。明洪武初，以其阴翊海运，封平浪侯”^③。

萧、晏二公在明时期已不限于江西，而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

① 《南史》卷五二《始兴忠武王憺传》。

② 参见前揭《中国民间诸神》丁篇“晏公爷爷”，第353页。

③ 乾隆《荆州府志》卷七《坛庙·江陵县》“晏公庙”条。

水神^①，但直到清代才在荆江现身，当与明中叶以后荆江沿线的环境变化有关。如沙市河弯，明代时曾有镇流砥，突出江面数十丈，水流至此，水势变缓，对黄潭堤的冲刷有所减轻，“沙市之地可保”。^② 顺治时，镇流砥已“崩为州屿”，其后更是“荡然无存”。^③ 从沙市河弯黄潭堤的防洪形势来看，嘉靖以后要抵御江流的剧烈冲刷较前更为艰难。据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记载，明洪武至正德年间（1368—1521年）黄潭堤共溃决五次，期间，知府李文仪曾首创荆江护岸工程，沿堤砌石，知府姚隆也曾增筑月堤三处约千余丈；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和万历十九年（1591年）复决；清康熙二十年、二十一年（1681年、1682年）又连续决堤。根据记载，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大水致“民之溺死者不下数万，其他房屋、畜生无算”^④；康熙时的不断溃决则使“室庐荡尽，或身饱于波臣，或田归于沙压，背乡井者已不可问”^⑤。水灾屡发，仅凭江渚已不足镇守沙市这个“百货充牣”、“万舫鳞集”^⑥的大市镇了，于是人们请来外地的水神助威。萧神到来之后，又发生了“本土化”改造，萧憺取代了新淦萧公，反映的仍是本地人们的愿望。

（三）清源真君祠和许仙观

清源真君祠和许仙观所祀之神是赵昱、许旌阳（逊），此二位能成为水神，不仅与他们作为地方官有功于当地相关，还因为传说他们具有入水斩蛟、平定水患之“异术”。据黄芝岗先生研究，赵、许二氏的“神迹”脱胎于《水经注·江水篇》中李冰化牛斗

① 参见前揭《中国民间诸神》丁篇“晏公爷爷”，第356页。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江陵》“镇流砥”条，湖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元年刻本。

③ 顺治《江陵志余·志水泉》，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三《方輿三·山川》“镇流砥”条。

④ 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堤防考略》。

⑤ 康熙《荆州府志》卷八《堤防·胡在恪堤防考略》。

⑥ 乾隆《荆州府志》卷一九《乡镇·江陵县》“沙市”条。

江神的传说。^①《方輿胜览》记载赵昱成神的原因称：

赵昱，尝隐青城山，隋炀帝起为嘉州太守。时犍为潭中有老蛟为害，昱率甲士千人，夹江鼓噪。昱持刀入水，有顷，江水尽赤。昱左手执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隋大乱，隐去，不知所终。后嘉陵水涨，蜀人见昱青雾中骑白马，从数猎者于波面过。太宗赐封“神勇大将军”，庙食灌江口。^②

对赵昱的祠祀始于唐代，江陵县的清源真君祠则见于明朝初年。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祠庙·江陵》：“清源真君祠在新东门内。唐时，神除害救民，因立祠祀之。本朝洪武修，弘治间被毁，正德初间重修。”清代，清源真君祠一直在新东门内。

许旌阳斩海昏大蛇的传说早在唐代就已流行，宋人沿袭其说：“许逊，南昌人。太康元年为蜀旌阳令，师事女真谶母。永嘉末，海昏大蛇断道，遂仗剑斩之。宁康二年，四十二口与鸡犬皆上升。今封为真君。”^③除了斩海昏大蛇，许逊为旌阳令时，还以“神方”为疫民治病，蜀民德之。^④

江陵县祠祀许旌阳的记载初见于明代，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江陵县下“许仙观”条称，观在郝穴，建于南宋咸淳间（1265—1274年），“晋许逊修炼于此，遗迹犹存”。万历《湖广总志》的记载与此一致。清初，明志书的记载遭到质疑。顺治《江陵志余》云：“据传，旌阳捕斩蛟蜃，往来江上，有功于民也，说者遂谓真君修炼于此，谬矣。”其实，明人何尝不知许旌阳斩蛟之说，当初记录下许旌阳的遗迹也就是与此说有关，否则，何需借助

① 参见前揭《中国的水神》第四章“二郎神的演变”、第六章“江西和四川的沟通”。

② 《方輿胜览》卷五二《嘉定府·名宦》，第941页。

③ 《方輿胜览》卷一九《江西路·隆兴府·人物》，第342页。

④ 黄芝岗先生已有研究，参见前揭《中国的水神》第六章“江西和四川的沟通”，第58页。

孙仙的功力来镇守郝穴，为本地除害？明末崇祯时，郝穴江岸坍塌，许仙观受到牵连，遂移至郝穴镇唐家湾。^①郝穴堤，明代又称新开堤，清时嫌“新开”一名不吉利，更名为“新垵堤”。^②可见，清人之所以力陈许旌阳的斩蛟之功，实在是因为看到了郝穴河弯的严重冲刷。顺治以后的志书均承袭了《江陵志余》的说法。

（四）杨泗庙

杨泗（四）是本区崇祀的另一位斩蛟英雄。宋人有关杨泗的传说相当丰富，其中之一称：杨泗将军生于宋代的长沙，他降服掀风鼓浪的无义龙，将此龙投入大井，从而平定水患，这一斩龙护国的功绩使其成为水神。^③

本区的杨泗庙主要见于江陵县和石首县。

江陵县的两座杨泗庙建于万城堤岸：一在下新垵堤内堤脚；一在古月堤内堤脚（见表5-5《清光绪年间万城堤部分水神庙分布情况简表》）。既建于堤内之堤脚，可见其寄希望于杨泗将军能斩尽激荡堤脚的众多“无义龙”。

石首县的杨泗庙初见于同治《石首县志》，据是书，杨泗庙有四处：一在显王庙以南，而显王庙在城南大堤旁（按：即黄金堤，见上文），因此该庙当距江不远；一在距县治五里的杨发河口；一距县治四十五里；另一处方位不详。^④

光绪时，上述四庙保存了两座：一在杨发河口；一在县城外“显王庙内”。^⑤既由显王庙南迁至了显王庙内，此杨泗庙当受到了黄金堤变化的影响。

杨泗早已成神，却在同治时才现身石首，似乎意味着这一时期的河势变化更为剧烈。

（五）何了公庙

何了公，元朝人，明代成神，是监利县“土生土长”的水神。

①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六四《外志四·寺观》“许仙观”条。

②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八《堤防志二·万城堤》“新垵堤”条。

③ 参见前揭《中国的水神》第一章“杨四将军与无义龙”，第1~6页。

④ 同治《石首县志》卷二《营建志·寺庙》“杨泗庙”条。

⑤ 光绪《荆州府志》卷二七《祠祀志一·石首县·民祀》“杨泗庙”条。

何了公庙的记载初见於康熙《监利县志》：“何了公庙在车湾。何公，监利人，辽宗藩请勅为顺江王，立庙，锡以仪卫。监邑前襟三江，后绕汉沔，故江渚诸神独著灵异有以也。”^①

乾隆时，上述记载发生了变化，乾隆《荆州府志》称：“何了公庙在车湾。公，监利人，明辽藩以其素有灵异，请勅为顺江王，锡以仪卫，至今远近争祀如故。”^②刻意强调何了公“素有灵异”，所以，“至今远近争祀如故”。

同治时，何了公的成神经历塑造完毕：“何公，元时瓦子湾人，行三，随父运粮，溺于水，后为神。辽藩以其素有灵异，请勅为顺江王，立庙，锡以仪卫，指挥使石庸监修庙宇。今庙在车湾，香火甚盛。蔡家洲亦有何王庙，道光八年重修。”^③据此，何公已被认定为瓦子湾人，在运粮途中溺水身亡，其灵异从车湾辐射至了蔡家洲。蔡家洲，在朱河汛，县东一百一十里，正是瓦子湾所在^④，而瓦子湾与车湾，皆为清代监利县河曲发展最盛的河段，直至今日仍是弯曲率较高的河段。

从瓦子湾到车湾，沿着何了公成长并成神的轨迹，不难感受到监利县东的河道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远近地区“争祀如故”的背后，是当地人们渴望得到本地“独著灵异”之神佑护的强烈愿望。

（六）二圣寺、普济寺

二圣寺、普济寺皆在公安县。

二圣寺，东晋太和三年（368年）由道安、慧远二法师建于公安县江滨，原名远安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改名兴化寺，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复称报恩光孝寺，不久更名为二圣寺，直至清代。由于河道南移的影响，明代二圣寺两次迁移，先徙

① 康熙《监利县志》卷三《学校志·附载诸祀》“何了公庙”条。

② 乾隆《荆州府志》卷七《坛庙·监利县》“何了公庙”条。

③ 同治《监利县志》卷二《营建志·坛庙》“何了公庙”条。

④ 光绪《荆州府志》卷一九《堤防志三·顺江堤》“蔡家洲”条，康熙《监利县志》卷一《方輿志·山川》“瓦子湾”条。

椒园，再移县治东南郭外。^①明嘉靖与万历时尚无二圣施威消除水患的记载，清同治时增添了这一内容，县志称：夏秋泛滥时，“崩溃陇岸，有司祷于二圣，见于云中现像，手执宝杵金环，于是水患寢息，民赖以安”^②。

清代，公安县水神庙分布的一大特点是较多的水神庙沿虎渡河进入邑内，“驻守”虎渡河两岸（公安县主要地名及其地望参见图 5-5《清同治年间公安县全境图》^③）。普济寺即为其一。寺在板桥里，太平口之东，斗湖堤右岸。明代这里有“三仙宫”，乾隆时已垦辟为田，但道光十九年（1839 年），“大水流一女神至此，里人于堤上建寺”^④。普济寺由废而建，折射出乾隆时虎渡河沿岸农田垦殖得到进一步扩展，道光以后水患对虎渡河沿岸的危害相当严重。

（七）高季兴祠与倪福可庙

五代高季兴与倪福可以及下文将述及的宋代谢麟等人，并不像关帝一样上升为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格神，也不像传说中的赵昱、杨泗等那样拥有斩蛟平患的“异术”，他们被立庙祠祀，是因其在当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特别是实际有过或被附会为有过治水的功绩，具有了佑护当地的人格神的色彩。

高季兴与倪福可有功于荆南，对二人的祠祀至迟在元代已有。

高季兴祠，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祠在江陵县通会桥西，“元末祠毁，碑碣今尚存”^⑤。没有提及祠祀的原因。但祠建于江陵城西，应与城西为“众水之会”、对府城有重要影响有直接关系。

万历《湖广总志》中，记载有了变化。其书称：高季兴祠在“县西通会桥西，季兴节度荆州，筑堤有功。并塑保融、保勗像，今呼土主庙”^⑥，明确提到了高季兴筑堤。

①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寺观·公安》，同治《公安县志》卷二《营建志·寺观》“二圣寺”条。

② 同治《公安县志》卷二《营建志·寺观》“二圣寺”条。

③ 据同治《公安县志·公安县全境图》绘制。

④ 同治《公安县志》卷二《营建志·祠宇》，光绪《荆州府志》卷二八《祠祀志二·寺观》“普济寺”条，并见图 5-5《清同治年间公安县全境图》。

⑤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祠庙·江陵》“高季兴祠”条。

⑥ 万历《湖广总志》卷四二《坛庙·荆州府·江陵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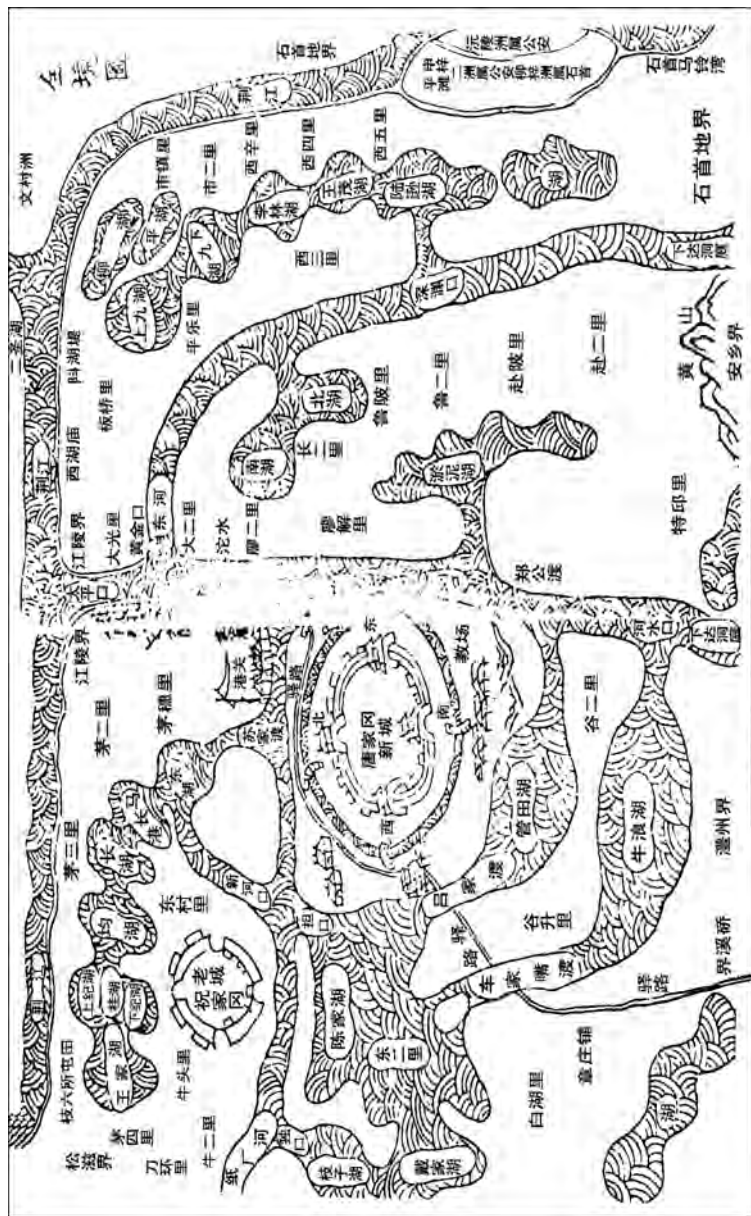


图5-5 清同治年间公安县全境图

明代两部志书何以会对高季兴祠有不同的记载？万历《湖广总志》的变化当源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关于监利县“高王庙”和潜江县“高氏堤”条的记载。据前条，“高王庙在县西北九十里，五代南平王高季兴据荆州，筑堤有功，故邑人祀之”^①。后条则称：“高氏堤在县西北五里，相传五代高季兴所筑，起自荆门州绿麻山，至县南沱步渊，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汉之水，民赖焉。”^②万历《湖广总志》将嘉靖《湖广图经志书》的两条记载合而为一，并将筑堤一事赋予城西的高季兴祠，显然是希望高氏能暗佑城西平安。倪福可庙，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称：庙“在县西五里，五代高季兴婿。季兴令筑内城，违期，怒夺其妻，福可并力而完，季兴喜，盛其装奁以遣还。后人以其功祀之”。万历《湖广总志》“倪福可庙”条的记载与嘉靖时的基本一致，以倪氏筑内城为祠祀的理由。同时，在二书的“堤防”部分，均称江陵县的寸金堤为倪福可所筑。^③对于江陵而言，这足以构成祠祀的理由，但在二书的“倪福可庙”条中却只字不提。就目前资料来看，倪福可筑寸金堤一事并无确切证据，很可能只是传说而已^④，正因为如此，明人才出现了上述矛盾的记载。

倪福可筑城一事，清人沿袭明代的传说并加以认可。康熙《荆州府志》卷二二《古迹》“子城”条：“子城，高氏内城也，在郡城西隅，倪福可所筑。《五代史》曰：江陵，当唐之末为诸道所侵，兵火之后井邑凋零。季兴招辑人士，大筑重城，民苦其役。”但清代方志在记述祠祀倪可福的缘由时，多将筑城与修堤并提，而不止筑城一事，如顺治《江陵志余·志裡祀》就称：“倪将军祠在城西五里，以福可筑城修堤有功，后人祀之。”

值得注意的是，高、倪二氏庙均建于城西，这暗示着宋元以前

①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祠庙·监利》“高王庙”条。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潜江》“高氏堤”条。

③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山川·江陵》，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二《水利志·荆州府·江陵县》“寸金堤”条。

④ 参见前揭《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中篇“堤防篇”第一章“从中唐到北宋”，第102~105页。

城西一带就筑有堤防，而明清对高、倪二氏的祠祀则意味着当时的水患已日渐加重。

（八）谢公庙

谢公庙在石首“县西六十里，祀宋谢麟”^①。谢麟，北宋中叶为石首县令，“县苦江水为患，堤不可御，麟叠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号‘谢公堤’”^②。

谢麟筑堤事在北宋，谢公庙的出现则迟至明代。像这类由地方官员演变为人物神的事例并不罕见，其历程往往达数百年，如川蜀李冰祠的晚出便与谢公庙十分相似。

李冰修都江堰事在战国时期，李冰祠的显应却迟至唐代。传说入唐以来，灌口地区一有水灾发生，李冰神便显灵保护。^③这一传说的由来与当地环境的变化有直接关系。自李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④，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⑤，有“天府”美称。但唐代以后，岷江地区水患明显加重。杜甫有诗云：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
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
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
终藉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寄希望于李冰神的显应。

同样，明代以后荆江水患日趋严重，仅仅依靠水利工程来防御

①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荆州府·祠庙·石首》“谢公庙”条。

② 《宋史》卷三三〇《谢麟传》。

③ 参见前揭《中国的水神》第四章“二郎神的演变”，第31~33页。

④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第七》。

⑤ 《水经注》卷三三《江水》。

⑥ 《方輿胜览》卷五一《成都府路·成都府·山川》“石犀”条，第908页。

已经不足以让人们心安，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向神灵乞求佑护，谢公庙因此应运而生。

不过，将谢公庙与李冰祠进一步比较，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二神祠背后的明显不同。

首先是灌县与石首县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灌县位于岷江中游，为岷江由山区转入成都平原之地，两岸有节点控制，河道摆动不致太大；虽然岷江上游有大量悬移质和推移质输送^①，但以粒径大的推移质为主，清淤、排沙相对容易。而石首县所在之下荆江河道长期处于摆动中，堤防修筑颇为艰难，不仅下荆江，整个荆江沿岸都难以长期保持堤防的稳固。而且，荆江承接了上游输送的大量悬移质与推移质泥沙，数量之巨非岷江一支流可比。随着上游开垦的增加，悬移质泥沙大量输往中游，悬移质与粒径大的推移质不同，难以输往下游，而是沉积于荆江河床。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使都江堰与谢公堤这两项工程的收效全然不同。都江堰可溉田数百万亩，从此彻底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谢公堤则随着河道的变化趋于废弃。

都江堰与谢公堤的功效大相径庭，还由于两者在工程技术、设施诸方面的高下悬殊。谢公堤只是较简单地适应河道变化；都江堰则是设计缜密、布局合理、人地水高度协调统一的宏大水利工程。

因此，李冰祠能遍及全蜀、李冰神传说不断衍生、影响深远的背后，实际是都江堰工程的千秋伟业。相比之下，石首河道变化频繁、筑堤困难、崩岸屡现、水患频发，此种情形下，“谢公”们的作用实在有限，所以谢公祠的影响仅限于石首一县，且无“显应”之迹。

将眼光放至整个荆江地区，可以看到，历朝历代的筑堤功臣都难以化身为了保护本区的神灵，无论是陈遵，抑或郑獬、张孝祥、孟珙、李文仪、赵贤等人，无一例外。他们之所以未能成神，并非其筑堤未成，而是堤工艰险、堤难坚固，很快销声匿迹。

那么，当像李冰一样既有惠政、又平定水患的赵昱、许逊成为

^① 参见四川省水利电力厅等《都江堰》第一章“自然概况”，第14页；第二章“都江堰的创建”，第48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年版。

了本区的崇祀对象时，李冰祠何以未传入荆江地区？看来，在本区人们心目中，要治理变化多端、险象环生的荆江河道，赵昱、许逊之类能入水斩蛟的“异术”，更具有丰富的想象空间。

（九）定江寺

定江寺在枝江县淞洋洲，据称建于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所祀之神为中山靖王之孙。^① 既建于变化多端的江心洲，又取名“定江”，立寺的意图显而易见。

定江寺又名“师祖庙”。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枝江县令赵善鸣与司理耿志伟、太守胡一鸿捐廉协修淞洋洲堤，称三公堤。^② 后人思赵令之德，“附定江寺，塑像尸祝焉，曰‘尸祝庙’，又以建在淞洲，庙讹作‘师祖庙’”^③。

从定江寺到师祖庙，从中山靖王之孙到赵善鸣，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反映的是堤防对枝江县的作用日益加重。

三、余论

通过以上讨论，不难发现，宋代荆江两岸见于记载的水神庙数量很少，且集中于江陵县；崇祀的水神以自然神为主，如江河、息壤、石牛等，人们对于这些神灵充满着敬畏。元明以后，荆江沿岸地区崇祀的水神逐渐以人格神为主，外地神灵也开始从四川、江西、湖南等地进入，水神庙逐渐增多；同时，水神的传说被添加上筑堤利民的色彩。清代，本区的水神信仰更趋多元化，对自然神与人格神的崇祀同步发展，不仅种类与数量明显增多，水神庙址的分布也以各县治为中心，向沿江或守护县治的险工段辐射。经过明清两朝的发展，荆江沿线的重要堤段和各县治周围均有水神驻守，重要的地点还出现了多个水神共同护佑的情形。宋代以降荆江两岸水神庙址的空间分布与变迁，体现了本区生态环境特别是人、地、水环境的变化，反映了本区治水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以江陵为重点、带动整个平原湖区的开发进程。

① 乾隆《枝江县志》卷二《建置志·寺庙庵观》“定江寺”条。

② 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三公堤”条。

③ 同治《枝江县志》卷五《秩祀志·民间丛祠》“定江寺”条。

具体到荆江两岸各个区县，水神庙址的空间分布与变迁又各有特点：

江陵县 元明以后，水神庙逐步围绕府城而建或直接建在城内；清代，水神庙以府城为中心，向万城堤或襄河堤的险工段辐射。清代的水神庙不仅分布于府城各门，而且尤以万城堤为修庙的重点地带。如表 5-5 所示，光绪时万城堤沿线建有数量较多的水神庙，在一些险工段，甚至出现了多庙集中的情形，如仅上、下新垸堤段就有四座庙宇，而古月堤内祠庙更是多达七座。在水神的传说方面，清代志书在明代的基础上有明显添加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此时的神灵或是降蛟龙功力强大，或是本地筑堤功臣的化身，无论水中、岸上皆可施展才能。此外，在水神庙的发展中，清代官府较多地参与了祠宇修建、赐额褒奖，与宋代有很大不同。

表 5-5 清光绪年间万城堤部分水神庙分布简表

| 庙 名 | 庙 址 | 庙 名 | 庙 址 |
|-------------------------------|--------|------|---------|
| 得胜寺 | 得胜台内堤脚 | 灵官庙 | 上柳林内海面 |
| 镇堤关庙 | 万城内堤脚 | 保安寺 | 下柳林内海面 |
| 老来福寺 | 下万城内海面 | 宗山庙 | 黄滩内海面 |
| 关帝庙、新来福寺 | 上方城内海面 | 观音寺 | 登南堤海面 |
| 古迹破庙 | 下独阳内海面 | 关庙 | 文村内海面 |
| 马头关庙 | 东岳庙内海面 | 镇安寺 | 龙二渊内海面 |
| 恭天观 | 上斗篷内海面 | 许仙观 | 上新垸内海面 |
| 龙王阁 | 杨林矶 | 三清殿 | 上新垸内堤脚 |
| 江神庙、沮漳神祠 | 中斗篷外海面 | 杨泗庙 | 下新垸内堤脚 |
| 马王庙、观音矶寺、泰山庙、镇江寺、新杨泗庙、御国祠、文星楼 | 古月堤内海面 | 九华寺 | 下新垸内海面 |
| | | 金果古刹 | 金果内堤脚 |
| | | 羊子庙 | 中孟家垸内海面 |
| 白衣庵、大慈庵 | 古月堤外海面 | 祠王阁 | 中斗篷内海面 |

资料来源：《荆州万城堤志》卷三《建置·祠宇》。

监利县 水神庙较多地修建在受河曲发展影响大的河段沿岸，车湾就颇具代表性，集中了数个水神庙；有的水神庙还建在了江上，如萧公庙，与江陵县的萧公庙址有明显不同，暗示着下荆江的河势变化比上荆江更为剧烈。在水神的起源方面，监利县拥有一些源于本地的特殊水神，如穀神、何了公神、萧姓天妃^①等；还有一些虽来自外地但在荆江两岸其他地区不见记载的神灵，如宗泽、欧阳将军等。^② 这些不同于荆江地区其他各县的水神的存在，其实正反映了下荆江有别于上荆江的环境变化特点。

枝江县 与该县江心洲较多、御江有特殊困难的环境特点相符，清代各江心洲上皆修建了水神庙，如上百里洲的二郎庙、杨泗庙、白马庙，下百里洲的江会寺（原为水府庙）、兴隆山庙，羊角洲的镇江庙、神龙观，等等。^③ 水神庙在江心洲上的扩散，反映出明代中后期以来江心洲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同时也面临着日趋严重的防洪困境。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下百里洲遭遇大水，其后修建兴隆山庙以镇压水势，乾隆时是庙尚“恃为砥柱”^④。在建庙的同时，各洲亦大量修筑堤防，为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后，下百里洲“堤塍港闸，次第修举”，乾隆时称：“至今桑麻禾黍，顿成沃野。”^⑤

公安县 除上文所述各水神庙外，在清代虎渡河左岸，市镇里另有椒园寺、梅园寺^⑥，鲁陂里有江渚庙、五王庙，赴陂里有黑神庙，特邱里有五显庙等；虎渡河右岸，茅穗里有永镇宫，谷升里有

① 乾隆《荆州府志》卷七《坛庙·监利县》“天妃庙”条。

② 乾隆《荆州府志》卷七《坛庙·监利县》“宗公庙”、“欧阳将军庙”条。

③ 乾隆《枝江县志》卷二《建置志·寺庙庵观》，同治《枝江县志》卷四《建置》。

④ 乾隆《枝江县志》卷二《建置志·寺庙庵观》“兴隆山庙”条。

⑤ 乾隆《枝江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下百里洲”条。

⑥ 同治《公安县志》卷二《营建志·祠宇》称：梅园寺在斗湖堤南门外，亦属市镇里；而二圣寺的旧址曾称为梅园、椒园，则此二寺当距江不远，并成为与二圣寺具有相同功能的水神庙。

乌龙观、三清观^①等（以上参见图 5-5《清同治年间公安县全境图》）。显而易见，清代公安县的水神庙沿着虎渡河两岸向县境内逐步深入，这一进程与同时期虎渡河两岸的开发基本同步。

本章小结

本章从聚落、自然灾害、日常生活、水神信仰等方面考察了宋代以降江汉平原的社会生活与环境演变。

对聚落、自然灾害、日常生活的研究围绕宋元时段展开。

宋元是江汉平原聚落发展的重要时期，聚落点增多、规模扩大，在空间分布上出现了较明显的分化、聚合与转移。影响聚落变迁的因素很多，本章着重分析了地貌、水文和自然资源因素：四面高、中间低的地势，使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在平原的周缘地带，中部低地的聚落规模较小、分布较稀、变动较强；水系发达、河湖交错使大多数聚落分布在江河沿岸，往往也是水运交通线旁；丰富的水产资源和矿产资源，使专业性聚落应运而生。宋元时期江汉平原聚落的发展变迁反映出当时当地的人地关系相对和谐，但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不利扰动的问题也开始出现。

宋元时期江汉平原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其中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最高、产生的影响最大。受地质环境、水系特征、气候条件及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灾害发生的时间规律与地域分布表现出夏季为高发期、平原中腹是集中地的特征。自然灾害对区域社会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不仅对农业生产、经济生活造成破坏，而且带来环境景观的变迁，并给民风民俗打上烙印。

宋代江汉平原的农村日常生活，在写实的宋诗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宋诗中所展现的农村生活，蕴涵着富有地域特色的环境特征，江汉平原河湖密布、地势低洼、气候温湿、水量充沛的地理特点与频繁多发的洪涝灾害，造就当地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从农村

^① 同治《公安县志》卷二《营建志·祠宇》“三清观”条称：“咸丰时大水，有长生观三清神像漂泊至此，里人建此观。”

日常生活的角度看环境变迁，不难发现，在宋代的江汉平原，土地、水和其他资源在人类社会中起着主导作用，宋诗反映的江汉平原农村日常生活正是当地人民顺应环境、理性选择的结果。

宋元明清时期，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强与生态环境的变化，江汉平原的水神信仰逐渐发生变化，本章以荆江两岸水神庙址的空间分布与变迁为例，考察了水神信仰的变迁及其所反映的人地关系演变。宋代以降，尤其是明中叶以后，荆江两岸的生态环境趋于恶化，修筑沿江堤防与境内垸堤的活动不断增加，水神庙址随之不断扩散；水神庙多分布于水患严重及环境敏感的地带，重要的地段甚至有“多神”佑护。水神庙址的变迁，正体现了本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特别是人、地、水环境间的关系及其演变。

结 语

本研究以正文五章的篇幅，探讨了两宋至晚清近千年间江汉平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与动态机制，并试图揭示本地区人地关系的主要特点及演化方向，为本地区当前及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可以凭信的历史借鉴。

一、历史时期江汉平原人地关系的演变大势

（一）旧石器时期至唐代的经济开发与自然环境

早在距今十多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江汉平原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对此提供了有力证据。1992年，在今江陵县距荆州城约五公里的荆城镇郢北村鸡公山遗址，清理出古人类的居住活动面，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石制品，是我国迄今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平原上的活动遗址。^①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更是多达数百处，分布遍及整个平原地区，较重要的如湖北江陵毛家山

^① 前揭刘德银《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湖北江陵鸡公山发现旧石器时代居址》。

遗址、荆南寺遗址、公安王家岗遗址等。遗址中发现的人工栽培水稻,显示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利用当地有利的气候、土壤、水域等自然条件从事生产,水稻的种植表明“江汉平原当时已有相当的排灌系统”^①。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气候的偏向干寒,或因雨量增大带来的输沙量逐渐增多,该时期江汉平原的湖泊面积有所缩小,洲滩平原相应扩大,为土地开垦提供了条件。为了在河湖交错的环境中生存,当地人们学会了从商周时的环城挖沟作埴以排水、护城,到春秋战国时的开挖沟通长江和汉水的人工运河^②,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迈出了一大步。对江汉平原自然环境演变起了重要作用的筑堤垦田活动,也可追溯到先秦时代。楚庄王时担任楚国令尹的孙叔敖推行“宣导川谷、波障源淥、溉灌坡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罍之利”^③的主张,收到了“治楚三年而楚国霸”^④的效果。

秦汉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推广,森林砍伐、兴修水利、垦殖农田等人类活动进一步发展,该时期江汉平原的社会经济呈现出“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也发展林、牧业多种经营”^⑤的特点。

经过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北方人口逐渐南迁,三至六世纪期间江汉平原的开发较以往有较明显进步,集中体现在筑堤围垦与开渠溉田两方面,人工堤防开始成为江汉平原经济开发的重要手段。同时,人们以“火耕水耨”为主的开垦方式,“使得地表水土大量流失,流域的产沙量增大,特别是来自坡面的细沙增多”^⑥。

① 李文澜:《江汉平原开发的历史考察(上篇)》,载前揭《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第47页。

② 参见前揭李文澜《江汉平原开发的历史考察(上篇)》,第49页。

③ (宋)洪适:《隶释》卷三《楚相孙叔敖碑》,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7~38页。

④ (汉)韩婴:《诗外传》卷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⑤ 参见前揭李文澜《江汉平原开发的历史考察(上篇)》,第51页。

⑥ 参见前揭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第三章“河道历史变迁”第一节“全新世以来长江河道的变迁”,第66页。

中唐以后,江汉平原接纳了大量移民,社会经济得到较显著发展。河湖水泽地区逐渐得到开垦,堤防修筑成为当地水利事业的一个突出现象,堤防日渐成为农田水利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同时,茶叶的大量种植改变了原生植被的状况。但从总体上看,唐代的江汉平原仍保持着较为和谐的人地环境,对当地威胁最大的洪水灾害的发生频率还比较低。^②

(二) 宋元明清时期的大开发与环境的变迁

北宋自仁宗朝后,江汉平原的经济伴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有较快发展,人口增长,农田垦辟,堤防增加,市镇崛起。与此同时,江汉平原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有时甚至出现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江陵府“三海”的屡淤屡决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早在三国时期,孙吴为拒魏兵即在江陵城北筑堰并引城西北至东北一带的河湖之水,渚水成海,周围数十里,称之“北海”。隋唐之际,北海已干涸成田。五代时,高保融再蓄北海以遏敌军。^③入宋以后,二百年间,“北海”经历了几番重大变化。先是北宋统一后,“北海”失去了作用,“太祖常(尝)令决去之”^④。南宋前期,为阻止金兵南下,宋军再次启用人工海的办法,在江陵城外筑堤蓄水,先后修建了“三海八柜”。“三海”“引沮、漳及诸湖之水注三海,绵亘数百里,弥漫相连”^⑤。南宋后期,由于泥沙淤积,“三海”基本上已淤为农田。淳祐五年(1245年),孟珙守江陵,登城遥望“三海”,叹道:“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变为

① 参见前揭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第二章“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的发展”第三节“唐代长江中游地区的土地垦殖”,第五节“农田水利事业的兴修”。

② 参见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载《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

③ 《舆地纪胜》卷六四《荆湖北路·江陵府·景物(上)》“北海”条。

④ 《宋史》卷三九七《刘甲传》。

⑤ 《舆地纪胜》卷六四《荆湖北路·江陵府·景物(上)》“三海”条。

桑田者，敌一鸣鞭，即至城外。”^①于是急令废田还湖，“三海”再次成为江陵天险。元朝初年江陵战事平息后，廉希宪入城，见“江陵城外蓄水捍御，希宪命决之，得良田数万亩”^②。

从田到“海”，再从“海”到田，几番变迁，人类活动不断地对自然环境加以利用、改造。

除了沿江（汉）堤防的修筑，南宋末年垸田的兴起对本区自然环境的变化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垸田的出现，使过去难以利用的沼泽洼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本区的地理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由于此一时期人口压力还不大，平原湖区的围垦尚处在起步阶段，荆江堤防尚未连成一线，本地区的人地关系仍处在相对和谐的阶段。

入元以后，湖区的垦殖进一步发展。垸田的扩展带来了垦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提高，也使得荆江两岸原有的众多分流穴口渐被堵塞，荆江水位较宋代有所上升，水灾发生的频率有所加快，但元时期尚有条件来重开穴口以减轻水患。

明中叶以后，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日渐失调，人类改造自然的的活动所产生的不利后果日益严重。例如，荆江、汉水两岸的堤防体系逐渐形成，江、汉重要支流的堤防亦得到增修，两岸穴口不断湮塞；加上垸田的渐趋饱和，原先蓄泄兼具、调节水量的众多湖泊大量消失，从而影响了气候、水文等方面原有的生态平衡。清代，由于人口激增，堤垸膨胀，而且堤防体系业已形成，河湖阻隔，湖区内水系紊乱，已很难“退田还湖”。堤垸过度膨胀的结果是排水困难，内渍严重，渍灾成为洪灾之外垸田生产的大害。显而易见，“江汉平原旱少涝多及水灾日重尽管与降雨分布不均、江河湖交织、地势低下等自然因素有关，人为造堤围垸阻塞水流渲泄则是主要因子”^③。随着时间的推移，堤垸越修越多，使得水涨堤高，堤高水涨，如此连锁反应，造成恶性循环。近千年来本区洪灾频率

① 《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

②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③ 参见前揭张家炎《十年来两湖地区暨江汉平原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

的增强,基本与垸田开发的进程同步。

通过本研究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①,不难发现,人类活动对本区自然环境的影响,集中表现在沿江(汉)堤防体系的形成与堤垸的日益扩展,改变了江汉平原的水系格局,导致洪水位的上升,并对河道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改变水系格局方面,沿荆江、汉水与各重要支流的堤防以及平原湖区垸堤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江汉湖群以及荆江—洞庭湖关系的演变。如荆江北岸地区,由于荆江北岸、汉水两岸及荆河上中游堤防的修筑,江汉平原形成了汉北、汉—荆、江—荆三个相对封闭、外高内低的地域单元,并造成了明前期至清朝中后期江汉湖群的持续扩张。在荆江南岸地区,虎渡、华容、藕池、松滋等支河堤防将河道固定,巨量泥沙由此进入洞庭湖,造成了江湖关系的剧烈演变。

有关洪水位的上升,周凤琴先生的研究较为集中。周先生根据荆江地区大量的古遗迹、古墓葬、古水痕和史料的分析以及地质地理的调查研究,绘制出荆江近 5000 年来洪水位的上升曲线图^②,图中可见,在距今 5000—2200 年间的新石器至秦汉时期,荆江洪水位的上升甚微,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在距今 2200—800 年间,即秦汉至南宋时期,荆江洪水位的有所上升,但幅度较小,处于缓慢上升阶段;距今 800 年至当代,上升量越来越大,为强烈上升阶段。近 5000 年来,荆江洪水位上升量约 13.6 米,其中宋代以来大约上升了 10 米。

宋代以来洪水位的上升正与堤防修筑密切相关,二者形成互为迭加的因果循环:由于洪水危害,人们修堤防洪;而大堤的修筑,导致洪水归槽,加上泥沙淤积、穴口堵塞,使得洪水位上升,反过来又迫使人们进一步加高堤防,结果使得荆江洪水位不断攀升,终于形成高堤防、高水面的险要形势。

① 如前揭金伯钦等《江汉湖群综合研究》以及周魁一、周凤琴、林承坤、张修桂、蔡述明等多人的论著,详见本书所附“主要参考文献”。

② 参见前揭周凤琴《荆江近 5000 年来洪水位变迁的初步探讨》。

有关河道的变迁,堤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河床的演变、泥沙沉积方式的改变等方面。如荆江河道,宋代以后,荆江堤防及护岸工程的修筑限制了上荆江河道的摆动,对稳定河势起了重要作用;但在下荆江河段,由于边界条件不同,崩岸明显多于上荆江,沿崩岸地带渐次修筑的堤防(包括大量的月堤)不断巩固了新形成的河弯凸岸,河曲随之发育。同时,沿江堤防及护岸工程将水流逼向对岸,冲刷对岸及河道中的洲滩,促使河岸崩塌,加速河道演变。泥沙沉积方式的改变,主要表现为堤防的形成、洪水的归槽使得泥沙沉积的方式由过去的泛滥式面状淤积改变为堤外线状堆积^①,由此造成河床、滩面淤积抬高。荆江大堤的修筑,使大堤内基本停止淤积,而堤外滩面泥沙堆积逐年淤高,造成现代河漫滩沉积的超厚现象。目前的荆江大堤外滩,从沙市至新厂段一般淤高5—8米,而局部地段高差较大,以沙市为例,内滩高28—30米,外滩高38—40米,局部还在40米以上,高低差达10米许。汉水下游与荆江的情形类似。清后期时,随着系统堤防的形成与来沙的增加,汉水下游河床的淤垫抬升情况已较为严重,堤外滩地亦不断淤高,20世纪50年代初,汉水下游河段堤顶更是高出附近平地5—6米。^②

从总体上看,宋元时期江汉平原的人地关系处在一个相对和谐的时期,其基本特征是人适应着环境,遵循着自然环境的内在规律,对环境因势利导;人与自然之间能够和谐相处,良性互动。由于人口压力不大,自然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人们还没有必要大规模地与水争地,表现在堤防上即是长江、汉水的干堤只限于某些区间,江、汉皆有众多分流穴口;大多数河滨湖畔筑堤垦田的活动还不普遍,区域开发处在上升阶段,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南宋中后期,垸田兴起,江汉平原开启了从沼泽洼地向良田沃野转变的步伐,明清以后,垸田大兴,农业经济飞速发展,带动社会经济全

① 参见前揭赵艳《江汉湖群历史环境演变》,王剑等《论长江流域河湖体系演化与洪灾防治》,卢金友《荆江三口分流分沙变化规律研究》。

② 参见前揭鲁西奇等《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五章“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建设的时空特征及其制约因素”,第398页。

面进步。但与此同时，正如侯仁之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例如把原本是沮洳沼泽之地，开辟为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良田，可是也出现了不利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①“九穴十三口”被堵塞，江、汉大堤连成一线，筑堤围垦不断扩展，原先蓄泄兼具、调节水量的河汉湖泊逐渐消失，从而影响了气候、水文等方面原有的生态平衡。北宋中期人郑獬在谈到家乡安陆时曾感叹：“天下平治之久，生齿大繁，暴害天物亡休息。异时汉溪多鱼矣，不售则反弃诸河，今财充釜而已，是川泽不足以胜网罟。”^②郑獬的话可能有夸张，但形象地反映出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不利扰动的问题在当时即已开始出现。明中叶以后，伴随着垸田的日渐膨胀，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宋元时期的相对和谐，到明中叶以后的逐渐失调，再到清代前期严重失调的历程。

二、宋元明清时期江汉平原人地关系的主要特点

（一）气候的变化推动了本区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

作为自然环境变化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气候的变化必然引起土地资源及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由此引起农业产出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人口分布、经济开发、社会进程。

宋初延续了唐代的温暖期，建隆三年（962年）尚有大象在江汉平原的黄、安、复等州活动。^③温暖的气候带来了丰沛的降水，引起了北宋初期较多的水灾^④，同时使入湖水量增加。随后，气候逐渐向寒冷过渡，但其间寒暑交替，至南宋乾道二年（1066年）江汉平原南面的洞庭湖流域仍有大象出没^⑤，其后则再未见有类似记载。与此同时，乾道（1165—1173年）以后，江汉平原旱灾较

①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载氏著《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宋）郑獬：《郾溪集》卷一七《虎说》。

③ 参见《文献通考》卷三一一《物异考一七》。

④ 参见本书表5-1《宋元江汉平原洪涝灾害简表》。

⑤ 参见《文献通考》卷三一一《物异考一七》。

北宋时明显增多^①。

一方面是水灾的频发，显示出年内降雨变化趋大，导致了江河湖泊的水位季节性变化加大，水患增多，由此刺激了更多堤防的修筑。堤防的不断修筑，使得本来易于摆动或迁徙的河道受到束缚，造成行洪不畅，容易引发更为频繁与严重的洪涝灾害；而洪涝灾害的加剧又促使人类进一步加强堤防建设。如此互为因果，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是旱灾的增多，其结果使湖水蒸发加大，湖泊淤浅甚至干涸，江河枯水期时港汊交织，洲滩显露。这就为湖区围垦以及垸田在南宋末年的兴起并在元明以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随着人口的增长、治水能力的提高、筑堤围堰技术的成熟，那些淤浅干涸的湖泊逐渐成为围垸的对象，发展至明清以后，湖泊面积逐渐萎缩，垸田成为本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利用方式。

（二）以堤防为核心的人类活动从根本上影响着本区地理面貌的变迁

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不是单纯的自然演化，而是自然与人为因素相互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环境变迁必须考察环境演化的自然规律，也不能忽视人类活动的影响。

在影响本区地理面貌变迁的众多因子中，以堤防为核心的人类活动发挥了某种根本性的作用。宋元时期，本区的经济开发取得了显著成就：人口密度上升，分布渐广；沿江沿湖的低洼地带得到垦辟；新的县级政区在湖区和丘陵地带出现；江陵、鄂州等大型城镇日渐成长，进而构成区域性市镇网络的中心；乡村小集市较为普遍，即使在水网纵横的河湖洼地也有零星分布……明清以后，以垸田为代表的水利田大量出现，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过去的沮沼之地变成了鱼米之乡，“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格局开始形成，江汉平原的地理地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上述经济成就，无一不是在堤防的严密保护下取得的。堤防是本区赖以生存的基本前提，堤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宋元明清时期本区的开发，它牵动着本区经济开发、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全局，直到今天乃至

^① 参见本书表 5-2 《宋元江汉平原旱灾一览表》。

未来，堤防建设仍然是本区可持续发展的命脉所系。

另一方面，堤防体系的形成也给本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上文所述沿江（汉）堤防体系的形成与堤垸的日益扩展，改变了江汉平原的水系格局，导致洪水位上升，并对河道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皆是明证。不能不看到，在本区引以自豪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背后，本区付出了生态失衡、灾害加重的代价。

（三）自然资源的状况制约着本区的开发进程

人类活动固然有巨大的能动作用，但人类活动不能不受水、土、植被等多种自然资源的制约。区域自然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等种种状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经济开发的深度。

垸田的兴起与发展，是宋元明清时期本区对水土资源高水平综合利用的突出成就，但垸田的过度扩张与膨胀，又导致了对水土资源的破坏，带来湖泊演变加剧、渍涝灾害滋生。其结果是平原湖区整个生态环境的失衡，人类遭到自然的惩罚，本区的开发进程受到干扰。

不过，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种类、数量、规模、范围上都在不断进步。^①而且，宋元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人类活动也并不仅仅是单方面地消耗自然资源、加剧人地紧张，而是既有利用也有保护。以植被资源为例，笔者在田野考察、查阅《湖北省文物普查资料记录表》时，看到一方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的石刻资料，颇能说明问题。该石刻在黄梅县五祖寺沙垵东北约100米处岩石上，1992年6月24日黄梅县博物馆文物补查时发现，保存完好，刻石称：“乙未政和五年起首栽杉，至甲辰宣和元年住手，共计一十四万七千二百株。”^②政和五年（1115年）至宣和元年

^① 参见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自然资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② 湖北省黄梅县五祖寺管理处：《湖北省文物普查资料记录表》“五祖寺石刻”，湖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印制，内部资料，1992年。

(1119年),不过短短四五年间,仅此一处便栽杉14万多株,反映出当时人在植树造林方面还是下工夫的。类似情况,显然不止此一处存在。正是由于在资源消费的同时能有意无意地补充、保护,人们才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代代相传。

(四) 区域环境的特征造就了生活方式的特色

自诞生伊始,人类的生活方式就无处不在地打上了生活环境的烙印。宋元明清时期,本区的环境变迁与经济开发区相互作用、彼此交融,人们在不断创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人文景观的同时,也在受到自然界的深刻影响。无论是聚落的选址,还是饮食的结构、出行的手段;无论是生产活动的方式,还是精神世界的追求、民俗民风的内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鲜活地打上了本区特有的以人、地、水三者关系为核心的环境特征的烙印。

总而言之,宋元明清的近千年,是江汉平原人地关系不断变动、日渐紧张的千年。宋代以来,围绕着沿江筑堤、湖区围垦等活动,江汉平原得到有层次的开发;堤防体系的建立作为本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为重要的手段与结果,对本区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垸田的发展使江汉平原经历了从沼泽洼地到良田沃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人类活动也给江汉平原的自然环境造成了深刻影响。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以明中叶为界,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人与自然的关系较为和谐;之后,在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下,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逐渐失衡。值得庆幸的是,对这种失衡的纠正、回调,在20世纪末已展现曙光。

当然,今天已有不少研究者意识到:历史学领域有关人地关系演变的研究,应在复原历史环境的基础上,对各时段的人地关系状况作出评判,进而探索人地关系演变的规律;然而,要做到真正客观、准确、科学的“复原”几乎没有可能,更遑论“评判”。本研究试图尽可能地接近事实,因而对所凭藉的历史资料加以切实鉴别,对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加以细致分析,但是,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即使在这相当有限的时空内,人地关系仍有着相当丰富的内涵和相当复杂的多样性,我们的研究还有待拓展和深入。

因此,这里是本书的结束,也是新的研究的开始。

主要参考文献

一、基本古籍

- (汉) 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 年校点本。
- (汉) 班固:《汉书》, 中华书局 1962 年校点本。
- (梁) 沈约:《宋书》, 中华书局 1974 年校点本。
- (唐) 李延寿:《南史》, 中华书局 1975 年校点本。
- (后晋) 刘昫等:《旧唐书》, 中华书局 1976 年校点本。
- (宋) 欧阳修:《新五代史》, 中华书局 1974 年校点本。
- (元) 脱脱:《宋史》, 中华书局 1985 年校点本。
- (明) 宋濂:《元史》, 中华书局 1976 年校点本。
- (清) 张廷玉等:《明史》, 中华书局 1974 年校点本。
-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 1956 年校点本。
-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2004 年校点本。
- (宋)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王溥:《唐会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校点本。

(宋) 郑樵:《通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元)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

(清)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 1957 年缩印本。

(宋)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台湾大化书局 1979 年版。

《水经注》,武英殿聚珍本,明崇祯二年严忍公等刻本,四部备要本;宋本《水经注》,北京图书馆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杨守敬、熊会贞注疏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陈桥驿校证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唐)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 1983 年校点本。

(宋) 乐史:《太平寰宇记》,光绪八年金陵局刊本;《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 2000 年影印本。

(宋) 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 1984 年校点本。

(宋) 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宋) 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輿胜览》,中华书局 2003 年校点本。

(明) 李贤等:《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 1990 年影印本。

(清)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中华书局 2005 年校点本。

(清)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部丛刊本。

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湖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元年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影印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嘉靖元年刻本。

万历《湖广总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1996 年影印福建省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

雍正《湖广通志》,雍正十一年刻本。

民国《湖北通志》,清宣统三年修,民国十年刻本。

康熙《荆州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乾隆《荆州府志》,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光绪《荆州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光绪六年

刻本。

顺治《江陵志余》，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顺治七年刻本。

乾隆《江陵县志》，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光绪《续修江陵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光绪三年宾兴馆刻本。

康熙《监利县志》，康熙四十一年修，海南出版社 2001 年影印故宫珍本丛刊。

同治《监利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同治十一年刻本。

乾隆《枝江县志》，乾隆五年刻本，海南出版社 2001 年影印故宫珍本丛刊。

同治《枝江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同治五年刻本。

康熙《松滋县志》，康熙三十五年刻本，海南出版社 2001 年影印故宫珍本丛刊。

同治《松滋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同治八年刻本。

同治《公安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同治十三年刻本。

乾隆《石首县志》，乾隆六十年刻本，海南出版社 2001 年影印故宫珍本丛刊。

同治《石首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同治五年刻本。

同治《重修嘉鱼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同治五年刻本。

乾隆《荆门州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乾隆十九年刻本。

万历《承天府志》，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影印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三十年刻本。

乾隆《钟祥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乾隆六十年

刻本。

康熙《潜江县志》，康熙三十三年刻本，海南出版社 2001 年影印故宫珍本丛刊。

光绪《孝感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光绪八年刻本。

嘉靖《汉阳府志》，上海古籍书店 1963 年影印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

乾隆《汉阳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乾隆十二年刻本。

同治《续辑汉阳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同治七年刻本。

康熙《湖广武昌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影印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弘治《岳州府志》，上海书店 1990 年影印天一阁藏明弘治刻本。

隆庆《岳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 1963 年影印天一阁藏明隆庆刻本。

康熙《岳州府志》，康熙二十四年刻本，中国书店 1992 年影印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

乾隆《岳州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影印乾隆十一年刻本。

乾隆《华容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影印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光绪《华容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影印光绪八年刻本。

光绪《巴陵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影印光绪十七年岳州府四县志本。

万历《华容县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校点本。

（清）齐召南：《水道提纲》，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国学基本丛书本，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清)黎世序、潘锡恩:《续行水金鉴》,国学基本丛书本,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清)俞昌烈:《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同治四年湖北藩署刊本。

(清)胡祖翻:《荆楚修疏指要》,同治十一年刻本。

(清)王凤生:《楚北江汉宣防备览》,北京线装书局 2004 年影印道光刻本。

(清)倪文蔚:《荆州万城堤志》,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清)舒惠:《荆州万城堤续志》,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唐)元稹:《元氏长庆集》,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6 年重印明弘治元年钞本。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中华书局 1958 年校点本。

(宋)张洎:《张乖崖集》,中华书局 2000 年校点本。

(宋)王禹偁:《小畜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宋)刘敞:《公是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宋)郑獬:《郕溪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刘攽:《彭城集》,中华书局 1985 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陶弼:《邕州小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吕陶:《净德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宋)曾巩:《曾巩集》,中华书局 1984 年校点本。

(宋)刘摯:《忠肃集》,中华书局 2002 年校点本。

(宋)王安礼:《王魏公集》,豫章丛书本。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 2001 年校点本。

(宋)苏轼:《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宋)苏辙:《栞城集》,中华书局 1990 年校点本。

(宋)黄庭坚著,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 2003 年校点本。

(宋)张耒:《张耒集》,中华书局 1990 年校点本。

(宋) 张舜民:《画墁集》,中华书局 1985 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 黄裳:《演山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 吴则礼:《北湖集》,涵芬楼秘笈本。

(宋) 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 李纲:《梁溪先生全集》,道光十四年陈氏重刊本。

(宋) 王庭珪:《卢溪文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 胡寅:《斐然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 汪应辰:《文定集》,武英殿聚珍本丛书。

(宋) 王之望:《汉滨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 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校点本。

(宋) 罗愿:《鄂州小集》,中华书局 1985 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 朱熹:《诗集传》,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版。

(宋)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版。

(宋) 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别墅欧阳棨刊本。

(宋) 王十朋:《梅溪先生集》、《梅溪先生后集》,明正统五年刘谦等刻,天顺六年重修本。

(宋) 楼钥:《攻媿集》,中华书局 1985 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 袁说友:《东塘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 赵蕃:《淳熙稿》,中华书局 1985 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 王炎:《双溪类稿》,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 彭龟年:《止堂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 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同治十年大儒家庙重刊本。

- (宋) 蔡戡:《定斋集》, 常州先哲遗书本。
- (宋) 洪适:《盘洲文集》,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薛季宣:《浪语集》,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范成大:《范石湖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 (宋) 杨万里:《诚斋集》,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叶适:《叶适集》, 中华书局 1983 年校点本。
- (宋) 戴复古:《石屏诗集》, 清嘉庆道光间临海宋氏刊本。
- (宋)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 中华书局 1985 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 孙应时:《烛湖集》,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陈造:《江湖长翁集》,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张栻:《南轩集》,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曹彦约:《昌谷集》,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黄榦:《勉斋集》,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刘宰:《漫塘集》,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刘过:《龙洲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校点本。
- (宋) 魏了翁:《鹤山集》,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明崇祯十一年重修万历二十六年景贤堂刻本。
- (宋) 姜夔:《白石道人诗集》,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吴泳:《鹤林集》,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赵善括:《应斋杂著》,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项安世撰, (清) 秦恩复钞本:《平庵悔稿》, 宋集珍本丛刊, 线装书局 2004 年版。
- (宋) 李曾伯:《可斋杂稿》、《可斋续稿》,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陈杰:《自堂存稿》,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宋) 刘辰翁:《须溪集》,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元) 郝经:《郝文忠公陵川集》, 乾隆五十九年王鏊刊本。
- (元) 程钜夫:《雪楼集》, 湖北先正遗书本。
- (元) 刘敏中:《中庵集》, 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元) 柳贯:《待制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元) 宋褰:《燕石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元) 傅若金:《傅与砺诗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元) 苏天爵:《滋溪文稿》,中华书局 1997 年校点本。
- (元) 陆文圭:《墙东类稿》,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明) 杨士奇:《东里文集》,中华书局 1998 年校点本。
- (清) 魏源:《魏源集》,中华书局 1976 年校点本。
- (清) 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光绪二十九年刻本。
- (清) 杨守敬:《杨守敬集》,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 (宋) 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小石山房丛书本。
- (宋) 罗泌:《路史》,四部备要本。
- (宋) 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 1983 年校点本。
- (宋)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 2000 年校点本。
- (宋) 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 2002 年校点本。
- (宋) 陆游:《入蜀记》,中华书局 1985 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宋) 张世南:《游宦纪闻》,中华书局 1981 年校点本。
- (宋) 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 1991 年校点本。
- (宋) 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 1981 年校点本。
- (明) 宋应星:《天工开物》,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 (清) 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中华书局 1984 年校点本。
- (清) 陈运溶辑:《荆州记》,麓山精舍丛书本。
- (清) 陈诗:《湖北旧闻录》,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校点本。
- (汉) 韩婴:《诗外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版。
- (唐) 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校点本。
- (宋) 李昉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 1961 年排印本。

(宋) 李昉等:《文苑英华》, 中华书局 1966 年影印本。

(宋) 王应麟:《玉海》, 大化书局合璧本。

(明) 解缙等:《永乐大典》, 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

(清)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60 年校点本。

(清) 陈梦雷编纂, 蒋锡廷校订:《古今图书集成》, 巴蜀书社 1985 年版。

二、现当代论著

著作类 (含论文集、资料汇编、工具书)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 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自然资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1988 年版。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 岳麓书社 2003 年版。

冀朝鼎著, 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尹玲玲：《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齐鲁书社 2004 年版。

梅莉、张国雄、晏昌贵：《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 1963 年版。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石泉、蔡述明：《古云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本书编写组：《湖北农业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章开沅等主编：《湖北通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版。

宋豫秦：《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杨大禹：《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张驰：《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

黄芝岗：《中国的水神》，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年影印本。

程民生：《神人同居的世界——中国人与中国祠神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 1993 年影印本。

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7 年版。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本书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中、下册，水利电力出版社 1979 年、1987 年、1989 年版。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本书编写组：《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 1979 年版。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研究室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本书编委会：《荆江大堤志》，河海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王兆虎等：《湖北堤防纪要》，民国十四年（1925 年）石印本。

本书编委会：《湖北水利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 年版。

湖南省水利志编纂办公室：《湖南省水利志》（内部刊行本），第一分册，1985 年；第二分册，1987 年；第三分册，1985 年；第四分册，1986 年；第五分册，1990 年。

本书编写组：《江陵堤防志》（内部发行本），1984 年。

本书编写组：《江陵县水利志》（内部发行本），1984 年。

本书编写组：《华容县水利志》，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地理卷》上、下册，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乔盛西等编著：《湖北省气候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县市概况》，1984 年铅印本。

梁淑芬等编著：《湖北省自然灾害及防御对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版。

胡兆量等：《地理环境概述》，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乔盛西、唐文雅：《中国亚热带气候》，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李天杰等编：《土壤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被编辑委员会：《中国植被》，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干铎主编：《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农业出版社 1964 年版。

孙颌等：《中国农业自然资源与区域发展》，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年版。

祝慈寿：《中国工业技术史》，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

轻工业学院等编：《陶瓷工艺学》，轻工业出版社 1980 年版。

闰国年：《长江中游湖盆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及地貌的再现与模拟》，测绘出版社 1991 年版。

蔡述明等：《江汉平原四湖地区区域开发与农业持续发展》，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金伯欣等：《江汉湖群综合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版。

四川省水利电力厅等：《都江堰》，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6 年版。

林承坤：《长江三峡与葛洲坝的泥沙及环境》，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

谭其骧：《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中国唐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 1988 年版。

陈本立主编：《湖北历史文化论集》，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8 年版。

李锦章主编：《湖北历史文化论集》（二），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许厚泽、赵其国主编：《长江流域洪涝灾害与科技对策》，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杨怀仁、唐日长主编：《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9 年版。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水文局编：《长江中下游河道基本特征》（内部刊印本），1983 年。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水文局编：《长江中下游河床演变分析文集》（内部刊行本）第一辑、第二辑，1993 年。

长江水利委员会等编：《长江水利史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水利史研究论文集》第一辑，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李仪祉：《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8 年版。

陈宜瑜主编：《中国湿地研究》，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年版。

林业部主编：《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中国湿地保护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6 年版。

彭雨新编：《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刘纬毅辑：《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 1982 年版。

王自强主编：《中国古地图辑录·湖北省辑》，星球地图出版社 2003 年版。

本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

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3 年版。

王孝廉：《华夏诸神·水神卷》，台北云龙出版社 2000 年版。

苑利：《龙王信仰探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2003 年版。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 1972 年版。

刘翠溶、伊懋可：《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1995 年版。

宋史研究会编：《宋史研究集》第 1—35 辑，台北“国立编译馆”、兰台出版社 1958—2005 年版（第 2 辑起改为宋史座谈会编）。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美] 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日] 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美] 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日] 长瀬守：《宋元水利史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 1983 年版。

[日] 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編：《中国水利史論集（佐藤博士還曆記念）》，（東京）国書刊行会 1981 年版。

[日] 中国水利史学会編：《中国水利史論叢（佐藤博士退官

記念)》,(東京)国書刊行会 1984 年版。

[日] 森田明編:《中国水利史の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 1995 年版。

Göran Aijmer: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on The Hupeh-Hunan Plain, Central China: A Study in the Ceremonialism of the Transplantation of Rice*, The Ethnographical Museum of Sweden, Stockholm, Monograph Series, Publication No. 9, Stockholm 1964.

Peter C. Perdue: *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Robert B. Marks: *Tigers, Rice, Silk &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 History of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论文类(同一作者的多篇论文,不分主题统一列于该作者名下)

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朱士光:《历史时期江汉平原农业区的形成与农业环境的变迁》,《农业考古》1991 年第 3 期。

石泉、张国雄:《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 年第 1 期。

张国雄:《明代江汉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与垸田经济的关系》,《中国农史》1987 年第 4 期。

张国雄:《江汉平原垸田的特征及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农业考古》1989 年第 1~2 期。

张国雄:《清代江汉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与垸田生产的关系》,《中国农史》1990 年第 3 期。

张国雄:《清代江汉平原的水旱灾害与垸田生产》,《中国农史》1991 年第 3 期。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结构、地位考察》，《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

张国雄：张国雄、梅莉：《明清时期江汉—洞庭平原的人口变化与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期。

张车伟：《北宋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土地垦殖和生态环境》，《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张伟兵等：《历史时期人口与水灾关系探讨》，《人口研究》1999年第5期。

汪润元、勾利军：《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季刊》1994年第4期。

宋传银：《古代湖北人口发展的空间过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

宋传银：《历史时期湖北人口与环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3期。

宋传银：《宋代湖北人口与经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

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

谢元鲁：《长江流域交通与经济格局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

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详析》，《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

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移民及其阶段性人口增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

张家炎：《江汉平原清代中后期洪涝灾害研究中若干问题刍议》，《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

张家炎：《清代湖北的杂粮作物》，《古今农业》1996年

第1期。

张家炎：《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

张家炎：《十年来两湖地区暨江汉平原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

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垸田农业经济特性分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张家炎：《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杨果：《〈入蜀记〉所见南宋湖北人文地理》，《江汉论坛》1998年第2期。

杨果：《宋代江汉平原城镇的发展及其地理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杨果：《北宋时期湖北主户与客户的地理分布——以今湖北地区为例》，《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杨果：《〈吴船录〉对湖北历史地理研究的价值》，《江汉考古》1999年第2期。

杨果：《唐、五代至北宋江陵长江堤防考》，《中国地理历史论丛》1999年第2期。

杨果：《宋代荆江堤防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杨果：《宋代的鄂州南草市——江汉平原市镇的个案分析》，《江汉论坛》1999年第12期。

杨果：《南宋江汉平原“百里荒”考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杨果：《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聚落的变迁及其环境因素》，《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6期。

杨果：《宋代鄂州城市布局研究》，（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0辑，2006年2月。

杨果、陈曦：《宋代江汉平原水陆交通的发展及其与经济开发的关系》，《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2003年第3期。

杨果、陈曦：《宋代江夏地区制瓷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探析》，《江汉考古》2005年第3期。

杨果、陈曦：《宋元时期江汉平原自然灾害探析：种类、分布、影响》，《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

陈曦：《以江陵县为例看宋元明清时期荆北平原的水系变迁》，《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9期。

陈曦：《宋元明清时期荆江洲滩的变化及其对河道的影响》，《江汉论坛》2006年第12期。

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江汉论坛》1999年第9期。

彭雨新：《清顺治年间湖广等省兴屯始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张建民：《对围湖造田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述论》，《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

张建民：《清代江汉—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1987年第2期。

张建民：《明清农业垦殖论略》，《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

张建民：《明清汉水上游山区的开发与水利建设》，《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张建民：《试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农田水利》，《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

张建民：《论传统农业时代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张建民：《明代秦巴山区的流民与资源开发》，载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张建民：《清代秦巴山区的经济林特产开发与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2期。

张建民、鲁西奇：《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光明日报》2004年9月21日。

郑哲雄、张建民等：《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6期。

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鲁西奇：《台、垸、堤：江汉平原社会经济区域的形成、发展与组合》，《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鲁西奇、蔡述明：《汉水流域开发史上的环境问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7年第3期。

谭天星：《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

谭作刚：《清代湖广垸田的滥行围垦及清政府的对策》，《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

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宋平安：《清代江汉平原水灾害多元化特征剖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宋平安：《清代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王蕾：《明清时期江汉平原水患与城镇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魏子任：《中国古代的水神崇拜》，《华夏文化》2002年第2期。

曾雄生：《宋代的早稻和晚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

曾雄生：《宋代的双季稻》，《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曾雄生：《析宋代“稻麦二熟”说》，《历史研究》2005年

第1期。

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续）》，《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

包伟民：《宋代的粮食贸易》，《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史继刚：《宋代屯田、营田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曹家启：《宋代驿传制度研究述评》，载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漆侠：《关于南宋农事诗——读〈南宋六十家集〉兼论江湖派》，《河北学刊》1988年第5期。

刘文刚：《繁荣美奂的宋代田园诗》，《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刘蔚：《宋代田园诗审美取象的三大特点——以动植物为中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3卷第6期，2004年11月。

赵冈：《人口、垦殖与生态环境》，《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农林副业开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

蓝勇：《明清三峡地区农业垦殖与农田水利建设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

周宏伟：《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

周宏伟：《长江流域森林变迁的历史考察》，《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

吴松弟：《论区域经济开发过程中影响生态环境的诸因素》，载《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赵淑玲：《历史上人地观的演变及现实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

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

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

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热纳维耶夫·马萨—吉波：《从“境地研究”到环境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

张光直著，吴加安、唐际根译：《聚落》，载《当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张光直：《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

谢吾同：《聚落观》，《华中建筑》第14卷第3期，1996年。

钱耀鹏：《史前聚落的自然环境因素分析》，《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4期。

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文化中心的转移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

陈宗兴、陈晓键：《乡村聚落地理研究的国外动态与国内趋势》，《世界地理研究》1994年第1期。

管彦波：《论中国民族聚落的分类》，《思想战线》2001年第2期。

邓先瑞：《长江流域乡村聚落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5期。

邓先瑞、吴宜进：《长江流域住区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6期，2003年12月。

邓先瑞等：《关于江汉平原城市群的若干问题》，《经济地理》

第 17 卷第 4 期, 1997 年 12 月。

龚胜生:《两湖平原城镇发展的空间过程》,《地理学报》第 51 卷第 6 期, 1996 年 11 月。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 年第 1 期。

庄林德:《常德市域城镇体系发展的历史基础》,《经济地理》第 20 卷第 1 期, 2000 年 1 月。

黄进良:《近 500 年江汉平原湖区土地开发的历史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1 年第 4 期。

赵艳、吴宜进:《人类活动对江汉湖群环境演变的影响》,《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1 期。

赵艳:《江汉湖区的开发及其环境效应》,《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 年第 3 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昌青山瓷窑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1 年第 4 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江夏区新窑村窑址群的调查与发掘》,《江汉考古》2000 年第 4 期。

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梁子湖古瓷窑址调查》,《江汉考古》1998 年第 4 期。

武汉市博物馆:《黄陂县祁家湾镇宋王山北宋时期墓葬群》,《江汉考古》1998 年第 3 期。

武汉市博物馆:《洪山放鹰台遗址 97 年度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98 年第 3 期。

武汉市博物馆等:《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浮山窑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8 年第 3 期。

武汉市博物馆等:《湖北武汉江夏王麻窑址 1988—1996 年的发掘》,《考古学报》2000 年第 1 期。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汉市江夏区杨家澥窑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1 年第 2 期。

《武汉市江夏区陈家垅窑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1 年第 2 期。

武汉市文物管理处：《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北宋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武汉市文物管理处：《武汉市青山宋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孝感市博物馆等：《云梦王家山宋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1年第4期。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湖北黄陂县铁门坎遗址宋墓》，《考古》1995年第11期。

熊卜发、陈明芳：《湖北孝感市徐家坟宋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3期。

田海峰：《武昌县发现两座北宋瓷窑址》，《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

刘德银：《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湖北江陵鸡公山发现旧石器时代居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5月2日。

熊跃泉等：《湖泗窑初探》，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版。

汪家伦：《明清长江中下游圩田及其防汛工程技术》，《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

周凤琴：《荆江近5000年来洪水位变迁的初步探讨》，载《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周凤琴：《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载《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周凤琴：《从河道变迁研究探讨长江上游卵石的来量——以长江中游百里洲河段为例》，载《历史地理》第1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周凤琴：《云梦泽与荆江三角洲的历史变迁》，《湖泊科学》1994年第1期。

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张修桂：《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历史演变》，载《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张修桂：《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林承坤、陈钦峦：《荆江河曲的成因与演变》，《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5年第1期。

林承坤、陈钦峦：《下荆江自由河曲形成与演变的探讨》，《地理学报》1959年第2期。

施少华、林承坤等：《长江中下游河道与岸线演变特点》，《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2年第1期。

李长安：《桐柏—大别山掀斜隆升对长江中游环境的影响》，载《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李长安：《长江中游洪灾形成的地学分析》，《第四纪研究》2003年第6期。

李长安等：《长江流域泥沙特点及对流域环境的潜在影响》，《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年第4期。

张昌民：《现代荆江江心洲沉积》，《沉积学报》1992年第4期。

穆桂春、谭术魁：《人工地貌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0年第4期。

景才瑞、刘昌茂、郭柏林：《荆江河曲地貌特征》，《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程鹏举：《古代荆江北岸堤防考辨》，载《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刘毅平：《长江干堤病险堤坝的治理技术》，《西部探矿工程·岩土钻掘矿业工程》第11卷第3期，1999年5月。

白宪台、景才瑞：《论江汉平原以治水为主的国土综合整治对策》，《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4年第2期。

刘海燕、曹艳英：《江汉平原湿地开发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地理学与国土研究》第14卷第2期，1998年5月。

易朝路、蔡述明等：《江汉平原（四湖地区）和洞庭湖区湿地的分类与分布特征》，《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第6卷第1期，1998年3月。

左东启：《论湿地研究与中国水利》，《水利水电科技进展》第19卷第1期，1999年2月。

姜文来：《湿地资源开发可持续环境影响评价研究》，《中国环境科学》第17卷第5期，1997年10月。

雷慰慈：《长江流域生态形势、灾害趋势与湿地保护》，《地球科学》第24卷第4期，1999年7月。

蔡述明、周新宇：《人类活动对长江中游湿地生态系统的冲击》，《地理科学》1996年第2期。

王飞、谢其明：《论湿地及其保护和利用——以洪湖湿地为例》，《自然资源学报》1990年第5期。

邓德源、李开伦等：《湿地资源开发模式——兼论洪湖自然资源的创新利用》，《自然资源》1991年第5期。

任晓华、何报寅：《湖北省洪涝灾害与沿江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载许厚泽、赵其国主编《长江流域洪涝灾害与科技对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何报寅：《江汉平原湖泊的成因类型及其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2期。

熊治平：《上荆江河床演变规律探讨》，《泥沙研究》1996年第2期。

卢金友：《荆江三口分流分沙变化规律研究》，《泥沙研究》1996年第4期。

王明甫：《荆江与洞庭湖关系及防洪对策》，《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吴作平、杨国录等：《荆江—洞庭湖水沙关系及调整》，《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2002年第3期。

周魁一：《荆江和洞庭湖的演变与防洪规划的历史研究》，载《历史地理》第1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林承坤等：《洞庭湖的调节作用对荆江径流的影响》，《湖泊科学》2000年第2期。

苏成等：《洞庭湖的形成、演变与洪涝灾害》，《水土保持研究》2001年第2期。

殷鸿福、陈国金等：《长江中游的泥沙淤积问题》，《中国科学D辑》2004年第3期。

韩其为、周松鹤：《三口分流河道的特性及演变规律》，《长江科学院院报》1999年第5期。

王剑等：《论长江流域河湖体系演化与洪灾防治》，《岩相古地理》1998年第5期。

蔡述明、赵艳等：《全新世江汉湖群的环境演变与未来发展趋势》，《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傅云新、吴宜进：《江汉平原降水时空分布规律探讨》，《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7年第3期。

李文漪等：《湖北江汉平原及神龙架山区晚第四纪植被与环境》，载《中国北、中亚热带晚第四纪植被与环境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

赵艳：《江汉湖群历史环境演变》，武汉大学1998年博士学位论文。

吴宜进：《湖北省历史时期干湿变化与旱涝灾害研究》，武汉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

陈曦：《从荆江河道及两岸河湖的变迁看荆江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以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心》，武汉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后 记

在键盘上键下最后一个标点，东方已经发白。这本篇幅不大、撰写过程却不短的小书终于完稿。欣喜之际，“不能免俗”地想说几句感谢的话。

首先要感谢的是业师石泉先生。十五年前，笔者之一有幸成为石门登堂弟子，跟随先生学习历史地理；七八年后，笔者之另一人作为再传弟子，得以聆听先生教诲，并从先生大著中汲取无穷养分。正是在先生的指引下，我们开始了对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历史的探索，本书即是近十年来有关心得的结晶，虽分析未必精当，立论未必高远，但却忠实地遵循先生毕生倡导的求实与创新的治学原则，凡一字一句皆力求可以凭信、有所发明。我们希望，这些笨拙的努力，或许可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其次，我们要感谢众多的师友和机构：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师长、学友，到江汉平原多个县市的工作人员；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的评审专家，到武汉大学学术丛书编审委员会的成员；从法国国家科学中心、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历史学院资料室……正是来自这诸多方面的种种关心与支持，

使本课题的研究得以持久而顺利地进行。

我们这个研究团队还有一位未署名的“编外成员”，值得我们格外感谢。是他，陪伴我们，在骄阳似火的盛夏行走在村边地头，在风雪漫天的隆冬驱车在乡间公路；他不仅是我们的田野考察时最好的“护卫”、“司机”，他还为本书绘制了绝大部分的插图，没有他的帮助，本书的顺利完成是难以想象的。他的名字叫詹松，上世纪90年代初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现任湖北省某学院的中层领导和教师。

特别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雅红女士，她的严谨、认真，使本书减少了失误；她的开朗、明快，使我们的合作充满了欢乐。

著 者

2008年5月12日晨

于珞珈山寓所